

杭大人出版社

杭大軼事



图书编目数据

杭大轶事/郑良根编。--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杭大人出版社，2018.12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1）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00-5

I. 杭大轶事 II. 郑良根 III.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IV. 杭州大学--回忆录

杭大轶事

郑良根 主编

策 划：温时幸

封面设计：吴延风

封面题词：任 平

封面插图：吴延风

印章设计：任 平

封3插图：夏 超

封3题诗：施建基

出版发行：杭大人出版社（Hangdaren Press）

地 址：2376 Timbercrest Court, Ann Arbor, MI 48105, USA

网 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

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版 次：2018年12月第一版

本书网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hdysl.pdf>

开 本：小16K

字 数：229千字

定 价：免费阅读

国际书号：ISBN 978-1-970152-00-5

【杭大轶事】编委会

郑良根（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本科、81 级研究生）

施建基（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本科、81 级研究生）

孙敏强（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本科、81 级研究生）

陈建新（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本科、84 级研究生）



1979年7月14日，杭州大学化学系77级学生王俐在黄山巧遇邓小平一行。邓小平和卓琳在王俐的学生证上签名留念。



目录

<u>前言</u>	郑良根	8
<u>出版说明</u>	郑良根	11
第一章：高考		
<u>人生最忆是高考</u>	李纪定	14
<u>人生最忆是高考</u>	金秋芬	34
<u>人生最忆是高考</u>	杨艺敏	38
<u>人生最忆是高考</u>	阎兵	41
<u>人生最忆是高考</u>	夏超	44
<u>我直通杭州大学的高考之路</u>	郑良根	48
<u>百分之四点八里的一分子</u>	陈雯	54
<u>难忘的 1977—从田园到校园</u>	田书增	59
<u>1977，我的高考</u>	赵红	69
<u>两次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u>	陈建新	73
<u>幸运和感恩</u>	胡波	77
<u>芳华年代</u>	陈旭鸣	80
<u>一言难尽是高考</u>	孙淦钊	84
<u>最难忘的是高考，最感恩的是母校</u>	朱洪魁	87
<u>最忆高考</u>	魏立亭	93
<u>1978 年的高考是值得回忆的</u>	张晓音	95
<u>最忆是高考</u>	邱建华	101
<u>我的最忆是高考</u>	朱瑞蕊	103
<u>我的高考回忆</u>	孙奕蓉	106
<u>我的高考回忆</u>	盛祖仁	109

我的高考经历	承维琦	111
忆高考	刘 榕	115
入取	褚少英	118
高考：永远的青春记忆	陈 瑾	122
峥嵘岁月，相逢高考	任祝华	125
高考回忆两则	谢为群	128
天道酬勤	陈云舟	130
春风送我上大学	杨持光	134
1977：我的大学	卫军英	138
监考老师	方 巍	143
我的高考故事	鲍奕佳	145

第二章：入校

杭大报到	谢为群	152
杭大报到	周遇春	153
大学第一天	谢为群	154
杭大第一夜	夏 超	156
西溪河畔的迟桂花	陈建新	157
求学路	倪瑞杰	159

第三章：学习

四年寒窗	温时幸	162
排球与法语	温时幸	162
英语冠词“the”	陈 雯	163
杭大学习几则——啃词典等	谢为群	164
不可一日无此君	潘大安	172
教育的力量	周遇春	174

绝版英语电影	廖 诺	176
散文处女作	温时幸	177
失败的演讲	谢为群	178
杭大歌声	周晓康	181
拜票	郑良根	185
录音机	谢为群	186
录音机的回忆	廖 诺	187
体育课代表	陈 雯	188
英文老师替我收藏了一首打油诗	郑良根	189
本末倒置	周晓康	192
长跑达标与过目不忘	温时幸	194
三个暑假在杭大	殷国伟	194
杭大记忆	江 燕	195
挂课	宋宏亮	202
实验室里人和事	钟留群	204

第四章：生活

杭大情史	温时幸	212
外语系 77 级情史	温时幸	214
袁满的爱情	周遇春	215
寝室窗外的风景	谢为群	217
学校的舞会	周遇春	219
交谊舞	温时幸	220
演话剧	陈 雯	221
杭大外语 78 级毕业演出	宋宏亮	222
杭大食堂	宋宏亮	224
水仙花	周 农	226

<u>大排肉的功能</u>	廖 诺	228
<u>纪念我那被偷去的碗</u>	梅美林	229
<u>叫化童鸡与东坡肉</u>	温时幸	231
<u>妈妈的包裹</u>	倪瑞杰	232
<u>禁烟</u>	温时幸	233
<u>凭票香烟与饭后一支烟</u>	倪瑞杰	234
<u>难懂的专业术语</u>	倪瑞杰	235
<u>看电影</u>	林超英	235
<u>看电影</u>	周心红	236
<u>影院惊魂</u>	倪瑞杰	238
<u>室友情</u>	陈 雯	239
<u>个人卫生与摸黑洗脚</u>	温时幸	240
<u>内急+迅跑</u>	倪瑞杰	241
<u>抓小偷</u>	李卫星	241
<u>杭大记事</u>	蔡晓平	242
<u>难忘的高温</u>	倪瑞杰	244
<u>第一次班委会</u>	谢为群	245
<u>从那时的衣着想起</u>	谢为群	247
<u>入选杭大乒乓球队</u>	谢为群	249
<u>黄龙洞</u>	谢为群	251
<u>寒假里的闷罐车</u>	宋宏亮	253

第五章：师长

<u>沈善洪校长与老杭大领导对我的关怀</u>	史晋川	257
<u>“搭伙”记事</u>	任 平	262
<u>搭伙记</u>	蒋 遂	267
<u>蒋炳贤先生</u>	温时幸	270

陈立校长签名	金友元	271
忆吴熊和先生	孙敏强	272
怀念敬爱的老师	孙敏强	277
Jeskie 教授和毛昭晰教授	胡 波	283
拜访商亚南老师	温时幸	285
缅怀商亚南老师	叶子南	286
商亚南老师轶事二、三则	戚志红	289
追思恩师陈义镛教授	朱东卫	291
怀念戚文彬先生	骆红山	293
蒋忠泉老师	谢为群	297
莫美珍老师	谢为群	298
最 Nice 的吴浩敏老师	吴 磊	300
郑择魁先生百日祭	陈建新	302
缅怀陈桥驿先生	罗卫东	305
改字体	谢为群	309
很干净自豪	谢为群	311
系主任不都是老头儿吗？	史晋川	312
郑朝宗老师二、三事	钟留群	313
西溪河下 日月光华	董 平	316
杭大新村的往事烟云	任 平	323
听不懂的学问却依然崇敬	卫军英	331
老校长陈立和工业心理学	宋宏亮	334

第六章：同学

外语系 77 级新生代表	温时幸	337
世界语	倪瑞杰	339
好名字哟！	倪瑞杰	340

<u>同学情</u>	胡 波	341
<u>感触和启发</u>	胡 波	343
<u>老狗</u>	温时幸	344
<u>好为人师的“小鬼”</u>	温时幸	347
<u>鬼节话“小鬼”</u>	温时幸	348
<u>久违的同窗邬晓阳</u>	温时幸	350
<u>怀念郑明</u>	周遇春	351
<u>顾先生的高论</u>	倪瑞杰	353
<u>群众的呼声</u>	史晋川	354
<u>自画像</u>	肖兆才	355
<u>荒唐的评语</u>	温时幸	357
<u>可怕的眼神</u>	温时幸	358
<u>记忆碎片</u>	谢为群	359
<u>我在杭大过的第一个年</u>	陶宗德	361
<u>杭城见丹非</u>	温时幸	363
<u>相会芝加哥</u>	温时幸	365
<u>费城会友</u>	温时幸	368
<u>欢聚“揽月楼”</u>	温时幸	370
<u>记杭大外语系 77 级三十周年团聚</u>	周晓康	372

第七章：校园

<u>校园记忆四则</u>	谢为群	384
<u>黑板的变迁</u>	孙淦钊	390
<u>广播室</u>	周遇春	392
<u>杭大校广播站的经历</u>	宋宏亮	394
<u>生物系里宿舍楼</u>	钟留群	396
<u>花开堪折直须折</u>	宋宏亮	403

第八章：荟萃

<u>杭州大学：关于春天，一些难忘的瞬间</u>	孙敏强	406
<u>挥之不去的记忆</u>	殷企平	415
<u>路</u>	谢为群	419
<u>4 年与 40 年的认知变化</u>	沈加红	420
<u>杭大诗缘</u>	卫军英	425
<u>那诗，那歌，仍在轻扬</u>	任 平	428
<u>永远感恩我伟大的母校</u>	李共扬	434
<u>捐书记</u>	胡 波	439
<u>我向母校交作业</u>	周晓康	441
<u>“老掉牙”的词典</u>	周晓康	444
<u>关于杭州大学的客观评价</u>	祝 毅	446
<u>杭州大学“身世”概述（1952-1998）</u>	张美凤	448
<u>杭州大学源流小考</u>	郑良根	458
<u>杭州大学历史沿革示意图</u>	郑良根	464

前言

才忆校园书声朗，不觉两鬓竟成霜。我们逝去的青春呢？

路上车马今胜昔，花前楼馆似而非。我们杭州大学的校门呢？

自 1958 年杭州大学正式挂牌，我们的母校象杭州西湖一样，一直是一颗全国闪亮的明珠。它文脉久远，历经曲折，到 1978 年，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年内两届特别的新生到来，杭大开始焕发第二春。先是省内唯一的重点大学，继而跻身全国 211 名校，一直名列省级大学的前茅。

我们杭大人曾经是幸运的，自豪的。我们等来了邓公力挽狂澜，为我们重新打开大学校门。从此，一代人甚至几代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开启一个崭新的阶段。进入杭大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大荣耀。

然而，时至 1998 年 9 月，因高校合并，杭州大学被摘了牌子，变成西溪校区。从此，我们的杭州大学和我们的青春一样，只留在回忆里。我们杭大人何等遗憾！

有人说，假如地处杭州的这所综合型大学发展至今，那将是何等格局！我们知道，历史没有假如。我们也无意去评说这场高校合并的是非功过。我们只是回顾我们的青春。

承百年渊源，杭州大学经历了四十年。我们这些杭大人，较早的从 1978 年入校算起，至今也是四十年。四十年啊！人生有几个四十年！历史一瞬间，人生已大半，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半！每当我们想起自己逝去的青春，就想起我们已经消失的母校。因为，母校就是我们的青春。

四十年过去，杭大人数以万计。如今，很多人已经是学界名人，商界大款，政界精英，或者桃李满天下的默默园丁，还有社会各界难以计数的名流名媛。或不倦深耕于家乡本土，或游刃有余于全国

各地，或开枝散叶于五洲四海。不论身在何处，无分贫富贵贱，母校杭州大学，永远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杭大人”微信群是这个共同的精神家园里一个非常活跃的花坛。这里，人气旺、地域广、阅历深、感受强、主题明、才艺多。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不分先进后学，我们共同拥有曾经的杭大。这个纽带凝聚着杭大人一起缅怀青春岁月，抒发杭大人的情怀。“杭大人”微信群成了最活跃的杭大校友联谊会。建群一年来，日日高楼，昼夜无歇，散文佳作，诗词歌赋，书法画作等等接踵而至，精彩纷呈，目不暇给。有感于此，“杭大人”微信群发起人温时幸、金友元等，秉建群之初心，提议编辑出版《杭州大学回忆丛书》，将各位学友的名篇佳作汇编成册，既是记录我们的青春，也是对母校杭州大学的缅怀；既便于校友相互学习交流，亦或可流传于世！

本册《杭大轶事》即为丛书之一，是“杭大人”微信群校友们抒情忆旧的散文佳作选编。入选的文章内容、篇幅不拘，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巨制，也有短短的三言两语。凡校友回忆杭大旧事，兼收并蓄。“轶事”虽非正史，却是校友们真实的经历，有感而发，真情流露，读来饶有趣味，也充满了历史的痕迹。

比如高考，是在那个青春荒芜、怀才不遇的痛苦之后转折的关口，自然是充满着惊喜、奋斗、角逐、继而等待的焦虑和入榜的喜悦；

比如入校和学习，因人生开启了新的阶段，既充满了新鲜，更多是奋发立志，和刻苦求索；

比如生活、同学和校园，则在字里行间浸润着对当年青春的赞美，温馨校园里美好的回忆和对同学间友谊的怀念，也偶尔透露了年少时期的某些谬误，记录着成长的足迹；

比如师长，除了尊敬、缅怀和感恩，也往往记录着自己学业和事业的发展轨迹。

最后一部分荟萃，综合涉及多个方面。尤其推重其中有关杭州大学校史和学术成就地位的几篇重头资料，相信有助于读者对于母校的来龙去脉有个更全面的了解，以期求是育英，精神永存！

谈笑间，四十年。这样的抒情忆旧就不只是停留于过去的岁月，而是基于这些鲜活的回忆，透露着人生几十年之后的回望和对过去的审视，亦或夹杂着理性的剖析。回忆就不仅仅是回忆，而是充满着对人生青春美好的赞扬，对人生道路真谛的思考，因而也可能作为对未来人的警示，启迪和参考。如此，则幸甚。

《杭大轶事》编委会

郑良根执笔

2018年12月19日

[返回目录](#)

出版说明

“杭大人”微信群收集《杭大轶事》文稿始于数月前。校友们有感而发，踊跃献稿。大部分是原创首发，也有数篇曾经在其他书刊或者网站刊发过。凡是作者说明的，或者编者注意到的，转发的文章都注明出处。如有疏漏，或者原刊发者发现问题，请即联系本编者，或者通过校友群联络本群主，说明情况，我们可以修订和改进。

书中有几篇回忆高考的文章，原载《120 个回望 - 纪念高考恢复 40 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 月第 1 版。原作者送来分享，我们也征得主编祝毅先生同意。在此特别致谢！

本社遵从文责自负的原则，版权也归原作者所有。其他人引用须注明出处。本社对于投稿文章拥有出版发行权。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可能稍有文字修改，包括排版所需要的删减。

本书为电子版。这不仅出于出版发行开支的考量，主要为篇幅自如，修改再版灵活等诸多优势，更适合现代媒体发行，流传快捷而广泛。需要纸质版的校友可以通过按需印刷的方式获得。

本书为杭大人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杭州大学回忆丛书”第一本。2018 年第 1 版成于杭大人建群一周年之际。恳请读者建议指正。欢迎兄弟群交流，更欢迎各位杭大人继续赐稿，以资我们充实内容，适时修订再版。投稿邮箱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或者投到“杭大人”微信群。

本书策划人亦杭大人出版社社长温时幸为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毕业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学硕士，编辑发行《华人图书馆学电子期刊》二十多年，曾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德鲁斯分校出版多本电子版图书。如有有关电子出版等方面的事宜，欢迎通过以上投稿邮箱联系。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1：杭大轶事】

除感谢各位校友踊跃献稿外，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金友元、祝毅、任平、史晋川等校友多方面的支持；原杭州大学校办主任张美凤也有献稿。在此一并致谢！

《杭大轶事》编委会

郑良根执笔

2018年12月19日

[返回目录](#)

第一章：高考

人生最忆是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日语专业李纪定

1. 引子

1978 年的高考，已经过去了整整 40 年，然而当年的许多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去年秋季，杭大外语系 78 级“彩虹群”群主谢为群私信给我，希望我在次年 2018 年的年初担任一段时间的轮值群主。对此，我几乎不加思索就满口答应了。当时的脑子里就闪过了关于高考题材的念头，并在此后开始了《人生最忆是高考》的征稿活动。

今年春节，轮值期间，很多计划中的稿件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如期完稿。为了预防万一，利用春节假期前往墨西哥的飞行时间，我自己暗地写了几篇，以便青黄不接之际的滥竽充数。得益于彩虹群友的大力协助，稿件基本上如约而至，我想暗暗准备的文章可能用不着了。此后，应小学同学以及宁波业余日语学习班朋友的要求，我把这些零星的文章连成了一篇。

前不久，“杭大人”群主温时幸希望我提供“彩虹群”内各位的高考回忆，在【杭大轶事】中发表。借此机会，一并把自己的滥竽献上充数。

2. 陪考

1978 年春节刚过，宁波日语学习班同学金如国就急匆匆骑车来到了我家，说是高考落榜了。并且表示不太甘心，打算再考。

他报考的是厦门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宁波地区，和他一起报考厦大同一个专业的好像有好几个人。其他仨个人，前几天都已

经拿到了入学通知，得知了具体的报到日期。有的人已经开始准备行装了，而他至今没有入学通知的影子。看来厦大已经没了希望。

今天来到我家，除了回答我作为朋友对他高考结果的关心外，还明确表示绝不甘心于一次高考失败，决心78年再考。而且强烈要求我这个日语班的同学一定要陪他重考。

为了鼓励这位朋友，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热情，我想都没想就满口答应了陪他参加78级的考试。不过条件是只是陪他参加日语单科考试，不参加其他科目。然而，有意思的是，大概答应了这位朋友3-5天之后，他再次兴冲冲地来到我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说是收到了厦大的入学通知。我当然是热烈祝贺。

3. 备考

至今我还常常傻想，金如国的入学通知迟到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是不是冥冥之中有股力量故意通过他的“落榜”，来激起我的高考念想，通过他来诱导我开始把高考和自己挂上钩，开始认真考虑高考。

1978年当时，我身边有几类朋友。一类是绘画书法朋友，一般大我好几岁；一类是文学青年朋友，主要是交换小说（往往限定1-2个晚上），一般和我年龄相仿；还有一类是业余日语班同学，都大我好几岁，最大的大我二十岁。也有小我1-2岁的，但是非常有限，金如国就是其中之一。我的很多朋友都参加了77级的高考，唯独我没有行动。与其说没有行动，还不如说是无法行动。在我的心里，高考是非常高大的，根本没有把高考和小学毕业的自己作过任何联想。

许多参加了77级考试的高中毕业生朋友当中，比我小1-2岁的朋友和小4-6岁的邻居大都考上了大学。而比我大4-5岁的初中毕业生朋友大都没有考上。

我的邻居中有三个考上了杭大：2 女 1 男，分别是数学系，化学系和物理系。

朋友中有三个考上了浙大，一个考上了上海工业大学，一个考上了厦大。77 级落榜的朋友中有几个再次参加了 78 年考试。但是只有一个考上了杭州丝绸工学院，其他的考生都再次落榜了。

根据自己的总结，认识的朋友或邻居中间，高中毕业的几乎都考上了，落榜的大多是没有读过高中的，还有一个在读高一的邻居考生，在老师的再三动员之下，被动地参加了 77 级的考试，也取得了杭大的合格成绩。但是人小心大，没有选择进杭大而是选择了 78 年再考，后来果然上了复旦。

要我陪考的朋友上学去了。但是奇怪的是，我的高考决定似乎并没有因为他的不需陪考而有其他什么改变。参不参加考试，考什么科目都成了我的自由。我没有了任何压力，也没有了任何义务感。

我于 1972 年初被分配到一个机械制造厂工作。我没有轮到去做自己希望的机械加工，而被分配去做翻砂工（造型）。2 年之后开始半脱产搞宣传，本行工作也从造型工作调到了工作轻松的仓库。以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这主要是在 1974 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不仅没有去参加批斗会，批斗一个平时对待我们年轻人非常严厉的总支书记的活动，反而还应他请求，私底下代他写过几份“深刻检查”，帮他躲过了一场迫在眼前的游街。自那以后，总支书记好像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对我颇为照顾，也开始频频劝我写入党申请。

1976 年初，我被调到了宁波镇明纸箱厂（原为麻将发明者的陈家祠堂，现为天一阁的一部分，改造为麻将博物馆）担任印刷版面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工作非常轻松，除了需要新学一些制版手艺之外，没有其他难度。根据工厂接到的订单，工作量有所变化。一般

情况下每月也就一周不到的工作量。除此之外，不是看书就是练练书法之类，轻松无比。

1977 年下半年，一方面是工作不忙，另一方面似乎公司为了培养我，突然调我去公安局协助工作。除了正常的办案，当时还要参加很多被称为“刮台风”的突击活动。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根据平时的群众举报，列出一系列名单，通过居委会摸底排查，然后集中人力，大规模地半夜突击抓人。因此，也常常需要加班。我不用去现场抓人，但是需要配合突击活动，突击审查抓来的人。通宵达旦地审查“犯人”也是常有的事。

决定参加高考之后，在我再三要求下，大概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可以离开公安局了。然而还没有等我回到公司上班，公司又把我借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审查工作不要做了，调查工作却依然是大量的。记忆中，自从我决定高考后，我就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上过一天的班，没有一天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过书。因此我的备考，大部分都是晚上在家里摘录笔记，而且把笔记压缩成短小的内容，然后手工抄在纸片上，平时随身携带着这些纸片在长途公交和机帆船上阅读。不过这些能够在车船移动当中见缝插针学习的大多是文科内容。

在短短几个月的备考中，最占时间，至少占用一半以上时间，而又对后来的录取没有发挥过丝毫作用的是数学。决定高考后，一位北大毕业的日语老师动员我报考北大，并且告诉我说，即使其他科目的成绩再好，北大也不招收有零分科目的考生。于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补课，不过与其说补课应该说是从四年级重新学起。

数学本身是非常难以自学，需要有老师指导。我的周边几乎没有数学老师，一位挚友的母亲曾经是宁波教师进修学校的数学老师，也就是数学老师的老师。即使如此，我也因为一直出差在外，没人可以为我上课或补课。而且由数学老师的老师来教我这个数学初小

生也实在是浪费人才，浪费时间。因此，数学成了我高考复习的天敌，也是最让我无可奈何的科目。为了数学，我上蹿下跳，手忙脚乱地收集去年考题，学习最为基础的东西。而快到临考之前，教育部才宣布外语考生可以不计数学成绩。在此之后，我马上丢下数学，专心致志的开始学习其他科目。

宁波市还为历届生举办公开讲座。我参加过两次：一次地理课，另一次历史课。地点在礅石街小学（现在的天一广场）。记得两次课都是由宁波五中（效实中学）老师来上的课。地理课老师姓史，历史课老师的大名已经忘了。听了近二个小时的讲座，真有些顿开茅塞之感。甚至不自量力地感到如果有如此优秀的老师为你上课，何愁考不上大学（狂妄）？也是在那个公开讲座上，我看到我原来的同事周峰，一个高个英俊的小伙子和另一个同样高个英俊的小伙子总是在一起窃窃私语，有说有笑。入学之后，我在隔壁寝室遇到了后一位高个英俊小伙子，才知道他姓梅，大名为知浩。

政治课，同样也是由挚友的母亲，五中数学教师梅老师为我们张罗，请宁波五中的政治老师在五中的办公室里为我们几个考试开小灶讲了约 1 个小时。听课的六个考生中，我就认识一个考生王同学，后来考上了杭州丝绸工学院。

高考成绩中，我的政治课得了 83 高分，相信至少有 1-2 道题得益于那次五中补课。

高考复习中，除了自己试着写了三篇作文，中文课几乎没有花什么时间，不是不想下功夫，而是来不及下功夫。我有一位叫做沈祖望的国画朋友，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大学者，宁波天一阁的常客，也常在家中讲解古文。我平常经常去他们家串门，也常常和沈老先生交谈。而在高考复习期间我只去听过一次讲课，没有继续。主要是当时的我功利性太强，而沈老先生他们，用今天时髦的

话来说，是有些老年大学性质，追求内容完全不同。顺便说一句，这位沈老先生便是 1990 年前后浙江省省长沈祖伦的亲生父亲。

虽然时间紧迫，但是除了数学，我都觉得还有些办法对付，而且我自己针对高考提纲做的摘要，内容简明扼要，车上船里，纷纷秒秒都能用，效力较高。

4. 大病一场

然而几乎没有花费什么时间的是自己要报考的专业——日语。原来打算考前临时突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我打算在日语上花些时间的时候自己却大病了一场，整整高烧了一个月，一直烧到既不能站，也不能坐，只会昏昏沉沉地躺在地板上做恶梦。

当年宁波市政府为了支持历届生参加高考，给予已经工作的历届生一个月的休假时间，时间从当年的 6 月 20 日到 7 月 19 日。有关决定是在灵桥边上的“大世界”剧场开会宣布的。我和同样参加日语专业考试的日语培训班的繆源颖和宁波地区越剧团演员蒋晓英一起去大世界参加会议的。

自从决定参加高考以来，我几乎没有完整的学习时间，我衷心期待有整块的时间让我把零零星星背诵的政治，地理，历史系统地整理复习一遍，以求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就在当天会场，我在两人的中间落座之后，两位美女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你为何身上发烫呀？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发起了超过 39 度的高烧。

记得又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去医院就诊，因为发烧怕冷，半夜里我穿着衬衣和青年装去附近的宁波市第一医院就诊，医生告诉我，我的体温是 40.5 度。

5. 考试当天

由于高烧整月，身体虚弱无比，我已经有点担心我是否自己一人能够骑车来往考场了。考场分配下来了，就在隔壁的十一中学，一个在家里也听得到上课铃声的地方。而且，考试的教室还坐落在我小学母校运动场的上面。我感到赢了一分。

高考前一天，7月19日晚上7点多，已经在床上连续躺了大半个月，无论白天黑夜，只要闭上眼睛，就会神魂颠倒，恶梦不断的我突然发现自己脑子有些清醒了。马上量了一下体温，37.5度，体温下来了，我突然看到了一丝希望。

那天晚上，时隔一个来月，我睡了一个好觉。眼前没有了整夜漫天飞舞的地图，也没有了中外东西历史人物的张狂，更没有了在梦里永远也回答不了的数学考题。这是一个好兆头，我努力提醒自己，努力说服自己，努力激励自己：虽然几乎病了整整一个月，明天开始的连续三天的考场上，我这个重病人，或许还有一博的希望。

第一门是考政治，铃声一响，开始动笔。一口气回答了好几道题，一看手表，才过了5分钟，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干脆放下笔，让自己舒展一下紧张不已的神经。想想也是，从1966年到1978年，所谓的考试已经整整过去了12年，不紧张才会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呢。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为了合理分配体力，我已经打算放弃考试了。因为天气太过炎热，提前放假回来的浙大朋友劝我：你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前去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也是值得的。我自己也这样想。要是没有体力的问题，我早就跃跃欲试了。可是，担心高烧会随时再现，我心里真的直犯嘀咕。但是想起挚友母亲梅老师上班之前匆忙为我送来数学考题的情景，怀着满腔的感恩，我最后还是走向了考场。可是，我只看懂了一道得分为4分的因式分解题，又胡乱地做了几道其他题目便回家休息去了。

除了亲身体验过这个艰难困苦的自己，估计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一个人连续一个月发烧 39 度（最高为 40.5 度）以后的情景。除了每天步行来回考场 3-5 分钟，应付上下午各一场考试，我没有任何多余的体力。6 月 20 日-6 月 22 日的 3 天时间里，我把所有的体力都用在了考试。考试之外，就只能躺着，连坐的力气都没有。

第三天上午考中文，下午考日语。对于我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一天。其实当天上午开考后不久，我就已经知道自己又开始发烧了，不过体温应该不是太高，凭自己的经验大约在 38 度多一点，尚在可控范围之内。

下午考日语，打开日语卷子，我傻了眼。卷子很难，远远难过 77 级的考题。一眼望去，很多考题不懂，尤其有许多怪异生词。我掩卷足足坐了 5 分钟，心想只能明年再考了。后来转念一想，我遇到的如此窘境，其他考生不也一样吗。既然一样，还得矮中取长录取考生，于是继续做题。

交上考卷，步行在考场外面的走廊上，我如释重负，倍感轻松。突然有一个监考女老师指着我对边上的同事说，你看这个人还哼着小调呢。于是我赶紧闭口，作老实状缓步回家了。

即使不抄近路，回家也就 1-2 分钟的路程。一路熟人，一路聊天。聊高考，聊其他。1-2 分钟的路程，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回到家里，马上躺下，整整昏睡了三天。

6. 查阅成绩

考试以后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一位邻居老太太来找我，说她外孙女考试，自己估摸的成绩和班主任老师抄来的成绩差距很大。本人估计该有 390 几分，而老师抄来的成绩只有 340 几分，相差 50 分之多。因为考生本人比较自信，不太相信抄来的成绩，因此希望我陪她外孙女到高考办公室查阅一下。

高考办公室设在“宁波天然舞台”（剧场）附近的轻工业局里面。因为我骑自行车，小女孩步行，速度不同，而且那时的风气还很保守，虽然年龄差距“巨大”，但是男女一起外出还是有些心照不宣的忌讳，所以约好汇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分别出发，免得别人看到。

有趣的是，由于宁波地方太过窄小，途中汇合之后居然马上遇到了女孩的隔壁邻居蒋太太，她的娘家就在“天然舞台”的入口处附近。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弄得我自己都直想发笑。而且这个笑话节目一直保留在今天邻居聚会中。

到了高考办公室大门口，正要向传达室询问何处可以查询成绩时，突然前方有人直呼我的姓名。抬头一看，原来是同一个日语学习小组的同学，也是一起报考日语专业的，姓繆。三个人相互介绍之后，说明到此一游的缘由，便热聊起来。

繆同学是初中 67 届毕业生，高个小脸，性格明快，按今天的标准也是美女一枚。曾经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工作，后来调回宁波。除了一起学日语，我们也经常聊一些各自读过的小说，自然也谈起人生，常常一聊就是整整一个下午，甚至大半天，不知疲倦，也不知话题会终结在何处。

就在我们三人在高考办传达室附近摆开架子准备开始神侃时，我听到入口处传达室值班人员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电话好像来自杭州，并且在电话中大声和对方说：“什么？要我们找人？考外语的，什么？考日语的？这让我们怎么找呀？”

这些对话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宁波市区内学日语的人我大都认识，报考日语的人更加熟悉了。我走近传达室，打算自荐帮忙。这个时候通话尚在继续：“哦，姓李？叫什么名字呀，纪念的纪，一定的定，叫李纪定”。我想，天呐，这个世界哪有如此巧合的事情，这不是找我吗！

我隔着窗户向值班人员示意，要找的人就是我，于是电话那头要我直接说话了。电话来自省高考办公室。大意是，原来计划在宁波举办的日语专业口试，由于宁波地区只有一个人符合口试成绩线，所以口试老师就不特意来宁波，而是要考生自己去杭州参加面试。而且口试日期为后天下午，在此之前还必须通过体检。我马上借用纸笔做了最为简要的记录：后天，下午一点，杭州外国语学校，日语面试。

高考办的老师马上为我开了加急证明，让我务必傍晚之前就去指定的体检医院完成体检。于是帮助邻居查询成绩的任务，我是无法完成了。我匆匆交代繆同学几句，请她代为查询之后，就骑车直奔医院了。

说一句题外话，邻居女孩查询结果是：原先老师手工抄写成绩把 390 抄写成 340 了；更值得庆幸的是，她的成绩经省内复批，最后的结果是 407 分。

7. 口语面试

凭着高考办的加急证书，在医院畅通无阻地做完体检的次日，我坐火车去杭州参加日语口语面试。

在南山路柳浪闻莺附近的浙江美院大院里住了一宵，留出时间余地，我直奔杭州外国语学校。

1977 年春节，我和“画家”朋友钱伟俊（初中 67 届）来杭州出差时，曾经和他一起去杭州外国语学校看望过他宁波一中时代的恩师，时任杭州外国语学校校长的王老师。所以，关于杭州外语学校的方位，大致还有个印象。

参加日语口试的人不少，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被省高考办告知，只有日语笔试成绩 50 分以上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面试。或许也是因为 78 级的考题要远远难于 77 级，整个宁波地区只有我一

个人刚过该分数线。和我一起报考日语专业，日语成绩在 44 分的缪同学，还有日语成绩在 41 分的蒋同学都没有参加面试的机会。尽管我极力劝说两位美女不要轻易放弃填报其他志愿的机会，后来她们因为没有机会参加面试，放弃了填报其他专业的资格。而事实是，只有对宁波地区严格执行了 50 分以上才能参加面试的限制，其他地区似乎都没有遵守这一条，让我至今都为我的好友缪同学和蒋同学扼腕痛惜。

所以，在我眼里，参加面试的考生的成绩大都应该比我优秀，至少和我一样都是 50 分。为此我感到压力巨大。

主持面试的是陶老师和郑老师。当然这是入学杭大之后才知道的。面试模式大都相似，先发给一篇短文，阅读 5 分钟之后，要你朗读，然后再由老师用外语提问，考生同样用外语回答。

考生最为担心的无非是阅读资料中遇到怪癖的生词，尤其是汉字+假名的日语单词。由于日语一字多个发音，一旦遇到生词就可能一筹莫展。

运气不错，抽签得到朗读资料里只有一个生词。我就在朗读之前老老实实请教了面试老师。老师的提问基本上全部听懂，也自认为全部正确回答了。问答结束，我不由自主地吐了一口大气。多年之后，1988 年陶老师来我北京家里做客时，还主动提到对我当时松一口大气留有较深的印象。

面试一结束，我的考试就全部完成了。为了准备口试，高考之后已经“皮包骨头”（朋友语）的我就开始“犯愁”口试。为此，宁波文联的摄影家张信海老师几次为我电话联系或者写字条给宁波几家剧团里的熟人，让我自己带日语磁带去试听。不过，当年“微波炉”式的录音机，都是抢手货，几次联系，结果都不是太理想，我记得就去宁波江滨公园边上的宁波市京剧团听过一次日语录音。但是张信海老师的这份情谊，至今依然让我感恩不尽，不敢忘怀。

(后来，陈炳良老师为我查到的口试成绩为 85 分。)

8. 落榜？

为了满足“落榜”朋友的要求，答应陪同一起参加高考之后，我是做好了充分的落榜的思想准备的；与其说做好落榜的思想准备，还不如说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过中榜。我当时只答应朋友参加日语考试，陪考而已；也仅仅是参加日语科目的考试，藉此测试一下自己的日语水平而已。至于后来借机想学习一些文史哲，已经是后话了。

当年分配给浙江省的日语专业名额大概是 4-5 个。如果记忆不错的话，北大日语专业 1 名，厦大日语专业 2 名，川大日语 1-2 名。合计 4-5 名。

也是因为如此，科技日语培训班里的陈老师一心希望我能够报考北大。他为我的设想是，假如考不上北大，退一步考虑，作为一个“保险”，还能保一个厦大或川大的及格。

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五门课的总分为 360 多分，除了日语成绩正好 50 分之外，其他四门科目的平均分在 80 分不到一点，成绩中等偏高，有些考取的希望。

但是，由于全浙江省日语专业只有 4-5 个名额，而且都是全国重点学校，如果挤不进前 4-5 名，于我又是非常不利。因为，除了报考日语专业我难以报考其他文科专业。这主要是因为我的数学成绩仅为 5 分，几乎要全靠剩余 4 个科目的总分去和其他考生的 5 科总分去竞争。

庆幸的是，在考试之前一个月左右，《浙江日报》上刊登了杭州大学新设日语专业，省内招生 20 人的消息。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当时没有电话，联系不便，我也经常出差在外，是一个关心我的老师托自己的儿子骑自行车专门带纸条到我家，带来这个好消息！

为此，从小成绩优秀，就因为老爸 58 年被错划历史反革命而在 13 岁中学毕业之后就辍学的大哥为我高兴了大半天。我从大哥的高兴中感受到了他的期待，而他的期待中也包含了四个哥哥姐姐的期盼。

当年宁波市的外语考生中，最早拿到入学通知的是北京语言学院的入学通知。考生是我朋友的朋友，总分和我相差无几。于是，我也增加了信心。

78 年是文革以后的首次全国统一高考，理科的合格分数线相差了 40-50 分，理科高于文科。上述查询成绩中提到的我的一个应届生邻居考分为 407 分考取了复旦（录取分数线为 396）。于是乎我有些得意了，觉得假如复旦日语专业在我省招生的话，我似乎也有可能进复旦呢！

周围邻居或朋友的录取通知纷纷到来，北大清华的，复旦浙大的，杭大的，还有杭州丝绸工学院的。文科理科的都到得差不多了，就是没有我的。刚开始，我还很有自信，自认为不低的分数弄个杭大日语的干活总是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地有些着急了。

我在公安局协助工作期间遇到过很多前来查询 77 级考生政审资料的人。凭我的印象，77 级的政审还是很严格的。政审人员的眼神都带有深深的怀疑，口气都是刨根问底式的，大有不查出一些问题誓不罢休的样子。

于是，想到报考外语专业的敏感性，又联想到自己 70 年报考宁波地区京剧训练班的经历，那次我顺利通过初试和复试，而最终落选于政治审查，功亏一篑，于是现在我也有了落榜的预感。当时家父的错案尚未得到平反，长年目睹哥哥姐姐或在学校或在单位所遭受的各种委屈，每遇我自己提干加工资，低人一头的感觉还是那么强烈。

拿到复旦入学通知的邻居已经决定了启程上海的日期，考取其他地区的考生朋友也先后前来话别。虽然我依然坚持一丝希望，但是内心已经作好了落榜的思想准备，心平气和地开始考虑下一年的高考了。

而就在自己做好落榜的思路准备之后，记得是在 10 月 1 日的下午，我正在院子后面的明堂里洗头，刚刚上了香皂满头泡沫之时，邮电员大声呼叫着我的名字，送来了姗姗来迟的杭大入学通知书。跟着邮电员一起来到我家的还有许多关注我的邻居，他们给了我发自内心的热烈祝贺。

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收到入学通知书的感觉。没有什么激动，没有什么兴高采烈，只有一丝淡淡的安慰。觉得自己在考试前，整整高烧一个月当中，烧到时常流鼻血，即使如此，经过自己内心挣扎，最终没有放弃高考，总算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仅此而已。

9. 杭大第一天

假如记忆没错，我记得杭大报到是在 78 年 11 月 2 日，我自己一人坐火车去杭州的。出乎意外，出门当日，大我 12 岁的大姐和大我 10 岁的大哥有生以来第一次提出要送我去火车站，让我意识到这次出门和以往有些不同。因为，在此之前，我虽然家中排行老五，兄弟当中年纪最小，但是每次不管是出近门或是出远门几乎从来没有家人送过我。

我从小就住在外婆家。从外婆家大院的后门出去，步行到火车站也就 10 分钟不到的路程，自然是走着过去了。随身带的还有一个解放前父亲出远门时常带在身边，1968 年我的小哥插队黑龙江时曾经用过的铁皮箱子。箱子太重，由热心的邻居用三轮车送到火车站托运了。

离开宁波前，我忙碌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忙于接待前来送行的各路朋友，也出门拜谢一些赐教过的各科老师，因此非常疲劳。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高考之前整整 39℃ 高烧了一个月，体重从原来的 56 公斤剧降到录取之前体检时的 40 多公斤（毛重），可见高考结束后一两个月之后体力也没有完全回复。

至今清楚记得，在离开宁波的两天之前，凭着二哥的结婚证，赶在指定日期之内，帮我二哥从家具店徒手搬回了 4 条凳子。

而在离开宁波的前一天应约和上述查询成绩中提到到繆同学，一位美女考生一起去开明街明光电影院看了一场黄梅戏《天仙配》黑白电影。故事的悲惨结局把我的心情搞得很差，到了赴杭的当天，我好像还没有完全摆脱故事悲惨结局所带来的阴影。

我的二哥在杭州工作，报到那天不巧去外地演出了，不能来车站接我。于是，早我半年考上浙大的三位朋友中，有两位自告奋勇地来车站接我。这两位朋友，一位后来当了浙江建筑设计院近 20 年的副院长、院长，一位现在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大专利事务所的合伙人和主要管理人，前几年还当选了人大代表。

出了杭州站，热闹非凡。记得有许多高校安排了在杭州站迎接新生，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浙大的，当然也有杭大的。

和朋友汇合之后，我记得是乘坐杭大的大巴前往杭大校园的。好在有两位朋友的帮忙，让身体尚在虚弱状态的我省去了一些体力活。

办理报到手续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宿舍。宿舍在外语系男生宿舍的一楼最东端朝南第一间。进门之后，发现已经有几位德语班同学提前几天到达里面了。第一位和我热情握手并且主动自我介绍的是来自湖州的姚力，第二位是来自宁波的周建胜，还有来自上海的唐荣康.....。

为了行李，在宿舍和大门之间来回跑了好几次，到了傍晚行李总算到了，自己也松了一口气，好不容易可以安顿床铺了。

整整忙了一天，刚刚洗漱完毕，一边聊天一边准备上床休息，忽然从一楼走廊里传来了“哐当”的脸盆掉地声音，同时听到沉闷的身体倒地声响，几乎与此同时就听到了“救命！救命！！快来救命！！！”的大声呼救声。

平时遇事不太容易慌张，在宁波铸造工厂工作期间，还在学徒时代就指挥过一次工伤抢救的我，一下子冲到走廊里，发现有人倒在走廊的地面上，两眼上翻，只见眼白，不见眼珠，双脚颤抖，口吐白沫。经辨认，是隔壁宿舍来自宁波某地的同学。

记得 1967 年，在我的眼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一幕。某天，我正在闹市区看大字报，突然身边一个高中生年龄的英俊小伙子“咕咚”一声倒在了我的跟前，症状和这一样。在我措手不及，束手无策之间，约 6-7 分钟后，那位青年醒了过来，站起身，擦干脸上血迹和白沫急匆匆地离开了。事后我听说这就是“羊颠疯”。一般来说，只要身边有人，不让白沫阻碍呼吸就不会具有生命危险。话虽如此，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同班女生的一位亲哥，也是我二哥的同班同学+好友就是在家中深睡之际死于该症状的。

在大家一片慌乱之中，有人提出要送学校医务室。刚刚报到，还不知教室在何处的新生们哪里知道医务室在哪里呢！

虽然我不认为真有危险，但是因为同学亲哥的前车之鉴，外加新生们七嘴八舌地吵着要送医务室，我也不便明确反对。于是我和姚同学，周同学和邓同学等五人每人负责一个胳膊或一条腿抬往医务室。

凭着同学义气，拼着全身力气，我们几个一口气抬到图书馆附近，大家已经是大汗淋漓，手脚发酸。这时，我才深深地体感到“和死人一样重”的真正含义。路上休息的间隔越来越短，体力消

耗得越来越少，快到医务室的时候，该同学也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医务室的结论如我的预感：不碍大事。

回到宿舍，精疲力尽。重新洗漱之后，方得休息入睡。杭大报到第一天（the longest day）终于结束。

10. 日语专业

人生有时确实很有趣，验证一句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拜读朱兄洪魁的高考回忆，我真的非常敬佩朱兄一心向往大学，坚持学习英语的明确目标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对照自己，我不仅原先没有上大学的目标，自己学习日语也是完全出于偶然，开始之际学得还真有些不情不愿。

说起我的日语学习起点，还真的“感谢”我的二哥和大姐，还有当年邻居陈晓谷医生他们三人。

1972年9月中日建交之后，上海电台开办了由苏德昌（大数学家苏步青的儿子）老师主讲的日语广播讲座。当时国内学习日本的热情高涨，日语大热。二哥，大姐还有陈医生马上行动，开始了日语学习。广播讲座教程不快，每天教学内容非常有限，星期日中午还有一周课程的总复习。而家里唯一的收音机就放在我和外婆的房间里，于是我就深受其“害”。虽然我兴趣不在日语，而且还觉得日语既有汉字，又有假名，作为书写文体，一点也没有什么美观可言。但是，每天晚上尤其是每周日的中午，总是要被迫接受日语侵扰。于是耳听目染，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能够背诵不少日语假名和几个单词以及一些简单的问候语了。但是我从不在他们三人跟前显露，因为我并不喜欢日语。

大约半年之后，日语广播进入了第二册，但是包括日语学习发起人我二哥在内，都因为各种理由终止了学习，徒留几本初级日语课本在我房间的写字台上。

1974 年，宁波地区科技局首次举办日语学习班，我请二哥托他过去的同事，活动组织者陈定光搞到了一个名额。

通知发到厂里，被一个较为年轻的革委会副主任扣压了很久，他似乎有动用权力化作己用的意思。不过这不是我会轻易妥协的事情。

记得学习班办在溪石街小学，开课第一天是一位复旦毕业的溪老师（女）讲课，后来是北大毕业的陈炳良老师，还有南京军事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三位老师：潘老师包老师和毛老师。

学习班一开办，学员就人满为患，50 人的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就站在门口窗口听课。不过和我家里刚开始日语学习的状况相似，一个月后教室里就出现了不少空位子。

很快日语班就结束了。大部分同学就此分手，而有的同学觉得就学这一点点，肯定难以独自坚持下去。于是有人建议能否联合有意继续的同学，请一个老师，自己办个口语班。建议得到了陈炳良老师的热心支持，口语学习班办成了，10 来人，其中有我。

学习班里的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有在图书馆工作大我整整 20 岁的董玲玲老师，有在地委宣传部工作大我 17 岁的翁序云老师，还有大我十几岁的市委写作班子的小林先生（大姐中学同学的丈夫）；还有反右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就在文革当时也是轻易容不得社会阴暗的朱志强老师，还有几位大我几岁的美女同学。总之，大部分同学都是我的“大”哥哥和“大”姐姐。

大家约定，平时自学，每周周三一次集中学习交流。地点在地委宣传部办公室，后来改在市图书馆。再后来，老大学生戚葛宇加入后，常常在他的地区科技局办公室。当时我的兴趣在书法，我每周只是在周三那天下班之后，急忙吃完晚餐，骑车出发之前，匆匆从橱柜上面找出蜡纸刻印的教材，稍稍朗读一下就出发前去上课，以便可以向学习班其他同学有个良心上的交代。

所以，高考之前，虽说我接触过一段时间的日语，但是那仅仅停留在喜欢和人交流，不愿轻易放弃日语朋友而已，并没有下过多少真功夫，因而日语的水平一直没有什么提高。只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在想起报考日语专业时，才觉得当年没有放弃日语原来还是有那么一些用处。至于后来几乎没有准备走向考场，那是因为高烧打乱了我的备考计划。

而在日语学习，日语口语班以及后来的报考日语专业的过程中，得到了陈炳良老师的热心教导和无私的鼓励帮助，师生之情延续至今。

当我拿到杭大入学通知后，我高高兴兴报告了各位老师和各位朋友，而难以启口告知的就是我书法老师丁逸，乙卯先生了。

从1972年夏天，师兄李兴祥第一次带我去拜师先生，直至1978年春节，从先生处受教良多，得益非浅。

少年得志，中年落魄的先生在我和兴祥师兄等人的身上是花费大量的精力，也寄予一定厚望。

我临摹碑帖种类不多，大都是先生擅长的篆体和魏碑汉隶。而后来借调到镇明区里搞宣传书写大幅标语之际也都采用先生独创的一种魏碑字体。在全国大搞“红海洋”运动中，也因为是在区里协助搞宣传的关系，外面经常有人通过区政府熟人来借调我，因而也在宁波各处留下过不少笔迹，作为小学弟的我“出场”的次数可能还要多于几位大学兄。也因此，在先生处被“查询”某某处标语书写者为何人的频率较高。

我心里清楚先生口上不提，内心是不愿我“改行”的。所以，在我离开宁波前往杭州读书时，心中唯一愧对的就是先生了。而后来大学毕业之际，先生也曾热心劝说我留在宁波，而我还是选择了北京。其实我的高考动机之一就是要离开我觉得有些闭塞的宁波。

画家好友钱伟俊，甚至在我赴杭就读之前还在责怪我为何放弃长年积累的书法，而报考日语专业呢？

2015 年，宁波举行大型活动，纪念大书法家丁逸，乙卯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面对先生的遗像，这种愧疚之情尤其强烈。

11. 结束语

每当回想起当年的高考，我总觉得这一切似乎是有冥冥之中的安排。

从没想过要参加高考的自己，为了鼓励朋友，竟会自不量力答应陪他参加 78 年的高考。高小水平的自己，竟然会自不量力地挑战北大，进入轻易不得脱身的数学怪圈，浪费大量的备考时间。就在自己一心决定准备高考，打算早日回公司争取复习时间时，因为种种莫名其妙的理由让我不得脱身，无法取得安心备考的时间。即使在车舟劳顿当中，自认为准备不错，寄希望更上一层楼之时，又因为长期的疲劳积累而大病一场，39℃ 以上的高烧持续整月，差点在周围众人的劝说中寄希望于次年，后来又入学杭大。我常常在傻想：

是不是我的命里注定有杭大？

是不是我的命里注定有彩虹群？

是不是我的命里注定有那位需要我帮忙查询成绩的邻居？

一切是那么不可预知，

一切是那么变化多端，

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

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

而一切又是那么让我们心存感恩，

甚至一切又是那么让我们心存敬畏。

[返回目录](#)

人生最忆是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金秋芬

杭大外语系 78 级“彩虹群”轮值群主李纪定非常谦卑，非常诚恳，非常期盼与我约稿，我非常感激，非常高兴，义不容辞的应稿。

我说高考我们每个人都有故事，有深有浅，我虽然没有波澜壮阔，跌荡起伏，惊人的事，但愿与大家分享我的高考历程。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当年高考离现在已 40 年了。回忆 40 年前的高考，感慨万千。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但关于人生转折的大事却永远铭记在心，也感恩一路上帮助我的人，感恩永远！

我和共和国同龄。我父亲是手艺人，母亲家庭妇女。他们都没读多少书，父母把希望都寄托在我们五个儿女身上，希望我们要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小时候父亲就对我说“你如果能考上大学，我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

父爱如山，铭记在心，读书不敢怠慢，决心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要对得起父母。初中毕业，谁知高一板凳还没坐热，文革开始。学校停课，书是没得读了，也击碎了我的大学梦。没地方可去了，我们成了走到哪里都不受待见的“老三届”生。

68 年父亲也因劳累过度去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天好像要塌下来，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当时好心人建议把我 4 岁的妹妹送人，我们都哭了，我妈抱着我妹泣不成声，我妈说要苦一起苦，要死一起死，决不把我妹送走。伟大的母亲！

我老大，当时 18 岁。为了生活，我上山砍过柴，纺过纱，做过鞋，当过车工，只要能给家里减轻负担我都干。我从不叫苦，也不怕累。小时候锻炼出来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69 年知识青年下放开始，因家里特殊情况，我暂缓去支边，后来小弟去了。但城里是

呆不下去了，凭着自己初中学的知识，经过许多周折，在一个农村小学谋得一个代课空缺。我去了，非常感谢，感谢好人伸出援助之手。谋生真难啊。

来到学校我遇到了麻烦，当地公社要求我出证明，证明我不是下放对象，不然就不能教书。实际我是老三届生属于下放对象，因为只要适龄的都去。也有人来我家动员过我，只是是睁只眼闭只眼才不了了之。

现在需要证明，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没办法也得想办法，学校领导好说，我给你保留几天，你赶快去打证明吧。回家同母亲商量怎么办，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居委会老主任家求她给我开个证明，她很为难，说我不能开给你你不属于下放对象的证明，因为其他人都盯着看那，我要担责任的。但看到我们母女俩眼泪婆娑，不忍心，也非常同情我们的处境，答应给我开这样的证明，说家里困难，待业在家。拿到证明我泪流满面，也感谢这位老主任，永远感恩。

也是在那个地方，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折。71年县里来通知，将来全县中学都要普及开设英语课，需要英语教师，但农村学校英语教师寥寥无几，凤毛麟角，就这样县领导就委托师专办短期培训班，全县各地派人去学习。我也不知道这狗头运怎么会落到我头上，我是小学代课老师，怎么样都轮不到我，可能他们英语没学过都不想去，不想学，而我初中学的是英语，就这样我被选中了。也是这位给我保留几天的领导送我去，当时我激动啊，也非常感谢这位领导的豁达和器重，永远铭记在心。

我去了，一个培训班，有三四十个学员，在那里我碰到了孙淦钊，我们成了同学也成了挚友。教我们的是毛华峰老师（当然还有其他老师）。毛老师是杭大毕业的。我能考上大学也得益于这次培训。老师的认真教学，辛勤付出，是我永远要感恩的。

一年的培训结束后，大家都回自己原来的地方。我却回不去了，原学校已满员，不需要人了。我只好打游击，到处讨生活，像浮萍一样。

就这样到了非嫁不可的时候把自己给嫁了。穷，什么都没有，借住牛房。小孩出生一个月就抱着他来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学校当代课老师，交通不便，四面环山，那里非常穷，但村民非常纯朴。

感谢这学校的宽容和善意，让我一呆就是四年。已经没了奢望，生活就这样平静无奈的过着。

77 年恢复高考，老三届生都可以报考，也不管结婚或没结婚，有小孩或没小孩都可以参加考试。但是，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但现在想想，就算当时赶上去考了，估计也考不上，因为没准备，而且我的数学短板也是要计分的。而 78 年考对我更有利，因为数学不计分。

我燃起了希望，从心里感激邓大人。他是我们三届生的救星。是他的英明决策，让我们这批三届生能有机会参加迟来十年的高考。

我是临时工，学校同意我报名参加考试，我非常感激学校。从那时开始我进入复习，当然是白天教书，晚上复习。

离高考就两个月时间，在这两个月里那真的是挑灯夜战，紧张复习。历史地理那是临时抱佛脚，借来地球仪不停地转啊，从哪里到哪里脑子里塞满都是地名和线路。

学校晚上 9 点就关灯，不发电，我就点煤油灯看。煤油灯有烟，孤烟直上，也不知道把窗打开一些，点了一晚上第二天洗脸，自己都吓了一跳，两鼻孔像黑烟囱。当时非常无知，还好不是煤球，那时也没煤球。

英语想想还有点把握，再巩固巩固，其它就顾不上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豁出去了，也只有这次机会，没有第二次了。

考试那天非常热，考得汗流浹背。试卷统一送到县里批阅，然后填志愿，忘记了是考前填还是考后填。当时只想能考上师范，能回到城里就谢天谢地，感恩不尽，所以只填了一个志愿：当地的师范学校。

不料成绩出来以后还可以重填志愿。我记得好像我的总分 361 分，英语 81 分，数学 11 分，其它忘了。反正能上杭州大学分数线，我的心又高点了，那第一志愿我就填了杭州大学吧。

接下就是等待，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一天看到投递员，我急忙迎上去问有没有我的信件，他在邮包里翻了一会给我一个信件，是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的激动心情是难以描绘的。就这样我跨进了杭州大学的大门，很高兴得知同学孙淦钊也进了杭州大学。进校发现都是小弟弟小妹妹，他们青春洋溢，勤奋好学，深受感染，和活力四射的学弟学妹一起同窗四年，我非常开心和骄傲。

[返回目录](#)

人生最忆是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杨艺敏

接到李纪定一条长长的微信，言辞恳切地让我写一篇“人生最忆是高考”的短文。其实我天生缺乏写作的天赋，常常苦于词藻枯竭、辞不达意，更无奈于自己的刻板思维。可能既是被彩虹群的历任主持人所感动，也是回忆高考的确有话要说，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出生在一个被大家认为一脚足球便能踢入大海的舟山群岛，从小与海相伴却不会嬉水游泳；千岛连绵却只认得城门内的店铺与青石板的路。我家住在城南祖传下来的一幢二层楼的黑白相间的砖瓦木房里，往南眺望，不到 100 米就是大海了。儿时印象深刻的是明堂、天井、千石缸及院子里的满堂红（鸡冠花）。记忆最深的是我和我大妹拎着装满水的木桶，用刷子和抹布，趴在 40-50 厘米宽的地板上，挨个把楼上楼下的地板擦干净。奇异的地板花纹像世界名画带给我们非常多快乐的想象。记得，那时常常有居委会锣鼓喧天有选择地盘驻在邻家门口激情敲打，但是让人听着不是喜庆号而是催命符，说是谁家的某某该去内蒙或黑龙江支边了，是特地来动员催促的。几日后便传来邻居哭天抢地、生死离别的悲怆声。我总是怯怯地依在邻家门口，看到里面都是四邻八舍在宽慰或陪哭，支边要带去的木箱里塞满了各种衣物和糕点……。那沉痛与悲恐像一整块厚重的毯子覆盖在邻里四周，让人窒息难受。为此，我经常半夜哭醒，因为再二年也该轮到我了。

念高一时我大约 14 岁吧。我们这个时代的学业几乎都在学工学农中混着打发了，但闲暇阅读带给了我极大的愉悦，似乎打开了窗

户，让我如饥似渴地汲取营养，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但我同时也在深深地为自己的命运担忧，真的恐惧插队落户支边去了。

突然有一天，说是恢复高考了！我惊喜若狂，仿佛眼前闪耀着金光，如同抓到救命稻草一般对未来再次燃烧起希望和期盼的火焰。我的大学梦应该从高一下半学期开始了，然后我被分在了理科尖子班，然后每次张榜公布成绩不出意外一般在年级段前三吧。每天上学都有同学等我结伴而行，放学约我一块做作业，只要我在，同学妈便会烧烤菜年糕，那飘逸的香味和触发味蕾的美味至今难忘。我又成为学生典范和学习尖子。离高考还有 2 个月，我突然突发奇想，想考外语，要转文科班了。原因之一我太崇拜我那调离的班主任英语老师了，她漂亮优雅、活泼矫健，她让我觉得英语老师真美；原因之二我当时所在的高中是按居住地划分的定海一中，师资力量不如老牌的舟山中学，主要课程的老师上课时夸夸其谈，珍贵的 40 分钟时间有一半时间以上在吹牛，让人焦虑万分；原因第三可能是命运使然，冥冥之中让我扔掉了占绝对优势的数学，自习了自己蹩脚的历史地理。然后，老妈托人找了一个舟山中学的英语老师（一个文革时期的大学生）帮我辅导英语，偷做了好几套舟山中学的英文习题和试卷。我自己一次次从城南走到城北去请教曾经教过我们几天课的一个年老的已退休的郑姓英文老师，山东人，说是曾经给国民党做过翻译，我既崇拜又尊敬，每次进入他家院子都会肃然起敬。因此我把他的语音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直到 78 年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教英语，我对照后才恍然大悟：天哪，我讲的原来是舟山的郑式英语啊。但我永远感谢他一字一句的付出，他借给我的一本英文的安徒生童话，里面故事当时看得很艰难，一字一查，但让我无限着迷、不知疲倦，语感和词汇大大增加。得命运青徕，终于在全校考上三个同学（二男一女）中我当了一回独养女。当年全国参

考人数 680 万，我荣幸地成为有幸被录取的 40 万中的一分子。那年我还不到 15 周岁！

后来我就来到了杭州，有缘有幸地与各位亲成为同学，在敬佩你们的成熟博学和对知识的炽热追求时，又沐浴到了同窗同学的真挚与关爱。虽然在校期间时你们横溢的才华不知道“折磨”过我多少回，但我甘愿并且永远以你们为豪！

[返回目录](#)

人生最忆是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 78 级阎兵

说起我 1978 年的高考，用现在的话，那就是“裸考”后混进杭大的！那时家里除了把最好吃的饭菜都省下来给我吃之外，就是嘱咐我每天学习不要太累，因为 1978 年初不知什么原因（已记不得了），妈妈要我去医院拍片子，检查肺部，结果被告知得了“肺结核”！于是妈妈带着我去了班主任家，说明了情况，申请跟 79 级复读，班主任立刻就同意了。

1978 年高考前的半年，我白天还是照常去上课，每晚我妈妈在家给我注射链霉素（她是护士，对青霉素过敏）。那时我自认为自己没有病，每天仍活蹦乱跳的，对疾病和对高考都抱着无所谓不在乎的态度：反正可以跟 79 级再读，高考考得好不好都不要紧！由于没有任何思想负担和压力，没把自己当病人，也不熬夜复习，（大概只有两次超过 11 点睡觉。我一辈子都不熬夜，也不失眠）那时两眼一抹黑，无知无畏，勇往直前！

在中学时代，我从未见过一个外国人，也没听过一个 native speaker 讲过英语，或听过磁带，我经常纳闷：外国人真的是说“Long live Chairman Mao!” “Down with Gang of Four!” 吗？

我所在的是苏北小县城的一所普通中学，一共就十来位老师，所以地理老师就成了我们的数学老师（学校甚至都没有地理、历史或生物课）！政治老师也教美术！我也从来没有一本属于自己的英语参考书或词典。

幸运的是，作为英语课代表，我每周需要领读课文两次，这样我自己就得先把课文背下来，然后再背给英语老师听，发音不对的地方她帮我纠正。这样日积月累，我的发音越来越标准了。

记得前年回老家遇到一位高中同学，她说：闫兵，你知道吗？那时我们班就你一个人英语好。我们的英语作业都不会做，都是抄的你的啊！

高考前，英语老师还为我们三名报考英语专业的应届生把江苏省中学课本《英语》第五册的课文讲解了一遍。记得当时最难记的单词应该是草原英雄小姐妹那篇课文中的 dumbfounded（目瞪口呆的）。我还记得高考前我在别人家看到一本泛黄的字典上有“科学家” scientist 这个词，当时就记住了。后来高考英语时竟然在中译英中用上了它（科学家们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工作着）！

当我拿到口试通知单时，非常激动。我记得我口试时反应很快，主考官提问的问题，我几乎没有有一秒钟的迟疑都回答上了。记得只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被难住了：“What are we doing now?” 我很想说，我们在进行口语考试。可是“口语”二字不会说啊！卡壳了一会之后，我回答“You are examining me”。最后我的口语得了最高分：96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孤陋寡闻，无知无识，单枪匹马，竟然就这样摸爬滚打地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高考结束后，妈妈又带我去拍片检查，肺结核竟奇迹般地钙化了！（这个专业术语至今我都不知道啥意思）

其实我一辈子就是一懒人！懒得往上爬，懒得巴结领导，懒得写论文评职称。庆幸的是，我没有因为懒，耽误过公家的事！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讲，俺还是大大进步了！我妈妈告诉我，她解放初期很想去读书，但是我那当农民的外公不让她去，还说：“种地，流汗，种出来的庄稼才是甜的！拨拉算盘珠，那是不劳而获，地主！”不过，我妈妈并没有听她爸爸的话，而是自己坚持去上学。后来我妈妈结婚生子了，仍考取了南通卫校。我通过自身的努力，加上一丢丢小聪明和好记性，如愿考上了大学本科，并成为

俺们那个如皋小县城里 77 年和 78 年两届参加高考并被录取的唯一一名外语系的学生！

衷心感谢教了我两年高中英语的周俊老师，是她让我把第一志愿填写成了“杭州大学”，同时也要感谢我妈妈，她一直鼓励我们三姐妹好好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我更要感谢那场病，它让我在后来的四十年生命里再也没有过病痛，在 35 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没有病假过一次，没有迟到过一次！所以从不知道病假要向谁请假，更没有报销过一次医药费！每天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朝气蓬勃地活着！

现在我退休了，没有病，也没有太多的钱，但却拥有用之不尽的快乐。如皋是长寿之乡，我争取不负美名，健康长寿活到一百岁！

[返回目录](#)

人生最忆是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日语专业夏超



1976 年夏天，终于完成了高中学业，踏上了社会。然而在那个年代，毕业即失业。要么“踊跃”下乡插队，那会得到鼓励和表扬，并被欢送下乡。但农村的交通不便和艰苦生活让城里人怯步。幸好我并没有被轮到“强制下乡”，因为双胞胎的妹妹已经去了农村。

为此，我要考虑如何在城里找到工作。当时母亲在嘉兴市蚕种场担任蚕桑技术员，在她的建议下我

决定随母亲单位的农民工去嘉兴郊外农村的桑田里采摘桑叶，除毛毛虫，锄地和挑粪浇灌桑地。那时我冬天冒着鹅毛大雪出工，夏天顶着炎炎烈日劳作，而一天的收入仅 1 元 1 角 5 分钱，记得当时母亲技术员的月工资也仅为 54 元。

虽说我是在城里找工作，但实际上干的却是农村的活。一天，当我肩挑着粪桶在尚属于桑地的嘉兴市解放路大新桥一带行走时，突然远远望见昔日的两位女同学。想想自己一身破衣和满身粪臭，觉得很丢人，忙着招呼一起干活的同伴帮我遮挡一下。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我从小没有做过农活，所以一切都是模仿着身旁的农民工来干。一次在采摘桑叶时，由于对“采摘较嫩桑叶”一词理解不正确，我该采的不采，却把桑树枝尖上的小嫩叶采得精光。这样，在一个小时里我所采摘的桑叶也才几斤重，而农民

们在同样的时间里所采到的合格桑叶已够自己肩挑一担了。为此，桑园组长气不打一处来，连声呵斥我。记得那时在炎炎夏日中，我头顶着毒辣的太阳在地里劳作，要时不时去地旁的农户家讨水喝。此刻我总会想起昔日的高中同学，有些能在工厂的室内车间上班，并能享受夏季降温酸梅汤喝，真是羡慕啊！

1977 年夏天，在我失业和做临时工的一年后终于成为嘉兴五大国有企业之一的嘉兴毛纺织厂的正式职工，负责毛条车间的机械保养工作。而在工厂工作的这段日子，我无忧无虑，充满幻想，是我人生极其欢快的日日夜夜。

一天，国家恢复大学高考制度的消息突然传遍了工厂。听后让我心情为之激动，有了跃跃欲试的强烈冲动。

记得文革时期的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是由基层领导“推荐”入学的。入学资格首先需要出生贫苦，根正苗红。甚至在当时一部著名的电影《决裂》中，提出了只要手上有老茧便可以上大学的口号。由于我出生于“臭老九”知识分子家庭，而母亲来自所谓的地主家庭，外祖父又曾在国民党地方政府机关里任过职，因此，那时候上大学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那时候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地位，加上收入旱涝保收，使当地的年轻人羡慕不已。加上对比了先前在露天桑园的劳动，我觉得在工厂车间内工作可以“避暑御寒”，犹如进入天堂一般。

为此，许多人劝我不要“得陇望蜀”，应该满足于现状。然而，对知识的渴望，强烈地刺激着我投入高考的热潮中。我一边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温习功课。

考虑到自己在初中时曾经通过在中日恢复邦交时由上海复旦大学开办的日语广播讲座自学过日语，便决定“扬长避短”，选择报考大学日语专业，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之后，我便利用业余时间每晚学习到深夜，甚至是翌日凌晨一、二点钟，以至于父亲几次三

番地劝我罢手休息。同时，当工厂车间的师傅和同伴们得知我要参加高考时，时不时有人讽刺挖苦我，而师傅对我这位干活“不安分”的徒弟也是牢骚满腹，甚为不满。正因为“不专注”学习技术，我锉不平金属加工件，用力不当常把钢锯条锯断。这样的徒弟怎么会不让师傅生气呢？

在此情况下，为躲避大家的责难，我只好在工余时间躲进阴暗的车间工具房里低声背诵日语单词，默默地为实现自己的美好理想而拼命努力着。

然而，虽然我克服了种种困难，付出了许多心血，但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我。第一次高考由于政治和语文两科分数过低最后惨遭淘汰。但我考大学的意志未曾有丝毫的动摇。

第一次高考失利后，我还是打算参加翌年的第二次考试。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我无法买到一本正规字典。后来经打听得知嘉兴新华书店有字典销售，即刻骑上自行车前往购买。但在看到字典价格，九角二分，我犹豫了，并跨上自行车离开了书店。这个价格已占到我每月学徒工工资的十分之一。就在越过书店附近的十字路口时，我又突然想，今天一旦放弃，也许这辈子便无缘大学而要永远做一个平凡的工人了。想到这里，我又掉转车头重新回答书店狠心买下了这本字典。“既然花钱买了字典，便要认真复习迎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暗暗告诫着自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决定我是否再次参加高考并改变我命运的，竟然是一本价值人民币九角二分钱的袖珍字典。

经过连续不断的努力，最终我还是领到了杭州大学录取通知书。虽然当时她并不属全国名校，但却是浙江省内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时代使我最终有幸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浙江省首届日语专业大学本科，且是唯一的一个班级，从此走上了正规学习专业知识成功之路。

由于考试前发生了自行车撞人事件，我自己并连带父母赔付了许多钱，为此我已无力购买学校生活所需的手表了。当时同属生活消费品“三大件”的手表价格在人民币 100 元上下，我不可能再向父母伸手要钱。冥思苦想后，我只好忍痛将刚买不久的自行车送到坐落于市区建国路上的寄售商店寄售，并在上海亲戚的帮助下，凭购物券用售车款购买了一块上海产“钻石”牌半钢手表。

1978 年的秋天，我终于带上简陋的行李，满心欢喜地进入了杭大，度过了自己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大学生活。



[返回目录](#)

我直通杭州大学的高考之《路》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郑良根

一个人有值得回忆的往事，是幸运的幸福。尤其是，如果当时做的事有意义，成为此后人生的一个积极环节。回忆这样的人生节点，是回顾人生的成功脚步，也许还能给后人一些参考和启发呢。记得几年前，在接女儿从波士顿完成学业后回家的路上，她突然问我，“你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有哪些，如果只选三件？”我想都没想，就说了三件事：上大学，结婚，到美国。其中，上大学不仅是最早发生的事，也是最关键的事，从此改变人生道路，开启新的航程。

1. 高考机遇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 1972 年从农村高中毕业，对于上大学最多是一个依稀的梦想，一个很久很久都没敢去想的梦想。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达之际，我已经当了近五年的中小学教师，在建德乾潭（那时叫“区”），甚至在全建德县小有名气了，虽然是“民办教师”，一半工资（每个月 14 元），一半工分。暑假全县教师在严中（梅城）开会，我是乾潭区大组的领导小组成员。人们习惯把我和哥哥郑鸿根相比，兄弟俩都很出色。但是我上不了大学。几次“推荐上大学”我都失之交臂，因为哥哥在“推荐上大学”的第一年，在人们还没有明白这是个“当官人家”轮流得利的机会之前，就已经破天荒占用了第一次机会。现在我再出名，再符合推荐的条件，也出不了线了。大学总不能为郑家一家开吧！何况，郑家可以查到的祖宗几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人家，父母亲连生产队长都没有当

过，怎么可能再轮到第二个大学生呢！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出来，朋友们都说，这下挡不住郑良根了。

有意思的是，后来高考录取通知下达的时候，我在县城开会，从县教育局得到了消息。与此同时，通知书已经到达家里，全村上下立即轰动了。几天后回家，我的心情已经归复平静了。刚走到村口，一位朋友碰上了，大声叫喊，“良根，怎么样？我说嘛，你一定会考上的！”倒好象她是第一功臣似的。

2. 高考决策

高考之前，虽然我自恃能干能写也能说，毕竟数理化基础很薄弱。对于高考，心里也是很虚的。了解底细的乾中校长章楚高老师给我建议，考个中专，跳出“农”们，摘掉“民办教师”的帽子，也算大功告成了。同事们朋友们也都是这样建议的，民办教师的最大梦想就是“转正”成为公办教师。报考师范中专，两年出来就是正式的公办教师了，岂不美哉！可是我想，我底子“薄”，也许人家比我还“薄”呢。考中专，数理化都要考，薄弱环节全部暴露；而考大学可以选文科，可以将物理和化学两个弱项课程都避开去。虽然也要考历史地理两门没有学过的课程，但是别的人也有很多没有学过，或者学过的也忘了。中文我很有把握，政治也没有问题；要我去攻历史地理，总比攻物理化学更有优势。因此，我决意考大学。

事实证明，大计正确。

3. 高考之一：路在哪里

依稀记得是在新安江中学（那时的校区靠近县府）的一个教室里，大约 20 来人。第一门是语文。考卷发下来，先看考分比重最大的作文题。《路》，就一个字啊，有点吃惊，但是很快有了眉目。

然后倒过去从头做起。有字词句，有毛主席诗词选段解释等，感觉都不难，因此有时间一边答题一边构思作文。记得有一段古文，要解释加点标注的字词，全文今译和主题总结。古文的内容说的是“齐人攫金”。文字毫无难点，很顺畅的读懂了，翻译自然很快。最后一句好像是“攫金之时，徒见金，不见人”。当过几年中学语文老师，这个“主题”也太容易了，就是“利令智昏”嘛。

做完这些不太难的题目，作文《路》的构思有了。还在一年多以前，自己正是在苦苦地找“路”呢，有当时写的“诗”为证：

天下路虽多，于我却似无。
道是前途无限好，谁人知我心中苦！

虽然长得五尺，亦非缺智少谋。
龙卧浅滩无海潮，恰如平阳虎。

泥裹白玉无人识，谓我只配落荒丘。
暴风骤雨日，教人惊回首！

这个“暴风骤雨日”，原来就是 1976 年 10 月初发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抓捕四人帮的壮举，就是那时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就是邓小平复出后力主改革和恢复高考！现在，作文的“路”，无声的，静静的，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路！我分明听到了狂啸的海潮，听到了震耳的林啸，是龙腾虎跃的时候了！考试到这里，我已经胸有成竹，已经文思如潮。平时写文章喜欢涂改，这一次，真有点“下笔如有神”，格外的顺：从本来没有路的荆棘野地到走得多了就有了路；从即使没有路，即使只有崎岖小路，也要努力，只要勇于攀登，就可能走向成功；从当地近年来修过的公

路变得宽敞起来，谈到人生之路也要靠自己开拓才能越走越宽等等，一点也没有当学生写作文的那种冥思苦索，甚至都没有思考，没有迟疑，可谓一气呵成。

写完作文，离考试结束还有 10 来分钟。又把作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基本上没有想改的。我似乎已经感觉到，这条《路》就是要带领我通往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从备考以来，在我心里想当然的就认定了中文系就是我的目标；杭州大学就是我的目标。后来想想还真有点意思，我都从来没有想过，大学里有那么多自己没有听说过的系科，全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学，甚至都不知道有北京大学，有复旦大学……后来想想，还好不知道。当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好像都没有在浙江招生，要是我好高骛远了，结果岂不寒心。知道得少也有值得庆幸的时候。

考完收卷以后，听一些监考的老师们在议论。有位老师说，这个作文题目有意思，有考生交白卷的，有考生只写了“社会主义的路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句话的；有位老师插话，说有一名考生写得洋洋洒洒的，好像在说人生的路；还有一位老师说，有个考生好“厉害”，那么难的古文，用“利令智昏”一个成语就总结了主题。我在暗笑，这不都是在说我吗？

4. 高考之二：贵人指点

高考第二天中午休息时，哥哥“出差”来县城新安江，来考区找我，谈谈高考感受，也好帮我准备下午的政治题，“最后冲刺”。哥哥随便找了一些时事题来讨论。谈到当时的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理论，谈到中东问题的意义和问题的缘由和症结等。这些，在备考期间时有涉及，我多少有所准备。当然，经由这么一番“提纲挈领”的讨论，我的思路更清晰了，回答这样的问题也更有把握了。

神了，这些题目在随后的考卷里多少都有涉及。我不能不佩服哥哥作为一名资深语文和政治教师的功底。事后我体会出来了，哥哥此番来看我，绝不是一般的出差“顺道”而来，而是精心准备，来帮我复习备考的。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及时，这么准确呢！这么说，我考上大学，也不是一件简单的寒门出贵子的事，而是有兄长的提携之功：不只是多年来受到这个大学生兄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有复习备考时得到的直接鼓励和点化。备考过程中，我对语文似乎是稳操胜券的，数学，地理，历史，兄长大概也帮不上直接的忙；那时的政治讲究时事，正是兄长的拿手好戏，让我得益非浅。都说人生的腾飞往往在关键的时候要靠贵人提携。我的贵人就是我的哥哥。

5. 走向杭大，走得更远

考试以后，大约等了两个来月。我似乎有预感，并不焦心。接着，通知体检了，接着，录取名单下来了。当年四十万人口的建德县一共有十人考上大学：六人大专，四人本科。记得其中有一人是浙江农业大学，是杭州下乡来的知青；一人杭州大学政治系（后来分哲学系，经济系），是中学校友、师弟；我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正是我一开始便设想的那样，没有意外，也没有什么惊喜，好像只有顺理成章。

离家奔赴杭州大学是 1978 年 3 月 6 日。那天春雨绵绵。临走前我将心爱的手表摘下来交给还没有手表的哥哥。我穿的是一双带补丁的猪皮皮鞋。家里没有能力为第二个大学生置装了，相反，要为立即失去一名劳动力失去一份收入而发愁。家父已经卧病多年，三个妹妹两个还未成年。家庭经济状况多年来十分拮据，会因我上大学而更加艰难。

而且，我明白不过：在朋友圈里，在小小的公社、区的民办教师圈里，我好像是小有名气，最接近大学的“尖子”，因而有点当仁不让的感觉；仔细想来，那也是时代造就的矮个子堆里稍微高出了一点点。因为10年文革动乱，“读书无用”，没人读书，我却因为当老师不甘于混混而有所学习有所进步，所以走到了前面。真要说起知识功底来，其实是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现在有幸考进大学，来的都是各路“好汉”，未来唯有靠努力再努力，用功再用功，方能保持进步，不枉这份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上大学的荣耀。因此，在奔赴大学之际，我已经给自己定好了勤奋苦读的基调：此去不跟人比穿着，而跟人比成绩。这，大概也是“寒门贵子”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

在到达“大坂车站”上车之前，哥哥塞给我一张小纸条，写着：

壮志凌云人，
扬眉吐气时。
乘风破浪去，
万里从今始。

这个“万里”是哪里呢？去杭州大学的路也没有那么远啊，不过百来公里而已，是“虚指”吧。

没想到，10年以后才明白，是实指。这条路不只一万里，而是一万公里，是地球的另外一边，美国。

[返回目录](#)

百分之四点八里的一分子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陈雯



1977 年，我在杭十四中当代课老师，做班主任教英语。我从小爱看书，凡能接触到的书都看，遇到不认识的字便连着上下文猜。家里的西洋画册被我无数遍地翻阅，幼年时就知晓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名画。浣沙河西头新华电影院旁有个知足里，那是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地方。知足里住着一些以前的大户人家，其中一家和我家特别交善，他家藏有大量的世界名著。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悄悄地把他的藏书几乎读了个遍。就这样在那个不读书的年代，我读了许多世界名著。西方的文学美术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的审美观，对我后来选择英美文学专业有很大的影响。

我在十四中教的这个班是从安吉路小学升上来的文艺班，学生中不少人能歌善舞会乐器，为何让我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呢？原来我有这方面的特长。自小受母亲影响我热爱音乐，小学时母亲教过我两年钢琴，弹拜尔车尔尼巴赫等等。后来跟杭州歌舞团老师学习小提琴，在杭州市中学生文工团拉小提琴。我们几个琴友组成了一个四重奏组，每周一次聚在一起练琴，拉些如莫扎特的小夜曲这样的四重奏曲子，不亦乐乎。曾有过搞专业的想法，去



南京前线歌舞团拉琴给当时首席陈家华听，但终因不是“红五类”而无缘文艺兵。自己会拉琴，学生和我关系很融洽，除了当好班主任教好英语，我还帮他们排练节目在学校演出。每天忙得也开心。本以为就这样代着课，盼望能转正：能在杭十四中当正式老师在当时是很好的命运啊。

没想到 10 月份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只要符合年龄的人（十六岁到三十六岁）都可以报考。终于有机会可以公平竞争了！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这样没有上过山下过乡，没有做过工人当过兵的人是不会有机会上大学的。从 10 月得知消息到 12 月考试中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急忙找资料开始复习，一下班就把全部时间花在复习上。自己文科比较好，便把复习重点放在数学上，每天在几何方程上花大段的时间，中间休息的时间用来复习语文，调节脑子。想来是当时做了太多的数学题，我已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倒是清楚地记得在复习语文时写摘要，拿去请教十四中资深语文老师，她给了很好的评语，这鼓励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每天要上班，所以晚上都会复习到深夜，母亲每每提醒我好睡了，不要搞太累了。我从小体弱，母亲对我一直非常爱护，成年了还是事事叮嘱处处关照。正当我信心百倍最后冲刺的关头，突然有一天左眼看出去上部一片漆黑！我大惊赶紧去医院，原来是备考过度，抵抗力下降，得感冒后感冒病毒侵蚀到视神经，导致我的视野失去了一大半。看人只看见两条腿，眼睛上方象是压着一块漆黑厚重的乌云。医生开了强的松，叮嘱几天内不能用左眼并少用右眼以防止用单眼过度引起感冒病毒再侵蚀到右眼视神经。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心急如焚；梦寐以求的高考近在眼前，我却快失明了？！父亲用他的大手帕扎在我头上蒙住我的左眼，叫我靠在床上，他翻开复习资料读了起来。父亲在我不能用眼的那几天里，读课本帮助我复习了地理历史和语文。他在帮我复习

地理时编了“三字经”来讲解全国地图：辽吉黑，蒙新藏，陕甘宁，京津冀，鲁豫湘，苏浙皖，赣闽粤，等等。复习历史从西东周，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一直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习语文时讲解了古文观止的卖柑者言，捕蛇者说，陋室铭，等等。待我眼睛恢复，地理历史也基本背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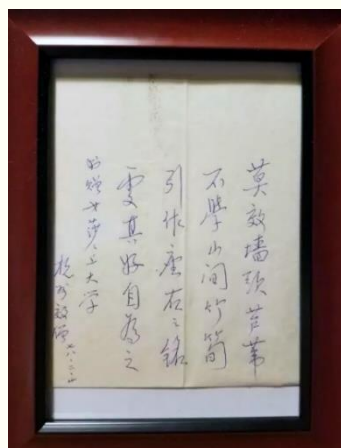
英语是我“放弃”复习的一门课。高中时我的英语课成绩就很好，是英语课代表。高中毕业后一直在自学，读许国璋教材，听英语九百句和上海电台的学英语节目。后来到十四中教英语，有机会去教师进修学院进修，对提高我的英语水平很有帮助。有这些本钱在，我基本上没复习英语便去参加高考。

高考那两天我没有紧张的感觉，也不记得考题，只记得进了考场坐好，考卷一拿到手便一门心思埋头答题。但是有一个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考完后考生从考场里出来走向学校大门，那么多人，基本上穿着蓝色调灰色调的衣服。据资料记载，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为百分之4.8。当时在杭十四中代课的和我不年龄相仿的有五人，两个教语文，两个教英语，一个教数学。77年考上两个，78年另外三个也都考上了。

考完试我又回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似乎并没有望眼欲穿等录取通知的焦急。直到一天母亲下班回来对我说她的同事告诉我我考上了大学，红榜贴在涌金街道里。我和母亲急忙跑去看，果然我的名字在红榜榜首！

78年春天，父亲送我去杭州大学报到。我带着一只棕色牛皮小皮箱，它是父亲读南京大学时用的，传给我陪伴着我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报到的前一天父亲赠我四句话：

莫效墙头芦苇
不学山间竹笋
引作座右之铭
爰其好自为之



我一直保存着写着这四句话的那页纸，远涉重洋也不曾遗失。



毕业照，后排右二为作者

1977 年高考开启了我的正规求学之门，一路走来真正感到学无止境。我强烈的求知欲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在我后来的文转理，考 CPA（注册会计师）过程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一直是学文科的，刚开始修财会课程时我真是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咬紧牙关坚持过了一学期，后来便越学越顺了。还记得在马里兰大学和两位美国同学一起去考 CPA，三人同住一间旅馆房间，两天考四个部分：

成本财会，商业法律和税务，审计，金融财会。结果两位美国同学没考出，而我这个非英语母语的外国人硬是考出了。

77 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无数人的命运，我是其中之一。当我的同学加朋友来约稿时，虽然只有三天时间就必需交稿，我还是应承了下来。提起多年不用中文写作的拙笔，匆匆写下这篇回忆，借此机会记录我一个平民百姓在中国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中的足迹。



右一杨洁篪(时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长)，左一为作者

注：本文原载祝毅主编 《120 个回望》，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返回目录](#)

难忘的 1977—从田园到校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田书增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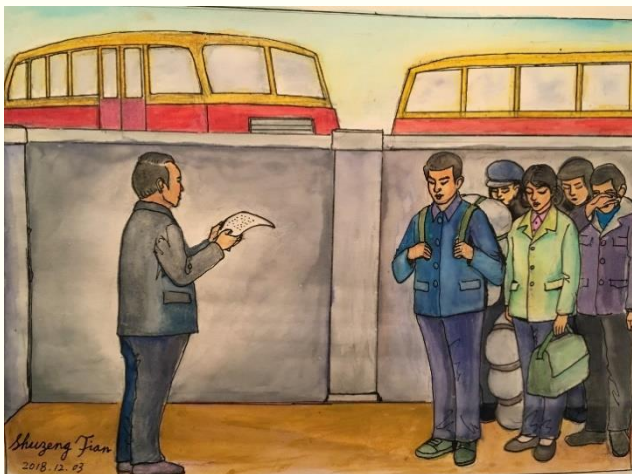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从高中到大学曾经隔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路途，没想到跋涉这条漫长道路的最短途径却是在农村。

那还是 1977 年 3 月的一天。初春的大地上乍暖还寒。四人帮才粉碎不久，人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可眼下的一切却还是老样子。对于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国人来说，生活中的任何变化都嫌来得太晚、太晚。

就在这万民期待而又焦虑不安的气氛中，学生们迎来了新学年开学的日子。然而在我们这些 18 岁左右的高中应届毕业生看来，这又是一个前途未卜、让人惴惴不安的日子。

这天早上，我和同学们像往年开学的时候一样，在熟悉的校园里整齐列队，聆听着老师的训话。但这回不同的是，在我们的身旁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行李。这给往日恬静的校园平添了些许怪异之感，而停泊在学校墙外的那十几辆公共汽车，更是为这次不寻常的集会笼罩了一层凝重的氛围。

“同学们，”已经教了我们两年高中的班主任终于开口了，“今天你们就要告别学校，奔向农村了。从



今天起，老师不能再陪伴你们，一切要依靠你们自己了……。”老师的话虽然不多，但是每一句都刺痛了我的心。我们以前也经常下乡，可每次都有老师陪伴在我们身旁，有了困难也可以随时随地得到老师的帮助。然而这回不同。一旦我们走出这个校门，一切就全靠自己了。想到这些，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我们全班同学都低下了头，不时还能听见有人在轻声地抽泣。我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悄悄地看了老师一眼，发现他的眼圈也有些发红。记得我们以前淘气的时候，老师也曾对我们非常地严厉，没想到就在我们失去呵护，将要独自面对严酷的未来的时候，我却体会到了老师对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殷殷学子们那份藏在内心深处的厚重感情。

背负着沉甸甸的行李，拖着沉重的脚步，我和同学们登上了等候已久的公共汽车。浩浩荡荡的车队，排成长长的一列，驶离了熟悉的街道，驶过了萧杀的城郊，奔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

路上不时地有个别的公共汽车驶离主路，拐入旁边的乡间小道。渐渐地，我发现跟在后面的车越来越少了。到了最后，只剩下我们这一辆还在广阔无垠的旷野上一路飞驰。终于，我们这辆车也拐上了一条凹凸不平的乡村土路，像船舶一样颠簸着前行。不多时，前方出现了一片村落，我们的新家到了。

汽车停在荒凉的路旁，一群衣着褴褛的农民正在那里等候着我们的到来。一位身体结实的中年汉子做了自我介绍。他就是本村的党支部书记，负责插队知青的日常管理。我站在一处高坡，无限留恋地凝望着刚才乘坐的那辆公共汽车卷起滚滚黄沙，朝着我们来的方向慢慢驶去。看着它渐行渐远的背影，我的心往下一沉，好像连接着家乡的最后一根纽带也被这汽车所掀起的阵阵尘埃所无情地砍断了。

我们住进村里为知青们搭建的集体宿舍。那是盖在村头的一排青砖瓦房。就在这下乡的头一晚，我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久久不能平静。没办法，索性和平时要好的几位同学一起来到户外，坐在大石头上聊天。四下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满天的星斗和树梢上的一弯明月把那水银般的寒光倾洒到我们单薄的身上。在隔壁的老知青的房里有人吹起了口琴，随之飘来了一曲忧伤的歌声：

一轮冷月照四方，
夜色多么凄凉
回乡的道路遥遥在望，
前途在何方？

听到这如泣如诉的歌声，我们愈发按捺不住内心涌动的思乡之情。黑暗中不知是谁轻声叹了一口气，“唉，也不知道咱们要在这穷乡僻壤呆多久？”。一个同学习侃地答道，“你没有看到伟大领袖的巨幅雕像向前伸出了五个手指头么？那是在明白地告诉你，至少要呆上五年。”另一个同学马上接上话头说，“你没看到伟大领袖的另一只手背在身后，还没有伸出来吗？那个意思就是，等你呆够了五年，还要再呆五年。”听了他们的幽默对话，大家都忍不住捧腹大笑，一时忘却了眼下背井离乡的酸楚。

（二）

第二天，生产队给新来的知青分配工作。队里赶大车的活儿大多由知青承担。原因是知青们在村里无家无业，村干部不担心他们用集体的大车干私活。队里分派给我的是一头鼻子上拴着铁丝的黄牛。听一位老知青讲，这样的牲口往往性子暴烈，只有被拽住鼻头上的铁丝时，它才会乖乖地听话。看管牲口棚的农民大伯简单地告

诉我如何套车，以及赶车时的注意事项，我就和另一个知青赶着牛车上路了。

那天的工作是往地里运肥料。我俩先把车赶到积肥的猪圈旁装车，然后把车赶到地里，将车上的肥料按照大致均等的间隔，一小堆一小堆地卸下来，由社员们用铁锹均匀地摊在田里。这牛走的很慢，脾气也似乎很



温顺。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象，我很快领教了它的厉害。到了中午快要收工的时辰，不知怎得那牛的龙套松了。只见这头牛一下从车辕里窜了出来，扬起四蹄，朝着牲口棚所在的方向狂奔而去。我见势不妙，一个百米冲刺追了上去。正要伸手去抓缰绳，不料那牛昂起脑袋往上一顶，尖尖的牛角恰好碰到我的眼眶上，一时间疼痛难当。但这时我已经顾不上许多了，手疾眼快地抓住牛鼻上的铁丝，顺手一拧。那狂暴的奔牛登时没了脾气，像个犯错的孩子，歪着头乖乖地跟我走了回来。我与同伴配合着将牛推入辕子，七手八脚地束紧龙套，然后赶着空车回到牛棚，把牲口交到饲养员手上。就这样，下乡后第一天的劳动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那时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直到许多年以后，每当想起这毛骨悚然的一幕，我的后脊梁还忍不住冒出嗖嗖的凉气来。

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我赶车的技术也日臻成熟，举手投足之间地已经俨然地像个老把式了。这天，分管知青工作的那个大队书记把新知青召集起来开会。我们揣测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一个个惴惴不安，面面相觑。

“同志们，”支书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本来你们初来乍到的，理应让你们先在村里劳动。慢慢地适应环境。可是现在公社的挖河工地上实在缺少人手，所以不得不派你们上阵了。”

第二天，我们背着行李，走了二十多里地，来到一个小村庄。这里就是公社分配给我们村的施工河段。我们刚一住下，就马上奔赴工地。抡起锹镐，在平地上挖了起来。就这样，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掘地不止。渐渐地，河道挖到齐腰深了，进而又漫过了头顶。现在我们只有双手紧握锹把。用力地向上猛甩，才能把挖出来的泥土扔到边上。当挖到一人多深的时候，我们实在甩不动了，只好把泥土装到独轮车上，由一个人在后边推，另一个人在前面拉，把泥土推上陡坡倒掉。随着河道越挖越深，仅靠两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够了，于是又增加到三个人。我偶尔也会站在坡上，向四周观望。只见整个工地像巨龙一样向两边延伸，不见首尾。目光所及之处，人声鼎沸，锹镐翻飞，车轮滚滚，一派热火朝天的会战景象。在这支挖河大军里，有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有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本来从衣着打扮和说话的口音上两者很容易分辨。但到了此刻，个个都是蓬头垢面的，已经难分彼此了。

就是靠着人海战术，在没有任何机器设备的条件下，人民公社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硬是在平坦的大地上挖出了一条笔直的人工运河。可惜的是，就在工程刚刚竣工，我们还没来得及亲眼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胜利通水的时候，生产队就派出几辆大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拉回村里。夏收就要开始了，那一望无际的金色小麦正在等着我们去挥镰收割。

(三)

就这样，夏去秋来，我已从城里的一介高中毕业生变成了一个干过各种农活，皮肤黝黑的庄稼把式。然而令人难以忍受的，不是肉体上的疲劳，更有那精神上看不到前途的痛苦和绝望。没人能告诉我这种生活会持续多久，也没人知道未来的道路究竟在何方。

随着秋收的结束，地里的庄稼已经入库。广漠的田野褪去了它那绿油油的生机，树梢上的叶子也随着阵阵秋风逐日地飘落。失去了植被保护的褐色土地像一位农家老汉，袒露出他那饱经沧桑、瘦骨嶙峋的胸膛。面对着万籁俱寂的苍茫大地，我内心深处蕴藏已久的那份压抑表现得愈加强烈。随着冬日脚步的日益临近，光照时间越来越短；这种抑郁的情绪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严重，最后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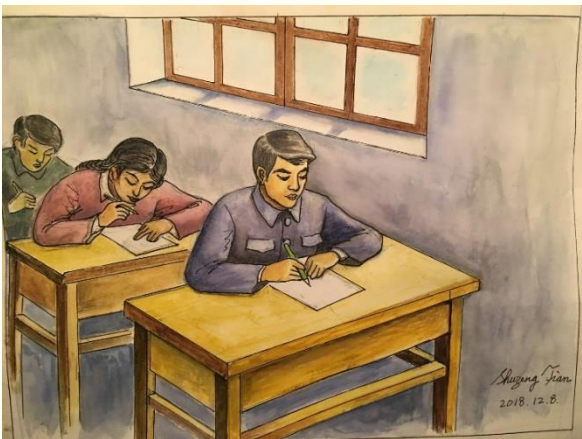
转眼到了 10 月底，地里已经没有什么农活了。这天早晨，我和几位同伴围坐在火炉旁，一面烘烤着早餐时吃剩下的窝头，一面倾听着从架在村口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突然，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声音像电流一样冲击着我的耳膜，“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即将做出重大改革，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听到这，我猛然一愣，后面讲了什么，完全没听进去。过了半晌，我才慢慢地醒过神来。一时间，只觉得眼前一亮，那种感觉就像在漫漫长夜里艰苦跋涉的人突然看到了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一缕曙光。我心想：这下可好了，再没有谁可以阻挡我前进的道路了，我要放手一搏，凭一己之力，杀出血路，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想着自己从中学时代就喜欢英语，而且在插队期间也跟着广播讲座坚持自学，于是我下定决心报考外语专业。

过了几天，上面下来通知，让各村志愿参加高考的人员到公社去报名。我二话没说，就步行十几里地，到公社所在的镇上报了名。

考试时间定在12月中旬的三天，算起来也只剩下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了。时不我待，我当即横下心来，把以前的课本全部找出，独自关在宿舍里专心复习。这个破釜沉舟的举动，引起了村支书的极大不满。作为农民大老粗，他对读书本来就抱有成见。见我如此这般孤注一掷，妄图借高考之机，撇开组织提前回城，就更加地愤懑。一天他碰到我说：“如果你这会考不中的话，就甭想回城了。”听了这话，我明白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咬紧牙关，一条道走到底。

考试的日子如期而至。作为临时考场的镇中学院子里，人影攒动，四邻八乡的考生纷至沓来。除知青外，许多农村青年也赶来了，所有人都把这次考试看成改变人生命运的一次机会。

考试的铃声响了。考场里静悄悄的，座无虚席。只有铅笔在考卷上书写时的沙沙声。我无暇他顾，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到考题上。时间很快过去了。还好，在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还有时间检查了两遍才交卷。后面两天的考试也这么一帆风顺地过去了。



考完试，我的心思又回到队里的生产劳动上，尽量不去想那考试以后的事情，免得心烦。一天，村支书来到我干活地方，故作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干活呀？队里几天前就接到通知，让你今天下午到城里去参加口试。”我心里暗暗地骂道，“你他妈的装什么蒜啊？你不通知我，我怎么会知道呢？”骂归骂，我表面上还

不能发作。抬头看了看太阳，已经快到晌午了。唉，来不及吃午饭了。我急匆匆地从田间地头赶往十几里地以外的长途汽车站。还好，没过多久，汽车就来了。坐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终于赶到了城里的考场。这时，人家的口试时间已过，正要关门下班呢。老师们看到我顶着满头的高粱花子，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跑进来，着实地吓了一跳。当他们听完了我的解释，又核对了名字之后，破例为我延长了考试时间。就这样，在坎坷的高考道路上，命运的女神再次为我敞开了前进的大门。

（四）

1978年的元旦到了。生产队里给知青们放了长假，我得以暂时回城与父母团聚。经过了这半年诸多的人生阅历之后，我也和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期盼着新的一年能带来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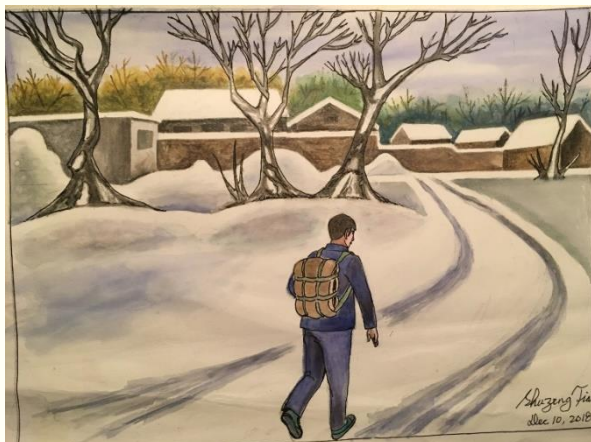
没过多久，我就接到通知，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受杭州大学的口试。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赶到那里。在一间办公室里，我遇到了一位举止优雅、态度和蔼的女士。她自我介绍说，本人叫商亚南，是杭州大学外语系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她简单地考了一下我的英语会话，之后问我是否愿意去杭州大学读书。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有了这一段苦难经历，我自觉成熟了许多。只要有学习机会，只要能离开农村，即使到天涯海角我也情愿，更何况是有地上天堂之称的杭州呢。

不久春节到了，我在等待中度过了每年一度的传统佳节，同时也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有关高校录取新生的消息。春节过后，我果然在广播里听到了各高校陆续发出录取通知书的报道，于是迫不及待地跑到县招生办去打探消息。那里的干部核对了我的姓名，然后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已经下发到所在地的人民公社了。这会儿已经是下午了，冬天的太阳下山早，从县上到公社还要坐几十里的长途汽车。

按理说，明早出发比较安全。但这时我的心情已经急不可耐，于是我坐上末班的长途汽车，快马加鞭地赶到了公社。当我最终拿到那份期盼已久的录取通知书时，已经没有回程车了。没办法，我只好步行到插队的村子，先住上一宿再说。这时天已经黑下来。我怀揣着珍贵的录取通知书，独自一人走在昏暗的乡间小路上，看到四周万籁俱寂的样子，和刚来的时候没什么变化。但我的心情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曾经在我眼里是那么凄凉的地方，现在看来却是那么美好、那么充满希望。

在皎洁的月光中，我终于看到了静卧在村头的那排知青宿舍的朦胧暗影。眼下正值农闲，知青们还在城里休假，宿舍里黑乎乎的，空无一人。我一人摸黑爬上空荡荡的大通铺，一点也不觉得孤单。不知怎的，一向睡眠很好的我，那一晚却失眠了。夜里好几次把压在枕下的录取通知书翻了出来，在油灯下仔细观看，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早上起床，发现昨夜下了一场瑞雪。皑皑的白雪覆盖了村庄，树木和远方的原野，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奇观异景。我打点行装，背着行李，义无反顾地走出村口，奔向远方的大路。此时此刻，我心中百感交集。我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走在这条小路上，因为我再也不用回来了。回想起过去一年中我在这客居的小村庄里所度过的日日夜夜，看到我留在雪地上那一长串脚印，心想那也许是我能留下的唯一印记了。不过，当这些脚印随着积雪的融化而慢慢消失的时候，谁还会记得从这块土地上曾经走出这样一位城里来的知青呢。



雪压农庄白絮多，
将离村口动心波。
横渊苦海投鞭过，
不信书舟不渡河。

[返回目录](#)

1977，我的高考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赵红

1976 年 5 月，我从杭州第十二中学高中毕业，按政策要求，来到桐庐县百江公社广王大队插队落户，以换取早一年毕业的哥哥能够留在杭州。

1977 年秋，我在乡下收到哥哥从杭州寄来的一封信。下乡后，通常家里来信都由母亲执笔，这次却出自哥哥之手，我本能地感到不寻常。拆开一看，果然，哥哥在信中以激动的口吻告诉我，国家即将恢复高考。一向沉静的哥哥激情洋溢地叮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认真准备复习，争取考上大学。

当时我们整个知青点 16 个人，吃住劳动都在一起。平时嘻嘻哈哈倒也快乐，但独处时，我常会为自己的前途忧虑。接到哥哥的信后，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人生的重大转折已经来临、自己的命运将会改变，反而有些晕晕乎乎，对自己能否参加高考，眼下要做什么，仍是茫然。

10 月下旬，报纸上公布了国家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明确恢复中断了 11 年的高考制度。但这场考试对当时的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陌生了。我和周围的同伴一样，根本没有信心能考上。母亲得知我的心情，专门写信来鼓励我，还费了一番周折弄来了文科类复习资料，给我寄了厚厚的一大叠。从确认高考消息到报名结束，距 11 月的初试已为期不远。我白天仍然按时参加劳动，晚上和休息天对着仅有的几本高中课本，同时翻看着这叠浅棕色印刷纸。资料上列出的是本次高考的可能范围和样题，我将信将疑，但只能以此为参照，为自己打气，增强信心。

事实上，之前在初高中阶段，受“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冲击，我们接受的教育缺乏系统性，加之我天生怕数学，所以复习时特地多看多背政治、历史、地理等文科内容。阳光暖暖的冬日里，我和同时报考的女知青小邓爬到高高的草垛上背诵政治题目，其中一道题印象很深：“试以‘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论述毛主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后来还真考到类似的题目。这套试题成了我进入大学校门的敲门砖。

初试只考了语文和数学，分数不得而知。没过多久，县里来通知让我参加复试。市文化局定点的百江公社下属三个大队知青点共计知青 50 余人，有 10 多个报名高考，约有一半人参加了复试。此时公社开了绿灯，允许大家全脱产复习。虽然如此，我既没想过也不敢奢望回杭州参加复习班，怕因此造成不好的印象。和家人的持续通信使我备受鼓励，带着好好复习的强烈信念，我坚持在知青点抓紧自习。

带着压力，我们匆匆上阵。12 月 14 日，我和小邓在百江镇口的公路上拦下一辆卡车，司机听说我们是要去高考后，爽快地让我们搭车。卡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开了四五十分钟后到达目的地分水镇。第二天一早，我们进入分水中学考场，开始了考试。

记得语文卷里有道题要求写出两条农谚，我暗自“哼哼”两声：这不太容易了吗？！随即写下：“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天上钩钩云，地上雨淋淋”。作文是当时大热的题目《路》，我早已有所准备。史地放在一起考，有道题让解释“黑水党”，我是头一次见此名词，只好胡乱答了一通。埋头书写时，监考老师数度站立在我身边，望着卷子频频点头。

两天考试结束，顿觉浑身轻松，我和小邓两人一头扎进镇上唯一的电影院，连看了两遍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最后的考分没公布，之后偶然听我家隔壁任教于三墩中学的小钟妈说，她参加了

高考阅卷，曾批到我的试卷，说我的作文写得好，书写尤其漂亮，另外，政治是几门课中考得最好的。

过了一段时间，村里传出有关单位对我进行政审的消息。当时我们都被派到了生产小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正忙时，我落户的三小队队长徐友坚在田间高声对我说：“赵红啊，县上来人给我们小队开了个会，调查你的劳动表现，我们都说你不错的！特别是你去年秋天跟着我撒萝卜籽，认真细心，节约均匀，今年小队的萝卜大丰收，我狠狠地表扬你咧！”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去年战战兢兢地跟着这位把“萝卜”说成“老婆”的快嘴江西佬学撒萝卜籽，生怕不符他的要求。三队地少人多，粮食不够吃，“老婆”便是很好的补充和替代。作为知青点长，我先后担任大队记工员、植保员、拖拉机手、小学代课老师，并作为1976年度优秀下乡知青，参加了县知青代表大会，因此我比较自信自己的表现。有关人员还分别去了父母亲的工作单位调查，我的政审顺利通过。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正在田里劳动的我突然接到消息，说县教育局电话通知百江公社，全公社有三人被大学录取，让我马上去一趟。我拔腿就去了镇上，拿到了杭州大学政治系的录取通知书。也许是我政治理论考得好，便被录在政治系。之后想来，这何尝不是命运的一种安排，若非如此，我就不一定会留在杭州，就不会与我的同小组同学史晋川相遇，继而结成连理。

之后便是从公社到县里的一系列户口转移手续。到了桐庐镇，只见县政府大门外墙上，贴着首届高考录取名单的大红喜报。我挤进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名字，心里乐开了花。全家人也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最早接获消息的哥哥，激动得满脸通红，向家人通报。喜出望外的父亲，不知所措，干脆打了个电话给杭州大学招生办，再次确认我的录取。日后母亲常会学着父亲的腔调：“喂喂，我是考生家长啊，我是考生家长啊，我想问一个考生啊，她……。”

一口纯正普通话的父亲，当时那一本正经的高八度声调和明知故问的做派把大家都乐坏了。

1978 年初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母亲再次来到广王，接我回家。她亲切的身影出现在村口时，我的心情难以形容，只觉得整个世界充满了阳光。

1977 年高考，不仅是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重大标志，更是我们个人命运走出洪荒之转折。毕业后我入职中国银行，成为国际金融专业人士，为中行海外分行的计算机风险控制系统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我高考成功的影响和鼓励下，我兄弟也相继考取中国美术学院、复旦大学，成为我家多年来的一段佳话。

注：本文原载祝毅主编《120 个回望》，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

[返回目录](#)

两次考上杭州大学中文系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陈建新

1978年4月30日，我在厂食堂北门口抄写黑板报，一旁的团委书记突然对我说：“建新，组织科收到了你的大学录取书，是杭大中文系的走读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又说：“读大学没意思，毕业出来也是当中学老师。还是在厂团委干几年，工转干吧。”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很荒唐，但在当时，虽然《哥德巴赫猜想》已经发表，但知识分子并不金贵，何况杭州大学文革前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生都当中学教师，而当时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连工人都不如。她和我都没有想到，进入80年代后读大学会成为时髦，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如日中天。我还没有回答，脑瓜子已经在飞速运转。怎么这么迟才来录取书，不是说三月初就开学了？领导把我的录取书压到现在，已经作废了吧？我志愿书上填了很多北京上海的大学，怎么结果还是要在杭州读书？对走读我也有点惴惴不安，我父母家在南星桥，房子不大，每天从家骑自行车到杭大要半个多小时，这书怎么读？

突然又闪过一个念头，重考吧，既然这次能考上，再努力一下，也许能进重点大学，去北京上海读书。现在回想起来，我得到这个信息，没有去了解一下情况，而是仓促决定重考，这简直是愚蠢。后来才知道，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全国高考录取率不到5%，浙江更是在3%以下，能进入杭大中文系读书，这是多么宝贵的机会！然而，我却轻易放弃了。

我初中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渴望继续求学，但视我为得意门生的班主任王老师（他毕业于杭大中文系）却反对我读高中，因为我姐姐去了黑龙江支边，按政策我有条件进工厂。那个时代，有一份

好工作比一张高中文凭强多了，他不愿我失去这次就业机会。1971年底我进入杭州制氧机厂工作，三年学徒四年帮工，很快变成一名标准的产业工人，离校门似乎越来越远。好在我初中时“不幸堕落”成了一名文学青年，喜欢阅读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在那个文化沙漠时代，读了不少能借到或买到的书籍，除了一些文学名著，还读了如中国社科院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俞平伯《红楼梦辨》等文学有关的书籍。记得1975年，听说南星桥新华书店要售《红楼梦》，我一大早请了假，骑自行车一个小时赶过去购书。书店门前早就挤挤挨挨排起了长队，我“无赖”地插队到了我两位朋友前面，居然买到了书，但是，那是当天书店出售的最后一套《红楼梦》，他们俩（一位是我的发小，1977年考入浙医大，另一位成了我杭大中文系78级同学）排了一上午，反倒没买着。当时读书完全凭兴趣，根本没想到还有高考这回事。等到1977年秋天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第一个念头是考中专，幸好被发小一句话提醒：要考就考大学，中专有啥意思？我这才战战兢兢地报名高考。进大学之后才知道，我的同学中有人只有小学学历，和我一样以同等学历报名，考上了大学。

其实我们这一代，很多人的学历都不完整。我读完小学四年级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两年，美其名曰“停课闹革命”。初高中生们还能到处“革命”，小学生只能失学在家里。两年后“复课闹革命”，我稀里糊涂成了初中生。初中两年半，很多时间都在学工学农学军，坐在课堂上学习的时间并不多。突然面临高考，我只能依靠自学得来的知识，选择考文科。那些复习的日子（啥复习啊，好多是新知识，应该叫自学才对），真是没日没夜。我住在工厂集体宿舍里，每晚看书到深夜一两点。工友们下班后，为了打发无聊的夜晚，常常聚到一起打扑克。现在回想起来，我坐在上铺做数学题，下面6位工友打扑克，也算一大奇景。但工友们对我考大学还是挺

支持的，这段时间打牌，没有我们过去打牌时的大喊大叫。他们打完睡觉，我仍然开着灯看书，也没有一位室友向我抗议。

1977 年高考在冬季，初试后还有复试，我居然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但体检却出了问题。厂里有一个公共浴室，职工们享受免费洗浴的待遇。不过，每次去浴室洗澡都要先回厂区外的宿舍拿换洗衣裤，很不方便。正好那年我托模具车间的工友做了一只木制大工具箱，只是还没有配门，我就心急地把换洗的内衣裤放到新工具箱抽屉里。哪知道，老鼠也喜欢上了这只新工具箱，把我放内衣裤的抽屉当作它们的窝。悲剧因此发生，复习中我感染上了疥疮。在全身痒痒难熬中我完成了复试，立即去看医生。医生给了我一瓶硫磺膏，让我每天涂抹全身几次，说两三周就能痊愈，但风疹块消退会晚一些。等到我拿到高考体检通知，身上的风疹块还没有全部消除。体检时医生问我这是什么，我老老实实回答是疥疮。后来我把此事告诉了发小，他直埋怨我太老实。不久，高校开始发榜，很多人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却没有任何消息，我明白自己已经名落孙山。但这次听到我居然能走读，我才意识到，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疥疮让我无法成为住校生。

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想得这么多，只是被这次未曾报到的“录取”树起了信心。第一次高考我是抱着试试的心情走进考场，有不少人认为我是懒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我对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一定能比第一次考得好，我要去北京，去上海读大学！征得领导同意后，我开始了新一轮复习。

第二次高考的复习条件不如第一次。第一次高考前我在车间上班，两个多月基本没干活，师傅们揽下了所有的活儿，把我“晾”在一边看书。但 1978 年高考复习时，我已经调入厂团委担任脱产宣传委员，我要负责厂团委《团讯》半月刊的集稿、油印和发行，还要负责食堂门前长长一溜黑板报的集稿和换版。这两处的稿子除了

向人约稿外，不少文章都是我自己撰写。书记虽然同意我再考一次，但要求我必须完成本职工作，且上班时间不能复习。好在半年前刚刚考试过，第二次复习，我自信更有把握。

从4月底决定到7月20日高考，只有两个半月。很快我又一次走进高考试场。这次考试已经是盛夏，考试那几天，试场里不仅有电风扇，还有大冰块。考前填志愿书，每个考生都能填写5所重点大学，5所非重点大学，每所大学填报两个专业。我把5所重点大学的志愿全填满，普通大学一栏我只填了杭州大学中文系。后面的是否服从调剂一栏，填了“否”。我当时想，如果这次连杭大中文系都考不上，这个大学我就不读了！

再次拿到录取通知书，盛夏即将离去。1978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直接寄到家里，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无法阻止我读大学。通知书上写到，我被录取到杭州大学中文系，10月中旬报到。这时候我已经知道，杭州大学在全国非重点大学中排名前列，中文系尤其厉害。其实我所在的杭州制氧机厂，离杭大并不远，但是，直到报到前，我居然一次也没有去过。没有想到，虽然几经进出，我在这所亲爱的母校完成我的本科、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博士学位（四校合并后）也在这里取得。我在这里恋爱，最后在这里退休。

进校后了解到，杭大77中文有11位走读生就读，我是排名第12但却缺位的走读生。我常常想，我居然浪费了杭大77中文一个宝贵的读书名额，如果我那年去报到，78中文就能录取排在我们后面的另外一位考生。我一直想向这位不知名的同龄人说一声：对不起！

注：本文原载祝毅主编《120个回望》，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返回目录](#)

幸运和感恩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胡波

当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桐庐县富春江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记得有过一时的兴奋和欢喜，但很快被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所取代。

我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说是初中生，实际情况更糟。受“停课闹革命”和“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没有正儿八经学到什么东西。在一个能将物理课改成“农机课”、上课老师被强行塞进麻袋的荒诞年代，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常识告诉我，要考大学，不管是什么专业，基本要求应该是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我的这种紧张和不安正是这种现实的落差造成的。

分析比较了自己的条件后，我觉得要面对现实，短中取长。英语自己比较有优势，相对其他科目自己信心更大些，同时也是可填报的专业之一。就这样，英语成了我的唯一选择。

我的外语之所以有些基础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初中毕业后由于受父亲“政审”的牵连，我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加上作为家中长子，我基本赋闲在家，为下乡务农做准备。父母担心大好年华被荒废，省吃俭用买了一台春蕾牌半导体收音机，希望我在家期间或下乡后能继续收听无线电台举办的英语学习讲座。同时，为了鼓励我学习，父亲每次进城或去风景区时总是带我步行穿过杭大校园（从文三街后门至天目山路前门）。看似不经意，但我能感觉到，父亲是想让我多少受到校园学习气氛的感染。

真正让我开始重视英语学习是我当工程师的五舅。他观察事物往往具有不同的眼光。有一次他来我家时送我三本新书，两本英语

小词典、一本英语惯用法书籍。他对着我说：“掌握一门外语如同多一双眼睛。趁年轻好好学习，今后会有用的。”这是在1974年前后，他的话听上去既深邃，又遥远。

就是凭借着这那台收音机，还有那几本工具书，我的英语学习基本坚持了下来，即使来到农村也没有中断，除非农忙季节。

考英语基本确定了，其他两门必考科目，语文和数学，尤其是数学如何解决，我知道像我这样文化基础的人需要花更大气力去补习，但哪来的时间？从何补起？成为我无法摆脱的问题。

就在此时，所在生产队学校负责人俞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去学校教英语，他那里缺少会外语的老师，同时还附带教授低年级的其它课程。如果我同意的话他负责去跟大队和公社干部疏通。我还能说什么，这一下子化解了我内心的焦虑。

我跟俞老师，还有在同一学校任课的张老师下乡不久后就相识。他们两人在当地农村被当作“大知识分子”。在我们后来的知青眼里他们两个是“隐“在乡间的奇人。两人同于1962年从杭州高中毕业后来这里务农。据说在校期间曾获得过杭州市物理和数学竞赛的前三名。我认识他们时两人已在农村娶妻生子，平时在生产队学校里当民办老师，农忙时回队参加生产劳动。

共同的杭城知青背景很自然让我们走的很近，他们也留意到了我会英语的特点。正是在俞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从生产队借调到学校当代课老师的。

这个改变对我高考的成功可以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一，让我有比较充裕的业余时间备考；第二，让我拥有资源可以就地寻求文化课的帮助；第三，也让我比别人更多的掌握有关高考的信息。（俞老师参加了地方初试的评卷工作）在那个信息极端匮乏的年代，任何一点有用的讯息都可能让我少走很多弯路。应该说，这时“天

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具备了条件。“人生在此一搏”是否成功就看我自己的努力程度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即使我插队的农村靠近省内两个最大的水电站，电网负荷时拉闸停电仍是家常便饭。有时整个晚上没电，有时天黑数小时后停电。想在夜间看书只能借助蜡烛或油灯。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所有知青点的人似乎都达成默契，晚饭后是铁定的学习时间，以往的无为串门和嬉戏打闹早已不复存在。静谧的环境和窗前的烛光默默地传递着正能量，大家相互感染着、激励着，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发奋努力着。

高考冲刺阶段正值公社掀起冬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所有知青，除我一人之外，都与当地的村民一起自备扁担、簸箕去数公里之外的大山脚下“挑烂泥”，开荒造田。他们很早就出门，当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住地时往往天色已晚。我就利用下课早的条件（同时也是安抚自己由于境遇的差距而产生的不安心绪）帮助食堂干些杂活，好让他们及时就餐有更多时间投入晚自习。

所有努力终究有了回报。当文革后首届高考结果在桐庐县城主要的大街上红榜公布时，我所在的生产队可谓在全县一举成名。同一个生产大队考上了三名大学生。（连同稍后中专录取的人在内，我们这个 20 多人的知青点总共考上三名大学生，五-六名中专生。）据说公社分管文教的干部为此受到重用和提拔。

1977 年的那场高考为无数的普通中国人开启了改变命运的大门，我是幸运者之一。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通往幸运之门的道路上得到过许许多多人的关爱、鼓励和搀扶。我深深地感谢他们。

（写于 2018 年 10 月）

[返回目录](#)

芳华年代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陈旭鸣

1977 年下半年，随着四人帮的粉碎，邓小平副总理恢复工作，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们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了！

我 73 年升的初中，那是张铁生“白卷英雄”的年代，整个初中，我们只上半天学。因为我是家里老大，底下有弟有妹，从小妈妈就对我说：“将来我们家，你下农村。”

我对农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由于父母是双职工，要上班，我出生八个月就被送到外公外婆家抚养。是外婆用米汤和米糊把我一口一口喂大的。

我印象里的农村，就像我外公外婆的家：有清清的小溪，有漫山遍野的绿树和青草，秋天硕果累累的果树和黄灿灿等待收割的庄稼。山野间有奔跑的小兔，家里有长着会说话般大眼睛的黄牛和每年春天都来屋檐下筑窝的小燕子，夜晚天空中漫天的星斗，小树丛前一闪一闪飞舞的萤火虫，还有见到我就欢喜跳跃的我的小黑狗。我喜欢农村。

所以，当父母告诉我，将来我要下农村时，我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在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的农村，穿着白衬衫黄军裤的我，扎着两条辫子，背着红十字箱，我进文宣队、我当赤脚医生。

刚进初中时，我们半天上课，半天自习。说是自习，其实就是几个同学聚在一起玩。我们去少年宫爬铁丝网、爬宝石山，在初阳台的大石块之间蹦来跳去，去同学家跳橡皮筋，弹吉他，拉二胡，唱歌。开心得不得了。

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母亲跟我说，“我们医院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看到农村的医疗条件特别不好。一些乡的老百姓看病，要

走几十里山路，非常艰苦。很需要医生。”我说将来我下农村了，要当赤脚医生。以后考工农兵大学，上医大，当医生。

于是，我去学校红医班学针灸，帮助老师给同学打预防针。我妈妈还帮我联系了浙医一院旁的一家卫生所，让我跟着一位六七十岁高龄的老中医学针灸学中草药，

那时候，我已经把我母亲书架上的厚厚的“医学论”、“解剖学”，还有一大摞针灸艾灸及中草药方面的书籍看完了。当我爬山时，可以认识很多中草药。

1975年，我以全优的成绩初中毕业了。我问我妈妈：“我是继续读书还是下农村？”妈妈看着不到十五岁的我，说，“能多学点文化还是好的，你的去留你自己决定。”我说，那我就继续读高中吧。于是，我报名读了高中。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施亚美老师，她个子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特别有书卷气，感觉特别沉静的女老师。我还记得我们物理老师赵光荣，英语老师丁老师。

78年初，老师让我们报名选文科班或理科班。施老师让我报文科班。我同意了。后来生物老师找我，劝我报医大。我其实心里也蛮想学医的。我问班主任能否调我去理科班。但因为理科班的人数已经超编，实在插不进去了。

我们高中大概有七八个班，只有一个理科快班，一个文科快班，其它普通班。我们去了文科班的，还得先按教学大纲继续学习数理化等课程。那年五月份。我以全优的成绩高中毕业。开始投入高考复习。

那时候我们一个班五十多个同学。我坐在倒数第二排。晚上辅导课时，教室灯光很暗。我发现自己眼睛看东西非常模糊，黑板看不清，地图及字典里的字看不清。一个星期后，妈妈带我去眼科检查后发现自己得了近视和散光。虽然只有150度，但我平时不戴眼镜，对面走过来的基本看不清楚脸上的五官。因此，我索性低头走

路，不看人。有一次，母亲对面走过，我都不知道。回家后被她一顿臭骂。

高考复习期间，母亲从朋友那里借了“红楼梦”在看。乘她上班去了，我悄悄把书从她房间偷出来，每天放学回家，就把书藏在书桌抽屉里，桌上放着复习资料，拉开抽屉，废寝忘食地看了起来。我把红楼梦里的诗，用笔记本抄下来背诵，几乎忘了有高考这件事。

7月份高考那几天，正是杭城最闷热的时候。父亲一早给我买了我最喜欢吃的肉包子。母亲陪我骑自行车去考场，下午又到考场接我，让我至今想起来都非常感动。

炎热的天气，紧张的考试，听说有好几位同学中暑倒下了。监考老师们给每个教室用脸盆装了冰块降温。

考完试，回家翻翻书，发现有些题目没有做对，有些题答得不够好。开始后悔自己平时不用功复习。但心里还是安慰自己说，要不明年考医。

到了快发榜的日子，我收到了英语面试通知。面试地点在杭州外国语学校。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参加了外语面试。因为我们小学三年级就是英语试点教育班，学英语对于我来说相当轻松。初中高中的英语考试，我都是班上第一个交卷并得分最高的。不过，对于这次英语面试，我还是做了认真的准备。有不确定的，会去楼下当外语老师的邻居家求教。

当我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杭州大学外语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最高兴的是我母亲。她说：“我知道你一定会考取的。”这对从来不当面夸我的母亲来说，是对我的最高嘉奖了。我庆幸我自己，因为考上大学，我终于没有被下放到农村。我庆幸我自己没有去学医而选择了外语，使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因为有了外语这个工具，让我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也让我走到世界任何地方，都能与人很好地沟通，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我衷心感谢祖国母亲的哺育，感谢父母的养育和教导，感谢老师们对我们的辛勤耕耘和培育，感谢陪伴我们一起渡过我们青春芳华的同学们，感谢人生路上的所有相遇。

一切，应该都是最好的安排吧！

[返回目录](#)

一言难尽是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孙淦钊

应该说在同龄人中，我和咱们大学同学中的老三届生一样，是受上天眷顾的，因为我们在经历了天翻地复、风风雨雨、辛酸苦辣的十余年后，有机会参加了被停顿了十余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此时的我已过花样年华、已为人妻、已是人母、也已在“戴帽初中”当了七年的民办英文教师。

1978 年得知老三届的民办教师也能参加高考，我便迫不及待、义无反顾的报了名。此后一边照常每周教十八节的课，一边着手复习功课。那时儿子刚断奶不久，和先生又两地分居，白天虽有婆婆照看，下班后当单亲妈妈可是全职的。每晚哄孩子入睡后，便“挑灯夜读”。于是时间变得更加珍贵，体力也饱受挑战。虽说不若“悬梁刺股”，还是要靠书桌前的墙上贴的座右铭“有志者、事竟成”来勉励自己。（据说后来成为隔壁老师教育她孩子的座右铭。）其间当然少不了母亲亲手烹饪、妹妹深夜送来的夜宵。此时不光体力，心理也备受考验。记得当时所在地的考生被召集开会，见到自己的学生们，每每感到非常难堪。因而总是悄悄地挑个最后排、最最边角的座位，默默地坐下。

考试日期终于到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每考一门，好像都得心应手：语文作文是缩写一篇文章；数学所有学过的题目全部答对了；政治历史地理当然容易；英文考的也是基础知识。回校碰到监考同事，说从考场出来时侧面见到我在频频微笑。

接下来是选择学校。填入学志愿是门学问，当然少不了师长的帮助。几经推敲后选定杭州大学为第一志愿，北京师范大学为第二、上海外国语学院为第三。至于英文口试，自然自信满满，因为在成

为英语民办教师前已经接受了台州师专英语培训班一年的训练（我和金秋芬就是那时形影不离的好同学）。可是有一天，一位好心的部队学院的英文老师（我老师的朋友）突然问我，口试准备好了吗？接着问我，“What’s the weather?”我想这不太简单了么？当然是“it’s fine.”他笑了，说他会这样回答：“Fine, isn’t it?”我自此受到了无限的启发。

考试后的日子是天天期盼的日子。那天下午我正在父母家，只听见门外有人高声地喊，“周老师、周老师，你女儿已被杭州大学录取了！”及至我和母亲赶出门外，县教育局丁副局长已经匆匆朝离我们几百米的教育局走去了，他的手里还提着行李包。他刚从省城带来了好消息！

第二天，邻居上街买菜回来，说我的名字在中心大街的红榜上。我抱着孩子飞步而至，发现“孙淦钊”果然“中举”啦！造化真是弄人！转身一看，街那边不就是几年前贴我大字报的地方吗？那是一位下届同学兼同系统的同事为了挤下我而自己能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而写的大字报。当时听说贴了大字报，我都没有勇气亲自去看个究竟，还是两位发小冒天下之大不韪、乘下大雨把它撕下来拿到我家才看到的。大意是：不许推荐孙淦钊上工农兵大学！因为她的叔公是国民党国防部长、奶奶是解放前城里四大名媛之一，亲爷爷是地主……我从未见过那位叔公、也没见过“亲爷爷”。后来听母亲说，她是有位本家叔叔在国民党国防部。那大字报还不是空穴来风呢！

正式的录取书面通知书是几天后收到的。擅抖着手打开信封的当时，弟弟在耳边轻轻说，“姐姐，冷静，冷静……。”

快起程了，向工作了七年的老师同事话别时，校长叹了口气，说：“小孙，去吧！我们这个池塘太小了！”。

离开家那天，天还没亮，起床时尽管轻手蹑脚，还是惊醒了熟睡的妈妈。咬咬牙、六神无主地提起行装步出家门，及至走出弄堂尽头，儿子喊妈妈的哭声仍然隐约可辨。那令人揪心的痛，至今难忘.....。

然而前进的脚步没有就此停下。揣着这揪心的痛，我和老三届同学们一起，以高考迈进杭大学府、迈向了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境界.....。

[返回目录](#)

最难忘的是高考，最感恩的是母校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朱洪魁

在我们上大学满四十周年前夕，我总想写点什么，以回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并且表达自己对母校的感恩。

和应届生同学不同的是，我自高一时起，就已经确立了要上大学的信念。但成长于文革年代的我们，都知道那时没有高考，只有推荐上大学。而且，从我自身家庭而言，我必然会下放到农村，成为下乡知青的一员。我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从中寻找机会，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于是，我从高一开始，便加强了身体锻炼，每天早晨 4:50 起床，去外面长跑，一般每天早上要跑 5 公里左右，上学后课间休息时间，学校里进行单杠、双杠的锻炼，下午放学后，再练举重以及哑铃、吊环的锻炼，并且在高二时开始冬泳训练，连续 2 年的加强锻炼，使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极为出色。我这样锻炼的目的，就是为了下乡后能够迅速适应农村的强体力活，不至于因为自己的体力不行而被当地农民瞧不起，因而不能成为杰出的知青，因而达不到被推荐上学的目的。

毕业后不久，我们被要求报名上山下乡，既然躲不过去，我就“积极”报名了。1975 年 10 月，我被批准下乡。下乡后，我成为我们知青点的负责人。由于我有明确的理想（对外当然不能说），和强壮的体魄，我是各项农活都积极地干，76 年 5 月，我又被大队单独抽调出来，去大队的一个最穷的生产队锻炼 3 个月，和生产队的农民一起参加劳动，凡是农民干的活，我都干，虽然每个工只有一毛钱（其它生产队每个工有 3 毛，4 毛），我也从不叫苦叫累，没有请过一天假，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很好，每次春节期间，当地

许多农民悄悄地把我一个知青叫到家里吃饭（只要尊重别人，别人也一定会尊重你的）。各方面的表现让当地大队的党支书及支部成员对我评价很好。尤其是在下乡一年的 1976 年 12 月，我们知青点的全体知青被通知去和农民一起参加冬天的水利建设——挖河，那真是十分的艰苦：早晨 4 点钟起床，吃完早饭（干饭加咸菜汤），顶着凌冽的寒风要走近一个小时才到达工地（冻得都感觉耳朵不再是自己的），挖河时，我们主要是把淤泥挑走，沉甸甸的泥土担子不能放下，越到河底越难挑，是众人轮流在肩上换泥土担子，十分沉重，但又不能歇下来，真是苦不堪言，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体魄，知青都难以坚持。事实也确实如此，其他知青最多待了一周，就擅自溜回去了，我却和土生土长的农民一道，坚持了整整一个月，直到挖河结束，和其他农民一起打道回府，没有当过一天逃兵。这次我参加挖河的行动，和他们是真正的同吃同住，干同样的活，没有缺席过一天，这使得当地农民对我刮目相看，认为我有这样的体魄和坚强毅力在知青中十分的罕见，大队领导，甚至公社领导对我的表现都十分满意，不久（1977 年初）就让我成为公社团委委员，并让我参加公社组织的工作队，去另一大队指导运动。虽然这样大部分时间不需要在农田里干活了，但我心中，这些都不是我的目标，我的期望是能被推荐上大学。我在继续等待.....。

1977 年 11 月份，我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大学招生将改变以往推荐上大学的方式，改为考试择优录取！这令我十分震惊，我必须改变自己！我立即向工作组组长请假，要求给我时间让我复习考试，但工作组组长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工人，难以理解我急迫想上大学的心情，不予准假，还将我请假的事报给了公社党委，公社党委副书记以及其他领导专程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该如此不顾工作。当时我的心情极其沮丧，但也无可奈何。这样情况下去参加 1977 年的高考，结果可想而知，落榜！

1978年1月，我的工作队生涯结束，公社因为对我有了想法，不再考虑我政治上的继续进步，让我回原来的大队，继续我的知青生活。岂不知，这正中我的下怀！这下我可以再也不需仰人鼻息，苦苦地等待被推荐上大学了（事后我也多次想过，我真的能被推荐上大学吗？估计只是自己的美好愿望而已）！恢复高考让自己真的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考上大学了！我可以有完全受自己支配的时间去复习（知青可以随意请假不干活，只是没有工分而已），迎接1978年的高考！

从1978年1月起，我便开启了真正的复习迎考，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在宿舍里复习，高考前三个月，我不再去干任何农活，用自己的全部时间复习。那时我们是两个知青一个宿舍，和我同寝室的另一知青，嫌农村生活艰苦，干脆回城里的家里去复习（我上大学毕业那年，他也终于考上中专）。他这样一走，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了，给我创造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可以不受干扰地安排自己的复习时间，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清晰地记得，我那时每天晚上九点睡觉，早上3点起床看书复习。由于身体好，也没有疲劳的感觉。最后三个月停产复习时，生活很艰苦，当时知青点已经不开伙了（其他知青都已经没有心思在农村了，纷纷回去各找门路准备回城），我就买挂面，用一个小煤油炉煮挂面吃，放点盐，没有菜，甚至都没有油！连续三个月每天三顿都是如此，以至于上了大学后，见到吃面就感觉恶心，面吃太多了！天气越来越热，蚊子也猖獗起来了，我晚上看书时，就穿上厚厚的粗布长裤，再穿上高筒雨靴，手里拿着芭蕉扇，不让蚊子肆虐我。但我已经感觉不到生活的艰苦了，认为自己的每一点辛苦，都让自己朝着心中的理想——上大学更近了一步！

由于我自小学三年级起，就生活在文革之中。文革中的学校是不需要，也不让认真学习的。到高考复习时，我才真正感觉自己当

年没有学好各门功课（绝大多数都没有认真学好），这让我感觉极其恐慌，高考高考，是要凭着真本事，考出好成绩才能被录取的！我首先把自己要考什么专业下来，首先分析自己的长短：初高中时，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行，只有考文科，文科中，语文也不突出（除了文革生特有的批判文比较擅长，虽然这对于我现在的律师工作十分有益），历史虽然感兴趣，但没有读过多少这方面的书（那时无书可读），只有英语在高中时的班级里比较突出），于是，我决定考大学的英语专业！

虽说我在高中时，英语成绩一直比较好，但复习考试时，发现自己还是基础差，有许多基础语法都成问题，知识储备也少，心中有恐慌。我自己觉得，还是需要认真补课的，当时，我下放的地方有一个干校，当时正好听说县里在那里培训英语老师，我抓住这个有利条件，有不懂的就去请教那里培训班的老师，培训班的老师（以前我们并不熟悉）也十分愿意为我答疑解惑，并且给了我一些考卷让我做，我做出来后，他给我批改。教师英语培训班结束后，我失去了这一有利条件，再有不懂的地方，我就跑去十几里外的公社中学，请教那里的英语老师（也不认识）。

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 78 年高考！在那烈日炎炎的三天高考日子里，我每天早晨 6 点出发，步行十几里路去高考考试点——公社中学参加考试，上午考完，中午买几个烧饼权当午饭，然后在公社大会堂的楼梯肚里休息一下（还是一知青的父亲通过熟人关系帮我弄到的），下午继续考试。在参加考试的几张试卷中，还是英语卷感觉最好。

通知口试后，我心中没底，又去找先前结识的英语老师培训班的英语老师（我中学英语老师是南京林学院毕业的，学的还是俄语，我心中对自己的发音是否正确没有底气），请他帮我纠正发音，果然有问题！他说我的英语发音基本不正确，让我重新跟他学英语发

音，纠正我的发音。那时候的老师真不错，不认识也愿意真心的教你，只要你愿意请教！

高考结束后，我就什么都不去想了，听天由命吧。在拿到杭州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说实话，我心情没有什么激动（我的父母比我激动，他们先拿到录取通知书，激动的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因为上大学是我人生规划中的既定目标，即使再次落榜，我也不会气馁，不会放弃，会继续复习，直至上大学！

高考体检称体重时，发现自己的体重从高考复习前的 65 公斤，减少到 55 公斤！

我们县里有两人考取杭州大学，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应届生蒋国俊，他考取了杭州大学地理系（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我记得杭大专门在杭州的武林门汽车站设点接待我们，梅志浩，我梅兄，也在那里接待我，他是我班里第一个我认识的同学！

我感恩我的母校杭州大学，不仅因为它是我改变人生轨迹的地方，更因为它的包容性和综合性。

我上了大学后，才发现我自己有容不得他人强迫我学习的个性，也就是说，别人强迫我学习的东西，我就学不好。我喜欢自己学习，自己思考琢磨，并且是自己喜欢的学科，我才有积极性，有动力去学习。感谢我的母校，给我提供了这方面十分宽松的环境，当年我们除了专业课和其它记学分的课，必须学习外，其它的悉听尊便，不干涉我们（不知这样的宽松环境现在是否已经改变），这就让我有大量的时间阅读自己喜欢学科的书籍。在大学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尤其是历史，政治和法律书籍。大学虽然包容，环境宽松，但同学们自己的学习劲头始终不松懈，我也一样，如果晚上在 11 点前回寝室，就像是犯了罪一样，心中就会感觉不安。在大学里，我们深感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每天都充分利用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书籍，补充新知识。所以就社会整体而言，才更显得

77、78 级学生是有史以来最用功的学生，以后的学生再也不如我们当年那么用功了！

杭州大学是个综合性大学，当年我们这些学生，只要你有兴趣，可以去外系任意听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我在大学期间，尤其是后两年，干了许多这方面不务正业的事。大学期间，我不仅和我们同专业的男同学有许多交往，也和历史系，地理系，教育系甚至体育系等的许多同学交往，交流各自的见解，有思想方面的碰撞，通过这些交流和碰撞，大大开了我的眼界，这和我后来改行做律师有必然的联系。

我永远难忘我的高考经历，它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第一步，也永远感恩我的母校——杭州大学！在四年的学习生涯中，它不仅让我获得了英语专业的知识，也使得我培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和思维方法。我自己始终认为，我们杭州大学就是中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感谢一路对我帮助极大的各位恩师，当然，我终生感谢邓小平，是他在当时，毅然决定高考，不再是推荐上大学！让我们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写于 2018 年 2 月 19 日）

[返回目录](#)

最忆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魏立亭

提起 78 年的高考仿佛就发生在昨日，但掐指一算已过了 40 年，快半个世纪了。Howtimeflies（大学许国璋课本第一课的第一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

77 年原本打算和闺蜜一起参加高考的，复习一半才知道有政策规定享受因病没下乡插队的（我高中毕业 600 度近视属病残留城）不能参加高考，除非有正式工作，结果闺蜜 77 级被杭大外语系录取，更增强了我要高考的决心。于是赶快辞去印刷厂排字工工作，父亲托朋友在一家化工厂找了份正式工作。才算有了参加高考的资格。

复习的过程是艰苦而又快乐的。现在回想，也许是我那时感觉最幸福的时刻了，也是我身材最苗条的时候。文革结束了，虽然物质依旧匮乏，仅温饱而已，但人生似乎有了些清晰的方向和希望。心情是愉快的，精神是充实的。我爷爷是教师，父亲的兄弟姐妹均大学毕业，所以家里支持我参加高考是顺理成章的事。那个时候似乎父母也不吵架了，注意力有所转移，也是我心情愉快的一个因素吧。

一边是两班倒的工作，车间闷热如桑拿，化工产品车间的粉尘，各种化工产品气味令人窒息，成天在这样的环境里令我痛苦不堪，也是参加高考的动力之一，要逃离此处！我的组长上班有时间和女工打打闹闹，却不许我上班时间看书复习。所以只能偷偷看书。一边是家里自学复习，那时居住条件都不好，家里连个电风扇也没有，看书时就坐在水泥地上降温，一会儿地上就湿成一片。当时并没有觉得苦，经常是一身臭汗裹着一颗快乐而又充满激情的心，因为感觉日子有盼头。复习资料少得可怜，也不知道哪里去获取，好在隔

壁邻居有一对复旦外语系毕业的老大学生，从他们家里能借点老课本权当复习资料了。晚上则回母校复习史地，现在想起来母校当年对我们这些散落在外的历届毕业生真是好，老师们晚上业余时间无偿给我们补习，帮我们考上大学视作是他们的希望和义务，把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当时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于是零基础的我史地居然还考了个 70 多分。

记忆最清楚的是那天午休时，穿着工装拿着饭盒和工友们在食堂排队打饭，工会有人拿着一张纸喊我：魏立亭，杭州大学通知你去口试，顿时排队打饭的人目光都聚集我，各种表情，我当时心里是有些得意的。

我们厂里一共有 5 人参加复习高考，只有我一人考文科，他们似乎信息很多，告诉我文科很难考的，因为录取率特别低，我当时心凉了半截，越发的不自信了。结果最后只有两人被录取，我和另一位考理科的工友，好像是杭大数学系。

世事难料。但生活告诉我们，人生在任何境地都需要心存梦想和希望，加上一些努力，机会有时会碰上你，人生的方向从此就会朝着如你所追求和期望的走。当我拿到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去我的母校杭州第七中学向我的老师们汇报高考结果时，在校外拐角处遇到承维琦（应该没记错吧）她鼓励我说了一句“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我记得很真切。

[返回目录](#)

1978 年的高考是值得回忆的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张晓音

1978 年的高考是值得回忆的。岁月流逝整整四十年了，可是那年我参加高考前前后后的这些事仍然清晰，有如发生在昨天。

决定参加高考前，我在工厂已工作五年了。从小学到高中到进工厂，我几乎没有做过任何重大的决定。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6 岁时，外婆决定送我回父母身边上小学。我知道外婆是舍不得我离开的，但是为了我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她牵着我的小手长途跋涉坐了大半天的汽车来到了杭州妈妈任教的学校和家。就这样，外婆替我做了影响我人生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从此，我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第二个重要决定是老师和父母帮我做的。那是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由于年纪比同届毕业生小，人也长的瘦小，如果去工厂可能算得上是童工了吧。正好那年，国家恢复了自文革开始停止的高中招生，老师和父母都认为我应该继续读书，于是我有幸地成了文革中的第一届高中生。那是一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可老师们讲课依然都很认真负责，我们或多或少还是学了一些东西；学工学农学军学商的经历更是让我至今受益匪浅。在那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日子里，我更多的是读一些闲书，然后把书里的故事讲给妹妹和邻家小孩们听，她们是我最早的听众。中学时，在学校宣传队的日子也很有色彩，外面在敲锣打鼓的游行，我们在教室里排练，我们在学校里演，去厂里演，还去为在萧山插队的校友们演出。高中时，由于学校离家远，我在学校吃午饭。午休时，我就去图书馆看小说，要不就去打乒乓球。学校工宣队的一位师傅耐心地教我怎样打球，打了一段时间，我竟然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了，我赢了我们赛区的比赛，可

是在赛区与赛区之间的比赛，我就被淘汰了。这些都成了我芳华年代生活的一部分。

高中毕业，因为姐姐在插队，我留城了。我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了一名板金工，成了我们家唯一的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真正的走向社会了。我心存感激，并怀着好奇及不安的心情开始了我日复一日的学徒工生活。我跟师傅学习着怎样用榔头敲打铁皮，怎样用钻床，怎样用电钻头在零件上打洞。我常常将榔头打在自己的手上，也时时怕钻头卡在零件上，更怕零件没夹住而飞起来，因为这些都发生过。车间里声音很响，慢慢的我手上长出了很多的茧，说话也不再轻声细语。三年学徒转正后，我被派往外厂学习新技能。在工厂的这些年，我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我开始有了梦想。

我的梦想很简单，梦想有机会去厂里技术科或其他什么单位当一名资料管理员或是翻译员。为了这个梦想，我开始学英语了。我和厂里几个一起进厂的高中同学跟着上海广播电台学英语，后又学《英语 900 句》。我们一起讨论语法，一起做英文造句。学了一段时间后，借助老爸读书时用过的的一本英汉字典，借助记住的一些单词，我开始可以看懂一些东西了。每看懂一段英文，我就想，有朝一日我是否也可以阅读英文版的闲书了呢？日子就这样地过着。外面的世界很热闹，厂里也很热闹，一会儿停工停产，一会儿加班加点。我一边工作，一边不紧不慢地学着英语。每天继续不管风吹雨打地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里和厂里，一路上见闻了人间百态，一路上感受着大地的冷暖。但是，一路上从此多了一个我向往的目标，尽管我也不知道何时能达到那目标。

时间就这样流逝着，邻家小孩都已长大各奔东西了，大妹也去了农村插队。

热闹非凡了十年的中国大地终于来到了 1977 年。那一年，祖国上下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来的如此之快，如此的干净利索，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理解其真正含意时，厂里一位同事参加了 1977 年的高考，并且如愿以偿地准备去上大学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同时也使我看到了一点希望。我的心开始不安宁了，我是否也应该去参加高考？我有一份固定工作，我在杭州工作，这都是当时很多人想之而不得的啊。我要放弃它吗？我徘徊着，我举棋不定，我问身为教师的父母，答复是我自己决定，因为我已到该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年纪了。我第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需要自己做一次重大的决定了。好在幸运之神又一次地眷顾了我。当我听说国家政策是五年工龄以上就可以带工资读书时，我没有任何理由再举棋不定了。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天时地利人和。1978 年的春天，我决定参加高考了，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考大军中的一员。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进入了紧张的备考模式。这是一种非常锻炼人意志的模式，虽说不上悬梁刺股，也可称得上披星戴月了。我白天上班，晚上恶补历史地理政治。由于离开学校太久，再加上小学到高中也没有系统性地学过历史地理，我越看复习书，越感觉自己知识之贫乏。我后悔当初为啥不用看闲书的时间来认真地了解一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地理呢？后悔是没有用的，只有往前走了。我自己决定要做的事，除了努力，没有后路了。由于白天上班不能看书，我就把中国地图印在了脑海里。趁上班有机会时，我就在地图上从南往北，从东往西地“走”一遍，把祖国的主要江河湖泊山脉及交通要道串一下以便记住，同时再把主要的历史事件在地图上“标”出来复习历史，晚上回家再看书核对白天“走”的对不对，然后复习新东西。上班的路上，是我背英文单词的好时间，我常边骑车边口中念念有词。天气越来越热，蚊子也肆无忌惮。高考也越来越近了。我脑海里塞满了自学的东西，包括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高考前一星期，我去父亲任教的学校请教地理老师。他耐心地解答了我一大堆的问题，我至今都很感谢他。高考前二天，我开始复习数学，虽说考文科的，数学分不重要，但我不想交白卷。父亲是教数学的，可我的数学细胞实在不多，好在我的应届生妹妹在准备考理科，她在校数学拔尖。于是，她当了我的数学辅导老师，短短的二天里，我陆陆续续地做了一些数学题，这就算是数学复习过了。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了。考试前的晚上我没有睡着，我听见妹妹也在翻来复去。思绪万千地熬到天亮，匆匆吃完早餐，我和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向工厂方向骑去。考场在离我工厂不远的一所中学里进行。进教室后，我坐在前排。等大家都坐定后，老师宣布可以从抽屉里把试卷拿出来了。打开试卷，我拿起了笔，我的手有点颤抖，是紧张，还是激动？一分钟后，我开始答题。考试进行了三天，每天考两门课，考的昏天黑地的。考试结束的那天，我发现考场上坐在我后排的竟然是我高中班的一个男同学，后来体检时又与他相遇。因为那时在学校男女生不讲话，读书两年，就像熟悉的陌路人，所以当时我们也没打招呼，好似根本不认识一样。三十多年后，我回国探亲，在同学聚会上碰到他，才知道他当年也考上了分数线，只是不知为什么没有被录取。由此可见，一个人，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也是有幸运与不幸运之分的。

高考结束后，接下来的日子比复习和考试更难熬。我和妹妹讨论着政治和数学的答题，我惊奇地发现我数学考的还不错。据说很多考理科的考生都没有做对的一道要求利用三角函数的关系解题的题目，我竟然答对了。我把我复习数学的这二天里所学的正弦，余弦，正切和余切的关系及互转公式全用上了，着实地体验了一下什么叫“急中生智”。等通知的日子是不安的，就像那炎热的夏天，烦躁又漫长。直到一天中午，邮递员送来一封杭州大学的信函。杭州大学外语系是我唯一的报考志愿，是落榜还是录取？答案就在此

信中。我急忙打开信封，答案揭晓固然使家人和邻居们欢欣鼓舞，而我却有一种五味俱全的感觉。又过了几天，妹妹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我们俩成了当年教师宿舍楼里唯一考上大学的，父母亲自然很高兴。

1978 年的秋天，我开始了来之不易且为之而骄傲的的大学生活。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学校。1982 年大学毕业，我分配在大学图书馆工作。1983 年，教育部下达文件，要求凡 77 级和 78 级毕业分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的去北京大学或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系强化性地学习图书情报专业半年。于是，我又当了学生，在武汉大学读书，半年读完了图书情报学系本科大一和大二必修的所有基础课程。

题外话：武汉大学真的很漂亮，校园内樱花盛开时，可以让你如痴如醉。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丰富、建筑宏伟、环境幽雅，令我感叹与敬畏。1987 年，通过 TOEFL 考试，得到奖学金后，我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图书情报学系读研了。

题外话：当年在美留学时的生活之艰苦是我求学路上最受考验的，比作洋插队一点不过，但我坚信辛勤的付出总会有收获的。获得了威斯康辛大学图书情报学的终极研究生（terminal degree）的学位后，我就一直在美国大学工作，并被授予内瓦达大学的终身教职及副教授职称。

1978 年的高考为实现我的梦想提供了良机。我也为这梦想从此走上了一条伴我人生的漫长，曲折且又充满希望的路，一条我从未后悔走的路。感恩我的外婆把我领上了这条路，感恩父母亲无私的抚养与教育，他们从来不在学习上给我们有任何的压力，也从来不把我们将别的学生相比。感恩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感恩所有教过我课的老师，他/她们的辛勤耕耘态度应是当今教育者们的楷模。感恩我的同学，同行和同事，在人生路上能与你们相遇是我珍惜与不能忘怀的缘分！当然，我更要感恩的是那个 1977 年。我后来才知

道，我们能幸运地进入大学来之多么的不易。据说 1977 年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开了整整 44 天，从夏天到秋天，其间回绕着是否恢复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分歧一直僵持不下。而庆幸的是，历史最终作出了恢复高考的艰难抉择；也正是这一抉择，促成了国家命运的拐点，促成了千百万人的人生转折。

[返回目录](#)

最忆是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邱建华

在我的人生轨迹中，参加高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大学一直是我很早就立下的志向。高中毕业时，老师觉得我成绩不错，好意动员我留校参加教师培训班，日后就留校当老师，当时所称的“小老师”。但当时的政策是只有工农兵才能上大学，所以我就决意要先去当工农兵。其实后来这些小老师也可以考大学的，而且有了很大学养上的优势，但这些政策的改变当时是无法预见的。1972 年我高中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一个大集体企业，叫胜利锅炉厂，后来改为杭州起重机械厂，成了一个车工，所谓真正的产业工人。

车工还是很辛苦的，每天站立 8 小时操作机床，有生产指标和质量要求，一天下来腰酸背痛，非常疲劳。还是两班制，经常日夜不分。工厂离家又比较远，骑自行车至少一个小时。所以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很少。但我一直怀揣上大学的梦想，认为干上 5 年应该有争取上大学的希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一直不懈地抓紧时间看书和自习。

1977 年 6 月听到消息说马上要恢复高考了，当时确实非常激动，马上投入了备考的战斗当中。但也有困扰，不太明确自己要考的专业。开始想考历史，认为能学到实在的知识，不像政治之类的那么虚。又觉得学英语也很好。记得当时很喜欢看《参考消息》，认为上面的很多文章比国内的报纸真实多了，如果自己看懂外文，就可以少受骗了。但后来还是去考了当时最喜欢的中文，觉得基础会更好些。清楚记得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路”，好有想象力的题目。但却没能考上，估计是数学考太差了。然而我并没有灰心，马上投入到下一年的备考中去。我的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父亲也只读到初

中，但他们在生活和精神上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我有个很要好的同事叫沈平凡，是老三届的毕业生，主动来帮助我复习数学。我的师傅和徒弟还有其它同事也很理解我，记得我那时会拿一本《英语900句》，在工休的时候会看一下。在78年高考的当天我所在的工厂用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把我们参加高考的同事送到考场，可见当年大家对高考是多么重视和欢欣鼓舞。对此我一直感恩在心。

78年我考的还是中文，但后来消息说如果我愿意调整到外语专业的话就可以被杭州大学录取，我当然马上答应了，就这样进入了杭大外语系。

因为是杭州本地人，最开始两年是走读生。每天骑自行车来上课，下课就回家了，同学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很紧密。后两年班级调整，班主任来和我商量让我当班长，我说可以的，但最好能给我一个床铺以便有更多的学习时间。这样就成了住校生，与同学也有了更密切的交往。

我们三班集体真的很棒。既有学霸，也有清纯活跃的应届生，来自各地的莘莘学子努力学习，课外活动也很丰富，大家还非常团结，风气正而温馨。这4年的芳华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和回忆。

印象深刻的是听给77级上课的美国老师 Jeskie 上英美文学课。当时蹭课也是明目张胆，拿了录音机早早地占了有利位子。录下来后，课后花很多时间把它整理成文字笔记。我的文学欣赏能力和英文听力在那时候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可惜后来这笔记本借给别人后就没有了下落。

Jeskie 邀请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西湖之畔。记得他说过历代他最喜欢的一句诗是 Wordsworth 的“golden hours in the glass”。

我们三班和四班合用一个教室，两个班彼此也都成了好朋友。

芳华永在心间。献给珍贵的我们大家。

[返回目录](#)

我的最忆是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朱瑞蕊

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从浙江日报上读到的。那是 1977 年 10 月 21 日，一个秋高气爽，温度适宜得奢侈的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妈妈刚为我手织了一件棉线衫，我几乎天天穿在身上，到处炫耀。

得知高考消息后，最乐开怀的是我父母。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女儿终于可以驰骋考场，上大学有望啦！

我父母似乎是志在必得，仿佛胜券稳操。可我本人却是诚惶诚恐，心里没底。

1975 年的夏天，浑浑噩噩的我高中毕业了，因为享受了一条优惠政策而幸运地留城待业。别人对我是羡慕不已，可我却踽踽独行在人生的黑暗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所谓的“待业”其实是画饼充饥。当时，无业可待，只能呆在家里“吃闲饭”。

我的家住在嘉兴一条巷子的头上，巷子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非常热闹。每天早饭后，无所事事、荷尔蒙爆棚的青年男女扎堆儿在我家的窗下聊天，嘻嘻哈哈，你拉我扯。他们中有的是“病留”在城；有的是“不服从分配拒去乡下”；有的是姐姐已经下乡他们可以留城；有的是二天乡下干三天回城歇。各有各的理由，汇集到我家窗下，互相调侃揶揄，打闹嬉戏，言语诙谐幽默。而我在窗内听得心潮起伏，跃跃欲试，很想出门加入其中。

我妈妈当时独力撑家，为了让我爸爸在部队安心工作，建议我自学英语，以便让我留足家里。为诱我上学习之钩，我妈妈煞费苦心杜撰出一套理论：生活中很多时候是“世人皆醉我独醒”，时下

大部分人玩而不学，如果你能忙世人之所闲，将来必定会闲世人之所忙。有朝一日，机会降临，不就有出头之日了？显然妈妈的理论说服了我。自此，我雷打不动地留守家中，独坐餐桌一角，“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学英语”。至于学习的终极目标，不是我所关心，也不曾考虑。

俗话说“书山无路勤为径”；“十年寒窗苦读书”；“力学如力耕”；“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些读书苦、苦读书的古语到了我这里一概被颠覆成了鸟语花香的晴朗日子。于是，我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浸淫在学海里，享受着源源不断的学习乐趣。我越学越深钻，越钻越“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可是去哪里“躬行”呢？

1976年，中国发生了苍黄反覆的变化，振奋人心的小道消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据说：待业青年要分配工作了；知识分子要落实政策了。我像大海里一只随波逐流的漂流瓶，海浪把我推到了一家工厂。面试后我被定位做“翻砂工”，就是蹲在地上做铸件的造型。

然而，命运的转机往往是突如其来的。正在我准备着工装前去上班时，恢复高考的消息登报了。1977年，泱泱五百七十万高考大军涌进考场。初试后就“无边落木萧萧下”，我是复试后成为其中一叶“落木”的。

我的想法是，复试败北的话就打起背包做工去！而父母则坚持要我次年再战高考，做一个当代“范进”。

半年之后，1978年的高考，翩翩而至，参加人数高达六百万。经过半年埋头复习的我，终于在1978年的深秋成了全国的四十点二万的一分子，坐进了大学的课堂。

现在，我虽已退休在家，可是尽力保持忙碌活跃。托克维尔曾说：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愿我们的心灵永远健康。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回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孙奕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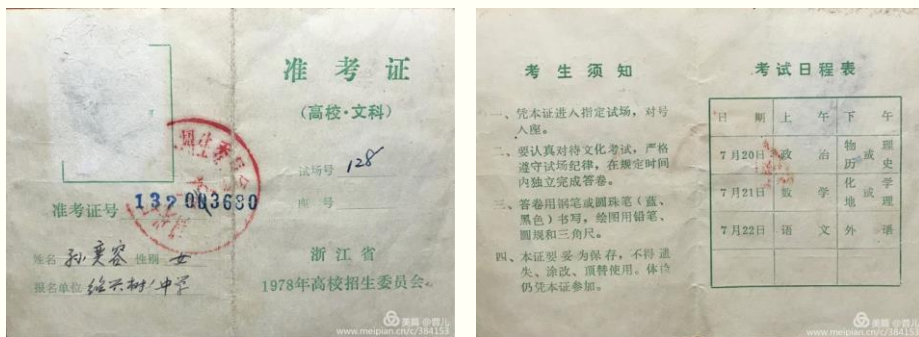
高考四十周年了，心底尘封已久的岁月还收藏着暖暖的回忆，盈满心房；那些高考的记忆在葱茏的生命里虽然渐渐模糊，但永不消逝！

在 1976 年的落叶季节，生长于绍兴这座文化古城的我，顶替父亲的教师职位，任教于绍兴树人中学。因为在我读中学的五年里，语文是我的强项，一直担任着班里的语文课代表，于是顺理成章，树人中学就安排我教初中语文。

直到 1977 年的秋天，国家在文革后恢复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以至于 N 年之后作为省城高校的教师，在给新生们“洗脑”时，常常会谈起我那令人难忘的高考之路：78 年的高考，我们高中班里考上了二男一女，物理课代表被上海交大录取；数学课代表被杭大录取。每每说到此处，一些性急的新生便会接口说道：那老师您一定是英语课代表了。哈哈，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英语老师在读中学时居然不是英语课代表而是语文课代表！

在 77 年恢复高考时，校长就鼓励我去参加了，我说了一连串的“不行”，没有参加。第二年校长又找到我，告诫说没有大学文凭，今后很难在教学岗位上立足。可笑的是，我当时的想法很是简单幼稚：如果考不上岂不让我的学生们笑话！也就是为了不让学生们笑话，我咬咬牙致力于复习，那时的我在学校每周要上二十多节课，便请教务处把我所有的课程集中在上午，把下午和晚上的时间腾出来复习历史、地理。记得那年的夏天，天气特别的热，家里唯一的一台“华生”电扇为我嗡嗡地转着，可我还是全身长满了痱子，其数量远远超过我在这以前和以后所长的痱子总数。

其实我走上高考之路，是要从一位令人起敬的绍兴著名教育家邵鸿书先生说起。邵先生是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侄子，抗战开始了，定居日本的他毅然抛弃了所有家产回到家乡，后一直致力于教育，曾任绍兴嵇山中学校长，晚年还创办了越秀外国语学校（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1977年，邵老通过介绍找到我，说他有一位亲戚打算参加78年的高考，由他来教英语，要我做他亲戚的陪读，没有多想我就一口应允。那一段时间里，邵老风雨无阻每周三次上门授课，学的则是他的自编教材。在邵老的教学下，我的英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兴趣也从语文转移到了英语。



经过四、五个月的突击复习，在赤日炎炎的时候，结束了大学考试。过了一段时间，一直关注着高考的邵老已经获悉了绍兴录取人员的名单老人兴奋地到我家来告知说我被录取了，可是一看名单，我的姓名只有两个字对得上，我说这不是我呀，可邵老坚持说一定是我，是人家书写有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难熬的十多天，直到接到正式通知书，杭大的外语系录取了我，才放下那颗悬着已久的心！遗憾的是邵老的亲戚却名落孙山！！而这时狂喜不已的我想到的却只是：这下子我教了两年语文的学生们不会笑话我了吧！

1982 大学毕业的我，为了报答邵老，我放弃了绍兴公安局外事办的职位，在邵老刚创办的越秀外国语学校当了一名英语教师，直

到84年调至杭州。有幸的是在越秀外国语学校，我遇到了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魏风江，时任首届校长，并和他共事两年。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回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盛祖仁

纪定兄日前专门私信我，邀请以最忆是高考为题写上几笔。如此盛情，必须从命。况且，高考与我，确实意义非常。只不过毕竟过去几十年了，记不清太多细节，只能是零碎片段式回忆，再带些许感想。

参加 78 年高考时，我已经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八年零四个月了（抗战也就八年）！而且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因为按当时规定，过二十五岁就没资格参加高考了。事实上，数年之后我依旧有好几次被落榜的噩梦吓醒。

高考点在县城，离我插队的村庄 36 公里。由于那时还没通车，所以前一天就和我弟弟（他和我一起下乡，当时父母觉得这样兄弟俩可以彼此照顾）两人步行前往。

大约走了有十多公里的样子，居然公社拖拉机去县里拉化肥，赶上来把我们给捎上了。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当时我和弟弟在爬上拖拉机后立刻拍手相庆，打心底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到县城后，找到已经上调在县矿石厂工作的同学，他们安排住宿，陪着去看考场。现在想来，多亏了他们的接待。但当时，不知是因为年轻不懂事还是因为大家很熟悉亦或两者都有，好像根本没有表示过多少谢意。此时此刻，眼前浮现的场景模糊不清，心里感受的滋味也说不清楚。

高考时的种种如今已记不清了。但是有两个细节估计这辈子也不会忘。

一：高考结束，在回矿石厂宿舍的路上，只觉着怎么走得高一脚低一脚的。进了门，突然我弟弟问：你的眼镜呢？这才发觉眼镜

不知什么时候被我装在口袋里一直没戴。而我这位六百度近视眼，居然还毫无感觉！

二：当时正值夏天，为躲酷热，决定当晚走夜路回生产队。36公里，等我们走到，至少快晚上十二点了。宿舍里竟然还亮着灯，同宿舍的另外三位插兄外加几个和我们关系很好的老乡，一直在等，他们认定我们会赶夜路回来的。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老乡家给熬好的绿豆粥！那份感动，让你既不会哭又不会笑！事后他们也都说，看着我们弟兄两就跟傻了一样。

当年敢于去参加高考，底气来自多年坚持的自学英语。72年底开始，先是跟上海广播电台学，不久，搞了套大学英语教材，带到乡下继续。之后，有了本《英语 900 句》。

想想这么副图画：夜深人静，在一间农村小茅屋里，昏暗的煤油灯下，两个知青在跟着时断时续的美国之音读《英语 900 句》。再后来，条件更好了，有了《新概念英语》。当时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里能拿出本“牛康”的，很可以神气一把滴。

最后，说点题外话。高考，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但是，对成千上百万原本同命同运的插队知青来说，高考亦如一把无情的匕首，生生将他们切割成了两个阶层！这些同在一个茅草屋里共处了七、八年的，高考之后，慢慢地渐行渐远，最后几成陌路！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同插，以后也都返城了。刚开始，每年放假，大家总要聚上几次。慢慢的有点不太好张罗了，聚会次数越来越少，主要还是他们不愿来了。他们回城之后，大多进了街道生产组，好些的顶替父母进了工厂。但最终都没有逃脱下岗。人都是有自尊的呀！而本来，如果一切正常，他们中许许多多绝对都会考上大学的。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经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承维琦

我高中毕业后和大家一样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和可能。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我哥哥那时已下乡，我可以留在城里找工作。后来我进了一家化工厂在三聚氰胺车间工作。我当时不知道三聚氰胺为何物，看到生产出来的三聚氰胺产品是白色无味的粉末，感到工作环境还挺干净的。工作虽然是三班倒，由于整个车间是全自动管道化生产，上班时也只是穿着工作服每隔半小时监测和记录反应炉的温度而已。产品生产出来后由男工负责包装，所以工作还算轻松。我当时还暗自庆幸我的运气。后来从工厂技术员口中得知三聚氰胺是有毒产品，尤其是女工，在这个车间呆久了以后会影响生育的。我这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么轻松的工作是没人要做的。看来进这个车间门容易要逃出这个车间是非常困难的。好在参加工作后没不久就到了 1977 年得知所有有志青年都可以参加高考的喜讯。我暗暗告诉自己这是唯一可以逃离这个车间的机会。

为了迎接高考，我经常是白天复习功课晚上上夜班，因此上班时老是无精打采。为此挨了车间主任不少批评。记得有一次我手指受伤（我已忘了是否是故意这样做的）无法扳动阀门，我当时兴高采烈地去找车间主任请假，被他臭骂了一顿。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臭骂我时的情景。他是一个皮肤黝黑，时常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在车间里来回走动，脏活累活总是冲在前面的汉子。从车间主任的角度看他是个好人。他的观点是既然已成为女工，就该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每个车间工人不论男女都应该像他一样为了工作可以迟下班不睡觉蓬头垢面！当他看到我举着受伤的手指要求请假时他自然明白我的真正用意。于是他用带着黑色工作手套

的手指着我的鼻子说当工人哪来的这么娇气，轻伤不下火线！我心里诅咒他但不敢露出来因为我不知我能否有机会逃离这个车间。好在我所在班的班长阿花（我忘了她的真名）知道我的心思，偷偷叫我躲在车间主任看不见的地方看书，我的工作她来做。我至今一直记得她的善良想报答她，可听说她已去世，也不知是否与这个有毒的产品有关。

由于我的车间主任知道了我的小心思，要想得到他的同情上班偷偷看点书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了逃离我不喜欢的工作我利用一切时间拼命复习，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阶段。一天早上下夜班我晕乎乎地骑车回家，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没注意到迎面过来的大货车，和大车相撞，我的自行车被压在轮子底下，我被撞出老远，当场失去知觉。等我醒来时我已被路人送往医院。由于撞车地点离我爸爸的工作单位不远，有人认出躺在地上的是老承的女儿，赶紧通知我爸妈去医院看我。我醒来后我爸妈告诉我当他们赶到浙二医院急诊室把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找了一遍没找到我时，我妈当场就崩溃了以为我此时已被送往太平间。后来发现我坐在急诊室的一个角落里，捧着右手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见到爸妈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我的自行车被压坏了吗？我爸妈又好气又好笑，说好在压在大货车底下的是我的自行车，不然的话，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们带我去拍了片子。医生告诉我是脑震荡加右手腕骨折。上了石膏后医生要求我住院观察。这时离高考还有 5 天！我真不甘心我的高考梦就此戛然而止。我妈妈的一位朋友（浙大的教授）得知这个消息赶来医院看我，当他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建议我妈妈允许我 5 天后悄悄离开病房去考场看一下考卷，以便我准备下一年再考。妈妈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同意了，因为她知道这样做也许我会恢复的快些。

妈妈事先与主管病房的医生说了我的请求，医生也同意了。记得高考那天我天没亮就起床了不敢惊动同病房的病友，在病房门口

我要求妈妈帮我卸下石膏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右手吊在胸前考场的工作人员是肯定不会让我入考场的。当我进入考场看见考卷后，我发现好多问题我还是能够回答的。那时不知哪来的精力完全忘记了我是个右手手腕骨折外加脑震荡的病人。在考场里开始我是用左手写字的，由于从来没有用左手写字的习惯，字写得很慢，且难看。为了抢时间我开始用受伤的右手写字，可是当右手写字一用力就钻心的疼！怎么办？让我此刻离开考场太艰难了！我于是用左手捧着右手继续答题，这种奇怪的写字方法引起监考老师的注意。他几次走到我面前问我能行吗，我告诉他我真的没事。由于用右手写字写多了从开始的钻心痛变成钝痛再到最后变麻木了。神奇的是脑震荡也不来捣乱，我就像是服了兴奋剂奋力疾书，由于答题本上字写得歪歪扭扭，几乎没有赢的可能也就没有了任何负担，我只是将我所知道的都写上，考完试我就让等在考场外的妈妈帮我再绑上石膏陪我回病房休憩。第二天再如法炮制。

又过了一段时间，发榜的时间到了，我没心思去关心发榜的事，因为我知道录取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居然收到了体检通知！难道说我文化考试过关了？我想也许是我的举动感动了上帝！当然我体检是肯定被刷下来的，不过我已很开心了，也对明年再次参加高考信心倍增。我知道我逃离这个车间的时间快到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三聚氰胺！如果没有三聚氰胺我现在就是个下岗女工！是三聚氰胺让我没了退路奋力挤上了高考的独木桥！

对第二次高考我好像印象不是很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书写的也许是有了第一次高考的经验第二次考试比较顺利吧。大学毕业后又经历了几次在我的生命中比较重要的考试比如1990年参加申请 British Council 奖学金的考试，法学博士论文答辩和后来受越南司法部邀请去越南介绍我的博士论文因为我写的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以及帮助越南司法部修改越南国有企业法。我想我能顺利通过后

面的几项重要考试得益于第一次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不放弃不认输的努力和尝试。

[返回目录](#)

忆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刘榕

1976 年，我高中毕业了。作为家中的老大，我没有幸免于上山下乡，被分配到宁德地区寿宁县的一个茶场插队。

茶场的活主要是採茶、兼种、开荒，最艰苦的活当属开荒了。草如人高，土坚如石，锄头落地，东歪西倒地反弹上来。当然，后来的日子里，锄头开始听使唤了。不过，有一天发生的事让我刻骨铭心。那天，天还热，出工时，脚上穿凉鞋，没穿袜子。这天的任务也是开荒。挖着挖着，一个不小心，居然把自己的脚拇指的指甲给掀了起来，血不住地流，吓得我直哆嗦。好在身边的茶场工人懂草药，就近寻来毛毛草似的止血草帮我把伤口糊上，然后用我扎头发的手帕包扎伤口，这才止了血。这样的茶场插队生活，让我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每天晚上我总盼望着第二天下大雨，那样就不要出工了。

1977 年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可以高考了！爸爸出差北京为我买回了几本英语书和参考书，于是我投入复习，参加了 77 年末的高考。发榜消息出来的那天，我满怀希望地来到布告栏前，激动地查看上榜消息。来回看了三遍，我无奈接受榜上无名的事实！就地伤心痛哭了起来。

回家后，爸妈安慰我，勉励我来年再考，妈妈当场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去茶场出工了。就在家温习。”她说话的口吻，仿佛她是领导似的。我惊讶地问：“那领导会同意吗？”妈妈说：“不管他了！”我投向妈妈以无比钦佩的目光，顿时觉得妈妈好伟大！有她这句话，我感到浑身是胆。

在师大附中任教的伯父为我提供了一套福建师大附中的复习资料；爸爸为我准备时事政治；高中的英语老师为我答疑解惑。每天除了帮奶奶做点家务活外，我总是自觉到阁楼上读书。阁楼很小也很安静，除了瓦片砖墙，就是一块复习的小天地了。复习的日子里，我的心很静，很专，很努力。目标是那么明确，信心是那么坚定！没有什么可以扰乱我的心境。真可谓：躲进小楼成一统，一心只读高考书！

1978 年的高考终于又来到了。高考前一天，妈妈给我加营养，结果吃坏了肚子，半夜闹肚子了。次日一早，妈妈就去药店买了药，一边让我服药，一边后悔地自责。

考试开始了。天气很热，考场放了几盆水降温。庆幸中间没闹肚子，但那天居然提前收卷了。具体提前了几分钟，我不清楚。只听到大家纷纷在议论这事。好在我没有因为这几分钟而与大学失之交臂，但不知是否有人因为没做完题而受到影响呢？我至今都不知道。

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全家人欢天喜地，爸爸妈妈扬眉吐气，我呢，内心在谢天谢地，因为再也不用去茶场出工了。

准备面试了，我还是找我的高中英语老师。老师推荐了《英语 900 句》，要我努力背下。可我没书，向他借，他限我一周内要还。我觉得还是抄下来为好。又了这本手抄本《英语 900 句》，我跟着收音机朗读，尽力模仿英语老师的语音语调。英语老师还为我准备了一些 topics（题目），同时为我选了几期有参考价值的英文版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让我回去自己先准备，再去他那里模拟面试。有些 topics 是他直接给范文要我背下的。这就是我的英语老师——李圣鑫，他通晓多国语言，有英、俄、世界语、德语、西班牙语，还有其他几种小语种。我读中学时，李老师除了上课和上街购物，都在看书。他眼睛不好，看书都要借助放大镜。据

说还是学生时，他因为用眼过度，眼睛手术过。可这么一个好老师，在我上高中时，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的头发光秃，学生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他 potato（土豆）。又因为他喜欢吃面，学生叫他 noodle（面条）。在那个“不学 ABC，照样干革命”的年代，班上不少学生都不愿意上英语课。经常恶作剧地在他进教室前，将扫帚横在掩着的门上。老师一推门，扫帚就落在他头上，引来一阵开怀大笑。我虽然没有参与，可我没有站出来阻止、反对、谴责这种行为。现在回想起来，我还很惭愧。我们这些学生如此对他，可是他却从未记恨，在我参加高考需要帮助时，他无私地帮助了我。我能走进大学学习，离不开他的帮助。

四十年过去了，我真的感谢我的父母，也感谢我的高中老师，没有他们的勉励和支持，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

（2018 年 1 月 18 日于福州）

[返回目录](#)

入取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褚少英

习惯了整日无所事事，早上三五成群地结伴横行在本来就不宽的马路上嘻嘻哈哈准备去学校打发日子。然后经过漫长的一天，傍晚还是以同样的阵势几个人一起奔出学校，再次横行于主干道上，回味着一天下来种种无聊或欢乐。经常搞得某些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愤愤吼道：“瞧瞧你们这些疯丫头，整条马路都给你们占了！”“疯丫头”们先是突然集体沉默 2 秒钟，紧接着便爆发出一阵更加疯狂而放浪的笑声，响彻整条大街！没趣的老大爷只能悻悻离去。

这种日子循环往复了十来年。突然有一天，在高中快要毕业的最后一学期得知可以直接报考大学了！我隐约感觉我的人生会有所变化了。但比起我那种稀里糊涂、懵懵懂懂来，爸、妈、哥哥他们三个可是比我激动多了！因为我本来是轮到要下乡的，爸妈不放心哥哥这个“愣头青”去下乡，怕他交友不当会学坏，他们觉得我比较有“有头脑”，脑子也还算“灵光”。如果下乡可以好好争取上工农兵大学，另一方面把老大留在城镇也可以增加家庭收入。

我“幸运”地被作为种子选手分入快班。可悲剧的是，我从小不学无术，文科、理科都很差（那时的考试很简单，我可以勉强应付考个挺不错的分数，但其实一窍不通），单单只是英语在别人眼里“很好”。绝大多数同学是要考理科的，因此每天排满了数理化课，而我的文科已经很差了，理科更是痛苦不堪。一堂课下来，哈欠打得眼泪汪汪（还不能堂而皇之地打，得偷偷捂着嘴巴打）。

我比较认真听的是历史老师的课。不是因为有兴趣（我的历史、地理是空白），而是因为老师讲课特别有激情。他像是在舞台上忘

情而自如地尽兴表演。一会儿慷慨陈词，一会儿愤怒无比，一会儿讽刺辛辣地嬉笑着。冷不防“唰”地迅速摘下眼镜往桌子上洒脱地一扔，炯炯有神的双眼横扫全班，然后抑扬顿挫地做出最后总结。可惜他对着一帮理科生对牛弹琴，下面所有人无动于衷（现在轮到他们打哈欠了）。唯有我睁大两眼傻傻地“听”得出神（用“看”更恰当），但脑子一片空白！他显然注意到我是他唯一的粉丝，终究有了一丝欣慰。可他不知道我压根儿没有听进去丁点内容，而是把他的一举一动仔细地看在眼里，下课后一一学给同学们看，笑得她们直不起腰。到现在很多朋友还在说我选错了职业。但我却很惋惜历史老师被“大材小用”，至今我还常常在想他更适合在大学里教书，可惜他英年早逝。

那年夏天特别热，爸妈和哥凑齐 200 元（几乎是他们两个月的收入，当时爸妈都算是月收入 60 多元的高工资，哥的临时工收入每月才 9 元）专门为我买了电扇，让我从容应对酷热而安心复习。爸爸还从别的学校给我弄来了一叠叠厚厚的历史、地理复习资料以填补我的空白。无奈我从小嗜睡，开不了夜工，每晚 8、9 点钟就困困入梦乡。而且仅仅靠把那些如“Long live our great leader, great teacher, great helmsman Chairman Mao!” 等等背得滚瓜烂熟是考不上英语专业的，我得把爸爸给我弄来的 77 年各省的英语高考卷一一“啃”好，给我英语老师批改。史、地资料就先借给其他同学先看起来。我很诧异她们居然可以熬夜至 12:00 而一点点地把我的资料全看完了！眼看她们一天天瘦下去，而我却一天天胖起来，因为我生活规律（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月月长膘。高考来临，我也没有时间望一眼这些资料。直到考前一个星期，才硬着头皮复习了一下平时的考试卷，跌跌撞撞进入考场的。那套资料在我手上过了过手，没有真正派上过用场！同时由于心理压力，胃口越来越小。令我惊奇的是，平日唠叨不停、埋怨不止的妈妈，那些日子特

别“识相”，默默地收了碗筷让我休息！肯定是爸爸打过强烈的预防针了！

开考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天气超热！每个教室里放了一大块从外面运来的正方体冰块降温。同学们个个正襟危坐，有个别同学还挂着盐水来考试！老师们在外急切地观望着。考试一结束，看着考生们一个个严肃而疲乏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出来，老师也不敢问这问那，只能察言观色，自己猜测每个学生的大致情况。我的英语老师笑咪咪地看着我，我也笑咪咪地回答她各种问题。她似乎对我挺有信心，可我一向是故作镇静的高手，只是不想让她失望而已。这个态度特别温和、远比我母亲慈祥的英语老师，为了我的英语复习倾注了所有心血，我怎能让她早早地失望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煎熬，我和一些上了分数线的同学被通知去体检了！从医院里出来后，体检合格者都兴高采烈地回家等候入学通知。我还得再次接受一个星期的煎熬，等候“二进宫”去口试。不过口试远比笔试容易，所以口试结束后我的胃口恢复如初，狼吞虎咽地又美美吃了一顿从容的晚餐。

当我和卢启平、于智琴、王松华作为嘉兴仅有的 4 个应届生被入取英语专业时，我还在家里沮丧地考虑是下乡还是明年再考。听到邮递员叔叔兴奋地高声呼叫我的名字告知我有入取通知书时，整条路上的邻居们都欢腾了。我立刻按照爸爸的要求，一有消息就电话通知他（他在电话里笑个不停），妈妈特地请了事假立马回家准备好烧一顿美餐。可是炉子灭了！哥哥马上到饭店炒了几个好菜等爸爸回来一起庆贺。

回顾短短一学期的努力奋斗，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小小成功后面，是整整一个团队在努力：爸爸全面负责调节全家事务，妈妈烧饭洗菜“马大嫂”，哥哥努力做好后勤工作。老师们——尤其是我的英语老师，更是默默奉献了他们的辛勤劳动，不计报酬，无怨

无悔。所以如今我一直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满足之心认真过好每一天。

[返回目录](#)

高考：永远青春记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陈瑾

时光悄悄流逝，往事渐渐淡去。惟有高考永远无法忘怀……。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1977 年，我刚高中毕业在家待业，确切地说在等下乡通知，我已做好了插队落户的心理准备。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时让我心泛波澜，改变命运的机会终于来临，但我却在报考大学还是中专之间犹豫。因为面对高考我心里没底，尽管学习成绩还不错。但在学校时学工、学农、学军占去了大部分时间，真正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极其有限。

要是高考落榜，我将面临着下乡。为了求稳，我没有听从家长、老师的建议，而是选择了报考中专。可参加完初试，觉得答题得心应手，初试取得的好成绩极大提升了我的信心，于是，又在一片反对声中，我决定放弃中专复试，最终选择参加 1978 年的高考！

高考复习紧张而又充实。每天有目标，每天有收获！白天自学，晚上参加复习班。由于相当一部分人白天要工作，复习班都安排在晚上。参加复习班的学员年龄参差不齐。清晰记得有位同学多次上课带着孩子来，让孩子在教室外玩耍，孩子大叫大喊时，他就跑出去制止一下，当时不太好理解，现在想来令人感动和敬佩！复习班不收取任何费用，老师充满激情，争分夺秒、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知识与才能；学生如饥似渴，踌躇满志。每次下课从复习班回家，踏着路灯下斑驳的树影，心中充满着希望和梦想。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复习资料十分稀缺。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英语教学节目，但买不到相应的教科书。当得知有同学托人在上海买到了，我匆匆赶到她家，请求她借我一周时间，最终她只同意借我 4 天，以减少对她学习的影响。4 天，我和母亲

一起，与时间赛跑，我们没日没夜地抄，最终将那本书完整地抄了下来！也许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却做到了。或许是因为内心有信念支撑着，远方有梦想召唤着！有了那本“手抄本”，我每天定时跟着电台学习，这对我英语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帮助作用。

1978 的夏天酷暑难当，为了确保我能更好地复习，父母为我买了一台台式电扇，这是我们家的第一台电扇，这台电扇让我凉在身上热在心头！高考前夕，又为我添置了我人生的第一块手表，以便我在考试过程中能把握好时间，这块手表后来陪伴我走过大学四年、伴随我走上工作岗位、为我把握住了人生中无数个时间点。。也许是因为还没有经历人生的甘苦，也许是因为半年的复习给了我足够的自信，走进考场的那一刻，我比较从容、镇定。

考试结束后便是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了成绩公布，据说当年苏州地区英语及格人数只有 66 人，我有幸成为这六十六分之一，顺利进入了志愿填报、体检阶段。我是只要能上大学天南海北都肯去的，可是家人始终认为还是江浙沪一带更合适。于是，反复斟酌后决定第一志愿填报杭州大学。

转眼到了 9 月，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而我迟迟未拿到。急切赶到我父亲单位询问（当年所有要下乡的学生的档案都转到父母单位），结果发现我的录取通知书被遗忘在传达室的抽屉里了！看到盼望已久的录取通知书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传达室工作人员再三为他们的疏忽表示歉意，可我只想和他们分享我的喜悦和快乐！

依稀记得离开苏州那天的情景，因为不想再辛苦父母，我只买了一张船票。随着一声汽笛，轮船渐渐驶离码头。回头竟发现父亲也在船上！原来父亲还是执意要送我，但因为没能补到票，跟船长

商量后，同意他可以待在船头的发动机旁边。这对于已 60 岁的父亲来说是极其辛苦的。我百感交集，内心的感慨与心酸无以言表！

就这样在父亲的陪伴下，我带着憧憬、带着期待走进了杭州大学，开始了我灵魂世界的重新塑造。

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但往事并非如烟。高考之所以难以忘怀，是因为这是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它记录着青春岁月的激情、拼搏与梦想；它浓缩了无数冬雪春花、晨晖夜月的时光；它汇聚着家人齐心协力、亲情厚爱的温馨；它磨练了意志、积淀了知识、丰盈了生命、它开启了真正的人生之路。

高考，我永远的青春记忆！

（写于 2018 年 3 月 9 日）

[返回目录](#)

峥嵘岁月，相逢高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任祝华

人人都有一个难忘的高考故事。四十年过去了，一旦提起，高考故事依然萦绕心头。

1976 年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年。1 月 8 日，人民爱戴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9 月 9 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恰巧就在这个时候高中毕业，16 岁的我成了一个社会人。

上山下乡原本是我的份内事。可是好奇于农村生活，我姐妹俩竟然为上山下乡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只能由父母定夺。妹妹个头大，几乎高我一个头，上山下乡的事她赢了。我受母校聘请，回校当了代课老师，任教高中尖子班的英语课。家父是一位水利工程师，他非常支持我到学校代英语课，专程奔赴上海外文书店买了一本五公分厚的英语词典。我如鱼得水，每天借助着这本词典，干起了“现买现卖”的活儿。

1977 年 7 月，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改变命运的契机啊。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领域进行改革的突破口，它是一次明确的宣示，即在全社会倡导教育优先和公平竞争。从此，读书不再无用，人才不被埋没，青春有了期盼。填志愿时，我举棋不定是去考理科还是报考英语专业。我的理科成绩好，父母都是理科生，父亲建议我以后继承他的专业，搞高分子化学。可是我却对他给我的“英语词典”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最后我还是感情用事了。这个决定为我们有缘相聚埋下了种子，哈哈。我在杭州地区建德县严州中学参加了浙江省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考。似乎意料之中，我旗开得胜，我以理科总分加英语科（笔试）总分第一的

成绩接到了外语面试通知书。建德县只有两位考生接到通知去杭州参加外语口语面试的。那兴奋的劲儿就甭提啦。

坐了接近三个小时的大巴到了杭州外国语学校考场。遗传了母亲晕车的我，坐车已经晕乎乎了，英语口语安排表上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更是晕上加晕。莫非喇叭听错了？莫非搞错地点？莫非口试德语？可是我笔试考的是英语啊，只是填志愿时听了60年代北大毕业的一位老教师的指导，填了德语专业。我一遍又一遍搜索着英语口语考生名单，一次又一次以失败告终。眼看考试即将开始，我抱着侥幸心理问了考官老师，那老师挺好，轻轻地告诉我去德语或日语考生名单查查吧。仿佛晴天霹雳，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在德语考场！我走进了德语口试考场，仿佛走进了“刑场”，呆若木鸡地接受“盘问”，一问三不知。考官很是同情，“明年再来吧”。另一位和我一起参加口语面试的考生，他因为报考志愿填的就是英语，面试顺利通过，大功告成，后来被录取在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回到母校，向老教师汇报了口语考试情况，他大吃一惊，怎么可能是这样？各省自主考试也不应该是这样啊？文革前，不论填报什么专业，口语面试全是考英语的，除非自己申请口试语种。他不明白，也无法明白，我却无故成了牺牲品。1977年的高考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1977年的9月，我回到了严州中学继续代课。我的学生们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老师您是来跟我们告别吗？我说我是来陪大家一起奋战高考了。就这样，我以老师和同学的双重身份和同学们一起日夜奋战。1978年4月高考报名即将开始了，大家又开始忙于选择报考文科还是理科，我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上一年的选择。可是填写高考志愿时，突然发现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与1977年浙江省高考制度不同了，报考英语专业的考生必须是文科考生，不接收理科

考生。这可咋办呢？这又是一记晴天霹雳啊！离高考时间只有不到三个月了，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可是零起点，我的强项数学又不计入总分，这下子可不亏大了吗？我左思右想，还是舍不得那本五公分厚的英语词典，出于无奈，做出了报考文科加试英语的抉择。

从此，我开始干起了“挑灯夜战”和“死记硬背”的绝活。天气却越来越热，“吸血鬼”（蚊子）越来越多，夜晚我在房子后院点着煤油灯学习，为了不被“吸血鬼”侵犯，我用报纸裹着双腿。困了累了，就躺在了露天的床板上，漫天的星斗仿佛成了我的被褥，小虫的鸣叫声唱响了伴我入眠的奏鸣曲，好浪漫的生活啊！有一天，在后院复习中，我居然还看到了天空中一团巨大的火球向我飘来，当我呼唤师友们赶来看时，火球又远去了。这火球后来被同学们称作 UFO。

1978 年高考填报志愿时，除了英语，我再也不敢填报别的语种了，可“考试制度”偏偏跟我唱对台戏，允许用英语参加小语种的口语面试。1978 年 10 月的某一天，母亲正坐在家门口帮我缝棉袄，她心里一定有数我要上大学了。突然，一只鸽子飞到了母亲的手臂上，并停留了片刻，不一会儿，邮递员喊叫着“任祝华录取通知书到了”。母亲喜出望外，果真是我的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直到如今，母亲从来都不吃鸽子，遇人就传颂这信鸽的故事。

百年修得同船渡，五世修得同窗读。茫茫人海中，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我们刚好相遇，是机会更是缘分。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享受，一起承受，风风雨雨一起走过，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情缘，值得终生留念。可想而知，与大家分享我们相遇的前奏曲——我的高考故事，是一种多么快乐而回味无穷的精神食粮啊！

[返回目录](#)

高考回忆两则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1. 公交上的考生

78 年高考临近时，我已从行政部门调到业务部门，从事水产食品检验工作。其中一项工作是去外贸仓库取样。仓库都很远，大多在市郊，坐公交车的话，来回大概要化上两个小时。车不挤，但有空位的时候很少，站在过道上拉着扶手，随着车厢的晃动身子也扭来扭去，觉得很无聊，也觉得这两个小时就这么扭来扭去有点浪费，所以想到了看高考复习的材料。试了两次觉得效果不好，主要是车厢晃来晃去，再加上有时人挤来挤去，一手拉扶手一手看书有点“受折磨”的感觉，眼睛累脑袋晕，有点得不偿失。于是就再动脑筋，总不能在高考迫近的时候就那么把金贵的时间浪费掉。我想到了背，背英语单词，背历史地理知识要点。于是回到家，重新整理复习资料，把要记住背下来的东西用最简练的句子转录在小本子上，随身放在上衣口袋里。跑外勤坐公交时，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眼背一下，背一下看一眼。

就这样等来了改变人生轨迹的关键一考：语文 52 分；数学 15 分；历史地理.....。

2. 一杯牛奶

高考日一天天逼近，逼得我有点透不过气来，虽然气温不高，虽然写字台前的窗户总是微微开着，但我感觉到它逼近的气息！

我白天上班，上班的时候偷偷地看复习材料，虽然我已看过许多遍，虽然许多段落已经很熟悉我了，我依旧不踏实，看了又看，看了心烦，烦了还得翻开再看，看得它也对我索然无味没兴趣了。

下班回到家，继续挑灯夜战，夜战到家里厨房灯客厅灯卧室灯一盏盏熄了，独独留下我写字台上一盏昏暗的台灯！睡意袭来，顽强抵御，但有节节败退的迹象，感觉急需救兵！

这时我隐隐感觉身后有人走近，随后有一只玻璃杯悄然出现在我右侧，然后轻轻落在写字台上。我看见了一只手，一只熟悉的手。顺着握着玻璃杯的熟悉的手，我往玻璃杯里看，我看到了乳白色，白得纯洁，白得温暖。我看到了杯口微微飘起的热气。

是我母亲！她半夜悄悄起身，轻轻披上外套，蹑手蹑脚地、悄然无声地为我热了一杯牛奶，端了过来。这一杯牛奶温暖了我高考的那些日子，温暖了我一辈子！

[返回目录](#)

天道酬勤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日语专业陈云舟

我出生于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 1960 年。1974 年春，受“文革”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初中只读一年半就辍学打工去了。1977 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和中考（当时是指考中专）。那时候，我还根本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但阅历丰富的父母亲反应比较快。1978 年，父母亲开玩笑对我说：“舟儿，你看你能不能也去考一考？”，我说：“考什么？”“考中专！”“考中专？别做梦啦！你儿子没那个水平和实力。”。

父母亲不甘心。1979 年，他们没经过我同意就背着我去替我报了名（那时候，报名没有那么严格）。为此，我很生气，还埋怨父母亲多此一举，并当场撕毁了准考证，闹得不欢而散。但是父母还是没死心，悄悄地捡起了被我撕毁的准考证并且粘贴好，等我自己想通的一天。

终于有一天，不知道是厂里发生什么事刺激了我。我主动去找父母，要去考中专。1979 年 7 月 7 日，人生第一次参加考中专。我原本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初中肄业，考前又没有努力复习，结果自然可以预料。放榜时，才知道自己只考了 150 分，平均每门课程 30 分。我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但是父母亲不但没笑我，还鼓励我，说我考得不错，比他们想象的好。

但是，回到厂里，我的成绩居然成为工友们的笑柄，个别工友甚至公开嘲笑，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风言风语说我考十年也不一定考得上。也是。人家根本没说错什么。当时不管是大专还是中专都是精英，即便高中毕业生，考上大中专也是很低的概率。何况我连初中都没毕业啊！

但我是一个非常具有逆反心理的人。被说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有点不服气。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以最短的时间考上中专甚至是大专。

1980年7月7日，我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高考，虽说成绩有了很大提高，但再次名落孙山。然而，我不仅没有灰心，反而因为成绩的大幅度提高让我信心倍增。于是，我向厂领导请求让我停薪留职半年，全力以赴复习高考，并向厂长保证1981年是最后一次高考，如果再考不上，就安心工作，永远放弃高考。厂领导被我的真诚请求打动，同意我停工复习，迎接1981年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的高考。

背水一战！怎么样让自己的考试成绩能够快速提高？这是当年每个考生绞尽脑汁的问题。总结前两次考试经验：一定要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长处。两年的考试成绩证明了自己对文科比较感兴趣，成绩提高进步也最快。但是潜力已经不是很大。怎么样继续挖出分数潜力？能不能通过学外语试试？那么到底学哪一种外语提高更快，更有竞争力？将来前途更大？

显然，学英语前途更大，更有竞争力。问题是，学得会学不会英语？学英语能不能短时间内超越别人？外语也不是任何人想学就能学得会的呀。

所以，当1980年高考失败后的八月份，在家人的支持下尝试着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同时试学两种外语：白天跟妹妹学英语；晚上跟妈妈学日语。妹妹当时已是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八月份是暑假，她正好有空教我。妈妈在医院当医生，当年为了晋升职称，学过初级日语。

妈妈每天下班回家，一家人吃过晚饭，妈妈开始启蒙我学日语。日语英语齐头并进着学习。虽然妈妈的日语只会那么一点点皮毛，但不知道是妈妈教得好还是怎么回事，我却深深地喜欢上了日语。

九月份，妹妹继续去杭州上大学。我也已经做出最后的决定：放弃英语学习，努力专攻日语，用日语替换前几年总分被严重拉低的那门课程。

妈妈三脚猫的日语知识一下子就被我吸收完了。如饥似渴的我必须继续求学。当时除了每天自学以外，还有听一天三次的日语广播讲座（其中有两次是重播），感觉还是不过瘾。因为一个星期才上一课，速度实在太慢，对于我来说，高考已经在倒计时。

于是，到处寻访会日语的老师。找过温州情报研究所的管老师，也去拜访过当年温州师范专科学校的符老师，他们异口同声说日语不好学，多年来温州去考日语的考生不少，但没一个人能考上日语专业。

他们很热心，说有什么问题，尽管找他们，只是拜师就不必了。

那个时候，信息严重不通畅。创办于 1978 年的勤奋外国语夜校我们家一直不知道。后来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温州市区竟然还有个夜校的时候，全家都高兴极了！

我迫不及待地急忙去报名求学。

当年勤奋外国语夜校设在距离老市区比较远的西门一百里坊小学内。1980 年 10 月，我插补进入日语秋季初级（一）班学习，授课的兼职教员是叶显崇先生，当时在温州国际海员俱乐部当翻译，据说他的日语也是自学成才。

记得当时来勤奋夜校学习各种外语的学生非常之多，每个晚上都有上千人，简直盛况空前。因为那时候，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学日语的学生也非常多，当时好像有好几个日语班，从初级到中级都有，教室里满满当当都是学生，每个班大约五六十人吧，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有四五十人在认真学习。

我家住在中山公园附近的公园路上，距离百里坊的勤奋外国语夜校大约四五公里左右，步行大约 50 分钟。当时既没有公交车，也

没有摩托车，只是因为学习热情高涨，不管刮大风还是下大雨，我往返全是步行，而且从没缺过一次课。

叶显崇老师上课非常敬业，每上完一课，一定会组织测验。其实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搞测验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打印机，测验的试卷，需要刻印、再油印，一切都是叶老师亲力亲为。

我从刚进去的倒数第一名成绩很快赶超到学期末的第三名，仅次于两个学霸级女生陈兆杭、彭巧云同学。在勤奋的这一段学习经历，为我打下了比较坚固扎实的日语基础，对此，我感激终生！

1981年1月，勤奋学校的课程结束了。隔一两个月过了春节后才能开始学习后续内容。但时不我待，我的学习不能停止，因为我要参加当年的高考！家人又带我去遍访名师，春节期间拜在陈惠生老师门下，学习日语五个月。

所谓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7月7日我终于成功考上杭州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非常感谢勤奋学校良好的学习氛围，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心辅导，还有就是自己的勤奋。

（2014年端午节于知新轩）

[返回目录](#)

春风送我上大学

——杭州大学教育系 78 级杨持光

回忆起来，我的高考时间跨度不长，但受一种魔力左右，显得跌宕起伏，犹如坐了过山车。

我于 1976 年 6 月高中毕业。父母说该自食其力了，便拜师学习手艺。其间，曾受邀为母校和某村办高中，各代上一小段时间的政治、数学等课程。“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出，不但“小伙伴”们，还有我的从“老三届”起的多位老师，都被“打了鸡血”，一时洛阳纸贵、备考资料难求。我有家长全力支持、多位老师鼓励辅导，先后积极参加了 77 级高考的初试、复试。印象中，当时不公布考生成绩，只告诉是否“上线”。记得当年县城某处，曾大幅张贴出来 77 级高考复试上线者名单。我听说后，专门骑车往返数十公里去“眼见为实”。看到自己的确名列其中，颇感欣悦。

77 级的高考录取有两次。第一次未被录取，我只怨自己考得不好。想不到没多久，通知“扩大招生”，我等未被录取者可再填志愿，有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分校（现在的杭师大）之类。但我再次名落孙山。

77 级第一批新生入学已在 78 年初春；第二批发榜 3、4 月间，入学报为 5 月初。相隔仅数月，78 级高考报名又至。榜样（如我初中数学老师，高温中一面在寝室里放置大盆井水降温，一面挥汗全力备考研究生）激励，加上有名师指点，我冒着 7 月酷暑，再次走进了考场。

78 年 10 月 1 日，在这个共和国成立 29 周年的特殊日子里，我初中英语老师微笑着将盖有“杭州大学”大红印章的《录取通知书》

交到了我手里。霎时间，我竟像触了电一般：激动得浑身有些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来。

故事后边的故事是：其实，导致我不能成为 77 级学生的，并不是高考得分。若干天后，乡（当时叫“公社”）分管领导告诉父亲：我 77 级高考两次均未被录取的原因只是一个：“政审不合格”。他说：“现在你儿已考上杭大。大家高兴，说说旧事也无妨。”原来，他早知晓这一切，只是善意地隐瞒了真相，为着不要影响年轻人的上进心。

为什么会“政审不合格”？几个月前的“不合格”，几个月后怎么又“合格”了呢？这一切，还要从我母亲政治生命的起起落落说起。

我父母都是“公办教师”。母亲 50 年代后期被定为“右派分子”，属于五类阶级敌人（又称“五类分子”）之一。因为接受教育改造努力有效，一段时间后被“摘除右派分子帽子”，恢复了人民教师公职。但不再是教导主任，又被从中心小学调到村（当时叫“大队”）校工作。还听母亲说过，工资也被降了两级。

“文革”来了。母亲因属“摘帽右派”被再度“打倒”。不知怎么的，还被加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新“帽子”。于是，再度被勒令停职，安排到另一个行政村的某组（当时叫“小队”），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母亲被召回原村校挨斗，以“清算”其“毒害”下一代“罪责”。“批斗会”的场景是：主席台中央，放置着课桌 1 张、方凳 2 条；唯一的“阶级敌人”，被安置于台上前端一角，台下是黑压压的全校“革命师生”；师生代表轮番上台“揭发批判”，期间还会有“坚决打倒某某某！”“彻底砸烂某某某狗头！”等口号声响起。母亲的“标配”有二：“硬件”是，挂在脖子上的木质小黑板，上面糊上了旧报纸，黑墨汁书写着“现行

反革命、右派分子某某某”（“某某某”的第 2 个字呈上下颠倒状），姓名上再覆以一个更大、红色、横行霸道的“×”）；“姿态”是：要在立正姿势基础上，弯腰、低头认罪。当时上小学低年级的我，则被安排站在“革命学生”队伍里，共同批斗“阶级敌人”。当然，少不了也要跟着高呼“革命口号”。

散场后，也许是人性本善，也许是农村人“阶级觉悟”不高，（我更相信是后者）“狭路相逢”的校长和一、两位老师，先后热情地招呼母亲为“某老师”，给了她莫大安慰。进了家门，被要求“划清界限”的我，先帮“阶级敌人”生火做饭，再与“阶级敌人”一起填饱肚子。饭桌上，母亲与作为长子的我说：挨斗时，她很想一头撞墙死了……又想到没有了妈，孩子们会很可怜……母亲说出这番话后，抱着我们孩子几个，痛哭了一场。母亲又说要我们听话，她会养育我们的。今天，读了太多“文革”中被逼自杀、家破人亡的故事，早已“知天命”的我，越来越感同身受到：身为女性，丈夫又不在身边，母亲够坚强、不容易！

“文革”后期，母亲又因“劳动改造表现好”，获得“解放”，再次被恢复教师公职。想不到时至 78 年初，我的 77 级高考只因县教育局某领导一句话：“杨持光是某某某儿子，某某某是摘帽右派”，所以“政审不合格”，无缘大学门！是啊，荒唐年代里，“摘帽右派”何尝不是一顶“帽子”？不，它远不只是“帽子”，它是穹苍：让你无处隐遁，可置你于万劫不复之地！

真心感激粉碎“四人帮”后极速“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真心感激针对 78 级高考生出台的“政审结论要与本人见面”的具体规定。虽然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但早春暖风已经扑面而来，它让万千个有志青年，走进了知识的殿堂；它让一个乡下木工学徒，继承父母职业，站上了高校讲坛。

按《录取通知书》规定，我于当年 11 月初到杭大报到入学。不久后的一天，收到母亲来信。她欣喜地写道：“上面”按照文件，对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所谓的“右派分子”作了“改正”处理。这意味着，她的头上永远没有了荒唐的“摘帽右派”的“帽子”，更意味着，她从来就不应该是“右派分子”。

弹指一挥间，我的高考四十年了。我写下以上文字，是给自己加油，要不忘初心朝前走；是为了怀念父母，愿她们含笑九泉；是想将那个激荡年代的真实故事告诉孩子，要珍惜当下，奋力追寻中国梦。

[返回目录](#)

1977：我的大学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卫军英

那是 1977 年的秋天。国庆前后我从遥远的陕西农村回到杭州，知道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距离考试只有一个来月时间了。因为没有读完高中便去了农村下乡，所以很多课程都没有学过。加上生活在书香气息稀薄的部队大院中，几乎只能靠自学突击备考。好在那时候很喜欢学习，早年的基础还算不错，所以中学的课程也很快就补上了。主要是数学，语文什么的因为有作文垫底，自己胆气颇足，政治历史地理什么的，凭借当年的记忆力也没有怎么当回事。所以一个多月的复习还算顺利。

那年的考试因为积压了 1966 年~1977 年 10 多年之间的考生，所以浙江的考试分为初考和统考 2 次。初考时候我的考点在杭州松木场附近的向阳中学，这个学校以前我从没有听说过，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为了保险起见，考前两天我特意从军营辗转几个小时去看考场。回来路上再三叮咛自己，要记住哪个转角哪个路口，都有些什么标志。也就是在那一天回来的路上，我第一次徒步经过了天目山路的杭州大学正门，当时并没有想到 3 个月后这将成为我的母校。更不会想到，后来自觉人生最美好的 30~40 岁年龄段，就居住在这里松木场附近的杭大新村。而我的儿子小学就在向阳中学隔壁，再后来向阳中学又并入了我儿子就读的保俶塔实验学校。那时候的杭州松木场一带，远不像如今这样是城市文化和行政中心，虽然周边也有省政府和杭州大学，距离西湖不过咫尺之遥。当时出武林门向西似乎都是农田，一个很有说明性的标志就是，从武林门沿天目山路往西到杭州大学，如今高楼鳞次栉比，但那时候 3 站路下来杭

州大学的门牌号码才排到 34 号，也就是说整个马路北边只有 17 个墙门，我的母校 j 便座落在一片葱绿的田野之中。

就这样在 1977 年 11 月的 25 日，我一个人前往位于杭州松木场的向阳中学参加了高考。那天的路线是：早晨 6 点乘坐部队的一辆解放牌班车出发，大约 40 多分钟到一师所在的营门口，再换乘唯一开往武林门的 6 路公交车。好像是怕认错地点，公交车坐到武林门再往回走两站路去了考场。那时候我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还没有手表，估摸着距离 8 点的考试时间还有一会儿。初考只有数学语文两门，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赴考》，于是当然地写了一篇记叙文。写什么忘记了，想来肯定不会少“沐浴着明媚的阳光”之类的幼稚套话。因为这里不是我就读的杭州青年中学（现“杭州市西湖高级中学”），也不是部队营房附近的上泗中学，所以考生中一个认识的也没有。考试结束后我站在旁边，听别的考生扎堆议论。说实话当年的考试是鱼龙混杂，听别的考生议论时，自觉增加了不少信心。回来的路上没有坐公交，而是徒步走了大约 10 站路到留下，然后再从那里乘部队班车回到中村。初考后自我感觉不错，以为必在统考之列。果然初考不久后就有了结果，我原先一起复习的同学所在的那个年级，有参加统考资格的大概不到 10 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于是学校老师开始加大了对我们这几个人的辅导，从知道结果到统考，大概只有半个来月时间吧。那时候我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久，家里有辆今天已经很少见的 28 寸“永久”自行车，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和同学一起骑车去上泗中学复习。上泗中学位于杭州郊区的凌家桥，沿杭富公路距离部队营房所在的中村还有好几里路。这一带如今是充满艺术风范的大学校区和高档楼盘，那时候郊外没有路灯，除了影影绰绰的乡间灯火，全是莽莽然然的郊外农田。破旧的公路崎岖不平，冬日的夜晚萧瑟荒凉，但是年轻时候内心充满热情和向往，所以这些全不在意。

直到 1977 年 12 月 15 日，这天我们参加了中国高校改革招生制度之后的首次高考。考试连续进行了两天，说那是改变命运的两天一点也不夸张。无论对这个文明悠久的国家，还是对岁月蹉跎的一代人，那都是个不平凡的季节。就在这前一年的秋天，中国核心领导层清除了极左的激进主义当权者，几个月后三起三落的历史老人邓小平重返最高权力层。这一年老人已经 73 岁了，他的蹉跎感和使命感比任何人都强烈。年逾古稀的老人主张，通过教育和科学拯救沧桑的中国，于是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定，包括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一切都迅速而坚定不移，陷入红色动荡和灰色贫乏之中的中国，仿佛一下子迎来了一个灿烂辉煌的季节。诗人郭沫若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热情洋溢的讴歌《科学的春天》，作家徐迟一篇《歌德巴赫猜想》激发了中国人无数美丽的幻想……。

参加统考是在我 17 周岁生日的一个多月后，也是我在农村锻炼整整 15 个月之后。15 个月不能算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就在那个短暂岁月，年轻的生命经历了一种真正的灵魂洗礼。从大环境上看中国社会经历了 1976 年的大变动，每个中国人都感同身受；个人则是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锻炼，劈山开渠、穿洞引水，16 岁时我竟然可以左手提着马灯（一种用于室外的煤油灯），右臂下夹着一带标准水泥，从村里走到开凿隧道的沟底。记得 1977 年的夏天我在铁路上做临时养路工，换枕木时候竟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扛起一根枕木……那种艰辛的体力付出此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内心泛起了一句格言式的感悟：“吃苦并不能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那时最向往的是有一天自己可以写小说，就像是当时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那样。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我要回城要离开艰苦的农村，要在另一个环境里实现自己

的人生理想。恰巧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高考的机会。

大约是 1978 年的 1 月底我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我是最早接到录取通知的那批考生，好像当时那个中学一起参加考试接到录取通知的只有我一个，而自己所在的部队子女中，全军至少是全师最初也只有我一个，后来扩大招生又有其他同学录取，这点对我确实有些意外。我被录取在杭州大学中文系，通知书要求入学时间是 1978 年 3 月 6 日~3 月 8 日，接到通知的时候我已经在部队的淀粉厂做工了，所以直到最后一天才去学校报到。那天是部队的一辆 212 北京吉普把我送到现在的天目山路学校的，后来又送到了本部外面靠近上宁桥的中文系。比起同一届参加高考的很多同学来，我算是幸运的。我的同学中最大的是 1966 届高中毕业生，好多同学进校的时候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我们班最大的同学是 1947 年出生的，最小的是 1962 年出生的。我是班上年龄较小的同学之一，那时 17 岁生日过去没有多久。第一次走进大学校门，虽然办公楼的墙壁上文革遗痕清晰可见，“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标语惹人眼目，但是毕竟一股清新的空气给校园带来了勃勃生机。

几乎每个同学都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新生始业教育三天，记得某一天有个朗诵，写诗的是同学中已经在省里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老三届的张德强，朗诵的是女同学潘一禾。将近 30 年前的诗歌，如今还能记得诗的题目是《当我佩上了闪光的太学校徽》，起首几句似乎是：“当我配上了闪光的太学校徽，兜一路十月的金风，我们走进了校门……”。多年后我曾给自己的研究生讲到这几句，弟子们不解“为什么是十月的金风”，解释说：十月是成熟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而中国也是在 1976 年的 10 月清除了激进主义集团，因为有了那个 10 月才会有我们的今天。机会来之不

易，所以大家倍觉珍惜，读书报国成了那个时期大学里普遍认同的主流意识。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理想主义燃烧着整整一代人，也燃烧着那个时代。就在这一年的更晚一些时候，中国的高层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被称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注定成为现代中国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中国的高层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中国又一次为她的崛起真正拉开了大幕。就这样一个民族的命运和一代人的命运，紧紧的交织在一起。

[返回目录](#)

高考回顾点滴：监考老师

——杭州大学化学系 78 级方巍

1978 年 7 月中旬，到宁波一中参加高考。

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这个工人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半年之前，也在这里，参加了 77 级的高考，如今再进考场，少了点神秘感，多了几分现实感。

监考的是一男一女两位中年老师。时值酷暑，天气炎热，进入教室，地上已经放了两个巨大冰块，顿时感觉一阵凉意。两位老师非常仔细认真，每一位同学试卷上填写的姓名、准考证号码反复核对，他们待人和蔼可亲，总是笑咪咪的。

我们考试时精神高度紧张，只顾埋头做题，也没注意他们在做什么。考物理时，男老师打断了一下：“同学们注意，这里的单位是“韦伯”，不是“斯伯”，改过来。”似乎只有这么一次抬起来看了看前面。每次考题中途，都会有一块冷毛巾递到手臂上，传来轻轻的声音：“天气热，擦一下汗。”这才看到自己身上冒汗，心中满是感激，用毛巾擦了擦脸、手，继续做题。6 门课程，最后一门英语，因为不记分，大家就不那么重视了，时间过半，人也走了一半，两位老师还是一如既往地给仍在答题的考生递上凉水洗净的毛巾。

我的英语不行，试题多数不会做，反正考不好了，此时就关注起我教室里面，看到两位老师的衣服已经湿了。是啊，这么热的天，每门考试，都要给每个考生送上凉毛巾好几次，其间外出数次换脸盆水，工作量可不小。怪不得每次考完离开教室，两位老师衣服上都是汗水。这位女老师，就是徐老师，住梅园巷，是我邻居，吴伟国的母亲。

许许多多人为我们 77、78 级的高考付出了辛勤劳动，两位监考老师的形象也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今天要说一声：感谢两位老师，让我从这里走进了杭州大学。

[返回目录](#)

我的高考故事

——杭州大学生物系 77 级鲍奕佳

世事难料。真如电影里常编的，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牵动千家万户的变动来临之前的日子是那么的平常，那么的不经意。一日午后，我去同厂的一青工刘晓铃的宿舍串门。他抬头见我进门，马上慌里慌张收拾摊在桌上的书本。我说你在干嘛，鬼头鬼脑的。他说没啥没啥。我瞟了一眼，是中学数理化课本，心里犯疑：此君喜欢舞文弄墨，要求进步不假，厂里的文宣活动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乱七八糟的都有他的份，但再怎么着也和中学课本不搭界呀。逼迫之下，他坦白了。他在京城的一亲戚透风给他，说是大学招生政策将巨变，要恢复高考，任何人都可参加考试，凭分数，择优录取。

我顿时如春雷炸顶，似有一股暖流直冲脑际，任督二脉瞬间贯通。表面镇定，心里头倒海翻江：苍天有眼！要知道像我这样黑五类子女，哪怕是文革前也不可能上大学的。更何况初中毕业后我和弟弟都被排除在县高中门外，靠的是永康拖拉机厂的领导开恩，把我们这二三十个失学的职工子弟组织起来，办了个半工半读高中班，星期一二三由厂里的技术员给我们上课，星期四五六我们到各车间去劳动。如此混了二年，说是毕业，但教育局不承认，没发文凭。这下可好，说是只要考分高，就能上大学，这是要变天的信号呀！回家我赶紧把中学课本找了出来。

没过多久，恢复高考已是家喻户晓的了。小小的县城沸腾了。在解放街东头的县中学教室入夜后是灯火通明，学校老师开了辅导课，教室里坐满学生。回想起来当年学校是很大方的，校园对外开放，社会青年也可在教室外旁听。于是教室窗里窗外，走廊上下，

人头攒动，里三层外三层，比前一年县委大院给伟人吊孝的场面还要壮观多了，热闹多了。这疯狂劲头与当年的红卫兵满街造反或是在溪滩看枪杀死刑犯的人山人海有得一比。只是这远远的站着，听着老师断断续续的讲解，手头又没有讲义，对复习到底有多少好处，很是值得怀疑。去了两次，我就作罢了。我想复习的主战场还是以自己家中为上。

在家中复习也有问题，料想不到麻烦竟然首先来自母亲大人。当时我们兄弟二人住在我妈单位永康荧石矿的一职工宿舍二楼。我们白天照常去各自厂里上班，晚上回家复习功课。从我妈住的平房可以看见我们的窗户，见我们宿舍灯光还亮着，还不到半夜，老妈就会来敲门催我们睡觉，还说凑什么热闹考大学，当个工人不是也好好的。说起来，老妈自有她的道理，几十年的运动把她整怕了。她说当年我们的老爸就是不听她的话，逞能，积极响应上面号召，说是要帮助党，给党提意见，他不吃不喝，连写三天三夜的大字报，拉也拉不住。人家党大权在手，怎么轮得到你去帮助？有毛病，犯傻呀。可不是，“引蛇出洞”，不久就抓右派，你爸也网进。当时幸亏一姓鲍的老领导是老革命，他念你爸太年青，又是同姓同宗，把你爸从右派的名单剔了出来，才逃过一大劫。现在一窝蜂考大学，不知是什么招数，如果设的是个坑，你们飞蛾扑灯，自投罗网，到时候有你的好果子吃，哭也来不及。我嘴上哦哦地应付着，可是心里说，老妈哎，你的儿子可是下定了决心，开弓没有回头箭，吃了秤砣铁了心。对付老妈，山人自有妙计。我们用报纸把门缝填了，再用棉被把窗子蒙上，密不透光。直到高考完毕，母亲大人还以为我们每天是早早睡了。

七七年高考因报名人数实在太多，各县都举行初考，考语文，数学二门。初考那天厂部派了汽车并由政治处的罗家斌主任带队送我们去考场。考场设在县农中。漫山遍野的考生，人真多。但见个

个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模样，我心里阵阵发慌。迎面碰见我初中的班主任毛晓帆老师，打了招呼。她笑眯眯地说，我晓得，你呀肯定是能考上的哟。虽然在小县城教书多年，出身书香门第的毛老师说起话来还是带着上海女人特有的隐藏着高傲高贵的嗲嗲味道。我嘴上谦虚着，心里听了挺受用。

考完，我闷闷不乐。初考的题目还是有点难的，勉强把题目做完，但有数道题目心里着实无底。考语文时，那破桌面是沟壑纵横，

不时地字写歪，把纸戳破，没有机会展示一下我自认为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也是让人懊恼。放眼望去，考生们似乎个个都是垂头丧气。有同行者问我觉得考得怎样，我摇摇头，叹一口气



说，不好，最多六七十分。周围的人听了，个个张口结舌，一付惊诧不已的模样。我一看这架势，心想糟糕，过高了估计敌人的力量，莫非他们考得更差。我马上改口说没有没有，我估计六十分也不到的。后来厂政治处的罗主任告诉我的成绩是一门 70 分，一门 74 分，据说县工交系统我是唯一的两门成绩都在 60 分以上的。那年初考后的分数线是两门加起来总分 80，此分数线把十之八九的考生卡在复考的门外。

复考是全省统一的正式高考，考五课目，分二天考。其它题目记不清楚了。但语文的作文题“路”我是记忆犹新。记得当时拿到题目，脑子飞转：是叙事还是议论？写实的还是来虚的？如果是叙事写实，要在半小时内编个具体，动人又有立意的故事，实非易事。立马决定来虚的。题材是现成的：由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

披荆斩棘，千辛万苦建立新中国之路，写到粉碎了四人帮的今天，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长征，重新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我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自以为就是一简约版的人民日报社论。是否切题，我还是有点担心。但一转念，改考卷的老师应该都是胆小怕事的臭老九，文革刚过，当惊魂未定，我骂四人帮，当同仇敌忾，给我同情分。另外给他一万个胆怕也不敢打低分给我这高大上的社论文章，因为那就不是文字水平的问题，而是政治立场大是大非的问题。那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由此一想，我顿时豪情万丈，交了考卷，趾高气扬出了考场，想起古时李大诗人的一句诗，怎么说来着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不太理解这蓬蒿人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稻草人吧，我又想。

记得我是到厂政治处二楼罗主任的办公室去填大学志愿的。先前是考理工还是考文科我还是犹豫了一会。因为我实在是有点慌数理化。比方说什么自然对数，凭什么你就是对的数，别人就错了？你是自然的，别人怎么着就不自然了？直到今天也没想明白。但是我跟着混的厂里的大知识分子-技术员们都是浙大的。他们一个个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对文科是不屑一顾的。想象要面对他们藐视的目光，我实在不敢告诉他们我想考文科。报文科，万一我考取了，屁股拍拍，走人了事，倒也无妨。但十有八九考不取，那我跟他们就没得混了。这个面子输不起，咬咬牙，我还是报了理工科。罗主任的办公室摊着一张报纸，密密麻麻列着大学名字。大家趴在桌子上选。我第一志愿是浙大液压传动专业，没接触计算机的时代，觉得液压传动很神奇。第二志愿是农大农机系，我在拖拉机厂工作，学农机顺理成章。第三志愿是丝绸工学院，办公室有人打趣说这专业好，找对象方便，丝绸厂女孩子多。最后的志愿是武汉大学微生物学系。不知道微生物是啥玩意，但听起来很牛，就像现在什么微机，微信也很牛。

复考过后的小县城回归到往日的宁静。考生们的盼望，等待，惶恐，焦虑的心情一般都是深深掩藏着，外人面前不会轻易流露的。我的好消息来得比别人早，来得突然。原在同一公社的知青程德贤已上了大学，是杭州大学生物系七五级的。他托人带话给我，说我被杭州大学生物系录取了，他在总支办公室的新生花名册发现了我的名字。不久，县政府大门边的墙上张贴了大红榜，上登全县高考录取名单。永康有十一条好汉考上杭州大学，全县共有 92 人考上大学，我和弟弟都有幸名列其中。



转眼到了三月，已是柳叶才黄半未匀的早春，严冬无可奈何地被抛弃了。大学报到的日子，我和弟弟搭我妈单位的货车来到了省城。我到杭州大学报到后，我们先是都在生物系住了一夜，次日我去生物系的食堂借了买菜用的三轮车，送我弟弟去浙农大报到。我踩着三轮车，载着弟弟，经文三街，转环城北路，一路向东，朝华家池奔去。中午的太阳暖洋洋的，我飞快骑着车子，行驶在笔直宽

阔大马路上，心里是无比的兴奋，无比的畅意，想不出什么好句子，冷不丁脑子里蹦出一句大跃进的口号诗：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是的，世界哟，小样儿的。我来了。我们七七级一代学子来了。

（原载：海外乡愁故事Ⅱ永康往事之三）

[返回目录](#)

第二章：入校

杭大报到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到杭大报到那天，阳光时隐时现，云团成群结队飘移，像是要去某个既定的地方。

我告别工作单位，告别家人，独自提着行李，登上了绿皮火车。我没让父母送，我觉得自己已到了对自己负责的年龄。就象填写志愿，我没与父母商量。

下了火车，换乘上公交，过了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时间，到了。走进大门的那一刻，内心有点庄重，觉得一个新的起点就要开始。但没有应该有的兴奋。

许多年后想过为何自己没有应该有的兴奋感，答案有点模糊。我试图让它清晰起来。

我想大概我没有要翻身的感觉，我不翻身的日子也很好过，前景也不暗淡；甚至说不上翻身后就一定比不翻身的更有光明。

知道我要离开单位了，领导很纠结，留也不好，放也不好。组织部门试探性地问：不走，你想去哪个部门就去哪个部门，如何？

知道我要离开上海，有些好心人有些不解：上海有那么多所大学，为何要去杭州读书？母亲也有些担心，担心我回不来。

我也闹不清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选择。不过有一点是清晰的，就是我想要读一回大学！读了以后的事我不想考虑。如果读了以后，回不了上海，或者日子反而更不好过了，我也觉得不能怪罪于知识。知识是无辜的，知识是乐于助人的，但能不能助到你，要看天意的。

于是，带着这样的认识，我十分平静地走进了杭州大学，走进了面向操场的寝室楼，在朝北的房间里默默地支起了蚊帐……

[返回目录](#)

杭大报到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周遇春

我报到的那天正好春雨绵绵。新绿的树，湿漉漉的校园内道，安静的环境。一幢幢土黄色的教学楼，以及闪着神秘反光的玻璃窗户，十分符合我对于大学的想象。

从踏进校园大门的那一刻起，我仿佛走入了一个远离人间的地方，恍惚中，有点不敢信以为真。

我是杭大扩招后进入数学系学习的，所以我报到时没有人群熙攘攘的感觉。记得那天早上，我从后市街奶奶家骑车出发，一路沿着解放路，西湖，保俶路，松木场到达杭大。然后进入地理系一楼的校教务处办理了入学手续。手续办完后，又骑车在校园内转了一圈。杭大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安静，深邃！

2009 年秋，我又进入杭大老校园参加浙江大学职内培训学习。这时候的氛围是嘈杂的，拥挤的空间和随处可见的广告，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商业气息。感觉一下子变差了。

[返回目录](#)

大学第一天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记得报到的那天，天气不冷不热。应该还有点春天的味道。有太阳，太阳也很坚挺，没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思；因此，看出去的东西都很清晰。

那天看到的東西应该会很多，但我只记得那辆公交车，那辆送我去学校的车。后来听说是接新生报到的专车。可我没那感觉，觉得和我平时常乘坐的公交车没什么两样，两节车厢的中间有一个会转动的铁质巨型环状接口，上面也设置了几把会随着巨型环转动而转动的单人座椅。

与普通公交车无异的另一个感觉是乘客，不都是清一色的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里面还混杂着不少老气横秋的大人，而且总带着鼓鼓囊囊的东西，放在他们的脚旁。我知道那些东西是他们带上车的，因为我看见他们手提、肩扛、扁担挑的。有点像去赶集。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来赶知识的集的，和他们的子女一起；虽然最后把赶集赶来的知识放进“筐”里扛回家的不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体力已经有点不支了；而是他们的儿子或女儿，但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和子女们一样的兴奋和难抑的喜悦。

我记住了这一幕。不会忘。

又记得，那天公交车比较挤，但还没挤到人背贴人胸。我环视了一下车厢，想估摸一下大约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来开始一段新生活的。估摸的结果有点失望，感觉都不像，除了坐在我不远处的车厢中间座位上的一个小姑娘。她有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白净的脸，圆圆的；记得好像是扎着一双小辫，记得穿一件花格衬衣。我注意到她的身旁站着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男子，不很明亮的光线

下，依稀能从他脸上辨读出只有父亲才会有的慈祥 and 温柔，还有女儿需要的那种安全感。

后来我在学校里见到了那个小姑娘，后来我知道她也是我们外语系的，只是不是一个班。应该说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学。她就是赵光珠，后来杭大旅游系的英语老师。

[返回目录](#)

杭大第一夜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日语专业夏超

1978 年秋，我坐上绿皮火车赶往学校报到。记得那时有杭大的不少大客车和卡车到杭州火车城站接车，然而却是人与行李被分开装运。等我抵达杭大后便找不到我的被子了，却在车里发现另有一被子没人领！那时我还不到十九周岁，第一次离开父母，生活似乎不太能自理，且有不能乱用别人行李的道德约束。几天后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只好求助家里人。那时被子也属“贵重物品”之一吧，也不是能容易买到的。待老妈得知消息后，立马心急火燎地赶来杭州，并耐心地一间一间寝室加以查看，一个多小时后被子终于被她找到。那时各家的被子花色各异，较容易识别。气喘吁吁且生气地问了那同学：你怎么可以乱拿别人的被子？答：我也不知家里人给我准备的被子长啥样，看看有剩下的就拿了呗。嗨！他这一草率却让我三个晚上无法睡觉！

好在有同班陈建平同学危难中慷慨出手相助，硬是热心地让我与他挤睡在本已很狭小的单人木床上。此即为我进入杭大后度过的第一个难忘之夜！后来看看这样不行，便求助于老师。经联系，杭大招待所安排我睡了两晚。当然，对我这个穷学生他们是不收费的。

[返回目录](#)

西溪河畔的迟桂花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陈建新

1978 年的夏天是在紧张、期盼与惊喜中度过的，当大学入学通知书到达我家里时，9 月份的日历已经被撕得没剩下几张了。入学报到的时间定在 10 月 16-18 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恢复高考至今唯一在国庆节后入学的一届大学生。现在我坐在电脑前回忆 20 年前入学时的情景，仿佛又闻到了当年校园里那浓郁得化不开的桂花香。

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与几年前曾有一面之交、这次一起考入杭大中文系的孔君、尤君相约在武林门会合，一起骑车到上宁桥边的杭大中文系报到。进入林木葳蕤的校园，一阵浓郁的桂花香扑鼻而来，时令已过了中秋，想不到这里的“三桂”开得还这么香。正逢学生下课，几位小女生擦肩而过，其中一位女生看了我们一眼，悄悄用杭州话对她的同伴说：“你大阿哥来报到了。”这俏皮话引得其他几个女生吃吃地笑，我们三个身上还沾有机油味的“大阿哥”不由地也相视笑了起来。我们三位同龄人在工厂都当了 5、6 年工人，放在今天，这样的年纪应该研究生毕业了。尤其是尤君，长着一脸络腮胡子，虽然那天刮得脸色铁青，看起来还是比实际年龄大许多，在 77 级的应届生看来，的确是大哥哥了。

不料第二天开年级迎新大会，我们才知道，我们还算不上大哥哥。全年级 118 人，分成三个班，那个 16 人的专科班竟然全都是老三届，其中有几个在 1966 年夏天就已经高中毕业。在我们本科班中，也有两位同学是老高三，比我整整大 7 岁，堪称真正的“大阿哥”。但我也不能算小，因为有几个应届考上来的，比我还小 9 岁。要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及时作出决定，我们这些“超龄新生”这辈子再休

想跨进大学校门！遥想当年，系领导和老师们坐在讲台前，看着我们这些成熟与稚嫩间杂的脸庞，心中一定感慨万分。可我当时除了兴奋，就是陶醉了。陶醉于自己终于如愿进入大学，陶醉于屋外飘来的阵阵浓郁的桂花香。系门口有一块大黑板，77级中文诗人张德强在上面发表了一首迎新诗，第一句就是：“在这丹桂飘香的季节”，这令我想起那句蟾宫折桂的成语。讲台上，风度翩翩的陈坚老师正作着风趣横生的迎新演讲，不时引起同学们的阵阵笑声……刚刚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和中文系的阅览室，看到了那么丰富的藏书，多么盼望着早早进入学习阶段，我一定要利用所有可能的时间，多读一些书。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不知哪位诗人的诗：

在这知识的海洋里，我愿成为一块海绵……。

四年时间是那样地短，一晃五个四年都过去了。再想寻找当年的激情，竟只剩下桂花的香气还在记忆里飘浮。

（写于 1998 年夏天）

[返回目录](#)

求学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俺上大学可比你等学友辛苦百倍，仅举一例为证。当年温州交通落后，只有一条水路通往上海等口岸，一条公路通往金华杭州。故此，俺只能坐汽车去杭州读大学。这条公路是一条典型的沙石路，雨天坑坑洼洼，晴天沙层飞扬，车到金华已是灰头土脸，车到杭州那就整一个“泥塑”了。早上只有 5 点多有几班车，所以要出门出差就要起大早，起来后晕晕乎乎，赶到车站上车，一进车站阵阵汽油味飘来，呕吐感觉即起。也许是那时候的汽车质量极差，油箱密封不佳或者排气管不干净，还没有上车就想大吐一场了。上了车，车窗玻璃都摇不上去，车一开动风沙扑面而来。到金华 400 来公里正常时间至少要花 8 小时，到杭州 600 来公里，起码要 12 小时。因为一路颠簸劳累晕车空腹，抵达终点站时骨头简直都散架了。唉，俺这家乡当年交通落后的真是不堪回首。有两句话为证，一句是描述公路的，叫做“汽车跳温州到”，意谓外地人或者本地人快到温州的时候不用看标志，只要汽车颠簸厉害，那就是快到温州了。另一句是描述水路的，叫做“温州只有‘死’（温州话谐音‘水’）路一条”，所以山高地远，当官的谁也不愿到温州做官。

正当温州山穷水尽疑无路却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改革开放之风夹着走私之风一起吹到了温州，一夜之间温州成了“名城”。几年下来，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为全国全世界所知，艰苦创业带来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仅举人均汽车占有量已为全国前茅全省第一，真有点“中国一小龙”之势头！如今哪个当官的不愿到温州来呀？哪些会议不愿在温州开呀？真是十年东流水十年西流水，今昔不可同日而语也！如今俺温州交通水陆空“三栖”

交错，俺作为温州人也跟着沾光不少，俺再也不用吃那二次苦受那二茬罪也，嘻嘻！

[返回目录](#)

第三章：学习

四年寒窗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杭大的四年，对“寒窗”一词体会颇深。

那时，室内没有暖气。寒冬早春，教室如同冰窟。长时间坐着看书，血脉不活，手脚乃至耳朵，都长满冻疮，晚上在被窝里钻心地痒。

而且一年两次。冬暖初愈，早春又发，苦不堪言。

当年春天亦带着耳朵套，成为校园一景。

杭大忆，
最忆外文楼；
腊月温低如冻窟，
早春阴冷似寒流。
疮冻四年愁。

排球与法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应该是大三或是大四，当时正在学习二外法语。

我们五班的小教室在外语楼一楼，教室后面有块绿草坪。课余时间，五班与六班经常在那里进行排球友谊赛。

六班的张宗义也是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子弟，小时候曾是隔壁邻居，一起玩过排球。多年后又一起考上杭大外语系 77 级。

张宗义每次跃起扣球，都会喊“bon”！既像击球发出的声音，又是法语“好（球）”的意思。学以致用，影响深刻。

[返回目录](#)

英语冠词 “the”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陈雯

不少同学记得，我们进校后有过一次摸底考试，然后根据成绩组成了快班。

我怎么也不记得这个摸底考试。但刚到快班后不久的一次小测验，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是测验英语冠词 “the” 的用法，在某个名词前该用它呢还是不该用它。大约二、三十个句子吧。我凭印象，刷刷刷就填好了。心想这还不简单。抬头看看周围，同学们都还低头在想着写着，我便装模作样检查了一遍。没看出什么错呀，交卷了。出来坐在校园里的阳光下听小鸟叽叽喳喳。一会儿后，没见有别人出来，二会儿后，还是没见有别人出来，不禁心里打起鼓来：不会这么难吧？！班里很厉害的同学怎么还没出来呢？我是不是做错了许多？

后来卷子发下来，果真我错了近百分之二十五。哼！所以这次小测验就在我的记忆里占了一席之地。以后的测验考试，再不敢早早交卷了。

[返回目录](#)

杭大学习几则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1. 啃词典

我从小不喜欢啃食东西，总觉得费那么大劲，再好吃也不值。

东西到了要被啃食的地步，那一定有相当的硬度。要啃食干净不留遗憾，也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愿意接手这样一个繁复的项目，想必被啃食的东西一定很有诱惑力，不然真的犯不着。

但我有过一次啃食的经历，很难忘。这难忘不是因为被啃食的东西有多美味，其实相当无味；却又弃之不舍，这个不舍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有多金贵，实在是很普通，几乎垂手可得；而是因为我感觉自己不得不啃；不啃就无活路可走。还有就是觉得半途而废是一个很没有出息的行为，我不想养成这样一个坏习惯；于是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啃下去。啃得纠结，啃得痛苦。

我啃的是词典，英语词典，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走进教室，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后，环视一圈，恍惚间感觉自己大概走错了门，来错了地方！怎么老老少少，象是居委会召集四邻八舍开街坊会议。坐在一起，有的像父女，有的像母子，怎么看都不像同班同学，但就是同班同学！

很快，这种年龄上的差距在学习上也反映出来了。那些在年龄上占尽优势的未成年少男少女，记性特别好，背英语单词的速度是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望尘莫及的。当然有些叔叔阿姨“先天条件”比较好，有的都是当地的英语“状元”，所以不输给那些未成年多少；但苦了我！我是先天营养不良，加上缺乏语言天分，眼看着被这些小朋友们甩开的距离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填补，我有了很强

的危机感，于是想到了“啃”词典，原以为是捷径，后来被实践证明是“冤枉路”，原以为翻身有望，后来发觉从未翻身过来过！

回想起来，那段啃词典的“岁月”虽然很心酸，但酸中带甜，甜中带着点自豪，这自豪不是成功的自豪，而是虽败犹勇的自豪！它给了我许多难得的人生感悟，无意之中也给了我一次修炼性格的机会。现在想想这才是最金贵的！

2. “手抄本”

我在大学期间做过“手抄本”，而且还不止做了一本。不过我的“手抄本”不是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的特殊年代的那种文学手抄本，而是英语单词用法例句手抄本，而且无意在民间流传，只是自学的一种方式。

这手抄本应该诞生于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萌生编写手抄本的动力是每次英语测试总发觉自己有些英语词的搭配词用错，总会对自己有恨铁不成钢的懊恼。几番挫折下来，决意对自己的软肋下狠手。经过全面反省和反复琢磨，终于想到了自以为会万无一失的对策：先确定课本教学的核心词语，然后据此从各类英语词典里查找有代表性的例句，最后一步就是手抄到自己的本子上。

我记得自己去学校小卖部里买回来很多叠印有“杭州大学”四个红字的信纸，然后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认认真真地把那些重要例句抄写在上面。记不得抄完了多少叠信纸，装订成多少本手抄本，但那抄写的情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但很遗憾的是那些花费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手抄本结果在学习成绩和分数上并没有帮到我什么，每次测试的分数依旧有让我悲痛欲绝的感觉，究其原因是我每一次的努力都是马后炮，因为痛定思痛后手抄的那些词语用法在下一次测试里不会再出现了；出现在

下一次的测试里的永远是布满陷阱的陌生词语用法！等到我恍然大悟的时候已经临近毕业了。

不过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由此我也看懂了自己，看明白了自己一路走过来的轨迹。只是可惜那些珍贵的手抄本再也找不见了！

3. 夜自修

杭大图书馆大概是当年杭大最豪华的建筑了，好像位于教学平房的左后侧。有点气派的。

我原先一直是在梯形大教室夜自修，先是外语系的阶梯教室，后来转移到数学系的大教室。再后来去了图书馆。

去图书馆的原因是发现好像大家都去，自己不去觉得有点象没读过大学的味道了。于是也去。

去了以后发觉图书馆的座位很热门，有点象听热门讲座那样，一座难求的架势！于是我也早去，吃了晚饭就直奔那儿。那时图书馆的门好像还没开，于是就在外面等。有一天等得无聊时忽然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图书馆看自己的书？一时回答不清楚。

门口等的人多了起来。其实也没有多到象现在的打折促销活动日。开门进去后，找位置好像都有点争先恐后的样子，显得迫不及待。

入座后环顾四周，确实有点座无虚席的感觉。但好像也难以入静，因为光线过于明亮，人气过于充足，充足到甚至有一丝赶集的味道。虽没有嘈杂声，但嗡嗡声还时而能感觉到。

我又去了几次，但这感觉一次次被证实。于是我开始认真思考先前问过自己的问题。答案很快就有了……。

几天后我把一张单人课桌一把单人椅搬进寝室，搁在自己的床尾。从哪里搬来的已忘记了。

从此我就在床尾的那张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课桌上重新开始我的夜自修，甚至包括没有课时的日自修。

4. 第一次上大课

第一次上大课上的是哪门课已经忘了。这不很重要。对我有点重要有点意义以致成为记忆的是气氛。

大课不再可能在小教室里上了，黑压压的一大批同级学友要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非得在一个开阔得能让自己的神采飞扬起来的空间里上。

在小教室里也上过一次全年级的大课，没准还是全外语系的超级大课，那是邀请了复旦大学莎士比亚专家来给我们开一堂讲座。那是采用了传统的拉线广播方式。这很让我想起久远的中学时代。

年级大课无疑是在梯形大教室里上的。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大教室的心情，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意思。眼睛有忽然一亮的感觉。见少识寡了。其实准确地说不是我记住了自己第一次走进大教室的心情，而是记住了眼睛一亮看见的画面：

那光线简直可以直抵灵魂，可以照见内心深处最不易见到光亮的地方。那宽阔高远的空间会让你可能已郁结好几天的心情得到一时的释放。一间教室能有这样的功能，真好。

还有那大教室的热闹，尤其是上课前的三五分钟，同学们接踵而至，有时可以用得上“涌入”这个词。那份人气对一个长期孤军奋战在知识沙场上的人来说，有时是很需要被感染一下的。

第一次走进大教室的兴奋可能还缘于能见到许许多多之前只是在教学楼、寝室楼或饭堂里仅仅是擦肩而过、印象十分模糊的同级他班的同学们，其中的一些有可能是自己很想定睛看清楚。大课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于是上大课的一部分时间是化在用眼睛来扫描定格。许多流传于西溪江湖上的八卦也需要好好利用这一段难得

的时间来用自己的“求证”，虽然这一“求证”的方法本身也很八卦。但乐此不疲。也可能紧张的学习生活，也需要以此调节一下。

我怀念大教室，怀念那气氛.....。

5. 第一次英语测试

入学后不久，大概几天、也许几周后，有了第一次英语测试。应该是全年级的，但分班进行。后来有了一个新的说法：摸底考试。

底其实已经摸过一次了：英语高考分数是很有点权威性的。许多同学的霸王地位就是从高考分数上确立起来的。但也有可能有个别临场发挥失常的。这都是揣摩。反正有了开学后的处女考。

我是有点忐忑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英语水平是很有限的，几乎是临时抱佛脚“拔”起来的。于是有了卑谦和小翼翼。

结果这个卑谦、尤其是那个小心翼翼帮我拿到了全班两个并列第一的其中一个。

我记得考分公布后，我心里有了一点没有外露的激动，眼睛一定是放光的，我想。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开始议论起作为学生最为在意的考分话题，我注意到了几位小同学朝我投来的敬佩目光。我很享受，很愉快。

但这样的激动、那样的享受和愉快以后基本与我无缘，因为那拨小同学很快就赶了上来，而且没再给我第二次机会。其实给了也没有，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

后来痛定思痛，认真倒带回忆了仅有的第一次，发现其实根本不值得自己激动、兴奋和享受，其实那是一次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摸底测试，出错的大都是粗心或满不在乎，答对得全仰仗了那份小心翼翼。

我想如果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对待那第一次摸底考，这个并列第一肯定就不存在了，那半个第一也肯定没有我的份了。

清醒得还不算晚，总算没有得意到忘形，到不认识自己。

6. 第一次挂科

我第一次挂科的汉语课，记不得是现代汉语还是古汉语，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名称。反正考卷里面有类似文言文的东西要我们译。反正是我用普通话的理解翻译了。反正是译错了。反正最后是挂了。不过我没惊慌失措，因为它不是主课，因为是期中考，因为还有期末考翻盘的机会。

我记得自己只上了开头的几堂课，就没兴趣没耐心了。不是不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或风格，我还记得自己专门写过小文赞赏过那位汉语课老师。主要是我不喜欢枯燥的内容。我记得我考砸一道题是解释“为”在句子里的意思，我把它当作介词了，其实是动词。这我不知道，以前中学里也没学过，后来也没自学过。本来大学里是有机会补上这一课的，但由于自己的性情，再次错过了。所以在今天初次尝试古诗词写作时，会错误漏洞百出，也就不足为怪了。

可我也奇怪自己既然不喜欢古汉语或文言文，为什么要选修它呢？也许潜意识里是想补上这一课的，只是理性输给了任性。

后来期末考试是通过了，据知道内部消息的同学透露，还考了一个全年级第二。当然我没有骄傲，因为我知道自己完全没有骄傲的资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验证了一个道理：万事没有学不会的，只要肯用点心。

7. 《嘉丽妹妹》

《嘉丽妹妹》是一本英语原版小说（Sister Carrie）的中文译名。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它在我的四年大学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和许多同学和校友相比，我进校时的英语底子，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零基础，没有很厚实的基础，没有看过任何有一定深度的英语读物，都是从教材到教材，从课文到课文。

进了大学后发现许多同学和校友阅读能力都很强，慢慢发现自己这么按部就班地学很快就会掉队。但几次想奋起直追，都因为课文内容来不及消化而迟迟不敢发力，也没时间发力。

终于到了二年级放暑假的时候，终于有了可以大大地喘口气的机会，也终于有了把提高阅读能力这件大事放到头等位置的时机。

于是马上面临选择哪一本原本英语小说作为突破口，既不能太难，不能难得无法继续；也不能太无聊，无聊得没有兴趣读下去。

《嘉丽妹妹》担当起了历史重任。我选择它是参考了老师推荐的书目，也兼顾了自己当时荷尔蒙的分泌程度。虽然时至今日我已全然忘记了嘉丽妹妹是谁，她做了些什么成全了这部小说，但一个“Sister”足以吊足我的好奇心。

我记得那个暑假我刻意走近嘉丽妹妹，千方百计地试图走进嘉丽妹妹的心，了解她的同时，试图解开也令自己困惑不已的青春密码。

最后书是读完了，英语的阅读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但青春密码却始终没有解开。

8. 谢谢莎士比亚专家

某一学期的某一天，系里邀请复旦大学外语系莎士比亚专家前来讲座，专家的姓名没记住，印象中是当时复旦外语系老主任，年龄很大。

原以为是在杭大大礼堂举行，不知何故后改为在教室听拉线广播，从而失去了一睹其风采的机会。

我对他充满憧憬，坐在教室里盯着扩音器，仿佛能从那儿看到他的神采。他的形象在我的幻想中越来越高：莎士比亚专家，复旦外语系主任，教授，老先生.....。

我想象着他一开口就会有石破惊天的漂亮英语，可能是很有磁性的标准英国伦敦音，也有可能是妩媚的美国口音。

然而一开口，从天花板角落老旧的扩音器里，却传出令人失望的英语。

随后的几天，我寝食不安、夜夜失眠，因为我一直思考着有可能影响我未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外国语口音与外国语学问，孰轻孰重？

一星期后，我终于想明白了。睡眠与食欲也随之恢复正常。

几个月后，我欣喜地发现自己的洋泾浜英语有了极大的提高。

谢谢莎士比亚专家！

[返回目录](#)

不可一日无此君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潘大安

离沪来美十几年，居无定所，辗转各州，家居物件弃换无数，但那部“补丁”累累的《新英汉词典》却如同家中一员，始终伴我同行，从青春步入中年。

记得在国内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时代，“新英汉”应运而生，一时洛阳纸贵，我在校园新华书店门口排队苦守一夜，用从助学金中省下的六元钱购得一部，从此读之背之，言必称“新英汉”，废寝忘食，如醉如痴。

当年靠着它考上研究生班，译出英美文学新作，考出“托福”、GRE 高分，申请到留美奖学金，而后又助我攻读博士，走上讲坛，岁岁如一，诲我不倦。

“新英汉”贵在一个“新”字，字里行间搏动着英美社会的时代节奏，开启了西方文化的一扇窗口，搭起沟通中西文明的桥梁，更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先声。

“新英汉”内容博而精，译笔信达雅，惯用词语例句丰富，诠释详尽。文如其人，反映出编委的严谨学风。睹物思人，编委中几位前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李振麟先生主持我的硕士论文答辩铿锵有力，杨岂深先生评阅我的论文一丝不苟，陆谷孙先生介绍“新英汉”谈笑风生。

来美之后，前辈教诲余音在耳，走着一条美国桂冠诗人弗罗斯特称之为“少人问津之路（a road less traveled）”，一介布衣，两袖清风，唯将“新英汉”视为至宝，平时备课之际，茶余饭后，“新英汉”自在必读，既是自修，又是自娱，既能温故，又能知新，每觉开卷有益，日积月累，自己也在词典空白之处添上不少新词，

例句，注释。每天走上讲台，面对着满座土生土长的美国大学生讲授英美文学、英语作文，心中升起一股豪情。

“新英汉”在我心头案首占据着一席特殊地位，其作用价值远远超越一部外语工具书。它如同杜甫诗中神骏，气韵生动，发人振奋。它是榜样的鞭策，足迹的记录，欣慰的回忆，精神的寄托。它是我的挚友知音，催我自强自励。在我那采菊见山的陋室中，它是“镇室之宝”，“见之座右久更新”。在我默默耕耘的生涯里，“不可一日无此君”。

注：本文原发表于曹正文主编的《我与“新英汉”》，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返回目录](#)

教育的力量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周遇春

年轻时，我不抽烟。上大学期间，学校里每月发的烟票，除了少数给郑明，老鞠等几个烟枪外，大部分是和阿亮拿到影院门口换电影票看电影了。发来的烟票可以保证我们一个月能看一二场电影。每周六是我和阿亮开心的日子，就因为可以去看电影。有时候严兄也会参与，不过他比较少。不知道他是如何打发这些烟票的。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我们这些不太关心政治甚至想远离政治的人来说，所谓开放是通过身边小事来慢慢认识的，比如电影。

我记得我们拿烟票换来的电影中，比较印象深的有：叶赛妮亚，基度山伯爵，流浪者，人证，伤痕，庐山恋，沙器等等。回想起来，那些关于人性，善良，正义，勇敢，责任等等概念的形成，还真要感谢当时的文化部。可以说当时电影对我的教育远远超过了学校里索然无味的政治课。我们是处于新旧交替的一代人，在我们的观念中，文革前左的教育自然已经留下了烙印，但是年轻人渴望了解世界，了解人性真实的冲动使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心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我们虽经历了文革，但由于父母的呵护，以及自己的懵懂，很少亲历那些严酷，所以我们没有绝望，很庆幸地保存了内心那份单纯善良和相信。这是我们能够不带偏见地欣赏这些电影，坦然接受外来文化并从中汲取精神营养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些认识是现在思考的结果。在当时因为阅历肤浅，不可能有如此清晰的感受。也没时间细想，因为比这些更让我费神的数学分析在等着我去搞明白。不过细雨润物，滴水穿石，再怎么愚顽，懵懂或当初仅仅只是为了消遣，为了放松一下一周学习的紧张的我

们，也在无意之中受到了真善美的启蒙，并影响了我们今后的生活态度。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返回目录](#)

绝版英语电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廖诺

记得应该是星期五下午。一周紧张的上课、背单词开始舒缓下来。杭州的同学急于回家享受周末。外语系为了照顾我们住校的学生，晚上安排了电影。信息是从外语楼的黑板通知栏目上获得的，红纸黑字：今晚 7 时 212 大教室放映英语电影。嘿！何等好消息，我还从未看过英语电影呢！

晚饭匆忙用过后，我们寝室的几位仁兄——国鸣、向明、周农与我早已约好，提前半小时进入 252 大教室，以便占领有利座位。但，莫道君行早，我等一抵那里即发现，前面几排嘉位早已宾客来临，还有用书包占了几个座位的。能有中排位子，也算不错了，谁要你不再勤奋早到。放映机架坐中堂，放映人是大家熟悉的电教室的老师傅。7 时过后，夜幕已临，大伙久盼、翘首以待的英语电影终于开始，黑板上的银幕徐徐出现一行英语大字：Sparking Red Star（闪闪的红星）。

一个星期后，大概是为了照顾其他失去机会的同学，该片又重新放映了一遍。以后一、两年内，我没有误述，亦没有听说过外语系放映过其它英语电影。我一直猜想，“闪闪的红星”是当时系里仅有的一部英语片。

[返回目录](#)

散文处女作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中学里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文，也写过诗。散文则是在杭大初次涉猎。

当时教中文的陈老师讲解散文要旨，即形散神不散，颇受启发。

主题很快就定了下来，要写“登山”。最初的构思是从一年四季写起。后来觉得还是写成长过程中与登山有关的经历，从小时候爬宝石山开始，一直到当中学老师带学生爬老和山、北高峰、十里琅珩，最后收回到进大学攀登科学高峰的主题。

处女作“登山”获得陈老师青睐，在 252 大教室当作范文讲解，受宠若惊。

记得当作范文的还有潘大安的散文，题目似乎是“钱江潮”，还有另外两篇，好像有叶子南的，但已记不清了。

[返回目录](#)

失败的演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大三的一天，在外语系的公告栏上看到一则消息：某月某日，外语系英语专业 77 级毕业生毕业论文演讲会在外语系阶梯教室举行。有意向参加论文演讲的 78 级学生，欢迎报名。

我的心莫名激动起来，我知道自己要来事了。

早就风闻，78 级因扩招，学生太多，老师已无法像呵护 77 级那样来呵护 78 级了，虽然仍然要求写毕业论文，但不再隆重对待了，交了就完事。我觉得亏了。这个亏不能白吃，得补上。怎么补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好象“补”的机会来了。

我是这样想的：我交了参加毕业论文演讲的稿子，有学问的评审老师总得审看吧，总得“矮”里选“高”吧，无论我写的论文属于“矮”还是属于“高”，总得给书面的理由吧？这不就补上了？我可以通过给的“理由”知道自己“矮在哪里，或“高”在何处，以利以后自己继续长“高”。我对自己的这样的认识很满意。

于是我报名了。报名了，就没有退路了，就只能背水一战了。我乐意不给自己退路，乐意给自己制造这样的“绝境”，因为我知道身处绝境的人会绝地反击的，如果他不想投降的话。如果有了退路，人很容易想到逃跑。我觉得在求知上，选择逃跑是不好的，起码当时我是这样认识的。

于是我开始在给定的时间内积极准备起来。我记得自己选定的题目是：《菊》评。《菊》是一部短篇，作者的名字已叫不全了，好像叫斯丹贝克。我选短篇是因为精读起来费时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分析主题思想上。

终于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了上去。我很满意自己。无论何种结果，都是我要的。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愉快地等待，轻轻松松地等待。

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我的“论文”被通过了。我的名字出现在那天要上台演讲的名单上了。获悉后，我忽然轻松不起来了。我不是怕演讲台，上台发言或讲话，在我进大学之前早已经历过多次，我可以不拿稿子，光列个提纲就可以“滔滔不绝”，但那是用中文用母语讲，现在可是要用外国语用英语讲！

我的英语基础其实是很差的，虽然考分还可以，但我知道英语本质上是一门技术活儿，不是一门学问，不是靠翻开书本学学，心里自己问问就能学好的，得象弹琴一样天天练。技术性的活儿不是我擅长的。

所以就紧张了，就不淡定了，心里起毛了。我知道不上也得，当逃兵绝对是丢脸的，我不想。于是有了赴汤蹈火大义凌然的悲壮感觉。

那一天终于在忐忑中来了，我故作镇静地踏着时钟进阶梯教室。一进门见黑压压地几乎坐满了人，好不容易镇静下来的心又被掀起！大多数的脸是陌生的，但肯定也有熟悉的，我想。此刻，其实陌生的还是熟悉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挺过去。我选择了后排一个空位坐下，然后等待开始，等待轮到我的那要命的一刻。

我记不得是怎么轮到我的，是主持人叫名字，还是事先约定的？但我记得我上台那一刻的画面：我继续故作镇静地从后排大步朝台上走，但已听得到自己的心跳！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坐在第一排，他脸上挂着笑，虽然留给自己胡思乱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我还是在瞬间读出了那笑脸里的善意。这是我需要的，尤其是在那一刻。

我走到了台前，拿起粉笔在高大的黑板上写下了“菊”这个英文词。这个词我至今能脱口而出，但已写不全了，只知道是有许多个字母组成的，就像“人生”这两个字是用自己的一生写就的一样。写完“菊”字，我刚要开口按事先准备的思路说时，突然，脑子“嗡”的一声，停转了，我能看得见下面黑压压的人头，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了。这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片刻”。以前在读小说和其他文章时看到这样的描写，总认为是作者的“自作多情”，用文学语言“杜撰”出来的一个心理现象，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是真实的描写！现在经常坐飞机，对那一刻的生理反应也有了更贴切比喻：就像飞机起飞或降落的某一刻，耳朵突然“堵塞”的那种感觉！

我是怎么结束“演讲”的我已记不得了，我是怎么从台上走下来的也没印象了。我只记得自己没有倒下，没有倒在讲台上，我是自己走下来的。

许多许多年后的一天，一位同班同学在微信上告诉我，那天他在场，还有一些其他班的同学也在场。“你很狼狈！”这是我听到的对我那次演讲的最简洁最有想象空间的评语！

[返回目录](#)

杭大歌声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周晓康

杭大，这个让我一呆就是十年的学术圣殿（从求学到教学），学子乐园（从本科到硕士），珍藏着无数寒窗苦读、埋头笔耕的故事，同时也记载着当年我们在课堂之外的娱乐活动和人生经历，那些欢歌笑语的美好时光。对我来说，最值得怀念的就是每天下午课后在教室或宿舍里学唱外语歌曲的时刻。



那是完全自发的课外活动，没有人特意组织或布置任务，也不是为了参加什么演出之类，而是我们班上有个见多识广、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的北京女生沈迈衡同学（后来才知道她是文学巨匠茅盾的孙女），会唱很多外国歌曲，尤其是英文歌曲。我们同班四年，又住同一个宿舍。每每听她唱起那些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歌曲（《音乐之声》、《魂断蓝桥》），俄罗斯民歌，或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乡村歌曲，又是英语原文的，便让我羡慕不已！毕竟我们这些本地人都是在文革期间听着红歌长大的（“东方红，太阳升”，“大海航行靠舵手”），也从来没有看过什么西方的经典电

影（原文或译文），更不用说那么多原文的英语歌曲了！跟她相比，我们都是地道的“下里巴人”或“刘姥姥进大观园”了。

于是，我就天天“缠着”这位学姐（我心中的西方“女神”）教我唱外国歌（不只是英语歌，还有俄语歌、法语歌，德语歌，有的是原文，有的已经译成中文），如饥似渴。每学完一首，心里就无比自豪，一种无形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因为在苦练英语的“听、说、读、写”这四大技能之外，又多了一个“唱”的技能，尤其是英语原文的歌曲，在美妙动听的旋律中，也学到了更多富于诗意和哲理的歌词（英语单词的读音和词义），词汇和句型随着歌曲日积月累，螺旋式上升！不能不说在当时那个十年动乱之后青黄不接的文化环境中，这些优雅经典的外语歌曲着实给我们的大学生活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情趣，形成了外语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就这样，一开始是每周一歌，后来逐步过渡到几天一首，最后居然能每天一首，既有学过的，也有新学的，有时一首很有名的或耳熟能详的，如《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Last Rose）、《美丽的梦神》（Beautiful Dreamer），《乡村小路》（Country Road），《昨日一再》（Yesterday Once More）、《雪绒花》、《三套车》、《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红梅花儿开》等等，就整个宿舍六个女生一起学，一起唱，歌声绕梁，甜美悦耳，不知情的外来人听到我们这寝室里的女声小合唱，还以为我们是音乐系的了！

更难忘的是，那时还没有歌本，全靠手工抄写。迈衡领唱，我们记歌词，也没有歌谱，全靠模仿，跟着唱，边听边唱，唱过几遍就学会了！几个学期下来，直至四年大学毕业，几十首、几百首都绰绰有余了！若是把一首歌比作一课课文，那也足以可达到本科毕业的教学量了！写得满满的、厚厚的几大本歌本。没想到在外语系还收获了这么一个“副业”，学到了这么多的外语歌曲！而且，这

些抒发情感、表达思想、追求爱情与美好生活的歌词内容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重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观。现在想来，迈衡师姐也堪称是我的声乐老师和人生启蒙老师了！饮水思源，不能不感恩啊！

无独有偶。八六年，我接任杭州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在跟第一批美国留学生的交往中，我把本科时学到的很多英语歌唱给他们听，顿时让他们产生一种共鸣，不由自主地一起唱起来，觉得格外亲切，大有似曾相识、宾至如归之感。而后来跟他们一起外出旅游时，又跟着他们学了不少那时的美国流行歌曲。他们中还有一位正就读汉语及国际政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白桂娴（Kristen Paris）在旅行途中还教了我几乎全部的英语圣诞歌曲（Christmas Carols），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唱歌学英语的突飞猛进！

我学英语的经历居然和唱英语歌曲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后来在我的中文系语言学课堂上，我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把我所学过的英语歌曲都“融入”了进去，一发不可收也！

后来我到了澳洲。在这个英语国家，我都能用我在杭大所学到的那些英语歌曲与本地人交流，无论是在大学校园里的师生群里，还是寄宿家庭的教会群中，总有机会唱几首大家所熟知的英语歌，便犹如旧友重逢，相见如故。而且我还学到了很多澳洲的英语歌曲和儿歌。

如今，在我的海外汉语教学中，我所尝试的歌谣教学法也是得益于我在杭大学到的那些经典英语歌曲。我最早编写的那些歌谣，几乎都是套用学生们所熟悉的英语儿歌曲调，慢慢地改编、创新，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不知不觉中居然已写了三百五十多首教学歌谣，并且还给每一首都谱了曲。我的老澳学生们唱得头头是道，背得滚瓜烂熟！

常常有人问我：你怎么会作曲啊？（亦或：你怎么敢作曲啊？）你是音乐系出身的吗？（你一定是有音乐天赋的！）我只得如实奉

告：我不是音乐系出身的，也没有音乐天赋，不过，我在大学里学了很多外语歌曲，可能就是所谓的“触类旁通”、“熟能生巧”了吧？

追根溯源，我在杭大学的这些外语歌曲，不仅是学了语言，学到了纯真地道、丰富多样的词汇和语言表达，而且更重要的是学了文化，学了歌曲中所蕴含的西方文化元素，每首歌曲背后所体现的西方社会的民俗风情和西方人的人生追求、人生理念和人文价值，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学艺术的欣赏，提升了自身的文学水平，可谓一举多得，不可小觑！

不过，那时又有谁能想到上个世纪的杭大歌声居然也能在不久的未来飘越千山万水在这个南半球的大洋洲响起？

（2018年5月20日于伊丽莎山庄）

[返回目录](#)

拜票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郑良根

拜票现在在民主竞选的时候是常见了。而我四十年前在杭大读书的第一年就已经成功运用过。

那时候，最初的“班干部”是由系里指定的。刚开学宣布班干部的时候，我被委派了班上“劳动委员”的重任。不知道我怎么会得到这份青睐。想想可能是 3 月初报到后不久的一天，我看到盥洗室和厕所相连的水泥地板上布满了带水带泥浆的脚印，密密麻麻一片狼藉的。实在看不过眼，我就在晚上趁人少的时候，用拖把全部抹了一遍。可能是这件“好人好事”被不知名的同学看到报告给系里了。

这个委员的主要事情，是有时候系里有“爱国卫生检查”之类要配合，组织打扫之类。农民出身，我一点也不怕劳动。可是，我觉得还是读书更加重要，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应该用于学习上，心无旁骛。到第二学期后期，那时“民主选举”之风兴起，班干部要选了。我乘机对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学说，对脸熟的脸不熟的同学说，恳请你不要选我；在班上坐到一起投票之前，我又抢着发表“竞选演说”，表明我不是怕劳动，不是要偷懒，只是，我更想专注于学习。请理解，请成全，拜托不要投我的票！谢谢帮忙！

果然奏效！此后，我就不再当劳动委员，更加专注于读书了。

[返回目录](#)

录音机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记得给我们上英语听力课的老师身高，记不得她那张脸了。她很高，感觉比一般的女生或女老师要高，年龄应该不很大，估摸三十岁上下，应该是留松松的长辫，垂在后背。

上听力课关注点在放的录音材料，所以注意力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落在讲台上的那台录音机上的，所以老师的形象就记得有点模糊了。

不过那台录音机在我的记忆里是十分清晰的，因为很特别，尤其与今天的各款录音设备比起来。

我记得那台录音机很大，几乎把整个讲台的台面都占了，感觉就像并排放着的两台电饭锅。这次回瑞典，在上北欧航空班机时，就看见一位中国爷爷或外公一手拉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一手提着装有一台电饭锅的网兜，于是想到了那个时候上课用的录音机。

之所以是两台“电饭锅”并排放，那是因为一台上的满盘磁带要转到另一台上的空盘里，一个送一个接，过程中就出声音了。

这两台“电饭锅”上的大磁盘，总让我想起美国老间谍片里经常会出现的监听设备。想想当年上听力课的老师也不容易，每天要提着两台沉重的“电饭锅”从这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我想听力课的老师这么“年轻力壮”是不是也出于这一层的考虑？

现在这样的录音机已一去不复返了，要返也要返到教育博物馆了，我想。

那样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要返也只能返在回忆里和文字里了。

[返回目录](#)

录音机的回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廖诺

为了帮助提高学生的听力，系里派给每个班一台录音机。该机体性庞大，约 1.5 尺长和宽，重约二、三十斤。按规定，此机只能在教室里用，但不能放在教室里过夜，当晚须专人负责搬回寝室保管，以防出现失窃的事情。这种搬上搬下的差事，谁来负责？一般说来，若无人自告奋勇，班长则按照谁多用谁负责搬的原则来定人负责。实不相瞒，女生中没有一位能搬得动的。我记得有两女生抬一机的情况。而大城市来的弟子，似乎也不太屑顾此等累力的事儿，一则是他们的英语听力要好一些，不太求助此机。二则我猜测他们家里已经拥有了更先进、体积更小的录音机。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某位仁兄、仁姐不时不知从何处弄来一盒新款录音带，在教室里上课前弄一番、溜一溜？如此说来，搬运录音机的重担，基本上落在我们身上。这活儿我先后干过一年多。外语系教室到男生宿舍远隔两、三条街，恰遇又下雨又刮风，要长年累月坚持，决非易事。

此事有无收益？我认为有。我们小地方来的学生，先天不足，听力一般较差，是不能与姚继荣、温时幸这些十几岁就入读外校的学生相比。他们口齿如此清晰，耳力如此敏锐。如今有着录音机利器般地相助，久而久之，听力果然有长进。开始我们听灵格风、祖康英语一类，慢慢就更复杂起来，二年级后也就少有劳驾此公了。当然，学海无涯，经年出国后，又发现英国人讲英语，美国人讲美语的事情，那是后事，不提。

[返回目录](#)

体育课代表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陈雯

我小时候喜欢跳绳跳牛皮筋，小学里班级间比赛跳绳我是我们班带头的那个人；跳牛皮筋很少输给别人的。可是我又体质很弱，妈妈常常不许我跳过份。慢慢的我就认定自己体育不行。

杭大给我们上体育课的是林燕平老师。几次体育课下来后她对我说：“陈雯，你来参加校体操队。”我吓了一跳！我可不会体操呀！再说我对体操也不感兴趣。林老师怎地就找到我呢？百般推脱，说自己真没有基础不能给校体操队出丑。林老师放过了我，不逼我去体操队了。可是每次上体育课我成了站在队前喊口令叫同学们报数的那个人，林老师还常常让我在双杠，垫上做示范动作……。这不是成了体育课代表？！

后来在美国一个医生给我检查身体时说：“You’re double-jointed.”原来如此！我是天生的软！再后来我为锻炼身体参加了舞蹈班，班里同学说我一定小时候学过舞蹈：腰弯得这么下，腿踢得这么高，还能劈叉。我说没有啊，我年青时只会拉琴不会跳舞，她们有点不相信。

现在回想起来，林燕平老师当时一定是一眼就看出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质，邀我参加体操队。我的无知让我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不然我现在舞会跳得更好！

[返回目录](#)

英文老师替我收藏了一首打油诗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郑良根

在大学里我埋头苦读是出了名的。不知不觉地已经过了数年。那时英语三年结束。到了大四，英语有个“提高班”。全系只有 3 人选入“英语提高班”的还在学英语，几个系的学生合到一起上课。

一天下课，刚走出教室，一位一年级的学生，似认识不认识的，上来跟我打招呼：“您是郑良根吧？”

我说：“是的。您是……？”

“我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认识您一下。今天我们英语老师讲了一个您的故事，果然是三年啊。”

我有点不知所以。他拿出一张小纸条，“我记下来了，您看。”

自幼未曾学外文，林彪四害误青春。

如今我来上大学，三年以后再评分。

想起来了。那是 1978 年 3 月 8 日晚上。新生报到结束了。明天上课以前，教师们知道这批学生不但年龄差别大（我们班 17-36 岁），资历和水平也相差很大。专业课还凑和，英语课是没法上。因此要来个“摸底”分班考试。我拿到考卷，完全不知所云，因为从来没有学过英语。数页考卷，翻来翻去，没有一个认识的“单词”，甚至都不知道“词”要叫“单词”。就花拉拉的看到一些数学课里见过的字母，A，B（两点成直线），H（高），L（长），O（圆心），R（半径），S（面积），XY（解方程用）等，似曾相识的，总共也就 10 来个字母。还有从位置和顺序猜出来的“I，II，III，IV”等。

老师一再说明，分数高低不重要，只为教学方便。我也知道跟升学无关。但是，作为上大学的第一次考试，对于刚刚跨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刚刚踌躇满志地想着“跟人比成绩”的我来说，完全不知所措，浑身冒汗，倍感沮丧。既觉得羞辱，又觉得愤愤不平。没学过嘛，考了不算！于是，虚汗一阵以后，就在考卷上写了上面那几句话，早早交卷走了。

此后，当然是进了最低的班，好听点，“基础班”。中文专业课都是 141 人合在一起在一个废旧的礼堂里上大课，一到英语课，就要和“中班”“高班”的人分开，找属于自己的“基础班”教室。

此后，也就进入了苦读的时期。不再是认字母了，而是要记单词。单词，单词！那时用一个小本子，大概是 2~3 寸宽，不到一寸高，正面写英文单词，背面写中文词意，随声带，随时读。上课是单词，下课也是单词，吃饭是单词，饭后散步是单词，尤其排队的时候更是单词，连睡觉前洗脚的时候也是单词！

三年以后，早把那次摸底分班的考试忘了。是学弟，是英语老师勾起这段往事。这位英语老师姓何，英语水平并不高。人很和善。听说他原来是学俄语的。60 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没有“饭碗”了，改行学英语。刚学了点名目，文化大革命，大学停了，后来有“工农兵大学生”时代，外语老师一直处于“半失业”状态。77 级开始，他才有了教学机会，因此很卖力，很敬业。他好像一直在教这个基础班，教了我一年多。后来我“跳级”插入较高的班级，离开他了。他显然是个有心人，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却把我的随手涂鸦收藏起来，暗暗“跟踪”了我三年多，直到这一天才拿出来在低年级用作他的“教具”。

想起来，有一次家嫂路过杭州来找我，只知道我是“杭州大学”，却不知道大学是分“系”的，更不道我在哪个“系”。下了车，在校园门口转了老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找我，连校门都进不去。

后来，碰到老师模样的人就问，“知道郑良根在哪里吗”。恰巧碰到一位知道我的老师，用自行车把她带到远离主校园的中文系宿舍楼下。嫂嫂见到我以后说，是教过你英语的老师，姓何。就是他，何瑞华。我相信没有记错。只是，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如果碰巧何老师能读到这里，请接受学生迟到的一声：衷心感谢您！

[返回目录](#)

本末倒置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周晓康

八五至八七年，我在当时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教“语言学概论”这门课。这是给全系两百多名本科生开的一门讲座，大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课间休息时，很多人懒得走动，就坐在原座上聊天。我那时是从英语系硕士毕业的年轻讲师，虽无“满腹经纶”，却满脑子的英文歌曲。因此，我就跟学生们建议，课间休息时学几首英文歌曲，大家热烈响应。于是，每当课间休息时，我就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曲，大家学得真起劲，日积月累，一个学期下来，竟然也学会了二三十首英文歌！那时大家的积极性之高，每当课间休息时，谁都不出去了！愣是把这门枯燥无味的语言学课上得“热火朝天”，“门庭兴旺”！在中文系的楼里到处都能听到学生们的英文歌声。

记得在学期结束时，我自己设计了一张教学反馈问卷，征求大家对语言学这门课和我的教学方法的意见和看法。几乎每个学生都毫不隐讳地答道：语言学太枯燥，但英文歌真棒，这也叫作“互补”（语言学里的一个概念）！有的学生说，我最喜欢这门课，因为可以跟你学唱英文歌！有的学生更直言不讳：我不喜欢这门课，但我喜欢来上你的课，因为我想跟你唱英文歌！还有的学生干脆就说：我来上这门课，就是想跟你学英文歌！你一定会说：这不是“本末倒置”了么！呵呵！事实就是这样，有的学生说，语言学的概念，考完试，我全抛在了脑后，但那些英文歌我都记住了！甚至还有更搞笑的，有几个学生（那一定是男生），在答卷上不约而同地写道：“若不是年龄上的差距，早就爱上你了！”哈哈！一定是我的歌声征服了他们！

现在想想，当年我在杭大中文系教语言学的这段奇闻，一定是“空前绝后”。那时候我们多么可爱，多么烂漫！多么富于创新！

[返回目录](#)

长跑达标与过目不忘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1. 长跑达标

已经记不起当年为何体育课要长跑，达什么标。调皮捣蛋之事倒还记得。

有一回，在我的鼓动下，快班的男生不遵守体育老师的指令努力达标，却沿着运动场跑道集体慢跑，看得郑老师直摇头。

2. 过目不忘

刚进杭大，对自己的记忆力颇具信心，夸口过目不忘。

一天，魏向明在寝室里问我认不认识 Buttocks 一字？当时不知道，然而信心满满，说看过就知道了，明天你再考我。第二天，魏向明再度考核，却想不起词意。牛皮不戳自破。自此，再不敢如此自负。

三个暑假在杭大

——杭州大学经济学系 77 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殷国伟

杭州的夏天就是火炉。但在杭大读书时，我三个暑假没有回家，在学校礼堂边的小房间和郭惕平，史晋川等同学一起看书，同时帮杭大图书馆整理图书，还可以看到很多借不到的书。

那时候的学习劲头不用说了，大家都是钻进书里，有时为了一本书几个同学轮过来一个晚上看一本书。

[返回目录](#)

杭大记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84 级英语专业江燕

(一)

四校合并是杭大人心中永远的痛，从此杭大人失去了永远的心灵家园。这场浙江省最好的四所大学的强强联手，使浙江省丢失文科第一块金字招牌，浙江省最后只剩下一所 211 为终结。

1984-1988 年，我在杭大外语系英语专业读本科。记忆中的女生宿舍非常拥挤，七人一间上下铺，只剩下一个铺位放行李，夏天很热，也没有电风扇，记得一到夏天学校经常停电。然后整个校园就是黑漆漆的，不过停电也有停电的乐趣。一停电大家就去黄龙洞爬山，黑压压的都往校门口走，等爬到山上一看，全是杭大的人，敢情晚上爬山也是杭大人的一种文化？第一次晚上爬山，第一次站在初阳台上俯瞰西湖群山，第一眼就被震撼到了，白堤如一串珍珠项链一样从此在记忆中不曾抹去。

除了爬山，杭大人最喜欢的运动似乎就是跑步。记得下午下课后，几个同学就相约去环湖跑。当时可能汽车也不如现在这么多。有时候学校上体育课也是跑步，一般的线路就是跑到黄龙洞山上然后再跑回来；有时也会绕着校园外围墙绕一大圈，从西湖电视厂跑回来。难怪多少年后杭大人开续友会敢情都是来比体育的。如果说比体育，浙大乃至全省的其它高校肯定是比不过杭大的，因为杭大有体育系啊。而且杭大当年还有许多特招的大学生，好多都得过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的冠亚军。有体育系真的挺好的，我们下课没事经常看体育系的同学练体操，有时也看他们上武术课，站在那一看就看半天。而且有时体育系的同学也会来我们外语系来现场指导下，免费兼个排球篮球教练什么的。有时也会教我们几招健美操。

外语角是大一时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地点就是学校的中心花园，就是现在喷泉这个位置。大概是每周一三五之类晚上八点半，几个同学就一起站在外语角聊天。当然是外语系的主场，不过也不仅限于外语系，能吸引很多其它系的英语爱好者。杭州六公园那也有一个外语角，刚开始大一的时候图新鲜我们同学几个也一起去过几次，后来大概也累了，渐渐地不去了。平时练口语练听力主要就是听黑胶唱片机，每个外语系教室有一台，不知道这种很古老的老古董现在杭大是否还保留着？如果条件好一点的同学就拿一个可以收短波的收音机晚上 8 点钟跑到操场听 BBC 或美国之音。1984 年的中国已经比较开放了，大家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听邓丽君的歌，也不用怕听美国之音了。就是这样，我们的翻译老师非常羡慕我们，因为当年他读杭大时，据说必须全班同学一起才可以听美国之音这种敌台，如果一个人听的话马上就会会举报。

除了外语角，那时还有一项更风靡的社交活动就是跳舞。当年杭大的舞会是非常有名的，有时在体育馆，有时要票有时不要票，如果不认识还不让进。所谓舞会就是在学生食堂或者大教室之类的地方借个录音机放音乐就可以开始跳了。而且好多兄弟学校的同学也会互相串门来跳舞，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杭大女生的颜值比较高，当然杭大外语系当年也是美女如云。

忘了提了，1984 年还有一件中国最大的事件，那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由于留下兵营的部队要穿越整个天目山路从老山前线归来，而且还要经过杭大大门口，我们这些大一女生无比激动。大家晚上睡觉就在讨论怎么给部队写信。于是，每个人都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开始行动起来，自制小红旗，当然我也亲手做了很多贺卡，等部队往我们学校大门口经过时，我们就跟上去跟战士们握手，给他们送贺卡写信，让他们给我们签名。当年场面之热烈程度，绝不亚于现在追星族，当年的战士在我们心目中就是最可爱的人。结果，没

想到第二周，我们就收到部队战士的回信。然后周末，记得宿舍几个女大学生又一起去了留下军营参观，那次我不知为何没去？后来到了周末，战士们就到我们宿舍来回访了，还给我们带来了压缩饼干和泡菜罐头。第一次吃压缩饼，又甜又咸的，我们几个傻妞居然还觉得很美味。

大一的迎新晚会感觉就是击鼓传花。这一般就是从小学一直玩到大学开班会的形式了，然后是大三或大四的师兄师姐介绍学习经验。其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欢迎日本青年代表团，晚上在年级辅导员朱毅老师的带领下写标语，用日语写“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1984年是胡耀邦时代，正是中日有史以来的蜜月，邀请日本青年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到处都跟日本缔结友好城市，杭州自然也是一样。

31年过去了，杭大物是人非，一半校园已被拆除变为格子笼似的教工宿舍，包括中文系的东临教室、六幢女生宿舍、当年的体育馆和两个学生食堂都不复存在。

（二）

80年代的杭大校园很流行办诗社办杂志，涌现出了很多新新派诗人。写诗办诗社办杂志，这种凑热闹的事我们外语系绝对不会拉的。记得83级的师兄师姐率先办了一个《晨钟》诗社，然后又办了一本杂志叫《湖畔居》。我们84级也紧接着办了一本杂志《他山石》，内容全是手工刻苦蜡纸，手工油印的，真正的散发着油墨香。当然印刷刻蜡纸这种活也是学生自己兼任。封面设计无比简陋，就是画几片柳叶，印几块大石头。但就是这样一本很粗糙的、没有美编设计的杂志却很受同学们欢迎，大家纷纷投稿，当然我也投了。我用英语写了一篇散文“西湖四季”发在《他山石》上，这可以算作我的处女作吧。多年以后，跟83级的何师兄聊起来，他说他也有

一篇诗作当年被《杭州日报》转载，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笔稿费。当然，我们年级也出了一位美女诗人，现已移民新加坡。我还记得她写的开头的两句：“我坐在黑暗中，抱着一团火”，好像是写纪念她父亲的。多年后我们相聚时聊起来，她很惊讶我还记得，问她，你是否还写诗呢？答：早就不写了。

除了流行写诗办刊，当年杭大还流行织毛衣，当然这是我的拿手好戏。记忆中每个杭大女生到杭大来都要经过手工扫盲，而且这是一种习得，是一种手把手的传帮教。很多宿舍的女生课余时间都会织毛衣钩手工，基本到杭大毕业哪怕啥也不会的女生也会织毛衣了。我最多一学期织过 7 件，花样都是从毛衣书上学来的，绝对新款。后来我们外语系还组织过一次手工编织大赛，我居然还得了第一名。

那时还流行听讲座，基本上国内省内的许多名人都来杭大给我们办过讲座。讲座也是五花八门，譬如《许国璋英语》的作者许国璋先生也过来讲过。我们一直在探讨为啥《许国璋英语》（第一册）这么火？80 年代直止 2000 年前，《许国璋英语》第一册可以说是中国最火的一本书，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探究原因，因为国人们大多只学了一个入门，基本上《许国璋英语》第一册学完了，第二册也就学不下去了。而且很多年以后，中国英语教学法一直是填鸭式的教学法，学的都是哑巴英语，很多人学了十年英语还不会说。用我们外语专业毕业的经验来说，就是没有经过强化训练的。除了《许国璋英语》，当年中央电视台有一台节目叫《陈琳英语》也很风靡，我们都很走火入魔地学过。国人学英语的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 2015，然后教育部说英语高考的分数比例要降下来的。

提起选修课，感觉那时的我好用功了，一天到晚忙着到处蹭课，还要参加各种选修课和讲座。上午一般在自己系上课，下午就跑到别的系去蹭课。杭大就是这样好，每个系每个教室的课你都可以随

便去听，记忆中我蹭过中文系、心理系和法律系的很多选修课，古代文学课，西湖诗词课，很多同学一不小心就蹭成一个变副业为主业。譬如说，我们年级的 Martine 同学，他经常自己系的课翘课，天天跑到法律系去上课，结果居然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还有一个温州同学，考杭大心理系研究生居然考了第一名，高等数学也是第一，全是翘课翘出来。总之，在杭大，你不必在意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只要你有兴趣，你都可以考别的系的研究生。

除了学术讲座，杭大那时确实很多各类名人开选修课，一般这种选修课都是场场爆满，需要提前占位置。譬如周大风老师的“民族音乐欣赏课”，毛韶晰教授的“音乐欣赏课”，浙江广播电台晓孟老师的“戏剧欣赏课”，还有中国美院的老师那时还叫浙江美院来开设“服装设计课”，杭州师范大学那时还叫杭州师范学院的老师来开设的“美声唱法”选拔出了一批金嗓子。还有，中文系的汪飞白教授也到外语系来开设“外国诗”非常受欢迎。这些名人名师的言传身教、高人指点真的让我们受益非浅。

想起考研，1988 年那会儿所有的考研培训班都是免费，许多老师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来讲课。记得政治系的老师给全校考研培训，好几个老师讲的真好，让我们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一直后悔我怎么不报杭大政治系的？原来杭大政治系才是水平最高的！专业的就是不一样！都是周末开讲，杭大要考研的同学都可以去听。1988 年的政治考研据说是有史以来最难的，不过记得我那年还考得不错！

说起谈恋爱，大学里其实也很正常。不过当年杭州的毕业分配政策好像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多少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了当年毕业分配的很多故事。通常杭大外语系学生谈恋爱的套路是这样，第一种就是接新生，每年的接新生历来是男生们最积极的事，很多漂亮美眉从火车站就直接被上一届男生给盯上了。第二种就是自产自销，一般高年级学长找低年级师妹，不过也有低年级小师弟和高年

级学姐姐弟恋的。在男女生比例达 1:7 的外语系 84 级，我们年级恁是没成一对！不过即便有一对有可能成了，最后也会由于管分配的王母娘娘大笔一挥，从此天各一方。第三种就是建友好寝室跨系，一般都是男生多的系与外语系搞友好寝室，这种成功率最高。外语系女生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办法嫁出去的。

抹不去的青春岁月，每当杭大人路过杭大路上老校区，一阵悲痛之情就涌上心头。永远的杭大，看来此生只能停留在杭州人记忆里。

（三）

杭大名人多，各个系都有，至今我还如数家珍。譬如心理系有老校长陈立（1902-2004），中国现代心理学家，我国工业心理学的创始人，智力理论和心理测验研究的先驱。当年师兄师姐每次都在我们面前夸耀，我们的毕业证书上是陈立校长的签名，你们的不一样了吧？每次都害我恨不得自己能早投生几年！陈立老校长我其实是见过的，虽然没教过我们，但那时候学校有一些重要的大会场合，陈立会被请来，老先生居然活到 104 岁！

譬如中文系有国学大师姜亮夫、一代词宗夏承焘，属于词学泰斗级别的，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夏先生在词学界地位这么高。1984 年-1988 年要么比较信息闭塞，也可能我还比较孤陋寡闻，晓得应该跑到中文系去蹭一下两位泰斗的课。然后还有杭大中文系的作家班出了好多名人，记忆中写《红日》黄亚洲也是，中文系的杂志我最爱看，一般都贴在食堂前面的橱窗里，我每次吃完饭都要跑到那边看半天，佩服得五体投地。杭大中文系绝对是有文化的！为此，我也一直后悔自己当年为啥不报考中文系？还有写《最后一个渔佬儿》的作者李杭育，写了葛川江系列，也回母校给我们作讲座，我也跑去听了。中文系老师汪飞白教授也跨系教过我们一年外国诗，号称精通十国外语，汪飞白笔名飞白。祖籍安徽绩溪。1929 年 12

月 21 日出生于浙江杭州，民国时候湖畔派诗人汪静之之子。非常有学问，课也讲得好。

譬如历史系有毛韶晰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考古专家，后任浙江省文化厅厅长，精通音乐，非常儒雅有学问，样样精通。百忙之中还开设一门音乐欣赏课，结果有一次他上课迟到了，抱歉说去救火了，因为灵隐寺的树皮听说要被香客剥光了。传说中听了灵隐寺的树皮就会生儿子这样的。

我们系也有一个名人，就是翻译《天使的愤怒》的林珍珍老师，后来教我们翻译。

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说杭大有 28 个系，印象中 80 年代的杭大没有这么多。总体印象，中文系、经济系是大系，每次学校运动会夺冠的热门。外语系女生项目基本能进入前三，男生几乎剃光头。其它小系也有强项，譬如图书馆系的龙游同学非常厉害，每年学校运动会的男子 100 跨栏都拿第一，说跟刘翔一样的项目。奖品就是一个文件夹，然后毕业留念时，他就赠送给我了！

杭大同学大部分来自省内，也有一部分来自外省的。印象中义乌、东阳的同学最喜欢搞同乡会，缙云同乡会也是，经常看到义乌缙云那边的同学经常性地组织活动，一大堆一大堆人地互相串门，说着他们难懂的地方方言。杭大衢州同乡下会不招龙游人，然后我们龙游人也搞过一次同乡会，我也去了！所谓同乡会就是大学一起跑到照像馆去拍个黑白集体照。

除了同乡会，就是杭州各大高校周末互访。那时也没个电话，都是突然空降，如果找不到人，其它同学都会很热情地帮你们到学校的各个角落里去找，然后终于找回来了。然后大家一起去食堂搓一顿。如果实在找不到，反正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学也会互相请到食堂里吃饭，感觉农大的饭比较好吃。有时候天晚了就会住在同学寝室，挤一个铺。

[返回目录](#)

挂课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德语专业宋宏亮

在杭大挂过一次课。应该是第七个学期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这种公共课是在大教室上，近百人阶梯教室，我总是躲在最后一排打瞌睡，可能是被老师发现了，给我的惩罚。印象中，那个老师很有气质，开始我总把她的形象跟文革女红卫兵联系在一起。她其实是个很称职的教师，后来我自己也当教师，如果有学生在我的课堂里打瞌睡，我恐怕也会让他挂科的。

那个寒假我留校补考。那是很冷的一个冬天，虽然没有下雪，但西湖水面结了薄冰，天气阴沉，游人稀少。人在心情压抑时，容易陷入深思。我在那个寒假，深深思考了未来的人生。挂科，让我膨胀的心沉了下来。

去拜访了那位老师，想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给我个补考的机会。老师住在杭大正门外教工宿舍，杭大新村某栋某号。我进门还没有报名，她就知道我的来意。印象中，她家里很温馨，她丈夫很和蔼，好像是位浙大教师。不关他的事，他还安了慰我几句。

后来想想，很敬佩那位老师的师德。她一遍又一遍耐心讲解，我终于明白，问题是没有弄清楚俄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孟什维克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列宁坚持要发动第二次革命，即布尔什维克革命，俗称十月革命。列宁为了说服党内同志发动十月革命，撰写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这部政治文献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外语系学生当然应该熟读，起码搞清楚基本脉络，搞不清楚毕不了业也对。

多年以后，我在德国转学政治学，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共产主义运动史，重温了我那门挂科的节点。我发现，我当年补考没有白费。

那一课真的很重要。你想想，假如没有列宁那部《四月提纲》，俄国穷人党思想不会统一，也没有办法发动十月革命，孟什维克也不会被轻松推翻。临时政府如果赢得了时间，就会制定一部俄国宪法，俄国就会走上宪制共和，和平发展的道路。没有阿芙乐尔巡洋舰炮响，北大师生也不会剧烈骚动，中国近代走向也许会完全另一个样子。

从失败中你能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些考试顺利通过的同学，考完就忘光了，只有我会记得这门课；只有考两次才通过的我，才会深深理解这门课的重要性。

补考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你才懂得，社会革命不会一蹴而就，总要折腾几次。法国大革命折腾几次，德国魏玛共和国短命，中国辛亥革命的命运也一样。后来读德国大学时，把如此深刻的思考写入我的硕士论文，把德国导师吓一跳。

后来知道，那位老师是杭大马列主义教研室组长，也是杭大教工工会主席。“杭大人”微信群里有谁认识她？请告诉她，有个补考生感谢她。

[返回目录](#)

实验室里人和事

——杭州大学生物系 86 级钟留群

生物系的实验是重头戏，绝大多数课程都配套实验课。

各科都有专门的学生实验室，另外也有仪器设备重重、机关复杂的各科实验室，甚至老师的办公室有时候也是一个小型实验室，跟着老师做课题时一般就会在那些地方。



虽然楼里有小教室有办公室，但好像总是叫它们实验楼。

1. 利器高大上

进入大学不很久天气就转冷了。

我跟着大四的学长去看过他们的实验室，好像是生化组的。

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微波炉。那个年代吃食堂饭都是用搪瓷碗，学长教育我不能在微波炉里使用，那个要击穿的。

学长把凉了的饭菜倒在玻璃皿里就开始旋转加热了，我很好奇地盯在窗口看，估计眼睛就是这样近视更厉害了。

后来还煮过玉米。玉米是田里现掰的，连皮微一下，取出来的时候看着没啥热气，拿到手就得倒腾手，好烫，剥开外皮，热气一

下子冒出来，玉米香就弥散开来，印象里特别好吃。我现在还这么煮。

其实还有很多利器的，但是都跟吃没什么关系，就记不得了。反正，最初的印象里，实验室里各种高大上啊用个水还要烧成重蒸水。后来就只在实验课进学生实验室。规矩着做这做那，有时候有趣，有时候恐惧。直到升入大四，老师的实验室又可以随便出没了。导师是陈宛如老师，很可爱，会带我们各种折腾。实验室成为一个快乐基地。



2. 泥巴师兄

泥巴是陈老师早几届带的学生，嫡系的师兄哦。那时候，他比现在年轻，没现在酷，笑容没有现在多，色彩也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但相机是和现在一样不离手的。他有时候送菌种来，有时候来帮陈老师拍各种蘑菇照。他眼里只有陈老师和蘑菇，我们同班的师姐弟仨——哈喽师姐、我、还有阿牛师弟，每次站那里都好像只是实验室里的空气。

90年夏天西天目的一个真菌会议，永远背着照相机的泥巴兄不但拍蘑菇，竟然还想起拍我们仨。泥巴兄会指令我们看过来看过去，

我们都受宠若惊地很听话。然后，传看洗出来的照片的时候，阿牛师弟说：“呀！老钟，你看这照片，拍得你都蛮漂亮了么。”

我可不可以踹死你啊！阿牛！虽然，泥巴兄拍的蘑菇的确是比真蘑菇好看的。直到去年的同学会，阿牛还在想念泥巴。

泥巴兄不太认识满地的草，他说他当年念书时候是乔木专家，专门了望远远的大树，没等大家看清树皮叶子花，就能喊出树的名字来。一路走他一路显摆给我们看。那树都远得我根本看不清，他说啥我都没法验证。我渐渐有点懂了。

3. 金针菇

有一次泥巴兄带来了金针菇的菌种，那年代金针菇还比较稀罕。

陈老师就带我们用纸板箱装上黑乎乎的棉籽壳来培养。拌料的时候放在很大的塑料盆里，加这加那，还要加入一定比例的农药，我吃惊了一下，就记住了。

但是应该没什么大碍吧，那个时候不怎么有一次性手套，我记得我犹豫了一下，陈老师已经开始大力搅拌并责令我们快点，我们也就徒手搅和的，完了洗个手而已。装箱后用塑料纸覆盖在面上保湿，每天喷点水。打开塑料纸时候，一股生腥味扑面，菌丝在蓬勃生长了呢。出菇以后齐刷刷的小模样太可爱。拽了寝室同学买点小菜，是不是好像还挖了荠菜哦，就在实验室里现剪金针菇现用电炉煮汤。

那种鲜美已经成为无法超越的概念。

收割后的纸箱把纸板盖子折回去，翻个身，让原来的底朝上，打开，喷点水，覆上塑料纸。很快，金针菇又开始探头探脑了。吃了好几茬，直到无聊。

4. 惊魂实验

动生实验吧，我跟阿皮一组的。阿皮很娇气，戳个指尖采个血都不敢。我就扎完自己再扎他。就这样，他还要“宝宝不敢看”、“宝宝啊恩叫”地作。他一手蒙住眼睛把另一手交给我，嘴里还在小哼哼。我刚一用力捏紧他指尖还没下针呢，他就杀猪一样嚎叫起来，简直是个豌豆上的公主。

一次动生实验要给兔子做一个气管插管，我不小心刀锋一滑，大量鲜血喷涌出来，我尖声叫老师。老师过来也是回天乏力，他一边给兔子继续放血一边查看刀口分析说可能切到了甲状腺，那里血管很丰富。看着兔子的伤口部位涌出大量的血泡沫，想是气管也切开了的。我就站那里一直哆嗦哆嗦哆嗦，心想还好没学医，兽医也不行。心理阴影面积之大，直到今天，上课一讲起甲状腺眼前就翻滚着血泡沫。

5. 那些队友

遗传学实验我和小明一组，记得一个果蝇实验中，要隔一个规定时间统计并转移培养一次。大家都是轮班的。小明特别好，笑眯眯地说：“哦，这个点你不想来啊，那我来好了！”可是实验开始之后，到了关键时刻小明总是去找妹子去玩去，而且隐瞒不报。可怜全不知情的我还在约定的值班时段里孜孜不倦地数那些早已经是遍体错误的果蝇们。

最后，我们的实验结果根本无法面对。实验报告上一串红叉叉。简直想掐死他…妹子。

有机化学实验我和隔壁班的一个男生一组。不记得谁了，像个未知数，就叫X吧。

实验室在化学系。好像有时候是单人实验有时候是合作实验，我俩共用一抽屉附有清单的仪器及零配件，以及巨多的无清单的杂

碎配件。每次实验要挑选合适的配件，搭出一个符合要求的实验装置来。抽屉是上锁的，老师要求实验结束后仪器零件都要复位。

有一次，坏了一个水龙头，隔壁桌霸占了好用的那个。X 拖出一根很长很长的橡皮管到处去别人家抢水龙头，没成功。我默默地看着。然后我翻动一抽屉的零配件，找出一个玻璃三通，用一小段橡皮管把它接到水龙头上，和平地完成了与隔壁桌的水共用。X 默默地看着。然后我们一起默默地等很久，等产物生成。期末按清单清点的时候，我们的抽屉里该有的东西都神奇地没有了！我疑惑地看着 X，他终于说话了：哦哦，这个谁借了？那个谁拿了？还有这个？这个原来就没有的……。

6. 乌灵参

毕业论文是关于乌灵参的生化分析，还要做大量的接种实验。当时使用的是老式的接种箱。陈老师的办公室里隔出一个小间作为接种室，高大上地装了空调，效果一般般，但可以让我们接种的时候不至于手指僵硬。



冬天到底还是冷的，一口气呼出，玻璃箱上一反弹，眼镜片顿时白茫茫的，像吃热面条时候一样。可恨的是，此时手还消毒了伸在箱子里边拿着试管、接种环靠在酒精灯火焰旁。不敢动弹，坐等镜片白雾消退。从此只用隐形眼镜，很快熟练到不需要借助镜子；

现在上课会要讲微生物培养和组培，当年的根深蒂固熟练到可以闭着眼睛张嘴就来。

其实我没见过乌灵参真容。接种时候吧，它长得和别的真菌都差不多；工厂送过来的呢，是发酵生产制作的菌粉，好大袋子装着，深褐色微泛一点红的粉末，淡淡的酸气。

我倒是吃过很长一段时间，吃一大勺后有一点点反胃。当年老师知我贫血，就说可以试试，当地人都吃的。然后就在杭大医院建了档，我是极早期的临床志愿者。

多年以后，乌灵参成功获得市场。

参看说明，主要是安神助睡眠，突然想起大四时候睡觉睡到被潘班长记旷课，会不会是乌灵参惹的祸？

想起我当年奋勇志愿者的经历，我想我应该获得个终身超级荣誉VIP！这样就可以免费抗抑郁、免费安睡眠。

现在公司的董董事是陈老师的儿子也是当年我高中时候的班长，我是他的宣传委员呐。如今他只是深沉地微笑不语；而此刻，上传乌灵胶囊图片算不算我正在履行旧职？

7. 实验室记忆碎片

- 植物实验每次都有绘图作业，辅导老师是班主任阿美老师，他每次都嫌弃我画得太慢，可是他也不看看我画得多好看。

- 解剖鲫鱼时候，肚子那一块最先打开剪下，搁在蜡盘里转眼就会失踪，传说是被同学收集到饭盒里去了。

- 揪着兔子的长耳朵，空气针打到手软，负责摁兔子的搭档小余突然撒手跳到我背后跺着脚喊：“哎呀哎呀它还在看我唉……”她一提醒，我就也看到了，也想躲，我俩就闷头抱在一起，都不敢再看兔子。

- 蛔虫一定是人人记得的，而且记忆里多半和面条关联。我反正很久以后还是看到别人吃面条都会反胃。

• 在实验室自己做果冻，其实就是用培养皿倒平板。加糖的时候看看化学纯不放心还用的分析纯，那天室友看了也吃了，但后来她说她再也不吃果冻了。

• 有一科的实验几乎每次都要杀好几个癞蛤蟆。而我每次都要酝酿很久，才敢触碰那种凉嗖嗖、气鼓鼓的软。后来发现大家都偷偷求阿牛杀，阿牛杀太多个了都成庖丁了。老师都盯上他了，但他还是有办法杀很多个偷偷分给大家。

实验室，几多欢乐几多愁，还有一整天一整天的疲累。

但是，时光是个神奇的过滤器，它让回忆只留下澄清的醇酿。

（原载钟留群《诗意地栖居在校园里》，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返回目录](#)

第四章：生活

杭大情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杭大的岁月，不仅仅是三点一线，穿梭于寝室—教室—食堂之间。杭大的岁月，也孕育着浪漫的情怀，悸动着多少颗年轻的心。

如今花甲之年，追忆杭大情事，心中依然充满温馨。

新生一年级，便喜欢过一位女生，曾经在大礼堂一起看电影，也曾用自行车载着她去文二街露天电影场。杭州的山岭曾留下他们的足迹，虎跑泉边曾出现他们的情影。暑假来临，她回了家。不久，从远方寄来书信，讲述在公园里朗读英文的情景。本已悸动的心，再也按捺不住，给远方的她写了封信，表达思念之情。不期，她回信婉拒，借口年纪尚小，父母让她专心读书。回校后，大概向年级主任作了汇报，因此调到了别班。然而不久以后，廖诺告诉我，她和一位大兵走在了一起，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应当是二年级了。一天，班主任朱炯强老师给了我一张戏票，也给了同班的一位女生。那天傍晚，我俩一起骑车去胜利剧院。一路上，谈着儿时的趣事。两家父母原是旧识，曾经同校共事。演出开始后，不能说是心无旁骛，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有别于同学之情。记得当时上演的节目，有口技“苗岭的早晨”，以及“丰收锣鼓”，等。也许是面对才女，自行惭愧，没有主动追击。这种幽会，仅此一回。多年后异国相见，依然是真情实意的好朋友。

再后来，另一位女生进入了我的视线。其实，她就坐在我前面，每天上课都看到她的背影。日久生情，此话不无道理。然而不知如何表达情意。恰好当时正在学习英美诗歌，美籍教师 Jeskie 的讲解，深入浅出，尤其是对意象（image）的阐述，令人大开眼界。那天学了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 Red

Rose)，灵感顿生，写了首英文诗，将她比作红玫瑰，在风中微微摇曳，散发着芬芳。时值冬天，她经常穿一件暗红色的外衣，一步三摇。将她比作红玫瑰，并非无的放矢。那天晚上，在 252 大教室，鼓起勇气，把那首诗“献”给了她。虽然通篇没有一个爱字，洋溢在字里行间的爱慕之情，还是拨动了她的心弦。自此以后，幽会频频。最常去的是苏堤，坐在西湖边，让微风荡起心中的涟漪。

[返回目录](#)

外语系 77 级情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外语系 77 级情史由三部分组成。对此，77 级年级辅导员徐潮文老师功不可没。当年若非他“睁一眼，闭一眼”，而是棒打鸳鸯的话，外语系岂不成了男女修道院？

言归正传。

如愿以偿的有：温时幸/朱尔萍，叶子南/杨忆平，凌建平/张力群，陶黎庆/左励，倪连生/刘佩珍，邹书康/李佐伟，等。这类同学大都是“地下工作者”；在校期间，一般都搞地下恋情。倪连生与刘三姐的公开恋爱属于例外。

青梅竹马的有：殷企平，杨夷平，汪晓明，魏向明，吴永安，陈建安，俞虹，等。这类同学，进校前即有心仪之人。在校期间，或周末约会，或两地飞鸿。毕业后，皆成眷属。

失之交臂的有：毛冀钢，刘小明，廖诺，刘燕，敖丽，富萍萍，陈模范，黄天海，等。这类同学，在校期间都曾有过一段，乃至数段恋情，可惜阴差阳错，未能与同窗缔结良缘。

毕业后结为连理的有：应惠明/王玲莉，顾宏远/施大芳，等。这类同学，毕业后，将同学之情升格为爱情。此乃后话。

[返回目录](#)

袁满的爱情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周遇春

袁满不太喜欢在图书馆里看书。去过几次后发现，那里基本是情人的天下，一旦你坐下，前后左右总会找到一对。

给对方抢位子一般是男同学的活。袁满好几次来到图书馆，看准一个空位刚待坐下，对面就飘来一个声音：“对不起，这里有人了”。过会儿，女生翩然而至。先窃窃私语一阵，然后看书，讨论，窃笑……。袁满虽然听不清，并努力装着看不见，但是那窃窃的声音偏往他的耳朵里钻，搞的他整个人心神不宁。

所以袁满决定假如在四年里没交到女朋友就不去哪里受刺激了。果然，接下去的几年里，除了借书需要外，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图书馆。

毕业后第三年袁满有了一个重返杭大进修一年的机会。袁满很高兴，除了学业他还另有一个目标：利用这次机会，一年内把女朋友问题解决掉。想来想去决定从图书馆入手，盼望能有好运气。

袁满去进修时，杭大的图书馆已经不止一处。除了原来那个外，靠近东门的田径场边上又开辟了一个。袁满认为新的打算就要从新的地方开始，所以他就从这个新馆开始尝试，占座总挑带空位的，好守株待兔。

果然，这一年是袁满人生中顺利的一年。图书馆去了不到一个月，在一个雨夜他就遇到了心目中的女孩。

那天晚上，袁满很激动。因为他发现，那女孩无论长相，气质，身材都符合他心目中描绘了无数次的她，最让他满意的是她居然还是中文系的学生。他说，那天他埋头于书本，一抬头看见她刚想坐在他对面，一双黑黑的眼瞳正询问着他：这里可以坐下吗？

Of course! 袁满事后回忆：他那一刻的表现简直可以用完美来评价，激动又不失理性。最重要的是，当他几次偷偷注意对方时，发现对方也在注意他，他知道好事就要开场了。

两年后，袁满结婚了。酒席上借着酒劲他跟我讲了他们的故事。并用手拍了拍还是单身的我的肩膀说，兄弟学着点，图书馆可是个好地方！

三十年后，袁满又回到杭大，独自去他们爱情开始的地方看了看。当年的图书馆已经不在，但是想起那个雨夜，一切还是那么的历历在目。

[返回目录](#)

寝室窗外的风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杭大四年，我的寝室一直朝北。原本听说过两年与对门朝南的寝室对换，但一直到卷铺盖走人的那天也没看见过阳光爬进窗户或爬上床头。进校时的那张原本苍白的脸到离校时更显白苍了。

不过我也没抱怨，虽然心里犯过几次嘀咕。在这方面我不习惯抱怨，倒是一直在学习父辈的忍辱负重。

好在有窗，有透气的口。不致于见不得阳光还呼吸不到空气，更何况那时的空气还是很新鲜。门当然也是一个口，但这个口子不喜欢开，只有不得不开时才无可奈何地开，因为隔壁的盥洗室味儿太重。

我的床不临窗，这说明我的床与窗之间的关系不是很亲密。不过我还是有机会与它亲热的，比如清晨起床后大家忙进忙出腾出了空位时；比如课后回到寝室大家都需要闲聊一会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都会尽可能靠窗坐，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一边往窗外看。慢慢地就看出了风景。

朝北的窗临一个篮球场，一个不长草也没打算让它长草的篮球场。每天清晨，如果不下雨不刮大风，男女生按班在那儿列队出操。由于近水楼台慢下楼，所以总能在广播操音乐响起之前欣赏到一些特别的身影，这些特别的身影慢慢地就转换成了熟悉的面孔。虽然有的到毕业还叫不对姓名。我们常说的当年印象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每到下午课结束，这个不长草的篮球场就成了男生释放多余能量的地方，激烈程度可从尘土飞扬的程度判断出一二。四楼窗台成了最佳看台。

操场另一端有一条不宽也不窄的水泥小路。如果想踏着铃声走进教室的话，还可以看到最亮丽的一道风景：从隔壁一幢女生宿舍里，会三三两两地走出各班的女生，脚步匆匆地走过窗前，走过那条水泥小路，如同走过一条特殊的 T 型台，不过展现的不是服饰，而是当年独特的精神风貌！

我想许多男生也许会有与我一样的感想，并为能看到如此不一般的风景而深感荣幸！当然这份运气只属于朝北的男生寝室哦。

[返回目录](#)

学校的舞会

——杭州大学是数学系 77 级周遇春

大三的时候，学校里兴起了跳舞的风尚。每逢周末，食堂边的室内篮球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音乐嘹亮。不用说，舞会开始了。

那时候跳交谊舞的比较少，大家跳的是《青春圆舞曲》的集体舞，一大帮人围成圈，在乐声中起舞，场面壮观。

作为好奇，我也曾和阿亮，严博平兄去瞄过几眼，并反复忽悠严兄下舞池跳舞。在我们不懈努力之下，严兄终于经不起撩拨，鼓起勇气进去了，而我们根本没看他的表演就离开了这个让我们好奇，也想跃跃欲试的地方。

第二天，我们问严兄昨晚感觉怎么样，严兄神秘兮兮地说，嗯感觉好极了，有许多外语系的美眉呢。但是他带着诡异的笑容，让我觉得他似乎也只是众多看客之一而已。

到了下个周末的时候，严兄开始鼓动：咋样？我们一起去跳舞？毕竟，我们挡不住那么多女生的吸引，于是又来到篮球馆。球馆门口有很多人，灯光和音乐从门缝里挤了出来，洋溢着欢快和诱惑地迎面扑来。但是我们还是把严兄塞进人群后，自己溜之大吉。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再有勇气作这样的尝试了，而严兄则似乎越来越如鱼得水。

时隔这么多年，我和阿亮一直不知道严兄当初是否真的跳了舞，拉过了几个美眉的手。

这个秘密只有严兄知道。

[返回目录](#)

交谊舞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大三的时候，跳舞的风终于刮进了外语楼。

有天晚上，英语快班组织同学跳交谊舞。在《蓝色多瑙河》、《纺织姑娘》等舞曲悠扬舒缓的节奏中，陈雯和刘燕热情耐心地教大家跳三步舞。

姑娘生来能歌善舞，男生可就大为逊色了。教室里姑多僧少。

这时，我看到陶黎庆在门口张望，便把他拉了进来。再想把他推上去学舞，他可急了，差点没跟我翻脸，只得作罢。

想必陶兄当年正在热恋睡美人，岂可心有旁骛，在众目睽睽之下怀抱其他女子？

[返回目录](#)

演话剧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陈雯

我虽然少年学习乐器，在中学生文工团时也常去演出，但演话剧是到杭大后才有的经历。

年级要排英语小话剧“灰姑娘”。演员阵容：“灰姑娘”曾红，“后母”流左红，“大姐”李佐伟，忘了“王子”是哪位男同学。不知怎么的，要我这个从来没有演过戏的人扮演“二姐”。再三推脱也不行，只好硬着头皮上。

我穿着一条类以十八世纪西方妇女穿的底下撑开的裙子。上场时，手拿一面镜子，作刚起床状从侧幕走出。一边照镜子，一边理头发，一边说台词。然后是跟着妈妈和大姐作贱灰姑娘。后来是试“水晶鞋”，作穿不进状。演完了觉得挺好玩。

这是我一生仅有的一次演话剧。

[返回目录](#)

杭大外语 78 级毕业演出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德语专业宋宏亮



1982 年春天，杭大外语系 78 级的学生快要毕业了，他们自编自演一台话剧，作为毕业献礼告别演出。我也去凑热闹，自告奋勇参加了剧组。剧本是从法国作家司汤达小说《伐妮娜》

改编而来，谁执笔忘了，好像改编的还不错，我演一个神甫，多少有几句台词。

剧本改名为《若为自由故》，剧情表现拿破仑时代，意大利烧炭党人秘密起义的故事，贵族姑娘爱上革命党人，一对来自不同阶级的恋人，把爱情置于革命洪流中，展现出种种生离死别感天动地的情节。

1982 年的春天，中国的改开时代正式登场，大学里人心骚动，盛行爱情至上主义，社会上新思潮，新气象一浪接一浪。在这个大环境下，这个宣扬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的剧本，能通过系和校两级领导层层审查，最后顺利上演，也是顺理成章。

剧组请来浙江话剧团的导演进行专业指导，一个美女导演，记得好像姓陈，印象中她很有文艺范儿。但后来知道陈导其实不是浙话导演，好像她父母是浙话演员，她也就是耳濡目染懂点舞台表演

规则，一个票友级的文青罢了，但对付大学生业余话剧，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为了这场演出，外语系的文艺骨干倾巢出动，话剧《若为自由故》主演有高玉龙，王青燕，陈虹，倪成创，孙小琴等。这中间，除了高玉龙在德国病逝外，其他人应该都还在，有的正在本群里潜水，有的正在准备向我砸砖呢。

演戏的乐趣其实不在舞台上，而是在排练过程中中，因为你一旦上了舞台，你就是那个角色，演好演坏你都得往下演，都不可以出戏，还原你自己。但排练时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排练时你出了错，你就得立刻出戏，导演给你重新说戏，你得重演一遍，这一进一出的过程，就是在玩弄情感，很有意思，也很危险，为什么演员滥情，出出进进的没法不滥。

记得那场戏的排练中，那个外聘的陈导对陈虹同学热情有加，眉来眼去，那种深情厚谊柔情蜜意，剧组里谁都能感觉到。陈虹好像是个高个子，白白净净文绉绉的，这样一个马上就要大学毕业的好青年当然很抢手。尤其是那年头，社会上对大学生如饥似渴，对于一个文艺女青年来说，那真是一枚白马王子，怎能让他白白逃走呢？

等演出结束，岁月重归静好，陈虹也不见了，也不知道那个女导演最后有没有追上他。78级毕业走后，杭大校园里文艺活动顿时冷清了许多。从79届级开始，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进大学的越来越多，学生年龄越来越小，阅历越来越少，生源也越来越集中在浙江，罕见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印象中后来的新生大都属于那种埋头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傻孩子，情商也比较低，外语系从此就再也演不出什么好戏了。

（原载《德国华人新生活》。2018年11月11日修改） [返回目录](#)

杭大食堂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德语专业宋宏亮

在杭州大学的四年，每天就是在教室，宿舍和食堂三点一线中转圈。食堂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那时候，要满足肚子的需求，除了食堂几乎没有其他选项。

如果没有记错，外语系学生是在中心食堂就餐，中心食堂是校园内最大的学生食堂，位置距离学生宿舍和东侧门之间。食堂餐厅很大，一排窗口一直到底，里面部分买饭，外面部分买菜，每日三餐到那里排队，一顿也不能缺。

那时，中国还是粮票时代，也就是粮食配给时代，那时，你光有钱还是吃不到饭，要按照粮票的约束吃饭。当年大学生的粮食定量跟军队士兵靠齐，好像是每人 31 斤，不记得吃不饱，只记得女同学都吃不完。每人发放基本饭菜票，饭票里包含了定量的粮票——你没感觉。

食堂的米饭，是在一层层大托盘里蒸熟的，就像一块大蛋糕，横竖切割成小块。你要四两，食堂阿姨切一块四两的米饭。菜有几种供选择，价格从几分钱到两毛钱，两分钱买一块酱豆腐，也可以伴饭果腹了，两毛钱一个荤菜比较奢侈，记得最可我的口的菜，好像是肉末蒸鸡蛋，中间黄色蛋黄，四周白色蛋清，蛋清下面有一层肉末，酱油的香味扑鼻而来。

饭桌是水泥板制成的，一张桌子两排凳子，可以坐八个人。没有硬性的校规，只是根据习惯法，女生坐靠里的桌子，男生在靠门的桌子，泾渭分明不可越线。有哪一对爱到不行了，躲在角落里默默享受两人世界，可是无法避免遭人白眼。吃饭桌分男女，买饭排队不分男女，如果你走了桃花运，你心中的女神正好排队在你前面，

你可以斗胆搭话，主动替她去排另一个队——接下来如果发展，就看你的情商了

学生必须自己带自己的碗盘筷子，食堂门口有一长排水龙头，吃完饭在水龙头下冲一下，就算洗了吧，冬天，水龙头里流出的自来水冰凉刺骨，敷衍敷衍行了。没有人会计较，你的碗是否洗干净了。

不知何时，杭大学园里有了一间夜餐食堂，晚上自习一直到关灯，饿着肚子回宿舍，咬着牙进入梦乡，终于可以避免了。上床前，到那里花一毛钱买一碗面条吃了再睡觉，多么简单的幸福呀。记得那个夜餐食堂好像只收人民币，不用饭票了。也就是说，人民币渐渐独霸天下了。

那个夜餐店位置就在外语系大楼后面，晚自习十点以后，饥肠辘辘，抬头看窗外，那个夜餐店灯光闪烁人声鼎沸，不去简直受不了。

[返回目录](#)

水仙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周农

外语系学生食堂有六、七个窗口。一部分窗口打饭，另一部分窗口打菜。

我最喜欢吃的菜是大白菜加一个肉球。大白菜吃起来清淡爽口。肉球状大如桔，香醇味美。只是这个菜比较贵。

读大四那年的新学期刚开始，我到食堂就餐。窗口的打菜员工是位胖姐，不算太胖，像是新来的。胖姐将头探向窗口，喜形于色地问我是不是刚回学校。胖姐和我素不相识，我腼腆地点点头。面对异性亲热的招呼，我怀疑自己平静的心湖是否荡起了些许爱的波澜。胖姐打菜的动作很娴熟，用长柄汤勺给我的搪瓷碗盛上白菜，加上一个肉球，用汤勺挤破大菜盆里的另一个肉球，将其中大半个肉球又添加到我的碗里。我吃惊地抬起头。胖姐很年轻，很白净，笑得像朵刚绽放的水仙花。

其时，许多同学早已情窦初开，而我对此的感觉却十分朦胧，因为当时的我正心无旁骛地迷恋于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水仙花》的诗句：

They (daffodils)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
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
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
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

食堂餐桌是一个个的大圆台。同学们围桌站着进餐。有同学看到我碗里有两个肉球，好奇地问我是不是买了双份。周围吃饭的同

学也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我能说什么呢？我开始知道世上有些事看似简单，其实难以说明。

此后，我只好去其他窗口打菜。我怕难堪。可是时光老人慢慢地消磨掉我的心理防御，后来我还是忍不住又去了几次胖姐的窗口。我想看看胖姐对我是否仍有好感。胖姐却一如既往，总是打给我将近双份的菜，全然不顾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在损公利私。我在学校的最后阶段，胖姐仅限于在食堂窗口和我打照面，除此以外，从没主动和我约会。我毕业以后，和胖姐失去了联系。

时光如白驹过隙。在参加工作以后忙忙碌碌的几十年的生活里，我接触过一些形形色色的人，也经历了不少各种各样的烦恼。在烦恼的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在孤独的时候我常常去郊外看花。不知怎地我在看花时总会去联想水仙花，想到貌如水仙花的胖姐，从而缅怀胖姐当年带给我的那份最洁白最纯粹的情感。

[返回目录](#)

大排肉的功能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廖诺

最近在网上看到王之光与某君聊起当年读书时如何吃阳春面、榨菜面一类。之光兄大谈面经与吃经，全然忘记其名校教授九五之尊，讲的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凸显他对阳春面的感情之深，历经三十年而不减。这也引得我想起当年吃大排的情景。杭大学生食堂烧的大排世界上最好吃！那扑鼻而来的香味，是我的最爱！记得大排肉并非每日供应，而是隔三差五，大约是两毛、两毛五一块，随伴一些白菜与肉汤。卖大排的窗口也是专门的，另排一队，非同一般菜肴窗口，一旦排错了队，存货量不多时，你排不上，便只好悻悻然吃其它青菜去了。说真心话，来自普通家庭的子弟如我者，绝非嘴馋了想吃就能吃的。排队前一般要摸摸口袋，数数菜金是否充足，才作决策。君不知，一旦决策失误，本月十几元的伙食费不够用，重大经济危机将接踵而来。此景绝非家住杭州，逢周末回家加餐，及那些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所能体会的。难怪他们的体质都比我好。

一块大排肉加菜叶肉汤，覆盖在四、五两香喷喷的白米饭上，于是变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时值二十出头的青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的上课、背单词，脑力、体力消耗极大，这块大排变成了重要的营养品。后来，我又发现食堂还供应一种红烧带皮的五花肉加梅干菜，其价位也相当，我也就开始向五花肉进攻了。正因为五花肉瘦肥相间，又无骨头，味觉和营养或许更佳。

后来，经济在发展，学生食堂旁加盖了一间炒菜馆，烹饪更好的菜肴，我们偶尔去去光顾过几次。

（2007 年 4 月 24 日于纽约）

[返回目录](#)

纪念我那被偷去的碗

——杭州大学物理学 80 级梅美林

1998 年 9 月 15 日，杭大被合并。迄今已十八年矣，弹指一挥间。

失去的总是美好，老杭大人悲悲切切，耿耿于怀，剪不断理还乱。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咱是“兵”，虽然在杭大呆了八年。

什么最值得回忆？碗！斯碗已逝，但曾经的丑恶未忘。

刚入学时，接待我的老同学说要自备饭碗，于是我去校内商店买了两口搪瓷碗，七毛五一口。

我把碗放在食堂的储物格内，可是不出个把月，两碗失踪了。

我去储物格寻找。有一口碗与我失去的有点像，拿起一看，只见碗底刻着一行字：“警告，本人患甲肝”。我噗嗤一笑：此地无银三百两，有用吗？由此看来，遭遇饭碗失窃之苦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买了新碗不久又失，买了新碗不久又失，大概循环了五六次，我耗不起了。窃碗不算偷？我终于下决心也偷别人的碗，可是吃完饭后，我性本善还是占了上风，洗好后将碗放回原处。

之后，我只好拎着饭碗上下课。时间久了，碗已磕碰掉漆了。一次，碗掉地上，我突发奇想：干脆反复往地面砸，摔破烂一点。用着恶心，看上去也显眼啊。

还是不奏效，放在储物格的两口破烂碗最终还是被偷了。

无奈，买个大书包，碗和书本装在一起，直到混三年研究生。

我是喜欢懒觉的人，不肯提前一分钟到教室，迟到难免了。

一次，我又迟到了，快步进入教室。书包里，不锈钢勺子与碗壁碰得叮当响，引学兄学妹哄堂大笑。

“低调一点好吗？迟到了还要叮当作响。”我惊魂稍定，自言自语。

（写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

[返回目录](#)

叫化童鸡与东坡肉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一次，不知是哪个嘴馋的发起，外语系 77 级英语快班的六幢舍友刘小明、吴永安、王之光、任国平和我，去了杭州酒家，一品杭州名菜：叫化童鸡与东坡肉。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尚未有体验，枉为杭州人。

东坡肉盛在砂盅里，色香味美，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只是比食堂的红烧肉高了个级别档次而已。

而那叫化童鸡，则是从未问津过。剥落黄泥、解开荷叶，顿时香味四溢。小小的一只叫化童鸡，怎经得住五个壮汉瓜分？记忆最深的是，吴永安把剩下的荷叶塞入口中，嚼得津津有味！

[返回目录](#)

妈妈的包裹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大概是大一下学期吧，那时的食物比较贫乏。

那天，我出去了，记不得是去了图书馆还是一路散步到黄龙洞，一路“苦背”单词了。

回到宿舍，邵水潮热心地跟我说，今天有些好吃的东西，大家分享一下，你一定会喜欢的。

他转身拿出一包东西，打开一看，哇赛！虾干，酱油肉，还有其他的土特产，望之口水欲滴。几个人一顿狼吞虎咽，转眼间一片空白。我连说“好吃好吃！”

吃完之后，邵水潮才道出缘由。原来这是我妈托人从温州捎过来的改善我伙食的土特产！不料被邵水潮一番设计，要享用好几天的美食转眼间都被众人“狼吞虎咽”了。

几十年后的那一天，和邵水潮在新安江见面。他旧事一提，我仍然记得我的“傻”，哈哈！

[返回目录](#)

禁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外语系 77 级的生源，少数来自应届生，大都是文革十年积压的历届生。有些人上学前就是瘾君子，抽烟的习惯也就带进了校园。我班的郑达华就属此例。

本人插队时，也曾学过抽烟，但抽不得法，烟熏泪流，终未学成。

进杭大后，便禁止同学在宿舍吸烟。不知当年之举，究竟是造福于同窗还是滥用职权？

[返回目录](#)

凭票香烟与饭后一支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1. 凭票香烟

进大学都是成人了，单调枯燥的校园生活常让人觉得压力不轻，所以，慢慢就开始学抽烟了。

记得那时候学校小卖部有一种很受我等穷大学生的香烟，名字叫“大红花”，好像是杭州出品，价格实惠，味道不错。现在可能绝版了。

那时候买烟一定要凭票购买，计划票（购物券）都是学校发的，计划经济嘛！

2. 饭后一支烟

肖兆才兴趣上来时，喜欢唱一曲越剧，其嗲声嗲气大有科班出身韵味。

他的钢笔字也写得好，龙飞凤舞。记得他的汉字“撇功”功底很深，凡是带脚带撇的汉字，特别有劲，令人印象深刻。

记得商亚南老师还曾经请他抄写过一篇什么文章。

不过大家可否记得肖兄还有一“好”一抽烟。那时候饭后茶余，总见他在寝室门口走廊里，或站或蹲，吞云喷雾，一脸的悠闲享受！他常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如今想来，他当年的生活观确有独到之处，无忧无虑，非我辈常人所能领悟也！

[返回目录](#)

难懂的专业术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邵水潮可能是我们当中个子最高的一个。篮球打得好，扑克也热衷。

那时候，隔三差五就在寝室打扑克。扑克发烧友有哪些人，小弟已记不太清楚。不过楼下有一小巧玲珑 MM 经常参与其中。哈哈，MM 的印象当然会深一点。玩到激情处，邵兄时不时抛出一句“公猪”（也许为谐音）。小弟不懂扑克麻将，对此类游戏天生愚钝，故对“公猪”一语大为不解，曾好奇问之，邵兄却答非所问。不过此术语可能是“专业术语”，不能为外行人理解也。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公猪”何意，小弟仍不明白。想来惭愧！下次见面，邵兄一定不吝赐教哟！

看电影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林超英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礼堂看电影《追鱼》。那是进校第一个学期，每组分到电影票只有几张。我也很想看，但我讲义气，把票让给小组同学，并事先说明我要能钻进礼堂，小组同学大家就挤一挤。

那天我果然混进去了，却非常拥挤，估计像我一样进去的人不少。后来又看过几次电影、演出，至于椅子怎么样，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了。

[返回目录](#)

看电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周心红

大学时代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的大学生活和现在无法相比，回忆起来其实有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不那么甜蜜的回忆就不想提了，还是多回忆回忆令人禁不住面露微笑的那些往事吧。这样的往事其实也挺多的，和同学一起去看电影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件。

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的丰富性和现在是不能相比的：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甭提网络了。因此，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看电影就成了当时最主要的文娱活动之一。晚上或周末，甚至没有课的下午，听说有什么好片子上映，同学们都会约上几人一同前往观看。

杭大周边可以看电影的场所有好几处：校内有一个大礼堂，但除了周末似乎很少放电影，大多只做开大会之用。去黄龙洞的路边上有一个浙江省艺校的剧场，条件算好的，票价也略贵。文二路上有一个露天电影院，里面有一些水泥条凳，是固定的。因为是露天，所以每逢下雨就关门了。这儿的条件相对差一些，票价也略便宜。更远一些的还有武林广场附近的红太阳展览馆内的一家影院和周边的杭州剧院，也去过市内的胜利剧院、西湖电影院、太平洋电影院。有一次甚至跑到了城站附近的铁路工人文化宫。那时候为了看电影也是蛮拼的，可以说几乎跑遍了全杭州。现在是绝对没有这个劲道了！

那时，电影市场几年前刚刚开禁，上映的各种中外电影还是很多的。记得在文二街露天电影院看过一个香港的片子叫《三笑》，看完之后好像几个同学还议论过扮演唐伯虎的那位演员是男是女。

里面的插曲都是苏州风味的民歌，朗朗上口，至今记忆犹新。越剧电影《碧玉簪》是在省艺校剧院看的，看后觉得扮演女主角的那位演员（金彩凤？）唱得真好听，人也漂亮。当时轰动一时的《小花》是在杭州剧院看的，音影效果相对较好。大家都对片中李谷一的所谓“气声唱法”和电子音乐印象深刻，觉得让人耳目一新。记得有同学说这部片子中使用了在当时没怎么听说过的“意识流手法”，还说里面的主演陈冲学的也是英语专业，倒也不免因为“同行”中有这样的“名人”而暗自自豪。法国片《巴黎圣母院》似乎是系里组织观看的，差不多全系同学都去了，应该是在西湖电影院吧？看完之后大家也不免就艾丝美拉达的美和卡西莫多的丑议论了一番。

还有一件事现在想想挺好笑的：有一次，第二天就有一场考试（是什么考试已经忘了），可我们几个同学（好像是三个？）晚饭后还去文二路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回到寝室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寝室里有几位同学在认真准备考试，看到我们风尘仆仆地回来，还说刚去看了电影，笑称：“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哈哈，其实我们当时颇觉赧颜，心中相当地惭愧：学习怎么能这么不认真呢？

往事如烟。对于电影如今早已没了当时的迷恋，原因自然很多。但不知还能否重拾那时的热情？

[返回目录](#)

影院惊魂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那天不知是学校组织大家一起去看，还是只有我和赵铁平一起去看电影“画皮”。这部原来属于“封资修”的恐怖片，也是文革后解禁的电影之一。

我天生是看恐怖片、鬼片的料，不怕被吓着。赵兄坐在我左侧，只见他摒住呼吸，全神贯注，我以为他非常投入。突然间，我感到赵兄手脚颤抖，呼吸急促，原来此时正是那女鬼影子在月光下慢慢掠过院子之时！我赶快安慰，说没关系，不就是电影吗？又没有真的女鬼！

可赵兄中场执意离去，要与女鬼拜拜，无可奈何，好不扫兴！

不知赵兄经这么多年的磨练，是否已练出“驱鬼之胆”？

[返回目录](#)

室友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陈雯

我们寝室住六个人。报到那天我头一个到，我的名字贴在靠窗的下铺。刚整理好铺位，门口进来一位窈窕江南姑娘，她后来成为我最好的朋友，用当下的时髦话来说是“闺蜜”，她的名字贴在我的上铺，叫伍志萍。后来我发现冥冥中那只大手的安排是那么正确：我和志萍都是要多睡觉的人！

我们俩每天晚上十点半多一点就收摊回寝室，洗好上床关灯就寝也就十一点了。寝室里别的同学可用功了，要到子时才回来。见我俩睡了，她们轻手轻脚进屋，不开灯，用手电照筒明轻手轻脚洗漱，轻手轻脚上床。好在两个要多睡的人睡一张上下铺床，不会因为床上有人爬上爬下而睡不安稳。

有段时间收音机里热播《夜幕下的哈尔滨》。我们几个人算好时间一定要十二点之前买好饭，好在食堂离我们女生宿舍是最近的，赶快回到寝室：中午正是王刚播讲《夜幕下的哈尔滨》的时段。半个小时，我们坐在桌边，围着一只半导体收录机，边吃边听，津津有味！

寝室里有一只小煤油炉子，有人会时不时开点小灶，烧些汤团馄饨的。我那时不大会烧菜的，就会做糖拌西红柿，但尝到了别的同学的家乡味道。记忆最深的是温州风味的醉小蟹，软壳的迷你螃蟹泡在酱油酒里，一口一个，好吃。

[返回目录](#)

个人卫生与摸黑洗脚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1. 个人卫生

当时杭大的卫生条件，尚属初级阶段。

六幢共三层，每层有个公用卫生间，还有个无门的盥洗室。

夏天，男生穿着短裤在盥洗室冲凉。冬天，学校的浴室开放后，大家赤身露体地合用几个莲蓬头淋浴，毫无隐私可言。

冬天洗热水澡是项奢侈，一般一月一次。平时每天只能到食堂打点热水洗脚。

有位仁兄，具有超前的卫生意识，每晚热水洗屁股！一时成为佳谈。

2. 摸黑洗脚

好不容易进了大学，大家十分珍惜学习时间，起早落晚，不甘人后。

六个人住在一间寝室，不同的作息时间，自然会相互影响。于是定了室规，十点熄灯。

有些同学，胡波即是一例，觉得十点太早，常常过了半夜才回来。这时寝室的灯已经关了，便蹑手蹑脚地开门进来，摸着黑找到热水瓶和脸盆，尽量不发出声音，以免影响大家。

刻苦学习与关心他人，两样兼备，这就是我们 77 级！

[返回目录](#)

内急+迅跑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我们六班男生宿舍在走廊的尽头。那条长长的走廊，至今仍印象深刻。当中位置是厕所和洗衣服的地方，只有洞开的窗户，没有任何玻璃。

那时候，冬天寒风凌厉，气温很低，就怕夜里内急。因为那是一段可怕的距离，需要坚强的意志与之斗争。为了保暖抗寒，内急时，我们都是一路速跑，快速解决，否则可惨了！

抓小偷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李卫星

“抓小偷”这件事我现在还未搞清楚。记得我们理科住在七幢三楼，二楼属体育系。

有一晚上，被楼下的吵闹声惊醒。据说体育系的健儿们在对“小偷”拳打脚踢，给予教训。

不知道哪位还记得此事？后来听说，其实那“小偷”并非“坏人”。那个人夏日天晚上在偷看青年老师的室内活动。

[返回目录](#)

杭大记事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蔡晓平

1. 夜半噪声

大四毕业分配前夕，经常听说男生宿舍有人晒出去的衣服第二天就不见了。那时衣服基本上是在没有门的盥洗室里，厚的衣服两三天是不会干的，说明拿衣服的人是不等衣服干了才偷走。这事不断发生就引起了学校保卫科的关注，于是晚上加强了巡逻打更，而这小偷竟敢于顶风作案，行动又十分机灵，两次被发现后都给逃脱了。终于有一天凌晨时光，宿舍楼里噪声大作，听人说小偷在逃跑过程中被冬青树绊倒，纠察队员一顿胖揍，抓住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犯案者居然是隔壁宿舍男生中成绩第一的同学。大家不解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要这些旧衣服，还把半湿的穿在身上，当然跑不快了。原来他的两个弟弟在杭州做建筑工人，需要很多工作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大家都很同情他，学校也没有作处理，但是他被分配到了偏僻的小地方工作，如果没有发生这个辛酸的过错，按他的成绩会是留校的人选或者其他的安排。不过人生道路上焉知非福，或许此兄后来发展很好正是得福于那几件湿衣服呢！

2. 校园捉鸡

校园里有几栋教工楼，家属养了不少母鸡，常常可以看到这些土鸡地在宿舍周围悠闲觅食。大三的时候鸡的数量大增，已经到了影响校园卫生环境的程度，学校三令五申禁止走地鸡在学校里面闲庭信步，但是收效甚微。于是便发公告，发动群众捉鸡，格杀勿论。一天同寝室的两个老弟捧了一只母鸡进来说是校园里打猎所得，美其名曰：响应号召，为民除害。于是乎，拔毛，炖汤，稀里哗啦，6

个人连声喊真鲜啊！吃着吃着，没有声音了，大概都觉得不对劲，这可能是老师养的鸡哦！可能他们正在到处寻找，哎，如梗在咽喉，吃进去永远吐不出了。想必其他几个馋猫会和我一样现在还有这种内疚的感觉。

[返回目录](#)

难忘的高温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大概是 1979 年吧。那年夏天热得要命，连续一周气温都在四十上下，又碰到要考试。

那时候宿舍里没有吊扇，除了闷热就是蚊子。

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平常别人不出汗，我已经很多汗了；别人一出汗，我已经大汗淋漓。

那个夜晚，闷热使我苦不堪言，坐立不安，难以睡眠。突发奇想，卷起席子轻装上阵，来到校园中间那块玫瑰花圃附近的地方，铺下席子。心想，现在已是深夜。这里虽然也是一丝风也没有，但一定比宿舍凉爽。不料一躺下来，背后热浪阵阵袭来，比在宿舍的闷热有过之而无不及。痛苦呀，转身逃之夭夭！

轻轻回到宿舍。睡在我下铺的肖兆才在蚊帐里面还没睡着。只听他轻轻说：“心静自然凉。”

我知道，他是说我的。当时我正“热烦”着呢，差一点发火。为什么呀？这家伙自己在床里面装了个用电池的小风扇，正在那美美享受着呢！当然“心静自然凉”了。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返回目录](#)

第一次班委会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入学不久，有了第一次班委会。那时好像每个班有一间专用教室。后来没有了，后来两个班合用，一个上午一个下午。

那次班委会就是在当时的专用教室开的，好像课桌椅还没有放齐，有空荡荡的感觉，但记得自己的内心没有空荡荡的感觉，而是很充实很饱满，有些跃跃欲试的劲头深藏在里面。

那次开会有班里的党代表、团支书，还有我一被起哄出来的班长。不过我很坦然，没有受之有愧的感觉。但班长我好像只当了一年就主动请辞了，不是我有负众望，而是我自私了，因为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不是学外语的料，常常事倍功半。这是可以自测的，就像我们通过《诗词吾爱》的软件可以自测自己写的诗词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一样，一目了然。经过自测，我对自己也一目了然了。于是我得重新规划自己。我明白书还是要继续读的，外语还是要继续学下去的，而且要学好，学得自己觉得对得起自己为止。于是我让自己作了一个取舍，一个在时间分配上有点自私的决断。于是有了请辞的后话了。

班委会上讨论了哪些大事记不得了，但画面感很强，记得很清晰：

那是个白天，那是个外面明亮的光线会兴高采烈地涌进来的天气。我们几位班干部围坐在靠近讲台、也靠近门口的前侧。不过我的记忆影像库里的自己没有坐着，而是走来走去的样子，好像有点小兴奋的神情。这有点不合常理，但也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我现在推测大概是去搬一张椅子过来。但小兴奋是肯定的，旁人看不出，我自己心里清楚。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心情很好，而且感觉以后的日

子会更好。我之所以会站起来，找个理由走来走去，有可能是自己不愿喜形于色但又必须有所释放的缘故。这个画面很温暖我自己的心。

那天，年级党支书蒋忠全老师好像也来参加这个第一次班委会了。

[返回目录](#)

从那时的衣着想起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我上大学时穿得最长时间的是一套军装，是我当兵的姑父送我的。送我的时候只有七成新了，是一种土黄色的老式军装。我很喜欢，从中学一直穿到读大学，颜色也从土黄色洗成了淡黄色，甚至有了破洞，我依旧很喜欢，补了以后继续穿。这种喜欢里有对军人的敬慕，有与军人存在某种关系的自豪感。这在那个时候几乎等同于现在的时髦。

时髦是对流行服饰的准确表述，它有时间性，过了那个时间点，就可能不再流行，不再被人追捧，会被新的流行服饰所取代。

那个时代，人们对流行、时尚、时髦等概念的理解是模糊的，界定没有象现在那样清晰，那样准确，大概就是一种喜欢，大家都喜欢的一种喜欢，没有太多的前瞻性。

那个时候的时髦，还有精神上的东西，比如知识，一个人知识比较丰富，看书看得多，会被人仰慕，会成为榜样。现在知识渊博的人依旧会获得敬重，但没有那个时候在人们心中的份量了。那个时候，走在校园里，吸引人们目光的不是漂亮的服饰，而是朴素服饰下面的学识。甚至朴素就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元素，它的标配就是才学。

那个时候，比较时髦的工作单位是研究所和科研机构，后来不知怎么得变成了银行和金融机构。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当一个熟人告诉我：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钱，关心的是钱赚得多不多时，我竟有一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与社会严重脱节了，有了一点恐慌。面对社会的飞速发展，我担心自己思想上调整不过来，以致被社会抛弃。

现在回过头来，都能看懂了，也理解了。也庆幸自己挺了过来，没有被“恐慌感”压垮，但也有一点点的惆怅，而且回忆起来，常常挥之不去。

[返回目录](#)

入选杭大乒乓球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入学不久，忽闻要组建校乒乓球队，很是兴奋。我对自己还是有点信心的，入学前打过中学校队，外贸局队。虽然我知道民间高手很多，但我也不能矮，要压住我上去，还是得要有真功夫的，我想。

我记得选拔赛是在正对着我们外语系男生宿舍楼的体育馆，很宽敞的感觉。那是一个晚上，那儿灯火通明。我去了，表面上显得十分轻松，其实内心早已严阵以待，准备好了打一场恶战！可结果不仅没有恶战，连像样的比赛好象也没有。但我入选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晚过来对我说“你入选了”的是一位中文系的高年级同学，名字忘了。他之所以有资格通知我，是因为在我入学前，他的球技早已在杭大有口碑了，早已被筹建校队的体育老师委以重任了。那晚，他在现场，一直在看，一直在观察。这里可能用得着这句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大概他在我的“手舞足蹈”中看出了一点他认定的门道。

我印象中这位看门道的同学来自宁夏，直握球拍，是快攻型选手。他中等个头，很帅，会赢得女生好感的那种。可惜我与他交集不多，因为他好象很快就毕业了，印象中甚至没和他一起参加过乒乓球集训。

我很高兴参加校乒乓球队，单调的大学生活因为它有了一点色彩；更高兴的是，我因此体育课可以免修，这让我有点感觉像是天上掉下一块巧克力，美滋滋的。不是我不喜欢体育课，体育课在我眼里就是在紧张的学习状态中放松一下，稍微玩一把；但玩也有好玩和

不好玩的。体育课不是始终都是好玩的。相比之下，玩乒乓球肯定要比玩正步走有意思。

[返回目录](#)

黄龙洞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黄龙洞是杭大的后花园。不过这个后花园不在学校后面，而是在前面，而且还有点距离，得走上 15 分钟光景的路。但我偶尔还是会去走走。

说是杭大的后花园，并不是说校内也石桥流水错落有致，格局与黄龙洞一致，可遥相呼应。其实在杭大很难找到一处有点庭院味的地方，局促得很，感觉。即便有一条西溪在旁边，也不见它特意拐个弯，流经校园。

所以去了黄龙洞。去黄龙洞是要事先有个念想的，很难做到说去就去的，虽然它已是最近的景观了。天天去那儿背英语单词，感觉是自欺欺人的一个说词，估计到了那里已无背的乐趣了。周末或者有整个半天没有课的时候，是可以动动这个念想的。如果想约个不是“煞费苦心”的会的话，那儿应该是个理想地。

不过，我去那儿多半是散散心。读书是很伤脑筋的活儿，有时需要稍微活络一下身体，顺便活络一下脑子，不然脑子会像身体一样，僵住的。

散心不一定要到了黄龙洞才开始，一走出校门就会有散心的感觉，如果真的想散心，而不是有目的地直奔目的地的话。我记得出了正门直走，走到不能再走的时候拐弯，向右。然后会经过一所戏曲学校；走过那儿时，常会想到京剧昆剧和戏服；有时还期待遇上几个以后会唱戏的学生，看看他们长得啥样，但没有遇见过。可能远远地有望见，但不会驻足等看，觉得这样一来就不是散步散心了，有任务了。然后好像再左拐，很快就会到。

大学四年，黄龙洞去过几次，但只记得进门吐水的那只石龙头。哦，上方好象有个亭子，我在那儿坐过。

我在想，如果当年进杭大之前就知道，西溪这条河没有流经校园，只不过是一条没有诗意的东沟；如果知道，校园里没有石桥流水，要去后花园得走上十五分钟、车辆驶过时尘土会在鼻尖下稍微飞扬一会儿的路时，我还会选择走进杭大校门吗？我的答案是：会的。

[返回目录](#)

寒假里的闷罐车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德语专业宋宏亮

在杭大读书的四个寒暑，回温州过寒假的，记得只有一次，应该是 1981 年吧，我父母 1982 工作调动到济南，所以以后放假，再也没有去温州了。

从杭州去温州，那时需要先乘火车到金华，从金华乘长途汽车才能到温州。寒假一放假我就去杭州城站买火车票，几次都白跑，虽然那时还没有农民工赶春节回家，但是也是一票难求。后来通过亲戚帮忙，总算买到一张去金华的火车票，没想到，那是一趟加班的闷罐车。



闷罐车是货运车，没有窗子，没有座位，没有厕所，角落上有个尿桶，谁实在憋不住了，就在那里解决，女人们互相掩护着，在男人眼皮底下该干嘛干嘛。除了尿桶散发的味道，还有一股猪粪味道，让你无处躲藏——这个车皮可能是运过活猪的。



乘客们都席地而坐，屁股下面垫张报纸啥的，也有妇女小孩，摊开棉被躺在地下。闷罐车按照货运标准设计制造的，车底下没有减震装置，行驶中剧烈颠簸，屁股坐得生疼。

很多年以后，我看到电影中有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统统是被关进闷罐车运去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闷罐车缓缓开进奥斯维辛集中营，闷罐车打开，车厢门口搭块木板桥，犹太人从木板桥上晃晃悠悠地下来，样子很惨。回头想想，当时到金华下车时，自己可能就是这副模样。我当时年龄应该跟现在的吴亦凡差不多，命运可谓天渊之别。

金华火车站是浙赣线上重要的节点，浙江中部的交通枢纽，1981年春节前，那是我第一次到金华火车站，车站广场上人声鼎沸，扁担横冲直闯，各种听不懂的方言扑面而来，我班同学周游是当地人，他来接我，还带来一个小警察，是他的朋友来保护我们的，警察说金华火车站治安不好，发生过什么什么案件。说着走着，他突然上前，抓住一个人，大声骂他又来偷东西，说着把手上的电棍塞进他的衣领里，那人惨叫一声，倒地不起了。



周游带我在金华到处游玩，在他家还过了一夜，我记得去了金华著名古迹八咏楼，八咏楼那时没有整修过，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燕子在梁上驻筑巢，梁间布满了蜘蛛网，柱子上

还有李清照的提诗，模糊难以辨认。后来查了一下，柱子上的诗词确有来头，应该是南宋年间，李清照在金华逗留时写的：

千古风流八咏楼，
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
气压江城十四州。

李清照生于乱世，北宋崩溃后，她跟随南宋朝野从济南一路南逃，东流西窜的颠簸不停。路上家产丢失殆尽，老公也病死了。一般的小女人，落到这种地步，应该是整天唉声叹气，以泪洗面，可是李清照不一样，她给自己规划的人生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她在这首诗中没有表现对命运的抱怨，只有开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气势。

浙江中部丛山峻岭，金华去温州的长途车，需要绕一个大弯子，经过仙居的峡谷中穿过，经过仙居的公路极其惊险，一边山崖，一边深谷。过仙居狭隘的关口，公路沿江而下，应该是进入瓯江的上游，属于浙南地区了。

以浙江地形的水系来看，中部以仙居为分水岭，北边是钱塘江水系，南边就是瓯江水系，我感觉应该如此。浙北人和浙南人的语系存在某种共同的区别，而语系的区别跟水系的区别有共同规律可循。

1990 年代后期，我有次开车从临海到义乌，横穿浙江中部山区，那时大部分都是高速公路了，但好像也经过了仙居，那一段没有高速，大街上，农民慢腾腾地走在路中央，我不习惯按喇叭让人家给你让路。人家是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为啥要因为你而改变呢？

杭大读书时的第一个寒假，我又有了一些新的阅历。

[返回目录](#)

第五章：师长

沈善洪校长与老杭大领导对我的关怀

——杭州大学经济学系 77 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史晋川

这篇短文，如实地记叙了我个人在原杭州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些事情，从中能够看出沈善洪校长、薛艳庄书记和原杭州大学的领导们对一位年轻学者的关怀。

1. 进校

我是原杭州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七七级大学生，1982 年初毕业即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西方经济学（当时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1984 年 12 月毕业，回到母校杭州大学任教。

1984 年 12 月中旬，当我揣着毕业证书和毕业分配表到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社会发展处报到时，被告知分配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由于我当时填写的毕业分配志愿是到杭州大学当教师，所以就同社会发展处负责毕业分配的同志商量，要求改派去杭州大学。他们劝我说，去省社科院更好，又能做学问，又可以列入培养年轻干部的“第三梯队”。但我还是坚持要去杭州大学当教师。凭着年轻人的胆气，我拿着个人材料，在蒋自强教授的陪同下，来到了杭州大学，径直找到校长办公室。记得当时薛艳庄校长和夏越炯书记在杭大西一楼薛校长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我。当时所有的谈话在今天回想起来我只记得一句话，薛校长对我说：“杭州大学欢迎你来任教。你毕业分配改派的事情，我们一定帮你争取，你自己也要去争取。无论什么时候办好改派手续，无论什么时候你到杭州大学报到，我们都将从这个月起发给你工资，计算你的高教工龄。”

有了薛校长和夏书记的鼓励和支持，我也就有了底气，坚持要改派去杭州大学。十几天后，省里终于同意让我改派去杭州大学任教。1984年12月26日，我怀着高兴和感恩的心情到母校杭州大学人事处报到，成了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

2. 晋职

进入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任教后，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我开设了《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课程，还参与了硕士研究生专题课的讲授，并在《经济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心情十分愉快，工作热情也很高。

1986年的6月底，临近暑假的一天，系领导通知我，说新来不久的沈善洪校长和薛艳庄书记（沈校长到任后薛艳庄校长改任书记）要找我谈话。我这个人比较自信，不太会忐忑，但还是有点好奇，按时到了校长办公室。沈校长和薛书记简单地问了几句我个人的教学科研情况后，有点严肃地告诉我说，经学校研究决定，准备任命你为经济学系副系主任，分管经济学系的教学工作。老实说，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时大学中的系领导，大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和学业有成的中年副教授。他们都是我敬佩的学术前辈。我当时只是一位年仅29岁的青年助教，真能胜任副系主任的重任吗？这大概是我在大学任教后第一次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但是，在沈校长和薛书记的鼓励下，我还是愉快地在新学期上任了。1987年底，经济学系拆分为经济学系、金融系、旅游系后，学校领导又让我主持经济学系的工作，并在1992年任命我为经济学系系主任。在此期间，沈校长和许多杭州大学的领导，都在工作中给了我许多的指导和帮助。

同样，我在职称晋升过程中，继1987年评定为讲师后，1988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1年破格晋升教授。在这期间，沈校长和薛书

记，还有马裕祥副书记、谢庭藩副校长、金锵副校长、董如宾副校长等诸位学校领导和许多师长都对我十分关心，给予了许许多多的支持和帮助。我记得，1990年在参加马裕祥副书记和谢庭藩副书记主持的衢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课题研讨时，同谢副校长谈起职称晋升的事，他很爽快地说：“你不是能在《经济研究》发论文吗？你再发，我就给你升！”1989年，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出版后，国内学术界反响较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也发表了罗卫东和夏海舟撰写的长篇书评。沈校长看到后十分高兴，约我在他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详细询问了我的教学科研工作，说学校将要出台政策鼓励年轻学者在学术上冒尖，破格提升年轻学者的职称。沈校长的那次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特别是沈校长反复说的学者的生命在于学术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坚定了我走学术道路的决心。

3. 出国

从1991年开始，我萌发了十分强烈的出国留学的念头。但是，同时我自己也有点心存疑虑，“八九”政治风波对我个人的影响，会不会成为我出国留学政审中的不利因素。

思前想后了一年多，怀揣着担忧，我去找了沈校长。沈校长说，虽然省委免了你的杭州大学党委委员职务，可你还是经济系的系主任，系党总支委员，还是教授，还在继续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学校对你信任的，你出国留学做访问学者的事，应该不会受影响。沈校长的话打消了一些我的顾虑，于是我很快提出了申请。大约过了半年，学校通知我已被列入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的赴美留学资助人员候选名单，真令我喜出望外。填写了一系列表格，又通过美国来的代表的面谈后，我终于在1993年7月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从事了一年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出国前有一段小小

的插曲，有关领导找我谈话，动员我去参加1993年浙江省第一次干部“双推双考”，要我报名省教委副主任职位，我极不情愿。最后还是由沈校长和薛书记出面同有关领导解释，同意我不参加申报，使我得以如期出国学习。芝加哥大学的一年学习，使我终生受益！

我在美国学习期间，时常会碰到杭州大学的同事。好几次在大家聊天时，都会有人说起，学校里常有传闻说史晋川肯定不会回国了。尤其是1994年春节，我爱人赴美国探亲后。当时学校外事部门的一位领导半开玩笑同沈校长打赌说，史晋川和他爱人的兄弟姐妹全部都在美国或英国，现在他爱人也赴美国探亲，史晋川肯定不会回来了。据说沈校长淡淡一笑，用很平和的语气说：“史晋川会回来的。”坦率说，在美国的那段时间，我真的有过动摇，我爱人的英语比较好，在美国已找到一份工作，公司还承诺送她去培训。最后考虑权衡我们还是按期回国了。毋庸置疑，沈校长和老杭州大学的领导对我的信任，是促使我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4. 读博

美国学习期间，收获颇丰。可是，有一件常出现的事让我时时有些尴尬。在美国学习交流中，时常有人会称呼我“博士”，人家以为教授么总是博士，而我偏偏没有博士学位，只是硕士。一方面出于小小的虚荣心，另一方面确也有回国后将在美国的学习研究做一个阶段性小结的想法，我下决心准备再回复旦攻读博士学位。

我先拉上复旦的师兄姚先国教授，他当时好像是浙江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俩人一同去复旦打听博士入学考试的事。得到的是好消息，复旦大学十分欢迎我们回母校攻读博士学位，且可以免试入学攻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又赶到复旦领了一摞表格回杭填写，然后将表格呈送学校人事处各部门，一一签字盖章，送到沈校长办公桌。沈校长当时非常支持我回复旦读博士学位，可不知出于何种

考虑，也许是担心我读了博士学位后留在复旦（杭州大学当时另一位与我同去的年轻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后真留在了复旦，后来还当了复旦的系主任），大笔一挥：“同意委托培养”。复旦方面拿到表格后，看到沈校长签署的意见，想不到杭州大学领导这么大方，愿意主动给复旦送委托培养费用。但复旦也不是见钱眼开的学校，主动打电话问我：我们没说要收你培养费，你们校长为什么会签“同意委任培养”的意见？我一听急了，钱是小事，可交钱读博士对我而言是一桩极不爽的事！赶紧找到沈校长，说了一番道理，沈校长马上就重新签了意见。

复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重点项目，在《经济研究》发表了 2 篇论文，与罗卫东合作完成出版学术著作《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研究》，两年半后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我的师兄姚先国教授也拿到了复旦的录取通知书，可一直没有去复旦报到攻读博士学位，至今引为憾事。问及原故，先国兄告诉我，学校的领导不同意他去复旦读博士，理由有二：一是系主任工作忙不能再去读博士；二是浙大的教授干嘛要去复旦读博士？我听后无语，只能对先国兄表示万分同情！

[返回目录](#)

“搭伙”记事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任平

“文革”前夕，全国普遍开展“社教”运动，高校教师被指派到农村搞社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既解决农村问题，清查违法乱纪，也锻炼改造知识分子，一举两得。当时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被省委社教工作组安排去诸暨。我父亲“三同”的地方就在枫桥农村。

当时我母亲当小学校长很忙，周末才回家。我在读初中。为了解决我的吃饭问题，父亲和夏承焘先生联系了，让我在他家“搭伙”。学校有午餐，于是，每天的早餐和晚餐，我就直接到夏先生家“享用”了。几天之后我就发现，享用的不光是饭菜，还可以听夏先生说文学，谈艺术，耳濡目染一位智慧者的风采。精神的“享用”才是我最大的收穫。

当时夏先生家里有三人，除了他和游夫人之外，还有从温州老家来的亲戚一柯国庆，女孩子，应该是不到二十岁的，是待参加高考还是待参加工作我搞不清楚。菜主要是“太师母”做。其实我都是称“太先生”、“太师母”的，因为夏先生是我父亲读大学时候的老师，后来虽然多年同事，但总是老师，比我高两辈。太先生的开朗与太师母的内向恰成鲜明对照，太师母的瘦小静谧有时在人群中几乎不被人察觉，有时又特别被人察觉。柯国庆是典型的温州女孩，漂亮伶俐，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女孩，她活泼但不失稳重，很有教养。

要说夏先生家里的饭菜，一是乾淨，二是简朴。他一家都是极其爱乾淨的，窗明几净，温州人大都这样，这一点我后来去温州实习得到了证明。当然，菜不但弄得乾淨，而且绝不油腻。素食为主，

我印象当中在他家吃到的荤菜主要是带鱼和鲫鱼。太师母的简朴早有耳闻，这次也得到了印证。带鱼是红烧的，但切成的每一段大约是一至两公分，我家至少是四公分，这样，每伸一次筷子夹到的分量，就不够，小男孩也不管什么，就反覆地夹。太先生和太师母当然不会有意见，反而鼓励我多吃点。其实这个分量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尤其太师母，胃口极小。现在我倒是有体会了，年纪大了适当控制饮食，有助于健康。

那些日子“饭来张口”固然很方便很惬意，但更让我感到惬意的是与夏先生的交谈。他知道和我这样的小孩子谈学术我也不懂，但他还是把我看得比一般孩子要“有文化”一点，这让我很高兴。他知道我喜欢画画，就常常谈到他对中国画的理解，他喜欢宋元文人山水画的高逸，也喜欢明清文人花鸟画的闲情雅趣。宋词是中国诗歌中最具文人情趣的，夏先生的对书画的审美，看来与他对宋词的偏爱是暗合的。

书架上有几幅水墨花卉，尺幅不大，率意但不失笔墨趣味，构图也挺别致，我正诧异，夏先生告诉我这正是他画的。夏先生也会画画？我的惊讶进一步上升了。他说，当初在浙大龙泉分校，中文系几位教师同住在“风雨龙吟楼”，这楼名字好听，其实是破竹楼一座，当时战乱纷纭有后方这一点安宁就不错了。大家常常吟诗，偶尔也作画。我父亲受我奶奶的影响，算是会画的，但夏先生也并不输于他，只是对画梅花自认弗如。所以在夏先生的诗集里有一首《为心叔画荷》正是表达了这一意思：“事事输君到画花，墨团羞对玉槎桲，不如听我说旧梦，湖月圆时船到家。”槎桲，指梅枝。

温州人都有点艺术天分，在外地成了有成就的艺术家的不少。夏先生当时给我介绍了在杭州的几位温州籍的画家，说有的虽然是业馀的，但画得很好。在他家也碰到一位，是电力研究院的，去看过他，可惜后来也没有再联系。

有一位夏子颐先生，是夏先生的侄子，在浙江美术学院工作。第一次是在夏先生家，由夏先生介绍认识了子颐，后来我出于对艺术的狂热爱好，常常去美院看画，而夏子颐先生所在的水印版画工作室，是每次必去之处。当时叫“水印木刻车间”，在全国美术院校也是惟一的，夏子颐是创始人之一。他本来就是版画系的教师，是著名的花鸟画家。

在子颐先生的示范和说明下，我领略了“水印木刻”这一中国艺术的奇葩（今天已经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也明白了刻印的工艺是如何的不同于一般印刷，简直就是一次精心的创作！出自该“车间”的代表作潘天寿的《雁荡山花》，据说连潘老看了水印作品都以为是自己的原作。还有齐白石、吴昌硕的花鸟小品，那墨色的润化惟妙惟肖，令人叫绝。我曾经向夏子颐先生讨了几张木刻水印的小品，至今珍藏。如今，夏先生和他的这位侄子都已仙去，但美的东西还留在人们心里。

夏先生的书法，知道的人比较多，在我看来，他的字在形体上和用笔上都很像马一浮先生的，但似乎更生动更显才情，是他学问家兼诗人的气质流露。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书法的“震撼力”。“文革”中，造反派为了造革命声势，也为了让“牛鬼蛇神”自己羞辱自己，逼迫夏先生写下斗大的标语“打倒夏承焘”，并且自己贴在家门口，让过路的人都能看见。我是看见了，是竖着从他家大门顶上挂下来的。字写得很有气势，很有傲骨。

但第二天就不见了，而且再也没有被找到。当然不会是夏先生自己收起来，而是有人因喜爱而“大胆收藏”了。只是不知“花落谁家”。到了今天这标语也算是文物了。我在夏家搭伙时，夏先生为我出示过他的几幅作品，是横幅小行书，写自己的诗词。看我爱不释手，他就允诺为我书写一幅。几天后我就幸运地得到了，写的这首诗，正是前面提到的那首。

夏先生对学术问题的精见与宏论，大都在他与研究生交谈中流露。我虽然在边上听，听不太懂，但有此“熏陶”也是极大的收穫和幸运。

当时在他门下的研究生有陆坚、陈铭和施议对。隔几天就会聚在夏先生家。陆恭敬有分寸，陈儒雅而深沉，施活跃而好问，其实声调最高的还是夏先生，并且无拘无束，时有爽朗的大笑，将现场的气氛搞得很融洽。

那天是周末吧，人都到齐了，我闻说有“节目”，便也在饭后溜了一圈后又回到夏家，见已经济济一堂。夏先生正经八百地宣告今天要做一个“智力测验”或者说“智力游戏”，并且有柯国庆担任裁判兼司仪。他说，你们中任何一位，在我不在现场时指点房间里的任何一样东西，等我回来时就能够知道你点的是什麼。于是他就到隔壁房间里去并且将门锁上。大家默不作声，有一位学生就点了墙上一幅书法上的某一个字。里面说：“好了吗？”夏先生就出来，东看看西看看，大家也都用狐疑的目光跟随他。几分钟后就走到那幅书法前，准确无误地指出那个字。

太神奇了！

他在其他房间里是看不见也听不到任何动静的，怎么会猜得如此准？这时夏先生神秘兮兮地说现在有人在研究感应之类的事，具体也不清楚。大家不罢休，说再试试。于是又点了几次，居然次次不差。弄得大家认为夏先生确有能够感应的特异功能了。于是又喝茶，吃水果，气氛缓和了但诧异仍然迴盪在每人心里。

夜阑人将散去，夏先生却在送客之时微笑宣布，将揭开谜底。原来事情极其简单，只不过用了个障眼法。在大家注意夏先生时，柯国庆已经点了一下那个目标，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发生，谁都不会去注意柯国庆，但夏先生注意了也记住了。事情说破了，自

然没有任何“感应”和“特异”，但大家体悟到的是，这带来了欢乐和轻松，这是夏先生的智慧和美意。

夏先生晚年长期住在北京，后来的夫人无闻先生照顾他并且整理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和诗词作品，据说最后那几年里记忆基本失去，有时昏迷，但在昏迷中常常念叨的一个名字是“心叔”，就是我父亲，可见他们之间感情至深。

蒋礼鸿先生告诉我，夏先生当年研究姜夔和宋词音韵，就曾让我父亲写过两篇文章，并以“缪大年”笔名发表。当时我父亲遭“反右”之祸，降职降薪，连用真名发表论文都受阻碍。夏先生这么做，一方面是看重我父亲在音韵方面的学术专长，希望不要荒废，一方面也是想让父亲挣点稿费贴补家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去千岛湖，特地嘱咐朋友将船驶到有夏先生墓的那个岛上。墓地很清洁，犹如我印象中他的家。在松柏环绕的夏先生的塑像前，我鞠了躬，当然，当时想到的是比“搭伙”更多的事。

注：原载香港《大公报》

[返回目录](#)

搭伙记

——杭州大学数学系函授生蒋遂

挚友任平有一篇《“搭伙”记事》刊登在香港《大公报》上。该文记叙了文革前，他父亲任铭善先生去浙江诸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杭大中文系教师大多去搞“社教”，我的父母蒋礼鸿、盛静霞也在其中。）任平母亲马素娥女士在杭州一所小学做校长，忙于工作只有周末才回家。任平的吃饭成了问题，于是任先生马老师将任平托付到夏承焘先生家“搭伙”。

此文勾起我相似的回忆，这个时候我也被托付到中文系蒋祖怡先生家“搭伙”，非但搭伙，而且还是寄存！再后来，由于学校搬迁，中午吃饭路太远，我还到任平家搭过伙。

我的父母亲参加“社教”应该是1963年，他们俩分派到浙江金华磐安农村和绍兴柯桥农村。至于谁在磐安，谁在柯桥已记不清了，只觉得他们下农村是家常便饭，正常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也不搞了，学生也一起到农村去了。

就这样，我们姐弟俩吃饭也成了问题。老杭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不但学术上相互切磋，而且情感上也很融洽，于是父母把我托付给同是道古桥宿舍邻居的中文系副系主任蒋祖怡先生家，把姐姐托付给中文系陆维钊先生家。（陆先生不久后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院）

我到祖怡先生家，不但搭伙，也睡在他家。祖怡先生上有老母，下有五个子女，依次为：绍惠、绍愚、绍恣、绍忠、绍心。蒋妈妈操持家务。祖怡先生也去农村搞“社教”，绍惠、绍愚求学去了北京，家里只有奶奶、蒋妈妈和恣、忠、心三位子女。63年还是大饥荒的年代，蒋妈妈为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动足了脑筋。她把小河边茭

藕的块经取来，滤出淀粉做成“藕粉”，把我和绍心从黄龙洞后山打下来的毛栗果磨成粉做“米糕”。每天早上，她用一個旧信封装半袋炒米粉，加一瓢糖，给我和绍心用来课间充饥。有时候运气好，蒋妈妈弄来一些极小的“猫鱼儿”，在油里干炸给我们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慈样的奶奶、祖怡先生、蒋妈妈早已过世，这有趣的条幅还常常在我梦里晃动，我常常想，我身上尚且残留的一点“土”气，是不是和祖怡先生家的“猫鱼儿”有关？

紧接着 1963 年下半年，我就学的杭师附小（现文三小学所在地），在文三街、文二街之间的求智巷，建起小学“本部”（现学军小学所在地）。我升入五年级后搬到本部。这样一来，上学的距离远了，常常会迟到。记得为上学不迟到，冬天天朦朦亮就上路，有时星光还未隐去。中午回家吃饭，也是紧赶慢赶，很难吃上一口囫囵饭。父母心疼我，就和家住河东宿舍（现文三新村）的任铭善先生商量，让我中午在他家搭伙。自然是没有问题！

其实任平家原来也是在道古桥宿舍，他家在六幢二号，我家在五幢四号，透过我家后窗，可以看到他家，开了后门去他家更方便。我们两家的友谊可以追述到三十年代。抗战前，我父亲和心叔先生（任先生字）同在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读书，心叔先生早我父亲两年入学。两人同样的先生，搞同一种学问。任先生铁骨铮铮，从不人云亦云，是极有学识和人品之人。49 年以后，受当局赏识，被派到华东革大深造，又被任命为浙江师范学院副教务长。正当任先生以为可以在新时代大干一场，报效国家的时候，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是年，45 岁年富力强的心叔先生，却拖着人力车，将刚入住六幢二号的家，搬去河东宿舍的两居室（六幢二号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

待到我去心叔先生家搭伙时，那顶“右派”帽子虽已摘除，境况未有多大改善。我每天去搭伙，任平母亲马素娥老师都不在家

（她在“城里”一所小学任教），吃饭时只有任先生父亲和一位老保姆屠妈。任先生吃饭不苟言笑，有时候默默地在我碗里夹几筷子菜。屠妈烧的菜清新可口，以素为主。至今和祖怡先生家“猫鱼儿”一样映象深刻的菜是“螺狮”。任平还不忘在一傍解释：“螺狮是穷人的荤菜。”至今想起来任先生这样杰出的学者，沦落为“穷人”叫人如何不伤怀？1959年，周恩来确定要重编《辞海》，任先生“带帽”参加编辑，被誉为解决问题的“两把刀子”，另一把是我父亲。

那位屠妈，原本杭州人氏，有后辈。看到任先生一家遭此横祸，甘心情愿留在任先生家照顾起居，且不要一文钱的报酬。这位无甚文化的善良老太太，她身上闪耀的传统文化光芒，令我无地自容，且不要鄙视传统。在任先生家搭伙的经历，随着这些住在道古桥宿舍子女的父母聘请老杭大职工李承德夫人王大妈，集体送饭嘎然而止。

[返回目录](#)

蒋炳贤先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第一次见到蒋先生，是在外语楼一楼男厕所。当时应该是一或大二。下课后，与几个同学上厕所，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拿着一把竹丝扫帚在打扫男厕所。经历文革的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位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问了别人，知道他是老教授蒋斌贤先生。

再次见到蒋先生，是在外语 77 快班上。快班学生，有的水平很高，看的书比一般老师还多还新，在课堂上经常引经据典，问得老师一筹莫展。因此，隔三差五，就换老师。后来终于请出蒋炳贤先生。也许是想看看快班学生的水平，以便因材施教，第一堂课，蒋先生就布置大家用英语写一篇 200 字的作文。可惜当年没能理解蒋先生用心，自以为是，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第二堂课，蒋先生把我的作文拎出来，作为“范文”，批评了一番。三十多年后回想起，方领悟：言不在多，达意则灵。限定字数，可以看出学生遣辞用句能力，以及构思是否严谨。

读研后，常常聆听蒋先生教诲。先生已经高龄，身体欠佳，依然非常敬业。上课时，讲解一段文章后，不时要停下来“呼呼”地吹气。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真正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当年英语专业研究生没有统一教材，都是教授们自己编纂。从蒋先生的选材中可以看出，耄老之年，继续跟踪世界学术前沿。蒋先生主讲英美文学，不局限于传统的文艺批评理论，让我首次接触到文体学。

几年后，我去美国蒙大拿大学做访问学者，看到有一份国际学术期刊《语言与风格》（Language and Styl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便把一份在蒋先生课上写的学期论文投稿过去，马上被录用。这得归功于蒋先生的教诲，学术敏感性，研究多元化。

我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兼任外语系研究生秘书，不时会去蒋先生家问候。一次，蒋师母问我，是否认识某某某，我说她是我妹妹。蒋先生和师母都格外高兴，因为他们和我妹妹的公公——中文系的蒋祖怡先生——是老朋友，一种亲上加亲的感觉油然而生。

再后来，我出了国。一穷二白，边打工边修课，十年之后，才第一次回杭。蒋先生已经走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敬业精神，永存我脑海心间。

陈立校长签名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级研究生金友元

1984 年的一个冬日，为求陈立校长在结婚申请书上签个字，我在校长办公室外的走廊上等了近三个小时。天寒地冻，弄堂风夹着雪花扑面而来，冻得骨头生痛。此情此景，恍似昨天，但我和拙荆结褵已经三十三年了！

这么多年风雨同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对。三十三年是斑岩婚，意味着婚姻已经进入坚实期，如同磐石。

[返回目录](#)

忆吴熊和先生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孙敏强

今天，我们在这里追思缅怀敬爱的吴熊和先生。

50 多年来，吴先生为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词学的教学和科研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才情。作为“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的卓越传人，吴先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痛失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长者，是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一个重大损失。吴先生高尚的道德风范，卓越的词学成就和崇高的学术地位，有目共睹，众口皆碑。学校、院系领导对吴先生所作的高度和全面的评价，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全体同仁的心声。

得知吴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心里非常难过，立即将此发在大学同学群里。同学们纷纷表达哀思悼念之情。我们这一届同学，和以后 78、79 级同学一样，都是从艰难时世中走过来的。同学们之间，同学与老师们之间有着一份更为特殊的情感。今天，我们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十位同学也来了，不仅仅是作为个人，也是代表全年级同学们来的。感谢历史的机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这一群学子得以在杭大中文系聆听一代大师们的教诲。经过不能好好教书、不得好好读书的十年动乱，我们的先生们正当盛年或金秋，一旦除、减禁锢，便才情横溢，翱翔奋飞，在辛勤笔耕的同时，亟思为社会好好培养人才，而我们同级一百四十一位同学也多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师生相得，那是怎样美好的一段时光啊！在我心目中，那是最好的大学课堂。是吴先生和所有敬爱的先生们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与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给我们的是足以影响一生的震撼、感动和濡染。能够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得到诸多著名学者的传授，是我们一生的幸运。

初见吴先生，高高的个子，飘逸的板书。没有讲稿，也无须看讲稿，就那样从敦煌曲子词一路娓娓道来。条理井然，挥洒自如，引人入胜。讲解诗人词作，总是确考时地，旁征博引，对于诗人当时的遭际境遇，创作动机，审美境界与人生精神、人格魅力，乃至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作全方位的把握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梳理与辨析。阐释过程深入浅出，而皆有来历；结论常发人深思，而无可移易。比如讲到吴文英词，前人张炎在《词源》中有著名的断语：“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吴先生不这样认为，他着眼于吴梦窗词所创构的“七宝楼台”所含的内在神理。吴梦窗词多为长调，情思脉络与结构非常独特，读他的词自然要换一种角度和眼光。吴先生作了非常精彩深至的解析，给我们的启示，远在梦窗词之外。

吴先生讲授苏轼诗词的情景，成为我印象中最经典最有感染力的画面。先生向我们解说苏子其人，上可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而不骄。新党上台，他忧虑民生而对某些新法提出批评，旧党执政，他又对当局尽废新法表达不同的意见，他详细介绍乌台诗案和苏子坎坷的迁谪之路。先生吟诵讲解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开篇时，声音不显高亢，而自有一种沉雄慷慨的气概，至“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抑扬低回，有无尽的韵致。先生曾引王灼《碧鸡漫志》中的话：“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先生之于后学晚辈，又何尝不是如此。也是从那时候起，苏东坡便成为我最喜爱的诗人。我一直认为，我是通过吴先生走近了苏东坡，又通过苏东坡，走近吴先生。苏子那诗意的理性和清醒的迷醉，使他有着特殊的人格魅力。我心目中的吴先生也是如此。“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子这样从容面对人生风雨，吴先生也这样面对疾病与生死。

这段时间以来，不时回想着 30 多年来吴先生给我留下的点点滴滴的记忆。

先生是诗人，也是大学者，他之与读书学问，有着别样的情怀。每每在挥洒谈笑中，言及于此，先生会特别的专注和认真。听前辈老师讲过关于吴先生年轻时的轶事：一边晃着女儿的摇篮，一边手不释卷，阅读沉思。慈爱的父亲和专注的学者，是吴先生的一个有意味的剪影。我们读大学时，杭州大学中文系在下宁桥，现在的省总工会干校内，毕业前夕，1982 年 1 月 11 日，我在中文系办公楼前碰到吴先生，想请他给我题词作为本科毕业留念。我打开同学录前页，恭恭敬敬呈递给他，他接过来，没有在前面落笔，而是翻看到后面部分，才写上：“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与敏强同志共勉。”那不仅涉于为学，也关乎人生，先生的神情动作，无言之中，有殷殷的勉励与期待，亦有一种宽厚与谦牧的风度。我有幸，在本科和研究生两个阶段都得以聆听吴先生授课。吴先生无论是课堂授课，平时交谈，还是作为系主任召集会议，从来不提高声调音量，更没有声色俱厉的时候，然肃穆的神情中总是蕴含着祥和的暖意，而恬淡平易之中亦自有长者的威严。作为系主任，吴先生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发展，尤其是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他组织青年教师论文报告会，亲自审阅青年教师提交的论文，写出详细的修改意见。有一次，在东一教学楼中文系会议室外面过道上，他叫住我，谈我提交的论文，说再好好修改一下，会是一篇不错的论文。先生于学，强调文史互证，主张文史哲打通，他自己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也正因为如此，吴先生能把苏氏的深情、理趣、才情与人生经历演绎得如此准确、微妙、深透和精彩。那次我和含松、明初去探望吴先生，尽管病魔折磨着他，先生却依然那样从容平和，他说：“你们忙，不必来看我。”与病痛搏斗十余年，面对病魔，面对生死，我们知道，先生是如此从容和顽强。

他立下遗嘱，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入而能出，深情而又达观，吴先生的为人行事总是显现出理性的高贵和光辉。在他身上，知与行、学术与审美、文学与人生是融而为一的。

11月5日周一上午上课，我为学生们转授吴先生对苏词《八声甘州》的评析，以寄托对先生的哀悼和怀念。“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想起吴先生讲授此词的情景。我起念考研究生，是缘于徐先生的鼓励；读古代文论、毕业留校，是受了祖怡师的栽培；喜欢苏东坡，是受到吴先生的影响。我是如此幸运，在生命历程中遇到那么多温暖、陶冶、影响过我的可敬的先生，那样的恩情永在我心。常常想起可敬的蒋礼鸿先生讲授《敦煌变文词语通释》的情景，和他最后的遗言。常常想起郭在贻先生匆匆赶路的身影，他数次专程从道古桥赶到文二街那边，为我们自发组织的《楚辞》兴趣小组义务讲授，人到中年以后诸事鞅掌，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惜时如金的郭先生对学生的无私、忘我、慷慨和盛德！常常想起郑择魁先生说过的话“我奉献了身内的青春，但身外的青春常在。”岁月有情，时光无情，现在，吴先生又离开了我们，又一次叫我们黯然伤神。

先生已矣，百身莫赎。我们不能唤回长者越行越远的身影，只能用拙笔记下雪泥鸿爪般的往事与随想，来寄托对给予我们关爱、知识和珍贵记忆的先生的哀思与怀念。我们也唯有继承吴先生和前辈学者求真务实的学风、教书育人的风范，才能让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薪尽火传，传于永久。“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吴先生为我们讲授《和子由澠池怀旧》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先生启人心智的教诲，微笑的神情，和带吴方言口音的话语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正像先生曾经评析此诗时说的那样：“这些清清楚楚留在雪泥上斑斑可见的鸿雁爪痕，都是他们漫长旅程中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生阶段。它们记录了自己

的人生经历，包含着许多令人难忘的前尘往事，值得人们珍惜、回味与怀念。”这也正是我们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原因和心情。

苏子《八声甘州》词中用羊昙醉过南京西州门，怀念舅舅谢安恸哭而去的故事。从此，西兴浦口，我也无法忘情于自己的西州之门。雪泥鸿爪，这著名的诗句和比喻，是年轻的诗人在彻悟人生命理的同时，深深眷念往事亲情，不能忘情世事的表征。当我们又一次送别长者的时候，眼前展现的是漫漫长路和斑斑行迹，心头浮现的是先贤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珍贵记忆，那一切，与我们的人生轨迹、心灵图像和生命情感息息相关。谨以这些文字，铭记和感谢师恩！再一次哀悼和纪念吴先生和我们所有逝去的可敬的先生！

吴先生的精神永在。吴先生千古！吴先生安息！

最后，谨拟一联，敬挽吴先生：

文明以健综赅唐宋慧眼词心学林著誉
风穆而清泽化芝兰春华秋实后世流芳

（此文为笔者在吴熊和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2012年11月25日）

[返回目录](#)

怀念敬爱的老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孙敏强

曾经一次又一次在心中默默送别自己敬爱的老师，又一个清明节即将来到，那是我们民族怀念逝者的特殊节日，我们不能唤回长者们越行越远的身影，便只能用拙笔记下雪泥鸿爪般的往事与随想，来寄托我们对给予我们关爱、知识和珍贵记忆的先生们的哀思与怀念。

还记得为撰写毕业论文前去请教指导老师而第一次走进祖怡师家的情景。那是大四时一个秋日有阳光的下午，当时的我，是一个从物质与精神都十分贫乏的年代，从一座江南小镇刚刚走出来不久的怯生生的青年，而先生则是早在解放前就已在文学创作与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知名学者。先生亲切地接待了我，从此，我的生命中就有了一位博学的导师和和蔼的长者。在一座还不无陌生感的城市里，有一位亲人般关怀自己的睿智老人，而自己也如儿女般牵挂着他，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幸运和缘分。一直到我毕业留校，娶妻生子，先生的家依然是我无拘无束、倍感温馨的所在，去蒋先生爷爷家，曾是我牙牙学语的稚子一件很开心的事。

我生也晚，未及见到先生风华正茂的时候。我见到的先生，已是饱受迫害，劫后余生。两度中风，半身不遂。高度近视与白内障，使先生执卷握笔，至为不易，更兼旧稿资料被抄散失，这一切给先生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在世界文明史上，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常常是最具有创造性和建设力，并已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的，但是，我们的兄长一辈的青春年华，和我们的父辈，当时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一代人的黄金时代，被无谓地点燃起来的有害国本的“文革”熊熊大火所消耗，绿色的春天和金色的秋天相燃耗，

这是共和国的悲剧和重大损失，也是先生至为痛惜的。然而，一向坚毅倔强的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伏枥老骥心尚壮”（祖怡师《劫后抒怀赠友人》）的精神，笔耕不止，诲人不倦。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龙论丛》、《锺嵘诗品笺证》等六部著作，赢得了学术生涯中又一个金秋季节。那些著作是先生以残病之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啊！

从先生游十余年，最难忘的是先生的微笑，那经历坎坷与忧患以后的微笑，那源于生命和心性中的宽厚和仁爱、如春风般和煦的长者的微笑，是特别令人感动的；还有，就是先生书桌案头橙黄色的灯光，晚上或阴雨天，先生的台灯总是亮着的，他总是在灯下拿着那柄放大镜，或是眼睛凑得很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书，要不就是在纸上摸索着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着。一直到92年初辞世前不久，先生还十分艰难地为他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话辞典》作序。在我的心目中，先生的微笑和燃亮着的灯光，辉映为先生生命中灿烂的晚霞，并成为我生命中永久的记忆。我敬重先生，敬重先生的为人及其所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精神，那完全是基于自由精神和平等人格的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我所难忘的还有郭在贻先生，记得读大三期间，我们几个同学自发组织了学习《楚辞》的兴趣小组，请郭先生做我们的辅导老师，郭先生欣然应允，每周课外义务为我们讲授。当时的杭大中文系在文二街那边，有时先生专程赶来，来回就要个把小时。现在我也已人近中年，工作和家务，常有诸事鞅掌，令我疲于应付的时候，想起那时郭先生匆匆赶路的身影，我才真真切切地理解和感受到惜时如金的郭先生对学生的无私、忘我、慷慨和盛德！每当想起在艰苦的条件下超负荷工作而英年早逝的先生，心里就非常难过。难忘郭先生以浓郁的山东口音讲述做学问“其乐无穷”的高峰体验，难忘

先生给我们讲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精神。先生正是以这样执着的人生精神，在训诂学理论和古汉语考证中默默地坚守着、耕耘着。当他离去的时候，他芬芳的园地里已开满鲜花。

同样，我也忘不了可敬的蒋礼鸿先生，他为我们上过校勘目录学，此外我没有很多机会聆听先生的教诲。但先生以他反复修订补充的开山之作《敦煌变文词语通释》，和将自己遗体献给医学事业的最后遗嘱，向我们后人阐释和昭示着生命的意义和崇高纯洁的精神品格。先生奉献了一切，他的风范长留人间，使一切的精心算计和蝇营狗苟显得苍白、无聊和荒唐。

去年二月，郑择魁先生溘然长逝，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良师。是郑先生，以他精彩而深刻的讲授引领我们走近一代文学大师的精神境界，去读懂鲁迅先生作品中所揭示的洁白后面的罪恶，和罪恶后面真正的洁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也是我们许多敬爱的先生共同的精神品质。1983年，祖怡师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影印重版的他父亲伯潜先生所著《十三经概论》而写的引言中，叙述了1942年他们父子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拘捕一天两夜，受到严刑逼供，而一言不发的情景，令人肃然起敬。我想：无论是在战乱、动乱的时期，还是在和平的年代，在无涯的学海中百折不挠、艰苦跋涉、拼搏一生的先生们不仅具有鲁迅先生上联的那种风骨精神，而且也以他们作为人师默默奉献的生命历程实践着下联的精神。郑先生在发表于1988年9月10日《杭州大学报》的文章中写道：“我奉献了身内的青春，但身外的青春常在。”这也代表了许多可敬的生辈们共同的心声。

我想说，这也同样代表了我们的的心声。在我们的生命和人生精神中，不绝如缕地延续着先辈们的生命与精神，尽管，不肖如我，没有能作出许多成绩来告慰先生们，而纷纷扬扬的粉笔灰也迟早要

悄悄地将我的头发染成秋霜，但我觉得无愧于先生们和自己的，我一直在努力，一直真诚地面对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的亲人、朋友、同事和自己。

岁末年初，我们又送别了和蔼可亲的吕漠野先生。我的眼前，有时会浮现出一位位先生那熟悉的微笑与身影，我的心头，有时也会有莫名的忧伤袭来。是的，先生们的事业和精神，自有我们后人来继承和延续，但是，当一位又一位长者远去的时候，那也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是亲爱的先生们，以他们和煦的微笑和灿烂的生命，辉映、滋养和对应着我们的生命，息息相通，痛痒相关地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当祖怡师远归道山的时候，我曾默默地在寒风中伫立和流泪，回想那从此只能作为记忆而存在的如沐春风的情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长歌当哭，当在痛定思痛之后。”我暗暗告诉自己，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一定要写一点纪念先生的文字，我要用时间去丈量师生之间的情谊所能达到的长度。但现在还不到十年，当一个又一个损失和痛苦接踵而来，累积和重压在我的心头的时候，我只能提前草草地写下这样的文字，作为对先生的一点纪念，以宽解我自己的心，而那美好的回忆，也将伴随我的一生。

曾经独自去探望酣眠中的徐朔方（步奎）先生，默默祝祷他能醒来。哪知春节刚过，却传来先生溘然长逝的噩耗。2月27日，是送别徐先生的日子，而我已远在异国。遥望南天，眼前浮现的是西子湖畔新绿的杨柳，心头浮现的是“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的诗句。先生的乡音犹在耳边，先生在天堂的微笑也一如往昔吧！

不由得想起大二时先生给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些细节和场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是讲授的重点之一，先生逐句逐段诵读讲解。文中写道：“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

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在古诗文名篇中，自述行文及于生活琐屑，似近乎不雅者，实属少见。而且嵇康是竹林七贤和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其为人爽朗清举，萧萧如松下风。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喟然叹息：“广陵散於今绝矣！”他的形象和“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诗句，与“胞中略转”诸语似乎存在不可思议的距离和反差。所以在预习时，我不太理解，甚而有所忽略。先生却花了不少时间加以详解，要我们了解绝交书的背景，读鲁迅先生的有关文章，思考其字里行间忧愤的情思。他从表面毁坏礼教，实则相信礼教，说到大俗大雅，放胆为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说来十分惭愧，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更由于自己读书少，因此存有一种简单的思维定势，一读绝交书，就鄙视山涛。先生的启发，使我再去阅读《晋书·山涛传》等有关文献，始知山涛与嵇康友情之深厚，全然超出我们想象。“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这样的品鉴和称誉，正出自山涛；嵇康临终前，“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后来山涛果然如父执般关爱善待嵇绍。可见，山涛于嵇康，是毫无保留地赞赏和倾慕；嵇康于山涛，心意相通，有着可以托孤的信赖。叔夜嬉笑怒骂的辛辣笔调，表现出的是对司马氏集团的最大蔑视。他锐利的笔锋所向的其实并非山涛，书面的绝交也并非真的割袍断义，划地绝交。社会需要勇于并且能够有所担当之士，如山巨源；也应该有不受羁勒，孤标独特之人，如嵇叔夜。前者未必不高洁，后者有时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担当。两者之间也并不形若水火仇讎，而是可以为知己为挚友的。徐先生在大四时给我们开过“英国诗歌选”的选修课，是用英文文本，以英语为主来讲解的，先生印发的讲义我珍藏至今。他对中外文学名著的解说，既揆诸历史实际的语境背景，又返求当下即刻的人情物理。他的教诲和

启发，不仅让我们学会怎样读书，怎样解读文本，而且对于自己思想的启蒙，情感的丰富和审美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使我们知道读书不该是沦于工具理性的技术操作，而应滋养自己的心性。徐先生上课时不苟言笑，言简意赅，没有多余的话，是我们最敬畏的一位老师。有次上自修课，我在看《清诗话》时遇到问题，就贸然问前来辅导自修的先生，他只说了四个字：“我不知道。”我思量许久，自省是否问题太幼稚？该好好去找资料，动脑筋。比这更重要的是，这四个字足以让我铭记一生，教我实实在在做人，老老实实读书，坦坦荡荡，没有负担。

那个学期先生给我们布置的期中论文是关于陶渊明的。一次上课时，先生说：同学们的作业我都看过了，我要请十位同学站起来。随着他一一点名，同学们一个个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先生说：你们七级学生是我所教过的历届中最好的一届学生，这十位同学的作业都可以打95分以上的。二十八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一刻，因为我以一篇《说悠然》忝列其中，从而增添了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和信心，我今天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工作，是与那一刻分不开的。令我永怀师恩。碰到老同学，谈及此事，也都难忘当时的情景。行文至此，又想起徐先生那熟悉的声音，让人油然而生“广陵散於今绝矣”的感叹。

“人生到处知何事，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著名的诗句，是年轻的诗人在彻悟人生命理的同时，深深眷念往事亲情，不能忘情世事的表征。当我们又一次送别长者的时候，眼前展现的是漫漫长路和斑斑行迹，心头浮现的是先贤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雪泥鸿爪，那一切，与我们的人生轨迹和心灵图像息息相关。谨以这些文字，铭记和感谢师恩！再一次哀悼和纪念我们逝去的所有可敬的先生们！

（草于2007年2月27日，3月12日、21日修改）

[返回目录](#)

Jeskie 教授和毛昭晰教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胡波

大学期间有两位老师留给自己的印象很深。一位是美国人 Jeskie 教授，一位是毛昭晰教授。

记得到了大四，系里恐怕找不到合适的教材，干脆让这位外聘教授给我们上英美诗歌赏析。Jeskie 是芝加哥大学的文学教授，在诗歌、音乐、绘画等方面都相当有造诣，在老外里面也属于“之乎者也”之类；加之他老兄挑选的诗文多为“古典”文学作品，其中不少艰涩难懂。尽管他讲课时非常投入，入情入景，那时的我还是难免被他说的如雾里看花，不知所云。过了几十年后，才发现并非全然如此。话说女儿到了小学高年级，经常有些英语诗歌赏析作业。一日她回来抱怨说，没兴趣，不知好在哪里。我说你不能像读 C. S. Lewis 小说那样，里面时时处处有引人入胜情节（C. S. Lewis 为英国著名作家，其代表作有“Tales of Narnia” - 作者注）。好的诗歌会给你鲜活的“意象”（images），当你闭上眼睛时，脑海里会呈现出生动的画面。从那以后，她真的每每读完诗歌后，都煞有介事闭上双眼。渐渐地，培养起了这方面的兴趣。这事还要归功于老 J。是他教给我这些赏析诗歌的入门要领。

另一位是毛昭晰教授。毛教授并非外语系的教师（好像是历史系）。我认识他是在一次学生会主办的西方音乐欣赏会上。70 年代末不比现在，学校组织的娱乐活动非常有限，对个人的私生活又有诸多限制（记得学生间谈恋爱组织都会出面干涉），猛丁冒出一个西洋音乐欣赏会的确感到又新鲜又好奇。毛教授选的哪些具体曲目记不确切了（但肯定有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但是他的个性，他的激情，还有他跟新一代大学生的情感互动，无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我觉得他和许多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棱角打磨掉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多年后曾听同年级毛冀刚兄谈起他父亲在政协任上，曾为文物保护之事和有关部门大动肝火而伤及身体一事。中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值得庆幸的。

（写于 2007 年）

[返回目录](#)

拜访商亚南老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2008 年 10 月 15 日下午，陶宗德陪我前往杭大看望商亚南老师。

商老师打开门，看见我们，问道：“还有一个呢？”我说：“谁呀？”商老师说：“高丹非啊。”忙解释，丹非正在凯悦饭店作同声传译呢。

商老师刚乔迁新居，地上还堆着一箱箱未打开的书。两室一厅，一百多平米。主卧室朝南，举眼望去，保俶塔清晰可见。

说是新居，家俱都是原来的。每件家俱都见证了过去的时光，寄托着无尽的思念。

一只镂空木箱，以前上面摆着电视机，很少打开。如今如释重负，展现出古雅的真面目。宗德说，价值连城啊。

睹物思情，亲情无价。生活在旧物之中，宛如亲人环顾。

商老师咬了一口宗德带来的山东蜜枣，问哪儿买的？又甜又脆。宗德说是最上等的。

拜访期间，商老师掏出钱给宗德，原来是宗德替商老师买的电话机。可宗德不收。出钱出力，敬师之情，尽在不言中。

[返回目录](#)

缅怀商亚南老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叶子南

2017 年 11 月 7 日早上，我在蒙特雷海湾旅馆刚醒，就在手机上看到之光在我们五人群里发的消息：商亚南老师今晨驾鹤西去。我急忙微信通知忆平，她说 77 外语群里没有这个消息，但之光怎能开这种玩笑，尽管我多么希望这只是玩笑。

我们一进杭大就感受到商老师。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她班里的学生，但每一个人都透过任课老师感受到她的化雨春风。我们的每一次测验，每一次考试都映射出那几位任课老师的责任，以及负责年级教学的商老师之心血。一个介词、一个冠词、一个连接词，都是老师们紧抓不放的教学重点，就是这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技能，这些大学者看不上的小知识，练就了我们这批杭大外语人的基本功。

当时好像没有班主任这一说，但是精读老师实际上就和班主任差不多。与其他老师比，精读老师与学生的接触更多，因为上的课更多。我有幸在三年级时聆听过商老师的精读课。她上课态度之认真，业务之娴熟，发音之标准，她的学生应该都有所感受。每个新词词义，每个语法概念都讲得清清楚楚。但是商老师并不像有些老师那样，会和学生海阔天空地闲聊学习之外的事。她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总把握着一个分寸，这到底是职业规范使然，还是性格所致，我当时不知道，因此在我心中商老师是敬畏多于亲切。这种距离感直到多年后才消失。

毕业后我们搬到了杭大河南教工宿舍 25 幢。商老师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小区，就在紧靠西溪路那幢宿舍，住最右侧门洞的一楼。八十年代有一段时期，我常在傍晚散步到商老师家中小坐。就是在那段时间，商老师在我眼中的威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恰恰是学生时

代难得一见的和蔼可亲。我记得夏天去的时候，她会亲自为我去切西瓜，然后坐下来和我闲聊。我一开始有些拘束，但她绝不会让交谈冷场，若有空隙，她总会提出一个话题。我问她，退休在家常干什么，她说还是喜欢看看书，过去教学忙，很多想看的书没时间看，现在就可以补上。那次她手中就拿着一本小说，我记得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她说是重读，却有新意。就这样慢慢地我对她的敬虽犹在，但畏已全无。到美国后，与商老师的关系中断了很长时期。后来大概是忆平提议，我们设法又和商老师联系上了。记得有次过年打电话给她，她清脆的声音真和当年无异，话音里透着愉快的心情，也不乏满足的心境。也是，一个人并非在独处时就孤独，精神世界丰满的人，总会有历史人物或文学角色与之对话。

既然可以“结庐在人境，不闻车马喧”，那就照样会有人在幽居中品味人生的乐趣，用孤独来形容这位长者并不很合适。又有一次忆平去看望她，看她在家中弹钢琴，听她说学琴的体会，那真是“人生始于八十”的一个绝佳典范。

我们这个时代总把伟大这一头衔赠给政治家或与时事风潮相关的人士，所以教师获此殊荣的很少，即便有，大都也是那些与风云搅和在一起的人物。但是真正在教室里手把手为学生改错，传授基本知识的人不是更配“伟大”这一称号吗？写至此，实在忍不住要借题发挥，针砭时事。时下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的好老师我们到底还能找到几个？洋洋洒洒的艰深文字毕竟对嗷嗷待哺的学生用处不大。文章固然要做，但是投入在科研上的精力是否也该往教学那边拨过去一点呢？出色的老师什么时候都是“珍品”，但满足教师基本职责的人不是应该像漫山遍野的蒲公英那样比比皆是才对吗？可现在，基本“达标”已难能可贵，像商老师那样的“花魁”就更是难得一见了。

商老师走了，走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人事有代谢，此时我又想起了《圣经》中的那句名言：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thing: a time to be born and a time to die。无论谈生，还是言死，商老师都堪称精彩。让我们也把余生活得精彩些吧！

（2017年11月15日于硅谷）

[返回目录](#)

商亚南老师轶事二、三则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戚志红



儿时我家在杭大河南宿舍，与商老师住的那栋楼前后相望。因和她女儿邬晓阳从幼儿园起作了十来年同学（并不总是同班），小时候也常去她家玩。但我 1985 年来美国后便与她们失去了联系。商老师去世的消息还是老母亲去年十一月份在越洋电话中告诉我的。他们夫妇与我父母早在之江大学时代就是同事（虽然不同行）和邻居，也有共同的信仰。

邬老师较早驾鹤西去。国门打开后，晓阳和弟弟相继在太平洋彼岸立业安家。儿女曾分别邀请母亲到美国同住，商老师住了一阵子后感觉不习惯，便选择回国独居。她基本自理晚年的生活，只请了一位钟点工帮忙做些重活。

晚年的商老师对于基督信仰更加孜孜以求，也积极服侍教会肢体。搬迁到杭大校内的启真名苑后，她曾开放自己的住所，定期召集邻近的老年基督徒在一起研读《圣经》。可惜后来遭到干预，设在商老师家的查经班不得已解散了。

去年深秋的一日，商老师不慎跌倒在地。由于没有亲人在近旁，当时由一位邻居家的保姆用轮椅推着，走了两站公交车程去同德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对她说，“没断骨头，回去慢慢疗养吧！”事实上商老师这一跤造成了严重内伤。不久之后的一天，钟点工早

晨开门进去，发现商老师床边的地上满是呕吐物，而她已永远熟睡了。

得知商老师突然离世之原因及情景，恐怕无人不痛惜扼腕。

虽然我对商老师不甚了解，但从诸多“旁证” - 包括叶子南等同学的观察 - 看得出商老师晚年独自一人仍心态乐观，生活丰富多彩。我曾近距离接触过一些信仰纯正而坚定的基督徒，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所属，即使在孤寂和患难之中仍有平安；他们知道自己人生目的，于是努力荣神益人；他们热爱生活，却对死亡无所畏惧，因为有永生的荣耀盼望。于是我相信：直至在地上旅途的尽头，商老师都有她一生信靠之主的安慰与陪伴。

写到这里，想起年初从这个群里下载过一张商老师的照片，找出来仔细端详。见这位丝发如雪、优雅睿智的老人仿佛面带微笑遥望天家，不禁从心底感动：商老师分明是在印证我的判断！

（2018年1月28日写于美国芝加哥南郊）

[返回目录](#)

追思恩师陈义镛教授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朱东卫

痛悉导师陈义镛教授逝世，万般思念涌上心头。

我是七七级杭大化学系的，毕业即考入陈义镛教授师门，是陈老师的第二个硕士研究生。我出国三十余年，与陈老师及师母王老师始终保持着联系。每次回国，只要有机会，更是一定会去拜见他们。

最后一次见陈老师，是去年九月底我去陈老师家。那时陈老师已经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师母王老师让陈老师去卧室休息，陈老师硬是撑着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和我们聊天。想必陈老师是不舍得这难得的相聚时间。一起在他家午饭后临走时，陈老师还起身送我。我告别他：“Please do take a good care of yourself!”陈老师回答：“You, too!”没想到这竟是陈老师留给学生的最后一句话。日后陈老师便每况愈下，再后面的电话，都只能和王老师说话了。

陈老师一生谦和为人，严谨治学。记得我把第一篇论文手稿交给陈老师时，回来的论文上陈老师修改过的字密密麻麻，几乎比我写的还多，连标点符号都改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老师的字非常工整、漂亮。当时陈老师对我没有一句批评的话，此举动却无声胜有声，更深刻有效地教育了我。这直接影响了我后来带人的方式方法。

陈老师是老浙大的毕业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谦和、严谨，但思想不保守。陈老师的两个儿子都非常出色。小儿子健浩是中科大的高材生。当年健浩来美国求学，放弃化学本专业转行去读金融。陈老师是有些顾虑的，来信要我劝说一下健浩，希望他能先拿到个博士学位再说。我回信说，健浩很聪明，拿个博士学

位轻而易举，但我觉得健浩做这个决定一定有他的道理，应该支持。信寄出后，我有点担心陈老师会不高兴，这是我第一次违背老师的意愿。没想到陈老师还是很开通的，他回信说，既然你们都这么说，我尊重健浩的选择。健浩现在做得很好，是花街大投行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

和陈老师的缘分，不仅仅是师生缘；师母王老师也教过我，待我更是关爱；我太太和陈老师大儿子左浩还是高中同班同学……

陈老师，您安息吧！做您的学生，我受益匪浅。来生我们再续这段师生缘！！



图为作者及夫人和陈老师、师母王老师合影。

（2018年1月20日写于美国明州。）

[返回目录](#)

怀念戚文彬先生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级分析化学专业研究生骆红山

我是原 68 届初中生，65 年进中学不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1969 年刚满 16 岁就被上山下乡的洪流裹挟到云南农村插队。尽管在 1973 年在上海师范大学化学系就读工农兵学员期间，多少读了点书，但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又使我们在学校里根本无法系统学习化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底子较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时任皖南山区中学化学教师的我，受当时蓬勃向上的社会风气及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不再甘心一辈子蜗居在山沟沟里当“孩子王”、“教书匠”，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报考研究生改变命运。1984 年 5 月，好消息传来，要我赴杭参加研究生面试。

初见先生，是在 1984 年 5 月 21 日上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刚走进化学系五楼的一间办公室，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就主动与我们打招呼，并自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原来他就是我们报考的专业负责人戚文彬教授。在介绍了同时在场的其他几位导师后，先生首先祝贺我们顺利通过笔试，并对我们几位面试学生前来面试表示欢迎，又和颜悦色地要求我们放下包袱，不要紧张，认真答题，考出真实水平。戚老师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一扫我们的不安和慌乱，终于，我们几人都顺利考入杭大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正式成为先生的弟子。

先生的严师之严，并非严厉而是严格。

先生的授课教案做得非常认真，仔细详尽，其内容不仅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沿革，更有与时俱进的发展前沿。有些课程的教案，从

纸张的质地而言，已有一定年份，但上面密密麻麻的覆盖着不同墨迹的蝇头小字，可以看出已经是多次修改，数易其稿。

先生对教学过程的掌控也十分严格，每次上课，他总是准时到场，认真讲学，悉心传授、一丝不苟。对我们课前课后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也都是耐心讲解、旁征博引、释疑解惑，一直到我们完全弄懂为止。记得有一次课堂上，我对一个问题无法深入理解，由于先生另有要事无法当场解决，事后我也忘了。不料几天后，先生特意来找我，认真地告知解答，令我十分感动。

分析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我们科研中和论文里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来自严谨的科学实验。先生非常重视培养我们的科学态度、科学素养和学术道德，谆谆告诫，言传身教。尤其是在毕业论文设计和实施阶段，更是越加操劳。不仅再三要求我们实事求是，万万不可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对一些重要的实验数据和结论，先生都要反复核对，认真斟酌，确保科学实验结果的准确无误。

先生的这种严格治学、严格教学的风格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我三年研究生学习中印象最深刻的，也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生涯。

到了杭大以后，知道先生的人缘很好。不仅在化学系，就是在整个杭大，但凡认识先生者，无论是机关干部、中老年教师，还是研究生、本科生，老老少少都尊称他为“戚伯伯”。先生瘦瘦的身材，一口略带慈溪乡音的浙江官话，初识之时，实难将他与一位知名学者联系起来。

先生和我父亲同庚，都是浙江人（家父祖籍浙江义乌），在校三年，深感他对我这个大龄老知青学员，投入了父亲般的关注。先生知道我已成家，女儿尚幼，难免会有思家恋女之情，三年之内，他对我的探亲请假从未拒绝，逢年过节，师母还会不时送上些许礼品。

虽然上海距离杭州不远，但地域文化还是略有差异。先生经常在闲暇之余，利用餐前饭后，有意识地向我介绍杭城的风俗习惯和杭大的校园文化，帮我更好更快地融入杭大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先生还一再要求我们几位研究生弟子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在他的教诲下，大师兄浦炳寅、二师兄胡俐以及其他几位师兄朱利中、郭伟强、王耕和刘明霞师妹等对我都很好。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在诸位师兄弟们的全力协助下，我终于顺利完成学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职。

即便是毕业后离开了杭大，先生非常关心我的成长。一是主动协助我在《分析化学》、《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等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并给予辅导修稿；二是为我在新的单位开展科学研究无偿提供化学试剂，支持我继续发展；三是不断介绍分析化学的进展，便于我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脉搏。至今我手上仍有先生参与编著并亲手赠送的《分析化学前沿》一书，先生告诉我说，他是在第一时间就把此书寄达我处，便于我学习和借鉴；四是多次来信来函，鼓励我参加全国和国际专业学术会议，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向同行和专家学习，促进自身发展。记得当年有一次在夏威夷举办的国际会议，先生主动给我寄来会议通知，并多次帮助我几易其稿，投稿终被录用。实际上，准确地说，在我前进和发展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先生的心血。

1994年，我获得赴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尔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任访问学者的机会。先生获悉后，非常高兴，为我的首次出国提供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同时还主动将在美国女儿威志红女士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给了我，并告我他已经关照女儿，我若有事可去找她。虽然在美期间没有与她联络，但先生这份情谊却铭记在心。

遗憾的是回国以后，正遇到房屋动迁，忙乱之中，竟然把先生的联系电话弄丢了，我原来留在杭大的联系电话也因搬迁而停用。原以为上海杭州距离很近，就没在意。不料此后先是赴新疆工作多年，回沪后又因职务变动特别繁忙，忽视了联系，庸庸碌碌中一直没有去杭州拜见先生。谁料有一天，遇到朱利中师兄，方知先生已经驾鹤西去，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心情。先生走得太早，太早。

先生若是健在，应是百岁高寿，好在众多弟子都能遵循先生教诲：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先生虽已故世，然而，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的严师慈父、博爱天下的音容笑貌，他的包容谦和、海纳百川的宏大胸怀，他的儒雅真诚、仁义礼智的传统美德，他的严格严谨、执着创新的工作作风，他的睿智坚韧、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如钱江水奔流不息，润物细无声；如雷峰塔千秋永矗，万世传美名。

[返回目录](#)

蒋忠泉老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杭大外语系 78 级的党支部书记兼辅导老师是蒋忠全老师。我一直记得他。

他是领导，领导我们整个 78 级，应该是有点规模的。你想，78 级十多个班级加起来有两三百号人，我当年工作的单位也是两三百人，却是局级单位了。但他却没有架子。我甚至感觉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找副架子搭搭。

他非常朴素，朴素得不像有派头的领导，倒像个从不想领导别人的农民。其实他的性格中确实有许多农民通常会拥有的优秀品质。我记得他憨厚的笑容，记得他没有发型的发型，记得他一身几乎不换的蓝卡服，记得他永远平和的语气语调。

这样一个“农民”要领导我们这批自我感觉都良好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不容易的。但他做好了这份工作。

我敬重他不是因为他有不一般的领导才能，不一般的说服人的口才，恰恰是因为他没有这些，却依旧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是他的善解人意感动到了我。

毕业后一度保持过联系。后来就象其它的一些关系一样，慢慢地淡出了各自的生活。

蒋老师，您还好吗？

[返回目录](#)

莫美珍老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莫美珍老师是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我指的是大学里第一位教授我们七班的专业英语老师。

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很低，但耳朵还是很挑剔的，并没有因为水平低就降低对老师的期望，因此每当一位新的英语老师走进教室，我不会先以貌取人，而是先以“音”取人。我会不动声色地静静地很有耐心地等待她或他开口。第一句英语脱口而出后，我就基本知道了自己本学期大概会有怎样的持续性的心情了。

莫美珍老师一出口，就惊到了我，就让我有了欣喜的感觉。我暗自庆幸有这样一位主课老师。她发音非常标准，音色极有感染力。

可惜她只教了我们一学期，也有可能是一学年，反正时间不长，很快就换老师了。开始还有点不习惯，后来就习惯了，换老师是一个常态。后来我也知道了老师们也是各有所长的。莫美珍老师非常适合教授刚入学不久、语音语调都处于各行其道的状态的新生，比如像我，我的语音语调常被她当场调教的。虽然小小自尊心会受到一点打击，但还是心甘情愿的，因为她一开口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第一印象很重要的。做任何事与任何人打交道，第一印象往往决定了事态的走向。于我，就决定了那一学期我的学习态度。

莫美珍老师是个上海人。这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是在她也知道了我是上海人之后，我们有过一次私下的接触。她托我回上海的时候顺便帮她办一点小事。虽然交谈的不多，三言两语的，但我感觉她是有故事的。我听说她毕业于上外，有时会想她是怎么到杭大来的。

莫美珍老师语音甜美，其实她长得也很甜美，中等个儿，略有一点卷的短发，很知性的气质。眼睛明亮，常常折射出很能看透人和事物的目光。我能感觉到她心很高，甚至感觉到她的心高没有给她带来很多快乐……

她现在在哪儿啊？感觉她没多久会离开杭大的。她的心是天上的云……

雁飞字横空，月明光直泻。
孤舟泊云间，单骑走天下。

她会不会去走天下了？

[返回目录](#)

最 Nice 的吴洁敏老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吴磊



昨日，“一家亲”的聊天大家想起了吴洁敏老师。她和先生朱宏达老师都是嘉兴人。她在学校里对我们的教导很关切，我们一想起来就心中涌起一股暖意。

我第一次见吴老师是刚到学校不久。因杭州久雨海水倒灌，食堂里打的水都是咸咸的，喝多了，嘴唇开裂。一天，吴老师像老母鸡一样，招呼我们这些刚刚离家的孩子到她家中，倒出一杯杯从玉泉打来的泉水，一声一声，“喝啊”，“喝啊”的呼唤。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把爱的种子撒在了我们心间。

当年的吴老师在 252 大教室里，为我们补习汉语拼音。我记得她发出的“花儿”的声音十分动听，赛过世界上最动听的歌声。她就是这样，把知识的种子撒在了我们心间。

更有一次，我们寝室的同学应邀来到她家中。那天好像是晚上，她培育的一盆昙花正要开放。我们一群同学围坐在花的周围，惊叹着花开花落的奇观。吴老师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一群花季少年，眼中充满爱意。

恩师情，终难忘！



[返回目录](#)

郑择魁先生百日祭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陈建新

我的导师郑择魁先生长期疾病缠身，近年来每年总要到医院小住数日。所以，去年秋天他再一次入住浙一医院，我总以为也是一次例行治疗，最多一个月就会出院。我去年搬家到城西居住后，远离了市中心，又加上疏懒，只到医院去探望了他两次。不料这一次他一住就是 3 个多月，更不料他会在春节前驾鹤西去。那天清晨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噩耗传来，我才悔悟到此生与择魁师已是天人永隔，再也不能亲聆教诲，不禁悲从中来，拿着话筒，呆呆地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还在 1982 年前我读大学本科时，择魁师的名声在校内外就已很响亮。当时杭州大学中文系搞现代文学研究的三驾年轻的“马车”，郑择魁、张颂南、陈坚，不仅以他们的才气与文章在学术界获得广泛的好评，在我们青年学生中声望也极高，他们的课是学生到课率最高的少数几位教师中的三位，每逢他们的课，总有同学早早地用课本去占座位。他们的选修课，选的同学也特别多。大学四年，我的兴趣一直在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上，所以，听郑、张、陈三位老师的课自然最多。

1982 年我毕业后在省级机关呆了二年，便考研重返了母校，与三位先生有了更多当面请教聆听的机会。是时择魁师任系主任，行政事务繁忙，但教学工作毫不放松，还时时督促我们撰写论文，争取发表。无奈我当时并不重视写论文，相信“板凳甘坐十年冷”的老话，其实骨子里是偷懒，只是傻傻地读书，三年中几无成就。第三年撰写毕业论文，有幸由择魁师指导，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向择魁师学到了很多。

择魁师为人端方善良，平易近人，与学生辈相处，并不以老师自居，遇有问题，也总是以商讨的口吻与和我们说话。比如我在选择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时，一度想探讨茅盾小说创作的得失，特别是他失败的一面。择魁师不同意我的意向，他怕我选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题目，答辩时难以通过。不过，他并没有随意否定我的想法，只是把自己的考虑婉转地讲出来，让我自己拿主意。的确，我读研的时候，政治风云多变，虽然我少年气盛，能完成那个选题，但极有可能被人当辫子抓。事后想想，那种可能性也是很可怕的。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省电大任教，那虽然也是一个高校，但教师的主要任务是管理，科研的氛围很差。我刚去的时候，还被领导“乱点鸳鸯谱”，参与编写思想品德课的教材并开课。择魁师听说后，几次对我说，早知要去干这样的杂事，真不该把你分配到哪里去。为了不让我荒疏专业，他介绍我参加了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并让我加入到他刚刚申请到的一个有关鲁迅的课题组，“逼”着我写了一篇有关鲁迅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介绍到绍兴师专学报发表，此文后来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这使我登堂入室正式走进了学术领域。后来，我又参加了类似的几个课题组，有一次还被择魁师点名当了一回课题组长。当我不满足于在电大任教，想调到中文系来时，我又得到了择魁师的大力支持，为此他还亲自出面为我疏通关系。我知道择魁师书生气足，并不善于与人打交道，所以从心底里感激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也是一个不善言词的人，因此在调动成功后，竟没有当面正式地向择魁师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至今仍引以为遗憾。择魁师并不介意我的态度，对我的事仍然非常关心，他辞世前还一直关心着我带研究生的资格问题，并多次向系领导提及。此事在上个月终于得到解决。我多么希望真的有个阴间，人死之后灵魂还在，那么，我就能在这个静静的夜晚，通过这篇小文把此事的结果告诉他，愿他在九泉之下，不再为之牵挂，当然，

还要捎带上我这个并不太令人满意的学生对他的深深敬意和感激之情。

择魁师为人不愿张扬，待人和蔼可亲，所以他的所有学生对他都崇敬有加。我写这篇小文，本来还有代表我的师弟师妹们的意思，但他们大多数是在我离校后成为择魁师的学生，我不太了解他们与择魁师的具体交往情况，只能讲讲我追随择魁师的感受。不过，在择魁师治病和治丧期间，他在杭的学生都表现出了十分诚挚的感情，自发参与整个护理和治丧过程，这足以说明择魁师在弟子们心中的地位。在择魁师的遗体告别会上，我代表众多师弟师妹们拟了一条挽联：“诲而不倦，琢玉成器，先生岂止传经问；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弟子正能作楷模。”大家一致通过。这挽联，不仅表达了我的心情，也同样表达了择魁师所有弟子的心情。

择魁师早年曾求学于唐弢先生门下，本来应该在学术研究上有更大成就，可惜多年的行政工作的干扰和身体的多病，使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他热爱的世界，这使所有爱戴他的人都为之深深地惋惜。在择魁师百日祭时，我写下这篇小文，再次表达我对先生的哀伤悼念之情。

择魁师，安息吧！

（写于 1998 年）

[返回目录](#)

山水契阔——缅怀陈桥驿先生

——杭州大学经济学系 78 级罗为东



2015年2月11日上午11时16分，陈桥驿先生安祥地辞别了人世。我接到陈先生亲属的报告后，立即赶去医院的病房，眼前的一幕让我难以忘怀，陈先生安祥地躺在病床上，两颊依然泛着浅浅的红润，身体还有余温，仿佛刚入睡。我总觉得过一会他就会醒来，用那标志式的绍兴口音普通话与我谈天说地。然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离开了自己心爱的书房，离开了一辈子浸淫其间的学问，驾鹤仙

去。陈先生长女陈可吟告诉我，几天前，老人身体出现状况，住进医院，临行前还手不释卷，书桌上还铺着正在写作的稿子。我朝着这位既可敬又可爱的老人的遗体，深深地三鞠躬。几天以后，陈先生追思会在杭州殡仪馆举行，应亲属的请求，我不揣浅陋做了一副挽联，并撰书，上联：“吴越骄子山水契阔治邴以精终为巨擘”，下联是：华夏逸才古今捭阖从性而游安归道山”，横批：“隐德垂芳”。这基本上表达了我对先生的认识，也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1978年10月，我进入杭州大学经济系读书，不久就知道了陈先生的大名。从同学们那里听说当时的地理系有一位传奇式的先生，学问精湛，能用英语和日语授课。由于刚经历过十年浩劫，恢复高考以后的大学，师资奇缺、百废待兴。像我们这样的系科，师资队伍残缺不全，很多重要的课程只能外请其他学校的老师来顶一阵子，

好老师更是稀罕得很。传说中陈先生这样的名师，令我们十分仰慕，也因此十分羡慕地理系的学生，期盼着将来也有这样的运气能够求教于陈先生。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自然无缘成为陈先生的弟子。1982年我本科毕业留在本系当老师，陈先生的长婿周复来先生恰好是我的同事，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由于周老师的引介，我得以与陈先生相识相交。

由于学科的差异，我对陈先生的学问只能通过历史地理学同行对他的评价来了解和判断，但是对他的处事之道，却有些深切的也是与日俱深的感受。三十多年时间里，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有四点。

一是正直不阿。这原本是我国自古以来士人的本色，但因历次政治运动，让很多学者噤若寒蝉，风声鹤唳，不仅涉及政治的事务，而且在学术方面为明哲保身而多取模棱之态。相比之下，陈先生虽历经磨难，仍不改学者的本性，臧否人物、针砭时弊，实事求是，毫不姑息。对学术方面的草率和马虎，他更是深恶痛绝，必欲尽除此风而后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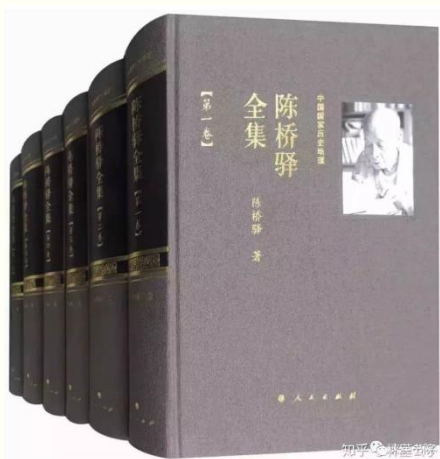
二是以学为乐。在他的生命里，学术与生活是浑然一体、不能须臾分离的。学问已然融入了他的整个生活，除了吃饭休息，他的一切时间和注意力都是围绕学问这个中心活动来分配的。看书写作自不必说，接待访客和出席各种会议仪式，话题也都是学术上的事情。一箪食一瓢饮，以学术为生，以问学为乐，学而不厌、乐以忘忧；

三是奖掖后学。陈先生奖掖学术后进的风范和胸怀，相信很多中青年学者都印象深刻。无论多忙，后学晚辈向他请教学术，作序题跋之类的事情，不论是否自己的门生，有求必应，对于求学之人，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对待学术界刻苦勤奋、好学上进的年轻人，陈先生宽容、可爱、慈祥、通达的性格可谓表露无遗。

四是宠辱不惊。一生历经的坎坷无数，他没有气馁和消沉，也不怨天尤人，不坠学问之志。后来获得各种荣誉，即是获得那些学术界视若至宝的巨大学术荣誉，他也是云淡风轻，不为所羁。可以说，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随心所欲、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不仅令人敬佩而且让人羡慕。

由于陈先生既不申报项目，也不主动报奖，体制内的所谓的“资源”，他没有享受多少，甚至，这么一个大学问家，在学科分割的体制下，都不是博士导师，不能指导博士生。很多人同行都为陈先生惋惜，为历史地理学学科惋惜。但话说回来，也许正是由于陈先生对所谓的现行学术体系一概不理，心无旁骛，只管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理想专心治学，才得以避免在那些非学术的事务中无谓浪费时间精力，也才有精品力作的不断问世。“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当今的中国大学有多少冠以博士导师头衔的学者，可是其中又有几人可以比肩陈先生的学问，有那么多的学术成果、那么大的学术成就呢？！

陈先生过完八十大寿不久，人民出版社就筹备出版他的全集，对此学校是十分重视的，我本人更是愿意积极地促成这件事情。历史上的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曾经名师云集，张荫麟、谭其骧、张其昀等一代名家都曾经任教于此，该系因学科设置中坚持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打通，创设了极具特色的课程体系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长期长校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先生不仅在物候学、气象学领域贡献卓著，在历史地理学领域也



造诣很深。由于 1952 年我国进行高等教育结构大调整，浙江大学的相关学科被分解并入到国内其他的学术机构，谭其骧先生也被迫调离。陈桥驿先生作为后来浙江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掌门人，事实上延续着史地系的血脉。由于各种原因，与历史地理学界的其他几位大学者相比，陈先生的授业弟子偏少，尤其是因为他未曾指导博士生，很多学术界的青年学者想得其真传而不能如愿，因此，出版他的全集就显得更加有必要、有意义。

感谢人民出版社的张秀梅女士，感谢陈先生的亲属周复来先生、陈可吟女士以及范今朝等陈门弟子，他们为文集的编辑出版投入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倾注了很多心血。

学术之道在于日积月累、薪火相传，相信陈先生文集的出版定能嘉惠学林。

注：原文发表于人民出版社 2018 年出版的《陈桥驿全集》

[返回目录](#)

改字体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这个细节应该发生在大学两年级，应该是朱炯强老师接任 78 级 7 班英语主课老师后不久。有一天，他在课堂上布置大家抄写英文词语。这是一件轻松活儿，不用费心动脑筋造句，不用费心琢磨时态的精确使用；而且英语书写我一直自认为是自己的强项，如果说用“龙飞凤舞”来形容英语书写不见得是褒义的话，那我也许会用“娟秀优美”来“自恋”一番。

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埋头抄写。朱炯强老师在一排排课桌的过道上回来巡视。走到我附近时，我挺直了身子，有意停顿了一下，把手从抄写本上移开。不是因为我抄累了，想拉直一下背部，而是刻意留出空间，让朱老师的视线能直抵我“娟秀优美”的书写。果然，朱老师在我身旁驻足了。我有点小兴奋，心存些许期待，期待朱老师的赞语，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个肯定的点头。“你的字写得……怎么让人辨认？”我感觉这口气没有称赞的那种柔软。我迟疑地抬起头，遇见了紧锁眉头的目光。“你可不可以写得清楚些呢？”他又追加了一句。语气里有些许会让人有点不舒服的严厉，但我也能感受到他对我寄予的厚望。

按我倔强的性格来说，我是不服的，内心已反抗了不知多少回，我可列举出许多条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英语书写是多么的清晰可辨的，多么的漂亮隽秀，甚至可以拿出比我更难以辨认的名人手迹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但我没有，当然也不会。我只是坐在那儿发愣。这一天好象吃饭也不香。

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听从朱老师的意见，把“花哨”的字体改成“朴素”的字体。这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因为要把

一个已经养成的写字习惯改过来，是很困难的，甚至需要点意志力的。要不要花大力气改过来呢？

经过认认真真的思考和利弊权衡，我决定脱胎换骨地彻底改造自己的英语书写法！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确实一直坚持改用一种朴素的印刷体书写英语，无怨无悔。

[返回目录](#)

很干净的自豪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记得去食堂的路上有一个大礼堂。那个大礼堂有点象仓库改建的，这在当时也算是上点档次的大礼堂了，上有舞台上座有座椅。记得下面的座椅是木条一根根排列钉起来的，中间有点空隙，像我这样骨瘦如棍的人坐着，某些部位在与硬性材料接触后有点硌得慌。

外语系在那里集中开大会应该不止一次，但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过一次。那次是邀请复旦大学的英语教授陆谷孙先生来讲。由于坐得比较远，陆教授的音容笑貌中只记得点“音”，且已模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英语讲得很漂亮，因为听过那次讲座后，我的洋泾浜英语没有蠢蠢欲动的想法，甚至有点想下辈子重新学英语的打算。

我之所以记得那次讲座不仅仅是因为陆谷孙之名如雷灌耳，更因为是他的同学朱炯强老师就坐在我们前面，他如顽童般把脚翘在长条座椅扶手上（如果不是我出现幻觉的话），让我看到了严师的另一面！尤其是当台上的陆教授提到受朱炯强老师之邀前来时，朱老师的脸顿时绽放出少有的光彩，这光彩里面当然少不了一点自豪，然而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可爱！是“还童”的可爱，里面很干净！

我喜欢很干净的自豪！

[返回目录](#)

系主任不都是老头儿吗？

——杭州大学经济学系 77 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史晋川

倪宝元老先生和我们家是好朋友。他的三位公子中我认识俩，小儿子夫妇倪机耕杨庄敏原来都在老杭大教务处工作。

三十一年前，当时我们还都不认识。一天我去教务处打印室取考试卷。倪老先生的小儿媳杨庄敏问我取什么试卷。我告诉她后，她查了登记本后又问，是不是经济系主任史晋川老师的西方经济学考试卷？我说是啊。她随即说试卷不能代拿的，你让他本人自己来拿。我笑答道没有其他本人了。她迟疑了一下，还是把考试卷给我了。我取了试卷出门，听到她喉咙梆梆响同事们在说：“耶，这个人就是史晋川啊？系主任不都是老头儿吗？”

其实我当时是主持工作的系副主任。七、八年以后，我 1994 年从芝加哥大学访学回来，发现杨庄敏调入经济系当教务秘书。她看到我很不好意思。大家后来成了同事朋友。他们俩夫妻的女儿后来考入浙大经济学院读金融专业硕士，导师是我。老杭大人的这种情份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了。

[返回目录](#)

郑朝宗老师二、三事

—杭州大学生物系 86 级钟留群

郑朝宗教授当年教我们植物分类学，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总觉得叫得出每棵草每株树的名字，喔～不要太酷哦！

在那个单休的年代，一整个春天，差不多每个周日都会有郑老师周日几点在某地带大家上山认植物的公告，认遍周边群山。

我虽然很喜欢，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抵不住睡懒觉的诱惑。不过，每次一定会有一些同学跟上老师的脚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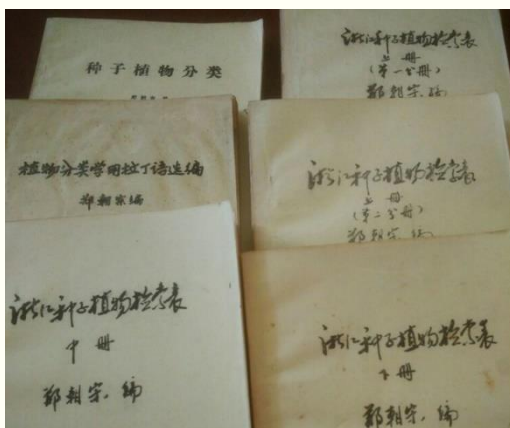
走山认植物一直持续到 7 月初的西天目野外实习。

记得最后考试的那间教室里顺序地摆满了枝枝叶叶，格局设计得有点像现在景点卖场的购物通道，反正我们会绕来绕去一个不漏地经过每一种植物。

我们捧着白纸间隔地被喊进考场，一边走一边挨个儿默默写下植物名。蒙圈的人会原地磨叽，想等下一位同学走近然后蹭个答案，这时候老师会威严地咳嗽。直到走到最后一种植物跟前写完答案交了卷子才被放出考场。

铁打的考场流水的考生。

那次实习，我好像老是被菊科的千里光卡住，每次指问老师，答案几乎总是千里光。这个百变千里光，叶型不断变化，胖了是千



里光、瘦了是千里光、长了短了还是千里光……崩溃之后一横心，遇到不认识的一闭眼就说千里光，居然能蒙对七八成。

今年很开心地在凤阳山又看到了郑老师。老师今年 82 岁了，思路清晰，无废话，不重复，和他聊天很舒畅。

可怕的是他的记性。

一起吃饭时，刚好看到圈圈里 82 级一位师姐的蔷薇果照片，顺道问了下种类，老师瞥见师姐的名字，很奇怪地说你和她不是同学呀——这个，老师都能随随便便计算出来！

然后说刚碰到过师姐，接着几乎倒背如流地向我介绍师姐各种隐私：前后历经几个单位啦，爸爸是老师啦，弟弟是谁啦，丈夫是谁啦……我说老师老师这个我认识，当年我大一时就跟着师姐的先生在系里宣传部干活的。然后我终于想起一个老师应该不清楚的师姐家隐私，我说她家女儿从我那个学校毕业的。老师停止吃饭，抬头将信将疑地说她女儿在国外啊！我说是的是的现在在国外，高中时候是在我校的。估计下次老师再碰到师姐，会确认这一条的吧。

这次的会场在三楼，上上下下郑老师都一个人稳稳当当健步如飞，也没个人管他。赶上郑老师时我说老师还是这么稳健啊！郑老师不太满意地摇摇头说：这个腿啊，就是走不快了。想当年，老师看起来虽然是晃悠晃悠地走着，实际速度却是我们三两下就会跟不上的。

会场里丁老师正在上复习课，展示了浆果楸的图片考问大家。郑老师突然举手发言说，看那个大大的苞片，当年此地错识其为鸽子树，有鸽子树可真是了不得的大事啊，所以制作了节目准备发新闻，头天忽然想起请郑老师做个鉴定，结果发现是个错误。

郑老师继续说：“他们车接了我去的，结果我说不是的，他们就不送我回来了！”

可惜现在浆果椴正在开花，网上找了个类似的图片看看那个鸽子感的苞片。

傍晚在凉风里散步的时候，郑老师说参加植物学会的活动最高兴了，爬点山不辛苦，在家里太闷，他说：“我也没别的爱好，就喜欢认个植物。”看大家都在认植物，就更高兴了。

说起前一段 82 级有个同学会他也接到邀请本打算去，结果植物学会这边刚好也有个啥邀请冲突了，我一分神没听仔细，反正，大意是认植物也喜欢、认学生也喜欢——于郑老师，这就鱼和熊掌了啊！

（原载钟留群《诗意地栖居在校园里》，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7 年版）

[返回目录](#)

西溪河下 日月光华：

怀念杭大的诸多师长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董平

杭州大学、西溪河下，是我生命的转折之处。当年的清流潺湲、油菜花黄早已不复可见，但记忆中的日月光华、硕学典范，仍依旧清晰。吉光片羽，熠熠生辉。

我是浙江衢州人。1975 年我从航埠中学高中毕业后，一面到处打工，一面等待分配工作。1977 年夏日的一天，我一位高中同学跑了十多里路，专门来告诉我：可以考大学了！当时我正在当地粮站做小工，猛然听到这个消息，有点发矇，表示未必可信。几天后，高中时的几位好友居然都来奔走相告，方信此事为真，当时心情之激动与复杂，实在是无法形容。1977 年的冬天，我背着铺盖冒冒然到衢州二中去“考大学”，最后结果居然算是考中，张贴在衢州城里十字街头的“红榜”上我的名字竟然在列。但我并没有成为“77 级”的一员，原因是因为“政审”通不过。第二年再考，按第一志愿录取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于是在 1978 年 10 月，我来到了西溪河下。

杭州大学中文系在西溪河下（现在称保俶北路），那时的路面是沙石子铺的，公交车跑过，一片尘土飞扬。西溪河的东岸还是农田。可在中文系的校园里（现在是省总工会干校），却时常可见当代硕儒巨匠的身影。他们年龄有长有轻，身姿有挺拔有稍显佝偻，衣着虽都极其普通，但举手投足之间，总是透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自然令人起敬起恭。王驾吾、姜亮夫、夏承焘、陆维钊、胡士莹、蒋礼鸿、沈文倬、刘操南、徐朔方、吴熊和、蔡义江、王元骧、孙席珍、汪飞白、华宇清、郭在贻等，还有文革初期去世的任

铭善先生等，这是一个如日月之光华、若星汉之灿烂的学术群体！有这样一批先生，杭州大学中文系要想不是全国最好的中文系之一都难！当时的先生们对这一点也十分自信，先生们说：“如果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我们就是‘富农’。”

浸润在这样一个“富农家庭”中，我当时是十分想在日后也成为“小富农”的，所以读书也可谓之如饥似渴。在我中学教师朱子善先生（后来成了我的岳父，1929—2009）的引荐之下，我曾拜访过当时的中文系主任王驾吾先生，因此而与王先生有一段令人怀念的交往。

王先生讳焕镛，号觉吾，以治墨学著名，实为孙诒让之后最为重要的墨学研究专家，而于周秦诸子之学，则无不通达。1979年春节后入学，我第一次去杭大河南宿舍拜访了王驾吾先生，当时的情景依然在目。忐忑地敲开王先生的家门，师母开门让我进去，给我泡了茶，让我稍坐，说王先生正在习静。我当时并无“习静”的概念，更全然不知“习静”为何事，便只是兀然端坐等候。不久，先生从别室出来，我呈上朱子善先生的引荐信，王先生显得十分高兴，与我说话。在我们78级入学时的迎新大会上，王驾吾先生以系主任的身份给我们做过讲话，曾讲到要学习好，还要身体好，最好每餐能吃三碗饭。现在对谈，老先生也仍然说：要努力读书，要锻炼身体。问我多大，我说20了，先生说：还好，年纪不算大，虽然迟了些，但还来得及。读中文系，要下背诵的工夫，诗经楚辞、古典美文、诗词名篇，最好都能背下来。背得多了，方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前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很有道理的。谈到锻炼身体，老先生看看我，说：你身体还不错。我大着胆子说：我曾练过二年拳术。先生突然十分开心：好好！我年轻时也练拳术，我练的是棍子。读书时，楼上寝室比较吵，声音大，妨碍我读书，我就用

棍子捣天花板，楼上马上就安静下来了。说着还哈哈大笑。先生说话时的神态，我突然觉得十分地孩子气。

王驾吾先生学问深湛，而对晚辈则极为和蔼，总是勉励有加，真让人有如沐浴于光风霁月之感。中文系读书期间，我曾经也苦读诗骚，唐诗宋词，更试图多背，每孤身读书时，便总会想起王先生的教导。此后与先生渐熟，曾请求先生赐予墨宝，不意先生不仅没有推辞，并且所用书体是他最享盛誉的隶书。“读破万卷诗愈美，行尽千山路转赊”，成为我求学过程中最大的激励，也是处困中最为有效的心灵慰藉。

1983年9月，我再次考入杭州大学，成了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第一批硕士生之一。这个古籍研究所，是姜亮夫先生创建的，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几个古籍所之一。硕士三年，成为我“学问”的起点。虽然我现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与当年古籍所所学的内容似乎相去较远，但正是古籍所的求学生涯，为我后来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古籍整理也一直是我的工作主要学术领域之一。

姜亮夫先生讳寅清，以字行。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早年又曾留学法国，他的学术眼界是非常宽阔而宏远的。我们入学时，他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眼睛高度近视，看字时，要背着强光，几乎把纸贴近镜片方始能视，但其思维之敏捷令人惊讶。他的敦煌学、文字学、音韵学、楚辞学等等，皆卓然成家，虽然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未必能为人所普遍接受，但他的学术方法，特别是将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神话学融为一体的解释路径，实为独树一帜。我们首批6名研究生（除我以外，还有傅杰、陈野、何丹、邬锡非、杨黛），姜先生是十分重视的，并按照他的学术观点来开设课程。古籍所创建之初，条件有限，我们每周一次到河南宿舍区的一栋小楼里，姜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虽然所里的师资力量已是非常雄厚，除姜先生以外，讲古汉语有蒋礼鸿先生、郭在贻先生，讲音韵学有

张金泉先生，讲古典文学有刘操南先生、平慧善先生，后来调进周启成先生讲庄子，讲礼学有沈文倬先生，讲版本目录学有雪克先生，后来又从浙江图书馆调进崔富章先生，讲宋史有徐规先生，等等，但姜先生仍然认为学生的学术眼界需要进一步张大，到外校请了许多老师来给我们开设不同课程，如请中国美院的王伯敏先生、章祖安先生来给我们分别讲中国美术史、《周易》，请安徽大学乐寿明先生来给我们讲佛学，请淮阴师专的萧兵先生来给我们讲神话学。了解到我们英语学习有困难，姜先生说外语很重要的，一定要学好！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读英文版《左传》，对着汉文原版读，结果是《左传》精读了一遍，英文也学好了。我们说能读英文版《左传》，英语就不会不好了，他笑笑，于是又请了杭州商学院的英语老师来给我们补习英语，每周一次“开小灶”，让其他专业的研究生羡慕得不行。

姜先生因为眼睛高度近视的缘故，作书不易，往往是一笔而一行到底，虽是字字相连，却不难辨认，实可见先生学风之严谨。1984年，古籍所曾试图编辑出版“所刊”，平慧善先生尝为此多方奔走，但终告无果，于是就以《杭州大学学报（增刊）》（古籍研究所专号）的名义发表了古籍所教师、学生的研究成果。姜先生有一篇《“中”形形体及其孳乳字分析》的长文，刘操南先生一篇讲竹简的论文，因排版困难，都是我手抄后影印的。姜先生论“中”的这篇文章，对我影响很大，此后我在学术论文中曾多次引用到姜先生的观点。我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先秦乐论初探》，也是发表在这个“古籍研究所专号”上，写作这篇文章的情形还记忆犹新，草稿是经过沈文倬先生亲手修改的。这最初的学术尝试，得到了沈先生的肯定，对我的鼓励极大。我也从此走上了先秦儒学研究的道路，读硕士期间，就开始在《学术月刊》、《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沈先生口不善言，但学问深广，尤精于三礼之学，当代的

礼学研究，盖无人能出其右。他给我们讲一门课叫做《广校勘学》，真可谓之汪洋恣肆！记忆最深的，是在这门课上沈先生专门给我们讲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我在学术上的广泛兴趣，既与八十年代中叶的时代风气有关，也与古籍所诸先生博雅的学术风度的潜在影响有关。先生们的博学是令人羡慕的，而由博返约、归于诚身则是先生们所教导的。姜亮夫先生给我们讲课，曾说：“我送给你们八个字：敬业乐群，修辞立诚。”这八个字，我至今奉为圭臬，以“敬业乐群”为生活态度，以“修辞立诚”为学术态度。

1986年我硕士毕业，当时虽然是分配工作，但也可以自己找工作。我当时已经确定了恋爱对象，不愿离开杭州，于是我找到当时已经在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的老乡赖金良，他带着我去拜访了所长吴光先生。在吴光先生的帮助之下，我进了浙江社科院哲学所，开始了我关于中国哲学的专业研究工作，也因此而与沈善洪先生有诸多交往。我初到社科院时，沈善洪先生已经出任杭州大学校长，但也仍然兼着浙江省社科院的院长。在某种意义上说，沈善洪先生是我进入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引路人。我那时对“宋明理学”是完全不了解，甚至毫无概念的，因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的学术训练，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不读宋以后书”。这当然是偏见，但当时我们都以通先秦古典为“高”。我的学术基础一直是在先秦，但浙江社科院哲学所则以宋明理学为研究的主要方向。我最终走上宋明研究的道路，与《王阳明全集》的校点整理有直接关系。这部全集的整理，最初是由沈善洪先生主持的。1987年夏天，沈校长与吴光、钱明、我以及杭大校办的滕建明等一起，到遂昌县某处度假村开会，就《王阳明全集》的整理进行讨论，确定了底本、参校本以及基本编辑体例，分配了校点任务。因有这一机缘，我开始进入王阳明作品的阅读与研究。但1992年《王阳明全

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沈善洪先生并未署名，只是写了个序。

大约是在 1989 年左右，沈善洪先生提出编写多卷本《浙江文化史》，并在杭州大学召开过一次课题会议，专门讨论编写内容、体例、结构、各部分容量以及具体撰稿人，当时出席会议的还有陈植镗先生。沈善洪先生作为“主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主张要重新全面梳理浙江的历史文化，要敢于探索，发表新观点，并直接指名让我负责“思想学术编”的写作。我接受任务之后，随即转入浙江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写作纲目中，我把佛教的内容也列为写作对象，这一点曾受到沈善洪先生的充分肯定。“思想学术编”的初稿我完成于 1991 年，但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陈植镗先生去世等方面的原因在内，“浙江文化史”项目未能继续下去。

2002 年我调进浙江大学哲学系工作，所在的校园是再熟悉不过的杭州大学的校园，但杭州大学已然不复存在，而称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了。沈善洪先生早已不再是校长，但仍然关心学术事业，我与沈先生也仍有较为密切的学术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联系。2001 年，我打算把原来为“浙江文化史”写作的“思想学术编”重加修订，单独出版，曾征询沈善洪先生的意见，他表示完全赞同与支持。2005 年，我稿子修订完毕，即将交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次去拜访沈善洪先生，当时还想请他题写个书名，他说：“书名我就不题了，至于书的题目，我看就叫‘从王充到王国维’好了。”这样，我的这部著作最终就以《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的书名出版。顺便提及，2009 年，费君清学长又重新启动了《浙江文化史》的编写，仍以沈善洪先生为主编，其中的“思想学术”编由我对这部专著的内容进行删节而成。这部二卷本的《浙江文化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回想我自己的求学过程以及此后“做学问”的过程，我总是对老一辈学者的提携鼓励充满感激。上面所记虽为一鳞半爪，却是我无法忘却的记忆。先生们不仅学问醇厚，并且对晚辈的奖掖不遗余力，乐见晚辈学有所成，其学术胸襟是浩大的。他们视学术为生命，以为道、为学、为人的统一为安身立命之根基，其学术目的是纯粹的。他们把学术作为自我存在之意义与价值的证明，略无哗众取宠之心，而有学以为己之质，其学术风格是平实的。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课题”、“项目”、“工程”以及各种各样让人竞奔攫夺之而后快的“头衔”，老一辈的学者们，大多神态安闲雅致，走路不疾不徐，而有纾余宽平之气度。正是当年会聚于西溪河下的老先生们，成就了杭州大学的日月光华，成为杭州大学人的永恒记忆。

[返回目录](#)

杭大新村的往事烟云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任平

每家每户都有一面“书墙”，这几乎是杭大新村的固有的风景，也是先生们埋头苦干的领地，孩子们莫名向往的圣地。

我在黎子耀先生家知道了什么是《易经》，在胡玉堂先生家见到了《圣经》，在江希明先生家翻阅了生物图谱，在白正国先生家惊叹他读了那么多德语的数学书！当然看到线装本古籍的机会更多。夏承焘先生读得烂熟的《宋史》，姜亮夫先生从巴黎抄回来的敦煌文献，王驾吾先生加了批注的《墨子》，胡士莹先生拥有的古代话本小说，蒋礼鸿先生熟读的《说文解字》和《广雅疏证》等等，让我觉得文化的博大和震撼。直到今天也会想起来就汗颜无比，前辈们的学问根本无法企及啊！

杭大新村的先生们，坐拥书城，做出了一流的学术，构成了他们人生最动人的交响曲。

老一辈如此，孩子们也个个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被斥为无用，文化不如文盲的年代，却有不少图书在杭大新村被流传。听说 13 幢几个小伙伴在看什么“三部曲”，我赶紧去和他们套近乎，条件当然是一本换一本，一本看完才能获借下一本。就这样，读完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接着是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出租》《骑虎》《有产业的人》，也是三部曲。据说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还有美国的《珍妮姑娘》，法国的《人间喜剧》等。常常见到书上有“杭州大学图书馆”、“杭大附中图书馆”的模糊印记，而书角翻卷，书页残损。于是想到了这些书可能的几种来源：“文革”混乱中被人从书库取出，当时声称要批判毒草是名正言顺的；或者是以前借的书，“文革”一乱就没有归还；或者是“抄家”

后的幸存…。喜欢画画的小朋友胡大林，当时狂热地收集画册，哪怕是图片残页也视如至宝。好几次他以万分激动的表情，给我看他刚“弄”到的几张苏里科夫、列宾和菲钦的画的印刷品，说这是 he 花了好几件无线电（大约是矿石收音机）零件换来的。而那些天他会埋头在小房间里，赤了个膊一遍一遍地临摹这些名作，还真画得不赖。还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拿出几页古代扇面画的印刷品，说这是名画又是代表中国印刷最高水平的。使我艳羡不已，差点想拿东西和他换。没料到过了几天，就有同学送了我几张，原来这是同一套里被拆散的，流落于各人之手。

当时杭大图书馆确实无人看管，任人进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悲剧不会发生。我的同学吕甘棠进去翻看报纸杂志，发现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就随手撕下来。不巧被化学系的红卫兵看见了，一查，那一页的反面正好是伟大领袖，恰巧撕破了光辉形象。这还了得！立刻，我的同学被扣上了“现反”帽子，胸前挂了牌子，押往化学系大门的台阶，低头示众。连续几十天啊！有时还将他的老爸，化学系的大教授吕荣山押来一起示众。这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是多大的身心摧残和人格侮辱！在那个时候，谁也不敢去解救他，也解救不了他。他只能含冤忍辱，没有任何解释分辨的权利。精神上的打击以及后来在黑龙江插队的艰苦生活，使他一直心情压抑、疾病缠身。但杭大新村的孩子们，总是会在窘境里找到一种寄托，会在学习中寻求一些希望。他在艰苦环境下刻苦自学外语，后来在工作中能学以致用，发挥出了自己的力量。

我住的十四幢北面是十七幢。至今我仍认为花鸟画画得最好的中文系张同光先生就住在这里的一楼。有一次我去看张先生画画，无意中发现他孙女张淑馨拥有莎士比亚全集！于是我动起了脑筋，两本外国短篇小说集借给她作为条件，莎翁集就让我看了。这可是解放前“世界书局”出版的朱生豪译本啊，当时并不知道版本的价

值，只记得父亲说过，朱生豪与他是之江大学的同学，还是同桌同室的好友，之江诗社的诗友。这样，读起来又多了一份暖暖的感觉。莎剧跌宕起伏的剧情、幽默犀利的语言，朱先生古典诗词味道的译句，精彩绝伦。虽然当时未能完全欣赏，但已经让我兴味盎然，难以释卷。其实此书还应该有一册“正剧”，但无可追寻。运气的是，张淑馨后来下乡并表示不要此书了；晦气的是，我下乡带着这两本书，被勾庄公社的一位好书之友借去，数月后，竟声称遗失了其中的那本“悲剧”！

那个时候能够读到的书确实少得可怜。下乡时，听说大陆公社（我插队的地方，现在属于良渚）翻过一座山，是大观山农场，那里的老知青有一些书。于是我连翻了几次山，也陆续借来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实味文集》、《莎菲女士日记》等在文革和历次运动中被批得臭哄哄的“毒草”书籍。秘密地、迅速地看完，又很守信用地还回去了。当时翻山还真不觉得累。

可能是受了“毒草”影响，在枯燥无味的生活里，几个知青也写点诗歌哼几句寻找乐趣。我与同屋知青徐小多一起创作了组诗，里面尽是“愁如门前溪水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之类。小多还为之谱曲。当小提琴奏起这些“靡靡之音”时，我看到那琴宛如一片经霜的红叶，在秋风中飘零。那几天，我和同屋的另一知青黄荔生，还干劲十足地在村里大画毛主席像，在墙上到处写“四个伟大”的标语。相映之下，这是对比多么强烈多么滑稽的图景！

去年到阔别几十年的大陆乡，以前一起种田的小伙伴已是村支部书记，他要带我去看一样东西。哦，在一间已经废弃的抽水机房，当年我画的戴八角帽的毛泽东像，竟然还在墙上！斑驳而又清晰……。

前面提到的胡大林、黄荔生都是我小时候的“画友”，也是杭大新村的邻居。这里面还有比我大些的朋友，以前“风闻”他们的本领，让我们好钦佩。

同学黎体凡的大哥黎体瓔，虽然以前是调皮捣蛋的大王，但小学三年级就横渡了钱塘江，后来考上浙医大，再后来又是浙二的“一把刀”，再后来就退休了，他的夫人严媛，父亲是哲学系教授、大名鼎鼎的严复的侄子严群。

金观涛是金松寿教授的大儿子，我和吕甘棠小时候每天傍晚和他走向黄龙洞，一路听他讲爱因斯的相对论，听到“时间隧道”时惊奇得一愣一愣的：超过光速的时候竟然能够看到几万年前的场景？后来他考上了北大，再后来他主编了第一套引进西方现代思想的《未来丛书》。我成了热心的读者。

爱好画画的蒋遵义和王重为，因为比我大，无从请教，我只是间接的粉丝。王重为的父亲王承绪教授，是杭大前身浙江师范学院的副教务长，和我父亲坐面对面同一张办公桌，也是同一年被划为右派。既是命运相同，又何尚不是惺惺相惜。于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中英语课时有两位“老学生”坐在最后一排，整整两年，都在静静地听，静静地记笔记。我们的英语老师史佩珍，是刚从杭大外语系毕业的高材生，又是饰演《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气质美女。那时她正配合王承绪、赵端英二位教授进行“标准伦敦音”的教学实验。由于教学理念新，方法先进，我们班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史老师说，王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学”专家，一直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代表。这么大的学者，那时却还带着右派帽子，还在中学里孜孜不倦地做实验，想想真悲哀也真令人感动。身处窘境，却视荣辱沉浮于度外，而视教学科研为生命。他们二老表面很平静，却有着火热虔诚的内心。前年我到了伦敦，路过 UCL

（伦敦大学），首先想到的是王先生在此留过学，想起王先生指导我们学的“伦敦音”。

知道赵端英先生是教育专家以及她的哥哥是古文字学家赵万里，是较后的事情。赵万里是我导师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的导师之一，所以按辈份也是我“太先生”了。

王重为的画非常好。虽然以前只是在他家见过却无从求教。但后来也算有了缘分。我以前做包装设计，需要美术参考资料。听说浙江幻灯制片厂有些幻灯片可以作参考，就去寻访在这个厂工作的王重为，怎么说也是老邻居嘛。他很努力地帮我找了需要的图片资料。最近他在微信里说，他父亲遭过“反右”的罪，他在极左路线下也遭过磨难。其实我以前也知道，他吃的苦头不小，但同是苦瓜一个，我又是个胆大的人，当时找他并无任何顾忌。

无论是我住在杭大新村的6幢2号，还是后来的14幢2号，以及后来的体育场路杭大宿舍，我与蒋遂、蒋绍心等“发小”从未停止过来往。不仅因为父辈都是中文系的同事、挚友，也因为我们有着相近的兴趣爱好。蒋遂可能是到了黑龙江后给我写信最多的人，回杭州后在厂里工作，即使到山东学习期间也常常来信，谈工作境遇，聊人间万象，诉情感悄语。前几年他在一家报纸编副刊，也不忘宣传杭大的老先生，约我写了些文章。

蒋绍心的父亲蒋祖怡是《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绍心虽脚有残疾，却是极其心灵手巧之人。初中时，他已经能安装“五灯”以上的电子管收音机。他哥哥蒋绍忠，杭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后来是浙江大学的总会计师。我高考时数学底子太差，几乎是绍忠和他妻子胡巧湄辅导提高上去的。他大哥蒋绍愚，北京大学的古汉语著名教授，也是我博士论文的评阅人。所以他家可谓文、理、工俱全，是杭大新村的“明星”家庭。后来知道，绍心的祖父也是大家，很早就著有《国学概论》。

我做姜亮夫先生的博士生之前是郭在贻教授的硕士生，而郭老师曾经是姜先生的学术助手。郭老师认为和我谈得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也喜欢书法。这位从孟子故乡来的谦谦君子，做的一手好学问，也写得一手好字。他是国内较早研究古代“俗语词”的专家。拜师伊始他就说，王羲之王献之书札中，有不少俗语词，你既搞书法，何不去研究一下“二王”书札？这个指点非常重要，使我写论文在很有兴味的状态下顺利完成。郭老师英年早逝。至今还常常想起，在轻轻推开杭大新村 27 幢他家的门时，总是一张和蔼可亲的笑脸，一口山东话：你来了！每次递上拙劣的小文，取回来总有密密的批注，用他那一手俊逸的毛笔字写成。马上要过五十岁生日了，郭老师却在浙二医院的病床上。我们几个弟子分了工，有的去买鲜花，有的去买蛋糕，有的去写祝贺文。永远不会忘记那天的情景，我提了装蛋糕的大盒子赶到病房门口，有人低沉地说：郭老师刚刚走了。五十寿辰只差一天啊！郭老师太过于匆匆！我们悲伤地在章太炎故居的附近找了一块莹地，不久，郭师的忘年交许嘉璐先生写来了碑文，我受师母之托恭书了此文。哲人已逝，师恩永存。

成为姜亮夫先生的博士生之后，便经常去杭大新村的四幢三号拜访求教。其实这也是小时候来过的地方，而且先生的女儿昆武还曾经是我母亲在六和塔小学时的学生。师母陶秋英教授又是挺健谈的人，由于熟悉而毫无拘束。这是两位谁看了一眼都会难以忘记的老人：先生高度近视眼，长期伏案而背已经佝偻，说话声音还一点不弱，带着浓浓的云南昭通口音。师母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一看就知道年轻时是个大美女。据闻曾被誉为燕京“校花”。她几乎天天画画吟诗，听说以前还经常坐上“黄包车”或三轮车去西湖边观景写生。其山水画路数很正，有明代吴门画派沈周之风韵。其实她正是苏州人。

现在的学生可能很难想象姜先生是怎样教我的。他几乎是“寓教于乐”。每次我去，他都视为尽兴畅谈回忆过去的好机会。我若问文字，他会说起在清华研究院时的导师王国维、陈寅恪以及曾求教的章太炎等，从生活琐事的娓娓道来，自然点出了这些大学者的学术态度、思维方式和一代风范。王国维研究甲骨文而考证了商王的世系，卓成大家；章太炎几乎不承认甲骨文，但对于商周金文的研究却因学问的深厚而鞭辟入里。我若问文献学，他便回忆起在法国巴黎的留学生涯。当看见博物馆、图书馆里大量的中国文物和文献陈列其中，这位热血青年毅然地放弃了攻读哲学博士的机会，而一头扎进了国家图书馆。从开门第一个进到关门最后出，他每天埋头抄录敦煌卷子中的国内已见不到的古本《切韵》，他没有照相机，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以致原来就已经 800 度的近视眼又加深了几百度。我看到的先生，眼镜片就像酒瓶的底一般厚，看书时脸紧贴着书页，几乎是“闻着”看的。师母说，都这样了还每天手不释卷，是个只要拿到一张有字的纸就不肯放下的人。当时为了省钱，每天吃一个夹几片包心菜叶子的面包。先生曾动容地说起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女管理员，她看到这位中国青年如此忘我工作，深受感动，特别为他每天延迟一小时，这样就能尽早抄完。这在西方图书馆也算非常破例了。当先生拿出中国科学院影印本《瀛涯敦煌韵辑》时，我看得几乎屏住了呼吸：这一丝不苟的书法，字字如珠玑，字字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啊。

说到博士论文，当时我完成后几乎是口述给姜先生听的。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更不要说眼睛近乎失明，于是他特地委托蒋礼鸿先生再度审阅。蒋先生在看所有的博士论文中，可能对我这篇是看得最仔细的。不说每页批注吧，也是朱墨灿烂。最后还写了全文的评阅意见。这些姜先生都了解得很仔细。所以蒋先生也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先生。

蒋先生病重住进了浙江医院，我去看过几回。他每次见到我去都非常高兴，有一次还让我扶他在灵隐路上“走走”。此时正是夕阳西下，天边的云彩里透出几缕金光。这异美的景色也让蒋先生有些兴奋，他说，你不是在教学生读杜甫的诗吗，“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喏，这云中投下的光柱，就是“日脚”啊。

是啊，这“日脚”，前辈们走下来了，后辈们还要走下去。

（2018年5月22日写于杭州）

[返回目录](#)

听不懂的学问却依然崇敬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卫军英

享年 92 岁的沈文倬先生辞世了。至此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上世纪堪称大家名家的一批学者，都已先后作古。夏承焘、姜亮夫、王驾吾、胡士莹、孙席珍、任铭善，这几位先生出生于上世纪初期，是早在 3、40 年代已经有所建树的学术名家，那时候被称作是杭大中文系的六大教授，放到今天估计都是所谓学术大师一级的人物了。我读书的时候适逢中国新时代方兴，其时王驾吾先生为系主任，姜亮夫先生则是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更年轻一些出生在 20 年代前后的沈文倬先生、蒋礼鸿先生、徐朔方（步奎）先生、王维贤先生等老师，似乎还不能归入那“六大”行列的，而年岁更晚一些的郭在贻、吴熊和、蔡义江、王元骧（林祥）等先生，大概还都算是中青年教师吧。

“六大”里面任铭善先生在我读书时候已经故世，其他年事已高（都是年约 80）也基本上不上课了。系里曾经安排姜亮夫、王驾吾、孙席珍几位先生给我们开讲座，而姜先生高寿一直到 90 年代还在指导研究生。所以我这一代还多少能记得起那一辈学术大家的风范。至于沈文倬先生、蒋礼鸿先生、徐步奎先生等，则不是开设基础课便是开设选修课。记得沈文倬先生开的选修课（或者是专题讲座？）是“三礼研究”。我也去听了，前些年还保存着老先生上课油印的讲义，后来几次搬家不知踪迹。记忆里沈先生是一位谨严的学者，讲话从容略有结舌。说实话老先生那深厚的学问，我从第一次上课就听不懂，后来因为对那个古老的“三礼”敬而远之，也一直没有懂得一丁点过。但是这并不妨碍当年在上课时候，仍然对老先生恭恭敬敬。我们都知道沈先生研究的是绝学，他本人也是国宝

级的人物。有几件事情是我当年印象颇深的。记得我刚读研究生时候，导师陆坚教授那时候担任杭州大学教务长，跟我谈起做学问事情，谈到了许多名师大家，也谈到了沈文倬先生。其中说到1983年沈先生评教授，他的文章送出去评审，竟然没有人能看得懂。“看不懂只好承认他学问深”，这句话令我印象很深。原杭州大学老校长深沈善洪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卓有建树的专家，我深深尊敬他但多年来内心也深深感觉愧对于这位战略型的校长，早年他也曾经以他那种特有的学者口吻感叹道：“沈先生的学识深不可测！深不可测！”记得后来我曾经和沈先生的弟子，也是我的朋友吴土法博士谈到沈先生的学问，说起沈先生的文章估计也只有顾颉刚这样的人物可以懂得了，可见那真是一种和者盖寡的高深绝学。还有一次是吴土法在《语文导报》做编辑时候，某天晚上约我一起去看北京来的何新，何新那时候刚出版了《诸神的起源》，还写了不少文章十分引人注目，比现在知名度要高很多。此君性情豪迈，颇为狂狷，不知怎么说起来“你们杭州大学的沈文倬，那可真了不起”，顿有肃然之意。我毕业留校几年后，学校分的房子在杭大新村，那时被称作河南宿舍就在学校的对面，沈先生也住在这里。从小区到学校的路上，偶然会看见先生，每每看见我总是毕恭毕敬，先生不善言辞，面容上总是带着长者宽厚的微笑。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想起来很有趣。记得当年沈文倬先生的论文大都发表在《文史》上面，通常都是比较长篇的论文，最可笑的是我等竟然连有些论文题目上的字也认不全。这样再回想那时候他讲的学问，字都不认识更遑论学术了。越是如此越觉得高山仰止，这种高山仰止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前辈大师的敬畏和对学术的崇敬。我突然想到我们现在的考评制度，沈先生一生并没有多少著述，他虽然早在50年代末就曾于上海主持编写《中国丛书综录》，但其学术地位却是80年代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而确立的，据说他80多

岁后来也出过一二本书。如果从数量上来说，显然无法满足现在的考评条件，他也没有过什么纵向横向课题，没有什么项目经费，几十年来也绝少参加什么学术会议，不要说没有留学博士的头衔，就是连国内大学文凭也没有，要放到现在估计只能被边缘化或者被精简掉。沈先生以毕生精力皓首穷经，一部著作写作 40 余年，这在今天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幸好他那时候际遇的不是一个以冰冷的数字和机械模式考评人文学者的制度，幸好他那时候的校长和教务长知道他虽然著述很少，但是学问却实在是了得，所以还是十分敬重能使他成为国家人事部批准的终身教授。我们整天呼喊什么大师啊，看来大师的出现很大意义上来自于对学术和大师的敬畏。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听不懂却依然崇敬的原因。

[返回目录](#)

老校长陈立和工业心理学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德语专业宋宏亮

陈立教授从 1979 年任杭州大学校长。他是中国工业心理学学科创建人。心理学是很神秘的学科，我以为心理学是研究神经病的科学，我在杭州大学选修过心理学公共课，就是带着这个好奇心去的。我始终不明白什么是工业心理学，心理学跟工业怎能联系起来，感觉工业心理学一定是很抽象纯理论学科，一辈子也无法理解。

直到近些年，我接触到一些国内人工智能项目，陪着领导考察德国企业的智能机器人，读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翻译了一些文件，我突然发现，智能机器人最难解决的问题不是理性逻辑，而是心理逻辑，而心理逻辑应用在工业，就是所谓人工智能技术。

陈立校长研究在工业领域中人的心理活动，和这些心理活动对工业的影响，其实已经考虑到了智能机器人的心理逻辑，他超前了半个世纪。陈立在他 1990 年代的一篇论文中，就机器人心理逻辑问题有段论述，解释智能机器人是否能理解人的心理，他举个例子：例如一个“不”字，能在不同的场合带有很不同的意义。例如假若送女友一个很贵重的礼物，她说了一声“不”，你是否就会把礼物拿回来。大概你是不会的。因为她很可能不是不要，而只是不好意思，她心里还是很感激的。这和外交官说“不”就完全不同了。我国古人有句话说：“不以词害意”，也就是口说的和心想的不是一回事。这是普通的常识，机器人是无法辨认这些细微奥秘的。

陈立教授 1930 年公费赴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留学，师从著名心理学家斯皮尔曼教授，并于 1933 年获伦敦大学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英国工业研究所和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杭大校长陈立于 2004 逝世。差不多十年以后，人工智能技术终于等到了井喷的那一天。智能机器人开始学习，模仿和掌握人类的心理逻辑。人的心理被机器人识破，这个恐怖的时代终于开始了。智能机器人从解脱简单归纳与推理的逻辑中解脱出来，科学家的思维摆脱了牛顿“那头只会归纳的驴子”。

人心莫测，终于成为历史，现在人的心理活动跟智能机器人能够对弈，这种机器人面对领导会奉承拍马，面对美女搭腔套磁。

可惜陈立校长没有等待这一天。智者总是走在未来，当未来到来，他已飘然而去。

[返回目录](#)

第六章：同学

外语系 77 级新生代表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1978 年 3 月，刚进杭大外语系，被分在五班。外语系 77 级共有 6 个英语专业班。最初，五班的班长是廖诺，因为他是从江西红区来的，还是班上唯一的党员。

一次班会上，好像是交流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的感想。同学们各自谈了自己的故事。当时不知怎么想的，别出心裁，用英语谈了点看法。也不知有没有同学听懂。

过后不久，年级主任徐潮文老师召集各班班长讨论外语系迎新大会。也许是廖诺举荐了我，因为我在班会上一时心血来潮用英语发言。或者是班主任李根丽老师有意栽培，当时她负责外语系 77 级 6 个英语班的教学。一天，李老师找我谈话，让我准备在系里举办的 77 级迎新大会上作为新生代表用英语发言。

于是，周末回家，看了几期《北京周报》英文版（Peking Review），拟了个稿子，送交李根丽老师过目。

外语系 77 级迎新大会如期在外语楼 252 大教室举行。首先是系总支书记程贤政老师致欢迎辞，祝贺我们成为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发言中不免一番鼓励。致辞的应该还有系主任鲍屡平先生和教师代表。接着是我作为外语系 77 级新生代表走上讲台，面对着黑压压座无虚席的大教室，拿出稿子照本宣读。

刚进杭大时，我英文阅读、朗读和写作有点基本功，因为从小在杭州外国语学校长大，得天独厚。入校前还在杭十三中教过一年半英语。但口语会话能力还很有限。

当年的迎新发言稿，具体内容已经模糊，大概有两页纸，无外乎是感谢中央英明决策，重启高考，让我们有宝贵机会上大学，为

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记得最清楚的是结束语，援引了当年的流行口号：“The ice is broken; the road is open.”（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

迎新会压轴的是外语系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代表，是个女生，不记得名字了。她的欢迎致辞，不用稿子，脱口而出，且悠扬顿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返回目录](#)

世界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外语系 77 级 6 班任国平同学，不知从何时起，成了“世界语俱乐部的成员”。天天口中念念有词，几乎不间断。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背着书包出去，很晚才回来，估计都在图书馆攻读世界语、英语和法语。

后来我们都不叫他名字了，以 Esperanto（世界语）代之。

任国平行动敏捷，体格强健。他好像从来不会累，我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比我们懂事多了，在我们班里有点大哥的味道。

他说过：“世界语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专用语言。将来世界语一定是世界的统一语言。”

这些经典话语，比毛主席语录还深刻，至今回荡在小弟耳边！

[返回目录](#)

好名字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当我用微软拼音输入法连续打进肖兆才之拼音时，马上出现“小招财”。妙哉！岂只“小招财”，大招财也。

肖兄父母当年给他起的名字，寓意深远，大有玄机。为何？“兆才”也好，“招财”也罢，“兆才招财兆彩招材”，都含大智大贵大富大顺之意，哈哈！

果不其然，几十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浪潮滚滚而来，国家需要“人才”和“钱财”，“才财联合”不就是强强联合吗？“招（才）财进宝”不就是国家发展大计吗？肖兄父母可谓大有先见之明，神人也！

如今的社会“向前看”不如“向钱看”，故命名馆或取名馆如雨后天春笋应运而生。举小小温州为例，命名馆就有几十家，其布置和环境各有特色，有传统式的，也有摆上一台电脑连上一个打印机的现代化式的。“师傅们”各出奇招，改名者络绎不绝。大人小孩无不认为取个好名可受益一生。

但本人有些学生经命名馆改名后的名字却不伦不类，非中非洋，实在不敢恭维，有些简直是乱弹琴。我觉得现在这些坐堂的取名先生，应该拜肖老先生为师傅。肖兆才（招财）的名字，可谓经典绝伦。

注：肖兆才是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 6 班学生。

[返回目录](#)

同学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胡波

寻老乡，找校友，这是中国人到了异地他乡的习惯。身居海外尤为如此，本人也不能免俗。

记得第一次遇到杭大学友是在 80 年代的非洲。当时我在那里执行援外任务，帮助当地修建一座小型水电站。工地处于原始森林深处，基本与世隔绝。某日，营地驶入一辆光鲜 4W 越野车，跳下一位个子高挑、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子。一看，觉得面熟；一交谈，原来是杭大外语系 78 级的学妹。谁能想到能在万里之外的非洲相遇（她也在另一处援外项目里当翻译）。当然少不了一番热聊，话不投机也很难。其间，她大谈有个妹妹是国内当红的影星，一下子整个营地中国人的眼球都被吸引过来了，大家洗耳恭听——在非洲的密林深处，听一位漂亮的女人讲述屏幕上动听的故事。因为这件事，我被工友们抬举了好几天，好像我与那位女星相识似的。

又过了若干年后，到了 90 年，有幸被国家公派去法国学习项目管理。在巴黎一呆就是六个月。每逢周末或假日，日子最难打发。法国境内该去的都去了，该玩的都玩过了，周边国家想去又去不了（适逢 6.4 事件发生不久，西方国家因有难民之虑不发给中国公民旅游签证）。一到休假日苦于不好安排，心里老想当地有相识的老乡、同学带我转转或聊聊天就好。最近才知道同班的张温柔同学就在巴黎，可惜晚矣。在法期间，上班在南塔尔（Nantaire），住在圣克里斯托弗（St. Christophe），周末经常去温州人聚居的第十三区打牙祭，说不定张温柔同学就在哪个附近。

时光一晃又过去了十多个年头，在澳州这块异国土地上尝试过不同工作之后，终于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咨询公司。地点定选在

悉尼内西区的伯伍德（Burwood）。一日在楼下的人行道上看到，一个人好面熟，觉得像大学同年级的一位同学。由于当时记不起名字只能作罢。后来又在同一条街上多次相遇，我决定即使冒昧也要问一下。等再遇见时，我上前问道：“你是杭大外语系 77 级的吗？我认识你。我在这条街上遇见你好几次了。前几次，我不敢认，怕太过冒失。现在我敢确认肯定是你”。看他还是半信半疑的样子，我就提了另外一个同学的姓名。我说你在杭大时，经常和凌建平一起饭后散步，对吗？（凌建平也是外语系同年级同学。我们经常代表年级参加 4X400 米赛跑，所以比较熟悉。）他连连称是。他，就是陶冶——我在澳州遇见的第一位外语系 77 级同学。说来也巧，陶冶家就在同一个区，而我们两个的办公室也相距不远。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往来。（注：陶冶现在已是悉尼城里颇有知名度的中英文双语笔译人才，经常承接政府和律师事务所的文案翻译任务。）

第二位在澳州见到的同学是同班的赵雪芳。2002-2003 年，她来墨尔本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培训。当时正值冬季，我都没怎么考虑，就携全家从悉尼一路驱车到墨尔本。两地间的距离有 900 多公里，和夫人轮流当班驾车，只用了不到 8 小时便赶到。记得为了找一个像样的中餐馆，颇费一番周折。我们两人当地都不熟，驱车转了好久，仍毫无结果。最后只有进了一家俱乐部请小芳吃一顿自助餐。好在大家都意不在此，找个地方叙旧才是真。

（写于 2007 年）

[返回目录](#)

感触和启发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胡波

在网上收看到温时幸“杭大轶事”一文，颇有感触，也颇受启发。

说感触，是因为本人和时幸在校时，曾同为一班（英语专业 5 班），他又是一班之长；说的更久远一点，时幸母亲和我父亲同为文二街上邻校的教书匠。我们还没进杭大前两老就相识。可谓“两代人的交情”。而今一别 25 年，感触不能不深。

说启发，是因为随着“同学会”的临近，时刻有一种“贡献”一点什么的涌动，但苦于不知从何处着手。时幸“杭大轶事”一文，其内容，其体裁开启了我的思路。

（写于 2007 年）

[返回目录](#)

“老狗”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中国人对狗的看法，总的来说贬多褒少。翻开《新华成语词典》，什么“狗盗鸡鸣”、“狗急跳墙”、“狗尾续貂”、“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彘不若”，比比皆是。唯一赞赏狗的只有“狗吠非主”一条。

美国人对狗的看法，则全然不同。狗在美国不仅是宠物，还是家庭成员；不仅可以登堂入室，还能与主人同榻共眠。狗在美国，似乎也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见到生人，一般都极为热情，不但摇尾示好，还往往会上前“吻”你。中国人对此可能会受宠若“惊”，美国人则会相拥互“吻”。

外语系 77 级主修的是英美语言文学。既然是学习英语，对英语的语言环境，包括文化背景，自然要有所了解，进而爱屋及乌，对美国文化中的狗，也就另眼相看。学习英语成了转变狗的形象之契机。

有位 77 级仁兄，甚至以“老狗”自喻，美其名曰：“老狗见多识广”（Old dog knows all the tricks.）至于这位“老狗”究竟是何方神圣，77 级同窗一定心知肚明，无需在此点破。

且说这位“老狗识途”（Old dog knows the way around），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四处溜达，足迹踏遍东西南北。先在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叼了个博士学位，继而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吠话比较文学，后来又在宾州传播中华文明，最终在南加州觅得“香格里拉”。在美国向美国学生讲解美国文学！能不把“狗”尾高高翘起？令人欣慰的是，“老狗”前年已获得终身教职，至此无忧无虑，优哉游哉。

既是“老狗”，自当本性难移。“狗”道热肠，无论走到哪里，亦都恒古不变。记得本人当初刚来美国，“老狗”毕业在即，热情邀请游览他家附近（120 公里外）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开着刚买的二手“小马”，揣着刚拿到的驾驶执照，抖抖索索地上了高速公路，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开往纽约州罗切斯特。

“老狗”一家住的是罗切斯特大学的联排别墅（townhouse），上下两层，比起杭大的住房，无论面积还是舒适程度，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老狗”正在准备论文答辩，百忙之中，仍亲自带我们去尼亚加拉瀑布游览。“老狗”当时开的是福特公司的名牌金牛（Taurus），马力大，而我的“小马”力虚，好不容易跟上，“老狗”又怕撞他狗尾，便往前窜，跟跟窜窜，窜窜跟跟，煞是有趣。

“老狗”戴上博士帽之后，精神抖擞，租了辆卡车（U-Haul），一路开到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上任。后来，本人亦毕了业，在南伊利诺伊大学工作。“老狗”又热情相邀，便前往香槟相聚。“老狗”亲自下厨，为我们下了碗沃面，嫂夫人教了内人一手做花卷的手艺，受用至今。当时，“老狗”的女儿在芝加哥上最好的私立高中，兼修钢琴。“老狗”到了周末，都会开车去接回来。那天也跟着“老狗”去芝加哥。“老狗识途”，开得飞快。本人迂腐，拘泥于规章制度，不敢超速。“老狗”事后传授秘诀：开车可以随大流（follow the flow）。别人开得快，跟上就是了。枪打出头鸟，警察只抓领头的车。

后来伊利诺伊经济不景气，修比较文学的人又少，便把香槟分校的比较文学专业砍了。“老狗”只得放弃热爱的专业，前往宾州阿伦敦市穆伦堡学院，教授并主持亚洲文化与文明项目。那年，我们在佛罗里达工作，假期开车去葛底斯堡（Gettysburg）凭吊素有美国内战转折点之称的葛底斯堡战场遗迹，顺便再次拜访“老狗”一家。“老狗”此时已是有产阶级，拥有自己的房子，两层楼，硬

木地板。看不出文质彬彬的“老狗”，修理家居亦是一把好手。

“老狗”有一手绝活，即用胶泥修补（caulk）墙角缝隙，平整光滑，绝对专业，本人是自叹弗如。那次，“老狗”热情依旧，让出主卧室给我们，自己夫妇睡客房。拳拳盛意，末齿不忘。

“老狗”南迁之后，尚未有机会再去登门拜访。逢年过节，也就一通电话。君子之交淡如水，“狗”道热肠情谊长。

注：文中“老狗”是杭大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潘大安。本科只读了一年，就考上杭大外语系研究生。

[返回目录](#)

好为人师的“小鬼”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记得一年级入学不久，班主任李根丽老师布置作业，说下星期测试英语介词。

我是从杭十三中英语老师考上杭大的，还有好为人师的陋习。

周末回家，在母亲的藏书中找到英语介词用法一书。回到杭大，在 6 幢寝室里备了下课。记得同班的刘燕碰巧来男生寝室，看到我备课。

一天下午，我自告奋勇为五班同学讲解英语介词的用法。第二天，李老师上课，也讲解介词的用法。所不同的是，我是用中文讲解的，李老师用的是英语。当时有同学眼睛就瞟向我。李老师察觉到，觉得有点奇怪。她讲课，同学干嘛看我？

下课后，我向李老师作了坦白。李老师笑骂了一声“小鬼！”

[返回目录](#)

鬼节话“小鬼”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10 月 31 日是西方传统的“鬼节”。中国的“鬼节”则在农历 7 月 15 日。同样是鬼节，中、西庆祝的方式不同。古时候，每逢鬼节，中国人都要在门前摆上食物，等候孤魂野鬼前来觅食。这种习俗属于“四旧”之列，早已给“破”了。如今知道中国还有个“鬼节”的人，恐怕寥寥无几。

而在西方，“鬼节”业已演变成孩子们寻欢作乐的日子。每年“鬼节”来临，商店里张“网”结“蛛”，还推出各种专为“鬼节”准备的服饰与装饰物品。天一黑，孩子们就走家串户，“Trick or Treat”，满载糖果而归。

同样是鬼，中、西的概念与形象不尽相同。在中国，“鬼”一般都是青面獠牙，披头散发，用来吓人的。而在西方，青面獠牙的“鬼”也不少，但小孩对此毫不恐惧。可爱的“鬼”也很多，大多是迪斯尼创造的卡通形象。

其实，中国人在生活中对“鬼”字的使用也是有区别的。“老鬼”不是什么好话，而“小鬼”则是昵称。

77 级同学中，就有不少“小鬼”。记得当年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因为他们是应届生，在我们这些上过山、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厂、教过书的大哥大姐中，像是乳臭未干的孩子，还特聪明，便昵称他俩“小鬼”。

可有个小鬼，人小志高，总不服小，千方百计想要甩掉“小鬼”之帽，跻身我们之列。他搬出年代为理由，说自己也是五十年代出生，尽管是最后一年，而另一个小鬼则是六十年代的。一年之差，也是年代之差。对此论点，另一个小鬼自然十分的不服气。可尽管

口中嘟嘟囔囔，却一时想不出有何妙计，可以拽住那个小鬼，同享“小鬼”美誉。女生中倒是有个更小的，可拉个女生垫底，也并不光彩。只好悻悻然，十分的无奈。

如今，两小鬼还是跟我们这些大哥大姐隔着一代。我们都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境界，他俩还在“不惑”的年代。不过，时过境迁，两小鬼已不再为年纪小而烦恼，对“小鬼”之美誉，听着也顺耳多了。心里恐怕还有几分得意，看你们这些“老鬼”，几年之后哪几个真正成了鬼？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来他俩要“鬼”笑到最后了。

本人在杭大也做过“小鬼”，并无任何反感。那是一年级时，拜班主任李根丽老师所赐。那一声“小鬼”，听着十分悦耳，声调中充满着慈母般的关爱，至今记忆犹新。不知李老师如今身在何处？“小鬼”在此遥祝康健！

想必，“小鬼”一语出自师长或同学口中，听在耳中竟有受用与否之别。也许“小鬼”出自同学口中，具有倚老卖老的意味，甚至有一丝揶揄之意？也许是年少气盛，不甘落后，即使是年龄也不例外。无论如何，“小鬼”已成往事。“鬼节”来临之际，勾起对杭大“小鬼”的记忆，谨以此文纪念。

[返回目录](#)

久违的同窗邬晓阳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2008 年 3 月的一个星期天，机缘巧合，得到邬晓阳的电话号码，马上打了过去，一则问候商亚南老师，二则也想了解邬晓阳的近况。

曾经在英语快班与晓阳同班两年。记忆最深的是，在一次班会上，晓阳说我具有“sense of justice”（正义感）。也许人都愿听好话，但晓阳的见解别具一格，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极像当年的商老师，尤其是发音与节奏。我打趣地问道，是否把中文都忘了？晓阳说，哪能呢，只是平时没有机会说，所以习惯使然，脱口便是英语。

回忆起杭大的岁月，晓阳颇带歉意地说，当年不够成熟，孩子气十足，有时还会模仿一些带有地方口音的同学，给那些同学带来感情上的伤害。我说，可不是，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居然在评语中说同学参加集体活动不够积极！回首往事，颇感愧疚。我对晓阳说，能想到过去的不足，说明现在成熟了；不但是成熟了，还是对自己的要求高了。否则哪来的歉疚之感？

有些牵涉到私隐的事，本来不该问，但一直萦绕于怀，还是启了齿。令人欣慰的是，晓阳婚姻美满，与夫君 BURRIS 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BURRIS 曾经在杭大教过我们美国文学，所以晓阳也可算是我们的师母？还是当作师妹更为自然。

谈到后来，晓阳说起了杭州话，还是乡音未改。晓阳问起了沈迈衡、陈淑君、张温柔，还有一位来自宁波的卷发女生。我就我所知向她一一介绍，还答应把我们的联络图寄给她。

欢迎晓阳重返 77 级大家庭！

[返回目录](#)

怀念郑明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周遇春

郑明是我到杭大读书时最早认识的同学之一，因为他也在走读班。

郑明高大威猛，要是穿上古时候的盔甲，绝对是一名相貌堂堂的纠纠武夫，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易如反掌。所以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无法把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和数学这门精细的学问联系起来。

当然这是表象，其实郑明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照顾起女同学丝毫不亚于我。但是我还是喜欢他豪爽，仗义，不斤斤计较，甚至有些鲁莽的性格，可能这与他出身军人家庭有关。总之这样的男同学是很多男同学愿意结交的朋友。估计女同学也欣赏他这粗中有细的男生。

郑明喜欢打篮球，我也喜欢。所以很快就成为球友，每天下午，只要没课，我，郑明，胡觉亮，严兄，陈晓华等就会去球场打上一阵。郑明个头大，又是近视，三步上栏的时候，可能不太看得清前面有没有人，一副舍我其谁的勇猛劲着实叫人害怕，必须退避三舍。也只有我比较二，敢去阻拦一下。其他人早被挤到边上去了。当然我也不笨，发现我这小身板实在顶不住，弄不好还要吃苦头，有时候也不得不让着些，可是这一让，倒叫他吃了次苦头。

那次，我们这些人又开始打球，郑明勇猛如常，在一次表现他三步上篮的时候，我闪到了一边，因为没人挡他一下，于是他直接就撞向篮架，只听咚的一声巨响，篮架晃了晃，等我们回过神，发现在他的额头与篮架的亲密接触中，开了个小口。去校医哪里包扎

了一下，没几天又出现在球场上，依然勇猛无敌。瞧这额头长的。可是，他最终还是撞不过拖拉机。

郑明是第一个离开我们的同学。每每想到他，我就会拿出当年的毕业照，照片中的他永远那么年轻，眯着眼，脸微微朝上，双手向后背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再过几十年，也许我会再次和郑明相遇。我一定要问问他，过得好不好，拍着他的肩膀说：哥们，咱们再一起努力，考上杭大做同学。

[返回目录](#)

顾先生的高论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倪瑞杰

外语系 77 级 6 班的顾宏远，脑袋大，很聪明。

还是上大一时的时候，那天中饭后，他从对面宿舍来到我们宿舍，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基辛格”。只听顾宏远对我们说：“你们知道 Kissinger 这个字的含义吗？”没等别人回答，顾宏远就娓娓道来：“kiss 是动词接吻的意思，加了-ing 变成现在分词，表示正在接吻，又加上后缀-er，所以意思就是‘正在接吻的人’或者‘接吻者’。”

哇塞！高论，至今记忆犹新！

[返回目录](#)

群众的呼声

——杭州大学经济学系 77 级政治经济学专业史晋川

讲个俺和殷国伟室友在文二街的小故事。

当年在杭大政治学系读书，俺和国伟兄是同班同组同寝室的“三同”同学。他睡上铺，俺在下铺。

国伟兄读书用功，睡觉比较晚，可一旦入睡，就把全寝室同学当作领导，让大家倾听他这个唯一群众的“呼声”。

有一次，俺实在不想再听群众“呼声”，敲了多次上铺床板未果，只好打开国伟兄的蚊帐，以蚊虫止呼声，效果非常好。

国伟兄第二天起床后，发现帐门大开，大骂哪个家伙这么“惨无人道”！

[返回目录](#)

自画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肖兆才



外语 77 级 6 班的肖兆才回来了！

在杭州大学时的趣事太多了，他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就写写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吧。

他 88 年去了北欧的瑞典，在一个不到 10 万人的小城住了 10 年。

1998 年受公司委派来上海开设了在中国的第一家分公司。

在上海工作和生活了 7 年后，又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嘉兴。

这是一座美丽精致的浙北小城，没有堵车，没有让人窒息的人流，有的是可以让人静静坐着发呆的地方。上海太大了，杭州也变得太大了，所以他选择了嘉兴。

老实说在校时，他是个小混混。高中时，他可是学校一个数一数二的高材生啊！到了大学，却发现自己前后左右都是能人巧匠、读书高手。他是怎么也赶不上的了，便开始混了。

还好走上工作岗位后，他在大学学的也绰绰有余了，并没有用上“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十八首：“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日……”）。

到了瑞典后，用了两个月时间学会了广东话。粤语在海外可算是国语了，不说粤语是很难和华侨沟通的。

半年后通过看电视（有字幕）学会了说瑞典文。开始时感觉瑞典文听上去象绍兴话，后来才发现瑞典语更接近德语。一年后，当地的老华侨们收到政府公文后，便来找他翻译了。“大陆仔”便成了他们那个城市华人圈里的秀才。

在校时他的成绩在班里虽然是垫底的，但对付那些公文，和瑞典人吹吹牛还是得心应手的，毕竟是语言科班出身的嘛，而且是鼎鼎有名的杭州大学，哈…哈…哈…

出世时，父母给他取名“兆财”，希望他长大后能发财。上小学时，老师自说自话地把他的名字改成“兆才”了，说想要发财，先得有才。去瑞典后，瑞典同事们固执地把 CAI 发成 KAI，怎么说都没用。耳听着自己美丽而意义深远的名字被凌虐了，他就索性去税务局把大名改成 PATRICK ZHAO KAIXIAO 了。台湾朋友说，他的“肖”是肖像的肖，不是姓氏的“萧”，中国大陆把萧肖相混是对中国文化的摧残。于是乎，他的中文名字就成了“萧兆凯”。

名字改了，性格也自然变了。瑞典人一般性情平和、不爱争吵、害羞、不善言谈。唉，如今他也那德性了。他曾努力想修正自己，以期重新捡回以前那个在台上蹦蹦跳跳的“小裁缝”，没乐找乐，从来不受学习成绩好坏的左右。但几年下来，成效不大。切，不改了，都 60 岁了，还改什么？！

[返回目录](#)

荒唐的评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1989 年 6 月，我完成了在美国蒙大拿大学为期一年的进修，计划在回国之前到东西两岸看看。

先是乘坐美国的长途汽车“灰狗”（Greyhound）离开米苏拉（Missoula），行程将近两千公里，历经 35 个小时，抵达洛杉矶。陈依群请朋友到灰狗车站接我去南加大附近的公寓。

游玩了洛杉矶的迪斯尼乐园和环球影城后，又乘飞机前往纽约。幸运的是，在蒙大拿大学进修期间，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来校园促销，便申请了一张运通卡。凭着运通卡和蒙大拿大学的学生证，我只花了 99 美元就买到一张从洛杉矶到纽约的来回机票。

到纽约后，在凌建平张力群夫妇陪同下，参观了联合国大厦，见到唐可青。当时她拉着我的手，问我还记不记得当年她考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时我写的评语，说她参加集体活动不够积极。当年居然如此一本正经，差点伤害到同学的前程。悔之晚矣！

注：凌建平、张力群和唐可青都是杭大外语系 77 级同学。

[返回目录](#)

可怕的眼神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77 级的学生，应届生很少，每个班可能也就一、二个，大多同学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有朝一日能够上大学，大家都十分珍惜时间，只争朝夕。我们常开玩笑说，我们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周末依然在学校里看书。

大学一年级。有天晚上，我在小教室里看书。因为眼睛近视，平常都戴眼镜，看书时觉得还是摘了下來看比较舒适。

不知看了多久，刚抬起头来，正巧赵雪芳经过我的桌前，吓得叫了起来：“太可怕了！”

本人脑子一时还转不过弯来。什么可怕？我有那么可怕吗？后来想想，也许眼睛盯着书本盯得太久，以致直愣愣的不会转动。但还不至于像狼吧？也许是平常看到的我都带着眼镜，突然看到一双赤裸发直的眼睛，才会惊呼？

[返回目录](#)

记忆碎片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从寝室楼出来，到食堂的那段路不长，约百米，路经大礼堂和女生寝室楼。这百米是人生中重要的一段，因为每天必走三次。这一走走四年。当然寒暑假除外。不过有部分同学的寒暑假不除外的。

这个食堂很大，不单单只有外语系的学生在用餐，还有历史系和教育系的学生，不过互不认识，只是眼熟，互不打招呼。其实一个系的同学有的也只停留在眼熟，也互不打招呼，尤其男女生之间。但时间一长，还是分得清本系的和外系的。

这个人流集散地，一到点，进进出出的人就多了，就热闹了，就有人声鼎沸的味道了，就会有许多可能或可以演绎出人生故事的“插曲”。

我就是在通往食堂的路上认识了一个教育系的同学。他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碎片，一个弱音符。

为什么会认识他，怎么认识他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与他在这条通往食堂的路上，驻足说过话，而且不止一次。为什么会驻足在那儿而不是停留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也想不清。也许他正好要去食堂，而我正好打完饭朝自己的寝室楼走；或者正好相反；但为什么不是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外系同学一样，擦肩而过，而是驻足交谈？我想一定是有个缘由的，只是我想不起来了。

他长得非常俊朗，戴一副上沿黑边的眼镜，显得十分清秀，中等偏高身材，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人，是学什么都能很快学会，而且还能学得很好的那种，话语里透出一种有底气的自信。我知道他

是有资格自信的，我带着一种欣赏注视着他，听他说话，作为回应，我也会说几句。短暂的交谈给我留下很正面的印象。

这种有底气的自信我在别处也看到过。那应该是在 1979 年或 1980 年的初夏，一个很好的天气，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围站在一起，相互之间说着话，有的多说点，有的多听点。其实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其中有一个说得多一点，他的模样很多地方有一点像我在通往食堂的路上驻足与之交谈过的那个教育系的同学。他透着自信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得了。我不可能有那么好的记性，但我记住了他的神态，很有感染力的神态。末了还忍不住问了他是哪个学校的，他答：北大的。

相由心生，我常常以貌取人。但也有“失手”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好象是在某个比较正式的社交活动上，我正兴致勃勃地与人交流着，但眼睛的余光注意到不远处靠近窗台的角落站着一个人其貌不扬的年轻人。我说“其貌不扬”是针对男女对异性的基本审美观而言。他个儿很矮，是大多女性会认为过于低于择偶标高的那种，也没戴有学问的常会戴的那种很秀气的眼镜，脸微长，下巴倒有点坚毅，但绝对不会让你往高处想。我不知出于那种原因，走了过去，于是我们有了简短的交谈。他是清华的，很厉害的专业。

后来在校园里偶尔会远远看见那个教育系的同学，但再也没有了驻足交谈，也没有了延续的故事。以后也没有见到过那位在公园里见到过的北大生和那位清华生，“萍水相逢”是最好的注解。但我记住了他们，他们成了我人生华彩段里的几个音符，虽然很弱，虽然盖不过其他重要的音符，但它们如同泛音，轻轻的，淡淡的，成为人生交响曲里的一丝很有韵味的余音。

[返回目录](#)

我在杭大过的第一个年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陶宗德

又快过年了。这几天，外语系校友群里大家对我那张读杭大时第一次在外过年的照片点赞有加，令我深受感动。更要感谢晓康的互动，有件事我不说出来恐怕晓康自己也完全不记得。

那是在杭州大学的一个寒假。放假了，就在上海豫园拍完照回杭州的第二天，我在我们班 334 的邮箱里收到一张从宁波慈溪寄来的包裹单，好奇的是寄件人是周晓康。好奇之余我拿了学生证立马就去了我们外语系旁边的那个小邮局。



记得是一个白布缝制的半个枕头大小的包裹，正面贴着邮件单。我用小刀割开缝线，里面显露出来的尽是一些花生，瓜子，糖果等过年吃的东西。对一个江西小县城来的，连回家过年的路费都凑不齐的，从未收到过包裹的穷小子，突然收到女班长寄来的年货，心里别说有多么的感动，太感动以致在开学后都忘记跟她道声谢谢。



时间一晃过去 37 年，如果我现在就那件事对晓康贸然说声谢谢，那她的好奇之心应该会远胜过我的当年了吧。时间过了这么久，她做过的事那么多，哪里还记得这区区小事一桩，而正是这件小事让我感恩了她一辈子。有时我想，好人一定会有好报，她能取得今天的成就，除了她的努力向上，也与她的善良，爱心和乐于助人有关。在这里我衷心祝愿晓康幸福，也希望有涌泉相报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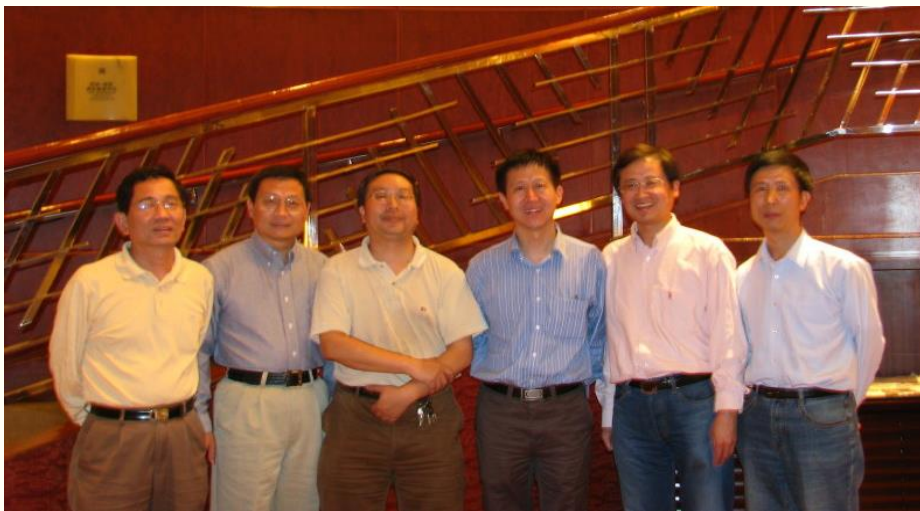


（写于 2017 年 1 月 11 日）

[返回目录](#)

杭城见丹非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2008 年的一个星期二下午，伍志萍见我上网，就 MSN 问我：“在杭州？”我说星期一刚到。她又问：“高丹非也在？”我说：“是的，但不知在哪？”建议问问王之光，他可能知道。过了一个小时，伍志萍又来 MSN，说高丹非住在凯悦饭店，只有当晚有空。

晚饭后，打电话到凯悦饭店，问丹非的房间号码，可电话打到房间无人接。正一筹莫展，还是殷企平夫人孙贻芳提起丹非应该有手机（真是老糊涂了！）。一查通讯录，果然有。丹非接了手机，说正和夫人在武林路上逛商店，半小时可回饭店。

于是殷企平开车带我去，还捎上陶宗德。路上，宗德打电话给倪连生、王之光，等，告知今晚聚会。

到了凯悦饭店，停好车，丹非和夫人已在大厅等候。毕业后还是第一次见面，丹非还是杭大时的丹非，清瘦随和。

上到 456 房间小坐。闲谈中想要窥探丹非情史，问起和夫人怎么相识的。还是高夫人心直口快，说和丹非小时同一大院，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同学。有心想问开裆裤时两小无猜的趣事，此时也不好意思出口了。

倪连生和王之光到了之后，想去四楼花园坐坐，走了一圈没有椅子，便下到一楼大厅，继续聊天。

问起丹非的事业。年逾半百，还能在同声传译上干的有声有色，令人肃然起敬之外，还有些好奇。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一般都精力不济，难以持续，而同声传译需要极强的记忆能力。丹非说起同声传译圈子的事，也讲了如何作准备工作。说得头头是道，听者频频点头，佩服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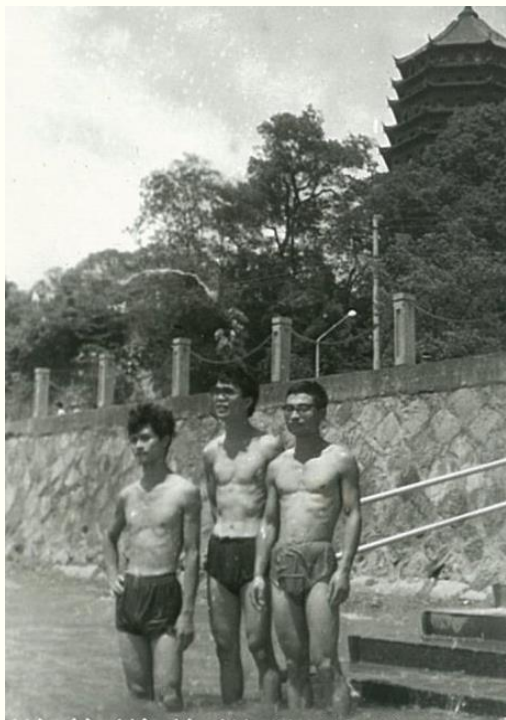
当晚聚会，伍志萍单位有事，无法脱身。郑宁宁也来过电话，与丹非单线叙旧。

丹非第二天就有同声传译任务，还是同声传译小组的组长，得检查传译设备。于是，我们十点告别丹非，后会有期。

[返回目录](#)

相会芝加哥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2007 年的一个周末，余英、吴永安、温时幸在邹书康李佐伟家相聚，一来是看望恢复中的佐伟，另外也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小型的同学聚会。

自 1982 年初杭大毕业后，余英还是第一次见到吴永安和温时幸。虽然相隔那么多年，彼此之间毫无隔阂，反而倍感亲切。其实在校时，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现在见了面，倒有说不完的话题。

吴永安与邹书康，也是杭大研究生毕业后，第一次见面。温时幸是五月份到芝加哥开会见过一面。当年在杭大读研究生时，三人同住一间寝室，共度三个春秋。书康还翻出当年三人在六和塔下钱塘江边的合影，个个营养不良，根根肋骨峥嵘。

晚餐时，书康捧出珍藏多年的茅台、五粮液，大家为佐伟的早日康复干杯。席间，也替肖兆才转达对佐伟的问候。书康和佐伟连连道谢，感谢同学们的关心。我们还品尝了佐伟亲手切的水果甜点。

饭后，大家下到地下室，吴永安主持乒乓擂台，与大家轮番交战；邹书康陪女儿和吴永安的千金打台球。佐伟在走步机上锻炼，

余英在一旁陪着，讲些养生之道。余英有一手绝活，就是按摩，有时替佐伟捏上几把，舒经活络。书康家还有“万利达”卡拉OK机，温时幸唱了一首《祈祷》，一首《牵手》。

后来，余英在计算机上放了带来的光盘，是在杭州同学聚会上拍的照片，让我们分享大家的欢乐。余英过了半夜十二点才回去。书康、永安和时幸，又回到地下室，聊到一点半，方才各自回屋就寝。

不知是前一天聚会亢奋未消，还是年纪大了，虽然是凌晨一点半睡的觉，早晨五点多就醒了。想想还要开八个小时的车，叠完床后，又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

永安起来后，书康还在酣睡，从楼上传来阵阵鼾声。佐伟的父亲上楼把他叫了起来。问佐伟，是不是书康现在胖了，才会打呼噜。佐伟说不是，年轻时就这样。这倒奇怪了，我们共了三年寝舍，永安就睡在书康的上铺，却毫无记忆。想必当年瘦猪一个，倒头就睡，任凭鼾声如雷，我自浑然不觉。

早餐有余英昨天带来的油条，还按照上海的习惯，用小碟盛上酱油。还有佐伟父母烧的稀饭、自己腌制的酸萝卜，书康买来的韩国泡菜、椰蓉面包，等。



边吃边聊，谈起读研究生时一起骑车去上海的经历。头一天骑了两百里，到嘉兴过夜，住的客栈是那种薄板间隔的通铺，记不得是否有跳蚤或是臭虫了。第二天，游览了南湖，品尝了

嘉兴粽子。第三天，一鼓足气骑到上海，在万体馆前合影留念。

永安和时幸都是长途旅行的爱好者。两人曾一起骑车从上海经苏州到无锡，本来打算过南京、杭州，再回到上海。后来永安有事，未能遂愿。我俩还曾骑车去莫干山和西天目山。来美国后，鸟枪换炮了，曾一起开车去新奥尔良（New Orleans）和迈阿密海滩（Miami Beach）。

于是在饭桌上，又提起明年（2008）开车去黄石公园的计划。书康、佐伟也来了兴趣。时幸给了佐伟一项任务：一定要快快好起来！这样三家才可以一起开车去黄石公园。佐伟连连点头，看来是欣然从命了。

临别时，佐伟的父亲给了永安和时幸一人一盒浙江兰溪制造的清凉油，说我们要开长途，带上可提提神。还是老人家想得周到。

短暂的聚会结束了。相信下次再见，佐伟一定恢复如初，又是一个“完人”！



[返回目录](#)

费城会友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2008 年 1 月，费城有个会。行前打了个电话给徐友铭，约好不见不散。友铭也是最近到费城工作的，才 3 个月。

那天下午四点半，来到友铭工作的美国联邦政府小型企业总署费城分局。进门后，安检十分严格，不但有机场那种包裹检查系统，还把我的相机扣下了！

本想拍个照，让大家一睹友铭办公的风采，这下没辙了。

友铭在安检门内等我，依旧身材修长，风度翩翩。上电梯后我问友铭，为何不准携带相机入内？友铭说，911 之后，联邦政府机构都加强了安检。也许是担心内部构造外泄，让恐怖分子可以研究在哪里安放炸药吧。

进了友铭的办公室，一眼看到摆在桌上的友铭夫妇合影。相形之下，梁卫平显得年轻精神，而友铭则两鬓斑白，有了一分老态。可不，友铭是家里挣工分的人，一人负担五口之家，日久操劳，历经艰辛，昔日英俊的脸庞，能不烙下沧桑？

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友铭，是新千禧年初。当时我在纽约上州的伦斯勒理工学院工作。友铭和卫平带着一对 3-4 岁的双胞胎，开了一辆越野车来看我。两个双胞胎，活泼可爱，头上戴着虎皮帽，圆头圆脑，在屋里互相追逐，对我客厅里的落地灯十分好奇。那时的友铭，神采奕奕，精神焕发。他在做信托业务，春风得意。未料，互联网泡沫 2001 年爆破，股市崩盘，所有的财富皆化为乌有。古有伍子胥一夜白头之说，可以类推到友铭。当时，不但友铭自己的投资血本无归，还牵连到许多同学，焦虑与愧疚之下，乌发染霜，当在情理之中。

下班后，友铭带我去他的住所。那是一幢高级公寓，外观像一家大酒店，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旁，对街就是费城艺术博物馆。公寓里住的大多是犹太裔老人，退休的市长和警察局长也住在那里。公寓里有各种服务实施，包括银行、餐馆、发廊、药店、旅行社、小型超市等，都是外门对外营业，内门为住家服务。这所公寓还有自己的大巴，每天接送住户上下班。住在这里，不仅环境优美安全，生活也是十分便利。看得出，友铭善于交际，无论是开大巴的司机还是门卫，个个都显得稔熟。

我与友铭有两代的交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家母曾在江山中学教过友铭母亲徐润芝英语，算是师生。而我与友铭则是同窗，一起考进杭大，又都分在五班。

1994年，家母来美，我曾陪她去华盛顿，住在位于杜邦环岛的华美达酒店。友铭当时是酒店的总经理，配有公司专用车，意气风发。友铭开车带我们游玩了华盛顿及周边地区。记得当时卫平和大女儿琳达周末也来华盛顿。闭上眼，还能依稀看到当年琳达和小女身穿泳装去游泳的模样。卫平曾说过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男人挣上十万，就可能变坏。”言下之意：钱少些无妨，能过日子即可，家庭和睦更为重要。

友铭现在是吃政府饭，比起以前在私人企业，钱固然少，工作要轻松得多，上任三个月就完成了年度计划的百分之七十。友铭常去华埠，向华人业主介绍联邦政府对小企业提供的贷款项目，鼓励大家向政府贷款，发展华人企业。

我们坐着闲聊。友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两家亲朋好友，一直谈到杭大同学。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临别，友铭送我回旅馆，互道珍重，后会有期。

[返回目录](#)

欢聚“揽月楼”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温时幸

2008 年回杭，除了看望父母外，第一个排在日程上的就是五班同学聚会。此次聚会，赵雪芳和冯国鸣，四方联络同学，精心选择聚会地点，面面俱到，我是十分感动。他们出钱出力，热情张罗，同窗情谊，尽在一举一动之中，表露无遗。

10 月 18 日中午，打的至“大华饭店”，左右找不到“揽月楼”。问附近的保安，说不知道。正要自己寻找，看到王伶俐上前问同一个保安，当然也问不出结果。两人刚转身，又听到魏向明的声音。回头一看，他也在问那个保安！三人相视而笑：都老杭州了，居然找不到地方！

“大华饭店”的地址是南山路 171 号，“揽月楼”是南山路 185 号。按照常理，“揽月楼”应该在“大华饭店”的右面。可右面根本没有“揽月楼”。还是王伶俐建议朝湖边走去，经过沿湖新筑的九曲步道，最后在“大华饭店”的左后方看到赵雪芳等。

今年聚会，有两位“新”同学。周心红毕业后还是第一次见到。令人欣慰的是，心红如今事业有成，是浙师大的外语栋梁。李宪平曾在宁波见过一回，那是毕业后去宁波招生口试的事。当年去过宪平家，也已二十多年了。虽然多年未见，此次相遇，一见如故，仿佛又回到杭大的岁月。

郑达华姓得好，无论怎样，都是“正”教授。著作等身不谈，瘦身确实足有成效。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唯有身体至关紧要。

周农依旧笑容可掬，处处与人为善。谦和的外表下，有双洞察社会的锐眼。生活中不如意事在所难免，保持积极的心态尤为值得赞赏。

冯国鸣古道热肠，连续两年开宝马去余姚接同学前来参加聚会。此处聚会，国鸣为大家安排了西餐，牛排和三文鱼供大家挑选。愿国鸣广开财路，赚完欧洲赚美国！

毕业后，与魏向明来往最多。那时，我住文三街，向明住文一街。逢年过节，向明都会上我家。临别时对我说，星期二聚会就不去了。坦率诚恳如故。

今年回杭的打算，第一个告诉的同学是王伶俐。那天看到她上MSN，便对她说，让她转告其他同学，说好“不见不散”。

施大芳还是那么瘦，比杭大时更瘦，瘦得有些让人担心。而她的夫君则红光满面，想起来就心中忿忿不平。有机会得上门评理，是怎么亏待我们大芳的？匀一下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揽月楼”是小芳订的。二楼的包厢附阳台，俯瞰西湖，面对保俶塔，位置极佳。包厢甚为豪华，像是董事会的会议室，用作“班会”，无形中提高了级别。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聚会期间，让服务员从包厢四个角落各拍两张。可能她没用过“这么大”的相机，按的劲过大，都抖糊了。早知如此，还不如轮换着自己拍呢。



在“西湖天地”碑前，最后合影。相约，明年再会！

[返回目录](#)

记杭大外语系 77 级三十周年团聚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周晓康



当年的杭州大学外语系大楼

4月21-22日，春意盎然的西子湖畔迎来了一批童心未泯、非同凡响的游子。他们来自大江南北，天涯海角，跋山涉水，飞越重洋，专程赶来参加老杭大外语系 77 级

毕业 30 周年的团聚。当年的宝石山下，黄龙洞一带，都曾留有他们踏青赏景的足迹和年轻矫健的身影；杭大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校园，都曾回荡着他们每天起早摸黑、废寝忘食地背诵英文单词和熟读课文的朗朗书声。一切恍若仍在眼前，殊不知一别竟已三十年！

21 日上午十点，我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和期待，夹杂着几分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世贸酒店的宴会大厅，不知还能否认出几个当年的面孔来？果然，靠近大厅的入口处，有几个女生在负责来宾登记。我见着她们都脸熟，但就是想不起名字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先直接进入了大厅，寻找筹办本次团聚的主持人，虽然也有三十年未见，但在这几年的邮件里还常来常往。

也许是因为我一手拉着一个大箱子，身上背着大包小包，一副旅游者的装束，风尘仆仆的样子，一下子吸引了里面的好几个人，还有已经进入工作状态、正在抓拍镜头的专业摄影师。大家都过来

跟我打招呼，很多人立马就能叫出我的名字，可我却一时无法“对号入座”（也因为有的同学虽是同年级却不同班，那时就不太熟悉）。心中干着急，恨不得给自己改装一个脑袋！看着一张张和蔼可亲的脸，我只能以笑容相迎，直到在人群中认出了几个本次团聚的组织者：包绿菲、伍志萍、吴永安（他是从美国提前赶来的），还有几个以前的活跃分子，倪连生、吴树贵、余小强等，在他们的指引下先把行李安置好，再去登记注册。



这时，我看到了以前我们四班的老同学：陶宗德、蒋建平、黄一飞、姚暨荣、殷企平，还有我的老搭档班长李方，这几位的名字一下子就叫出来了，准确无误！看来还是取决于相处的时间和程度。同班的同学毕竟朝夕相随，甚至形影不离：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听讲、开会、活动；在一个宿舍里同吃同住，同进同出，真正的“同窗”，就像在一个家庭里长大，怎么也忘不了。只是岁月的洗刷，让大家一时不敢相认，可再定睛一看，确信无疑！

更有意思的是，从美国赶来的两个本班女生，孙利群和梅满，一个本是全班最小的小妹妹（祖籍绍兴），昵称毛毛，这回长成了一个落落大方的大姑娘，标准的成熟女性，乌黑的头发盘在脑后，拢成一团，酷似鲁迅笔下的主人公；另一个原是全班的大姐姐（文革时的北方知青），这回却像时光倒流，生命逆转，那苗条的身材和青春的活力，完全判若二人，加上那副黑色的太阳眼镜，竟让我一时认不出来，情不自禁地冲口问道：“你是哪一位？”这个场面

可真是充满了戏剧性！随着一声“好啊！你都不认识我了？”，“你就是……梅满？”大家这才化惊为喜！

随后，在一连串的问候、“对号入座”、化惊为喜之后，我们开始在自己班的餐桌就坐，三十周年的团聚庆典拉开了序幕。大屏幕上是一幅在郁郁绿叶辉映下含苞欲放的绿牡丹春光图，上面写着：团聚之歌



吴永安和流左红两位同学手持话筒、声情并茂地用英文和中文朗诵由吴永安创作、姚暨荣翻译的《团聚之歌》。这首诗歌用惟妙惟肖、机智、幽默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本次团聚的深情厚意和热切向往，用“Let's go to the Reunion”这一主旋律，吹响了奔向本次团聚的号角，激励着每个同学的心，点燃了大家的同学情。接着，大会组织者致辞，我班的包绿菲向大家介绍了本次活动的筹办过程和与会嘉宾——18位昔日给我们上过课的老杭大教师，有当年教我们英语、法语、英语语言学、英美文学、欧洲文学史的各门课老师和全年级的政治指导员，他们个个神采奕奕，风度依旧。

接下来是本次团聚的主办人原三班的吴树贵同学致词。此时，出现了一道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原本一个堂堂正正的七尺男儿，刚拿起话筒，突然一阵哽咽，欲说无语！面对着三十年前的同窗同桌们，他一时百感交集，眼圈都红了……他努力地想克制自己，但几次开口都泣不成声。全场肃然起敬，倍受感动！不时有同学从座位上发出呼声：“吴树贵，好样的！”我的心里也在说：此时无

声胜有声！人生能见证这番真情，实属千载难逢，三生有幸！这一幕的情不自禁，也给本次团聚画上了最淳朴、最纯真、最珍贵的一笔。相信每个在场的师生都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轮到我作为澳洲代表发言时，我引用了在飞机上看到的一篇关于上个世纪校园歌谣作者高晓松即将举行全国巡回演出的报道，里面提到他们当年在清华校园里自编自演自唱的那首《此间的少年》，至今也有二十个年头了，但他们的心始终是纯真如初。跟他们相比，我们的三十周年团聚，时间跨度更大，心路历程更长，感慨和回顾更多，怀念和眷恋更深。我扪心自问，毕业后在海内外的闯荡、拼搏，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搞翻译，当老师，教汉语，编儿歌，都得益于当年在杭大学的 abc，归功于教给我们用英语来求学、谋生、奋斗的这“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基本技能（生存工具）的老师们，感恩于昔日杭大给我们创造的学习环境和条件。“饮水思源”，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此团聚的理由。来自美国的同学代表叶子南的发言也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点，该是书生所见略同。

简短的发言之后，我给大家播放了我为本次团聚所谱写的《千岛举杯》（初稿为《翘首以待》）动画片，歌词是：

杭大外语七级，同窗苦读朝与夕。
学海无涯贯中西，事业有成报社稷。
春去秋来三十载，丁香花开又一季。
千岛举杯忆往昔，百骥伏枥志不移。

虽然我并无唱歌的天赋，但还是怀着一腔深情和真诚，高歌一曲，为大家献上了我自己的心声。

发言结束后，由我班的姚暨荣同学（组织者之一）介绍由他全程编辑的本次团聚的精品纪念册。连图带文共 138 页。全书分为七

个乐章：一、曾经沧海难为水；二、征途漫漫寻梦路；三、心既能安处处家；四、文化碰撞话中西；五、行看流水坐看云；六、爱到深处是无语；七、人生五十方起步。顾名思义，每个篇章都有其鲜明的主题和特色，虽然每个人的投稿和照片都是各自随意，不拘一格的。全凭编辑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量体裁衣，定身制作，把这些看似松散、五花八门的文字和图片用一根红线串连起来，让我们看到三十年前从杭大校园走来的一群天真烂漫、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满口 ABCD，满腔创业热情，投身于海内外的各行各业，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探索着生命的点点滴滴，最终又走到了一起。

“趁我们记忆尚未模糊，趁我们神志依然清醒，趁我们热血还能沸腾，出发，我们团聚去！”这是本书开篇最激动人心的诗句。

“人生一个圆。在奔波多年、寻觅多年后，你一定发现，自己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最初的那份憧憬。”“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杭大不是塾。无论你走得有多远，你都无法忽略这个转折，这个起点。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三十年的心路历程，是我们这辈子的全部价值。”这是本书第一章开场白中的至理名言。难怪大家一拿到这本银光闪闪、沉甸甸的精装纪念册，就都迫不及待地打开阅读，爱不释手！

不一会儿，大屏幕上播出了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 Auld Lang Syne（“过去的好时光”）。这是一首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老歌，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不朽之作，旋律悠扬婉转，似行云流水，如诉如泣，歌词动人心弦，催人泪下；也是我们这代人（也可以说是每代人）曾经并且仍然为之感动不已、百唱不厌的一首最爱。当年毕业之际，我们唱着这首歌，热血沸腾，热情澎湃，从此各奔东西，四海为家。今天，我们几个人自告奋勇地到前台跟全场一起引颈高歌：愿友谊天长地久！



至此，杭大外语系 77 级的 30 周年团聚庆典拉下帷幕。全体同学和老师们的拍照留念。又是一个令人激动、值得永世珍藏的历史镜头！真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刻，

让我们再做一回同学、同窗。

午宴后，我们坐上去临安的大巴，直奔组织者们为本次团聚所精心挑选的旅游景点——千岛湖。一路上，大家欢声笑语，说长道短，真像是回到了当年学生时代的集体活动。我跟我的老搭档班长李方邻座，他还是像当年那样体贴照顾，善解人意，温良恭谦让；我们在一起可以什么都说，什么都不说，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回，我打开《团聚之歌》纪念册，才翻阅了第一章的几篇“新浪网友”的杭大岁月忆絮，里面那几段关于“妈妈的包裹”、“顾先生的高论”、“Esperanto（世界语）”、“凭票香烟”、“内急+迅跑”、“摸黑洗脚”、“叫化鸡与东坡肉”的描述，便让我忍俊不禁，直至开怀大笑！李方风趣地说，你这是第一



次看，我们早就笑过了！言下之意，你已经落伍了！的确，在 2007 年的二十五周年团聚之后，在墨尔本的仲秀荣同学在新金山的学报上找到我之前，我就像与世隔绝，跟大家都失去了联系，对此一无所知。错过了那么多的笑谈，可惜之至！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山清水秀的千岛湖。一轮嫣红深沉的夕阳悬挂在青山绿水之中，若隐若现，渐渐地躲进西边的云雾里。在我们下榻的千岛湖宾馆，三班的仲秀荣跟我合住一个湖景房，隔窗就能欣赏近在咫尺的湖光山色。她用她的相机不失时机地拍下了夕阳下山的那一刻，堪称美轮美奂。好像是大自然特意为我们准备的一张明信片。

晚宴在千岛湖的鱼味馆，由本地“元老”、原六班的邵水潮老班长亲临接待，让大家品尝最正宗的千岛湖淡水鱼。我记不得那道菜的大名，但确是我在澳洲从未吃过的，真正的色香味美。

晚宴期间最抢眼的还是那名目繁多、各种组合的摄影秀。有以班级为主的组合：一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六班；有以地域为主的组合：杭州帮、宁波帮、上海帮、江西帮、绍兴帮、澳洲帮、海外帮、海内帮；有以职业为主的组合：教师帮、行政帮、企业帮等；还有一个独特的情侣帮；最有趣的是按十二生肖的组合：属龙的、属蛇的、属马的、属羊的、也有属猴的、属鸡的、属狗的、还有属猪的，属虎的，属兔的，属牛的，属老鼠的。由于 77 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面向全社会招考，加上当年的应届生，所以同学之间的年龄跨度之大，几乎涵盖了十二生肖的每一种动物，即每一个属相。这也是 77 级的一大特色。不幸中之大幸！正如本次团聚纪念册的开篇所言：“三十年前，我们这群幸运儿，在历史大潮的夹持下走进了杭大。我们无法选择，就像我们无法选择母亲，无法选择祖国一样。杭大外语系成了我们人生的转折。生命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积聚，新的孕育，新的起点。”我想，那天晚上，看着

这些十二生肖快乐俏皮的合影，每个人的心里一定会有无限的感慨，每个人的脑海一定是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晚宴后的节目是卡拉 OK 自助唱。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地、几乎是从头到尾地和同辈人一起观赏和参与这样的演唱会。大家选的大多是一些我们这代人所熟知爱唱的老歌，如《歌唱祖国》、《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等等，也有一些我出国后的流行歌曲。几位男生，如朱晓明、凌建平、毛冀钢、姚暨荣、殷企平等，歌声洪亮，嗓音迷人，激情澎湃，怎么以前都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一手？只因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种技术和设备，才埋没了这些颇具音乐天赋的才子。现在谁都可以即兴演唱，自信满满，一个更比一个强。

女生们也不例外。左红和梅满的歌喉逼近专业水平，歌声甜润，清脆悦耳。她们俩还有别具一格的表演动作，左红的滑稽相，令人忍俊不禁，梅满的太极拳，功夫到家。孙利群也能歌善舞，活泼可爱，一反以前害羞忌生的表现。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包绿菲和伍志萍，她俩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体态轻盈，潇洒飘逸，简直就是科班出身的舞蹈家！好几次大家受到她们的感染，也都不由自主地加入了她们的表演。还有金玲玲和杨玉明的交谊舞，军民手足情，珠联璧合，悠闲典雅，引人入胜。

看到大家都在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华，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也深受鼓舞。想到本次旅行途中在飞机上回忆起来的一首英文歌曲（One Day in May “五月的一天”，老电影《翠堤春晓》的主题曲），还是在杭大跟着同班同学沈迈衡（茅盾的孙女）学会的。相隔三十年，居然还能一字不拉地唱出来，又一次印证了音乐对于记忆的奇特帮助。于是，我也勇敢地站到了舞台上，为大家作了即兴演唱：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And held me to your heart;
We laughed then, we cried then,
Then came the time to part.
When songs of Spring were sung
Remember that morning in May;
Remember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不可思议的是，唱着这首歌，当年在杭大的校园生活历历在目：那时的我们正年轻，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还体会不到歌词中的那份怀旧和伤感；可这次前来团聚，时隔三十年，突然“蹦”出这首歌，再回味歌词里的含义，字字珠玑，情真意切，难道真有这样的巧合吗？真没想到现在该轮到我们来追忆那过去的好时光了！

本来，按组织者（包绿菲和毛冀钢）事先的要求，我还该给大家唱两首我的教学歌谣，为此我也曾跟吴永安和殷企平在邮件里打过招呼，请他们一起来个三人对唱：“这件衣服怎么样？”。但在这样的场面，感觉有点不太般配，难登大雅之堂，就免了。没想到

在我的演唱后，三班的左红突然跟大家表演了一段她自己改编的英文字母歌越剧版，引起哄堂大笑，全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我也借此东风，跟大家唱了一首我在教学中根据英文版改编的汉语字母歌，是我们老外学生最爱唱的汉语拼音。可谓同工异曲，不谋而合！

就这样，这场别开生面的卡拉 OK 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家个个精神百倍，兴致勃勃，越唱劲越足，越唱情越浓。谁能相信那是三十年之后的重聚，一个个都越活越年轻，赛过活神仙！是想证明“人生五十方起步”，雄关万里从头越？“当香槟满溢，啤酒飘香，青烟袅袅中，巧克力融化了心，融融暖气间，绿茶点孕育了情……如此温馨的团聚，还有谁不想去？”耳边又响起了《团聚之歌》那情深意长、魅力无穷的美妙诗句，让人如痴如醉，不知今宵身在何处？

第二天的活动，以游湖为主。我们坐上一艘称不上豪华但却非常舒服、宽敞的游艇，驶向碧波荡漾的湖中心，观赏周围群山怀抱、景色秀丽的千岛风光。自然而然地就想拍照。只见大家都往二层的甲板上走去。我也跟着上去了。“哇！这里真美！”看着波澜壮阔的湖面和远处星罗棋布的岛屿，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惊叹道。

回到船舱，只见大家都在三三两两地聊天逗乐，侃侃而谈。忽然间，黄金搭档的流左红和吴永安给大家来了一个“切西瓜”的即兴表演：“一个西瓜切一半，给你一半，不要啊……，给你一半，不要啊……”两人口中振振有词，一唱一和，而且是英汉对照，“现买现卖”，让在场的观众个个捧腹大笑，乐不可支！

欢乐的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游艇很快就要靠岸了。我站在那阳光灿烂的甲板上，望着眼前波光粼粼的千岛湖和船舱里三五成群、谈笑风生的同学们，一种恋恋不舍的惜别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同时也不能不令人由衷地感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两天的团聚，就像历史长河中轻轻泛起的一朵浪花，很快又消失在滚滚向前、奔腾不息的波涛中。

此刻，我坐在我在澳洲的伊莉莎山庄寓所写字台前，窗外是一片南半球独有的田园风光，牛马成群，绿草如茵，郁郁葱葱，连绵

起伏，伸向远处的大海。但我的眼前，还是闪现着西子湖畔、千岛举杯的那一张张同学的笑脸，同窗的音容。

再见了，亲爱的同学们，下次团聚再见！



（写于 2012 年 5 月 27 日）

[返回目录](#)

第七章：校园

校园记忆四则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1. 阶梯教室

我喜欢杭大的阶梯教室，因为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教室，有了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新鲜感。也觉得它有气派，有与大学问匹配的气势。有与高等学府相称的不同凡响。

小学里没有这样的教室，也不可能会有，因为有梯，因为小学生们人还小，喜欢你追我跑，会绊倒。中学里也没有这样的教室，因为不需要，因为没有上大课的计划。到了大学才有了上大课的需要。

阶梯教室因为有阶梯，使得坐在后排的同学有了居高临下、一览众人小的开阔感。阶梯教室里一共有几级阶梯，没数过，但每级阶梯的宽阔是很有印象的，一踏进教室，我常常为每步应该跨一级呢，还是每两步跨一级纠结过；从容不从容、心急不急，都可以从这跨台阶的步子里看出来。

阶梯教室好象两侧都有窗户，采光很好，没有压抑感；通风也因此很好。讲台上田字型四大块可以上下移动的墨绿色书写板显得很大气，只是上下移动时需要点力气。

我在阶梯教室里上过许多印象深刻的大课，比如古汉语课。古汉语课的老师是位女的，中年，短发，有时会在一侧的过道上来回走动。这常常让我想起中学的语文老师，她也是中年，短发，习惯一手捧书，一手插袋，优雅地在狭窄的课桌间过道上来回走动。这侧影是我喜欢语文的原动力。

但我大学的古汉语课修学得不是很好，有一次的期中考试只得了 52 分。我知道我为什么会考得这么差。是因为底子差，是因为底

子差而逐渐不喜欢古文了。知道了原因，调整好心态后，要改写考分应该不难，结果期末考试全班第一、全年级第二。但我古文底子依旧很差，而对古文的态度则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了敬畏。

西方艺术史课的老师个儿很高，也很健硕，之前好象还没见过这么高大健硕的人。他的声音有点浑厚，有点胸腔音，我有时会想，他唱歌大概会很好听，他大概喜欢唱歌。

西方艺术史对学习外语的学生来讲应该很重要，但我发觉真正重要的是你想不想学好它，不然，再重要的东西也只停留在理论意义上。这是我后来认识到的。

那一年的外籍老师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头发有点长，有点像现在的我，可能我的比他还长。但学问与头发不成正比，这点我明白。他讲课肢体语言不多，基本原地不动，也因此把学生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他讲话的内容和讲话的音调上。我不知是他刻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反正我坐在阶梯教室正中间的位置上，观察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嘴形和发音，但我是到后来才慢慢听出澳大利亚英语与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之间的区别来的。

当然阶梯教室的功能不仅限于此，我那次失败的英语演讲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我的一些夜自习也选择在那里，由此可见我对阶梯教室是情有独钟的。

2. 小教室

大学四年，大部分的白天时间是在小教室里度过的。说它小，其实足够大，足够容纳我班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在这个小教室里我们与许国璋先生浅聊，和俞大綱先生深谈，与薄冰先生探讨……

小教室在底楼，朝南。采光很好，记忆里全都是阳光洒进教室的时候。肯定也有雨天和刮风的时候，但就是没印象。能记住阳光，并把阳光定格在记忆里是一件好事。

但我好像没有临窗坐过，这个记忆不可靠，因为为了保护视力，老师要求我们定期换座。如果每个月换一次，那我起码每学期可以临窗坐四五回，但我就是没印象。我想大概是因为临窗坐的话，只留意窗外的景而会忽略窗户的存在。唯有隔着一段距离朝窗外望，窗户才会进入视线，才会与窗外的景一起留在记忆里。其实，没有窗户哪来窗外的景？

我记忆里的教室窗户始终是明亮的，甚至明亮得看不清外面的景，于是有了憧憬。以窗外的光线为背景，有几位同学的侧影始终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一位是带着眼镜的，另一位是不戴眼镜。其实坐在临窗的位置上的同学肯定不止他们俩，加上定期换座位，可我记住的就是这么两个侧影。不过，借助这两个侧影，我也难忘自己曾经的岁月。

教室的课桌与中学小学不同，是一人一课桌；而中学和小学都是两人共享一张课桌；它有很强的自主学习的暗示，也符合我们日益觉醒的独立意识。它是掀盖式的，里面容纳得下你渴望容纳的所有知识。

我们就是从那一方天地开始了各自探索精神世界的旅程……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如今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的不是黑板而是白板，白板上方卷着银幕，等待按钮起动的随时降落，等待投影。

而更多的时候，我也无须担心我是否为人师表、板书有无“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因为站在讲台上的，很多时候不是我而是我的学生。

很想再回到 252 大教室：那四块黑板是否依然存在、上下两块如何替换？上面是否还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地写满了字？

3. 杭大盥洗室

大学四年住在宿舍楼的第几层记不得了，但紧挨着我们寝室的楼层盥洗室很令人难忘。

这难忘不是指它的装修豪华，也不是指它的设施齐全，它其实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一间毛胚房；而是指它时不时飘荡在楼层过道里的气味！

这股气味与各男生寝室起床后没叠的隔夜床被味儿不同，更与餐厅里通常会飘出来的味道相去甚远，是很不讨人喜欢的那种。虽然我也知道这种气味对每个人来说不会很陌生，偶尔相遇也不会不给面子，用言语让它当场下不了台，但如果天天与它亲密无间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抓狂的。

由于我住的寝室几乎紧贴着令我难忘的盥洗室，所以它飘出的气味常常捷足先登，优先光临我们的寝室，除非过道里的风向突变。且来了还愿走，有点赖坐的意思，于是这股气味就经久不衰了。

我有时甚至怀疑气味是否具有穿透砖墙的神功？不然在宿舍门窗紧闭的情况下，它为何还在？它究竟从何而来？即便门窗大开气流贯通时，它为何依旧能持续不断地前赴后继地飘然而至，挥之不去地逗留在我们原本就不大的生活空间里呢？有必要这样鲜格格地赖着不走吗？

由于大学四年天天受它熏陶，我感觉我的精神状况开始出现问题：现在每每路过或走进公共场所的盥洗室，我都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大学寝室隔壁的那个公共场所。虽然此时此地此空间已今非昔比，气味也有了很大改进。因为我知道其本质没改！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是从隔壁公共空间不时传出的铿锵男声，尤其是在清晨。虽然这些铿锵男声的音乐性和旋律线不是很多，但混响效果还是很好的，那是那个特别的空间特别提供的，这点大家都懂。

不过这种特有的混响常常响得过早，以致有点象吹早了的起床号，使得刚才还在睡梦中的隔壁室友们有了一些不适，尤其是身上那些还没有打算彻底醒来的部位。

带着这种不适是没法欣赏混响的。但又无法拒绝。然而久而久之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声音的鉴别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基本上只要听到那里传来的第一个不在调上的音符，就能八九不离十地基本确定是谁在练“嗓”。

我有时在想，我后来的英语听力有所进步是不是和自己每天这样的听力训练有关？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也许应该感谢一下校方把我分配在紧邻盥洗室的寝室了，当然附带的气味是要除外的……

4. 杭大门外有条沟

我的方向感很差，出了商店门常常走错方向。不过我觉得分不清方向没什么可捶胸顿足的。地球是圆的，总会走向原点的。然而会使自己追悔莫及的是，一路走去，竟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些有意思的记忆。

当然迷路是要付出些时间代价的。然而迷路也并非一定一无所获。

正因为方向感差，所以杭大四年，我很少独自出去游玩。至今杭州于我还是很陌生的，能记住的路名不多。不过我觉得路名记住多少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沿途你看到了什么景致。

由于“深居简出”，所以我对杭大校园也不很熟。它有多大？我不知道。从未绕着它走过。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不知道。从宿舍或者教室出发，只熟悉去食堂的路和去图书馆的道。

然而我记住了它，杭大门外的一条沟！

整个杭大校园有几个出口，我不知道。它们的朝向也分不清。不过没关系，要走出去，要走得远一点，走出其中一扇门就是了。

我记得杭大靠外语系食堂那侧有一扇边门，我从那儿走出去过多次。为什么会选择那扇门，理由和原因都回忆不起来了。也许去某个地方近一点，想走个捷径。

走捷径有时是要付代价的。

我记得这扇门的门外有一条河沟。那条河沟究竟有多长，它从何而来，会流向何处，我不清楚，也没想过。今天忽然想到，但估计没人能回答。它是否依旧在哪儿？我想它多半已随改革之风，与杭大一起飘逝。

但为何就记住了它，而且那样难忘？是它很美？不是，它连平凡都称不上。它给我的感觉不仅仅是“很农村”，甚至有点丑陋！

但如果从这儿出门，我无法绕过它，必须直面它！起初是皱着眉头；后来走得坦然起来；再后来，看着它就像看着自己身上的一处熟悉的伤疤.....

今天我重新忆起它，是因为念想到了它。它已是杭大的一部分，因此也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虽然这部分不是值得炫耀的华彩段.....

我想：人生的风景其实不一定要美，美的不一定就是有意义的风景。人生的风景是能留在心里的东西.....

[返回目录](#)

黑板的变迁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英语专业孙淦钊

四十年前第一次到外语楼 252 梯形大教室听课，进门后发现前面几排已经座无虚席，便拾级步上阶梯，找到空位，低头默默坐下。打开笔记本，稍稍调整一下坐姿和思绪，便抬头正视讲台。首先进入视野的，不是站在讲台后的讲师（因为我们的教授个个仪表不凡、才思敏捷、口齿清晰，这位也一定不例外）而是前方那黑板。那不是一块而是呈田字形的四块“黑板们”！

一边思忖着大学毕竟与中学不同，教授会有比中学老师多得多的知识要传授，一边纳闷教授即使踮起双脚也无法碰到上面那二块几乎触及天花板的黑板，又如何能在上面写字？！

记得当年在中学读书时，教室里只有一块长方形的黑板，从左壁一直延伸到右壁。难忘的是当年语文老师的行书，写在黑板上，黑底白字，娟秀清晰。当然，书写任何时候都必须工整，不能“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说着他举起右拳，伸出左脚，惹得同学们忍不住笑出声来。虽然老师日后被大字报上纲上线说是“讽刺贫下中农子弟”，我却受益菲浅：写字绝不可“拳打南山猛虎”而“脚踢北海蛟龙”，尤其是板书！且不说大多 252 大教室的我们的教授的板书是否大有“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之势，我好奇的是如何写到上面那二块黑板上去的。好容易等到教授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地写满了下面二块黑板，只见左面下方的黑板上升到上方，上方的空白的那块滑了下来！教授接着授课、接着写，换下的左下方黑板写满了，滑动替换右下方的接着写……我和同学们飞快地记着笔记。说不定今天黑板上写的哪一条、哪一句，会是考试的一道题！

及至今日，我还纳闷：教授是如何让上下二块黑板滑动替换的？
按按钮还是推一把？抑或跳起来拉一把？

[返回目录](#)

广播室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周遇春

刚进杭大的时候，一切都是新鲜的。甚至包括那时听久了的大喇叭广播。

那时候在学校操场和食堂附近就有广播，每当早晨课前或中午，下午大家吃饭，下课去球场运动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学校广播台的节目播出，有音乐，时事，校园生活等各种内容，偶尔也播出同学们自己创作的诗词，散文。虽然大家心不在焉，但是对它的熟悉就如同对自己双手一样习惯了它的存在。

学校广播室的工作由杭大学生自己组织完成，播音员需要挑选考核后才能胜任。我们的同班女同学罗竞波就是其中一位。当然自始至终我都不能分辨出广播里传出的声音是不是她。这些声音对我来说都很像。

我之所以说大喇叭新奇，是因为我曾在哪里被播出过我的一篇诗歌，这是我自小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记得当时学校的学习气氛很浓，同时因为刚入学，心中那理想的火焰也是旺旺的。一天课余忽来灵感，于是就写了一首讴歌理想和反映学习生活的诗歌，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往系学生会文艺部投了稿。

没想到，过了一段我都把这事忘记的时间，在一个去球场打球的下午，它居然被播出了。

当时那因意外而引起的激动感觉至今记忆如新。脑子虽然有些晕乎，但是每个字都钻到了耳朵里，上课也没有这样认真过。

在我那时候的认识里，写抒情诗一定要在某个时候用上“啊”这个语气词，否则不成体统。所以我的这诗里自然也有一两个“啊”

来烘托气氛，搞笑的是，当播音员念出最后一个“啊”的时候，其高亢，其充沛饱满的力度吓了我们一起打球的同学一跳。胡觉亮当时就打趣说，播音员是不是刚被人捅了一刀？当然，播音员肯定没事。

写下这段回忆，也是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对文艺部那位推荐我诗歌的同学以及忘情投入的播音员的谢意，没有你们，我的感觉就不会有那么好。至少在那 24 小时里你们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自信！

[返回目录](#)

杭大校广播站的经历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德语专业宋宏亮

杭大校广播站设在顶楼，外语系男生宿舍的那幢楼，我在那里当过广播员，时间应该在 1983 年前后。广播站里有中文，经济系，历史系的同学，外语系中好像就我一个。每天中午下午定时两次开播，一个男声一个女声搭配播出，广播稿子应该是校团委审编的，给了我们念出去，一字一句不可以改动。

跟我搭配的是一个中文系女生（王琦？），个子小小的认真严肃，她背一个大书包远远过来，每次很准时。轮班组的历史系高个子男生，应该是 79 级的，他以老资格自居，常常告诫我，广播站不能出事故，一出事故就是政治事故。

稿子念完，播放一段音乐，这时播音员可以自由发挥，我们在一大堆唱片中挑出自己的最爱，记得有日本电影插曲《草帽歌》，邓丽君的歌是首选，当然也有《洪湖水浪打浪》之类的红歌。

80 年代初，是个思想解放轻松愉快的年代，虽然有过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但这像一阵风很快刮过，校园里春风依旧，到处弥漫着罗曼蒂克的气氛，同学们三五成群，小情人们成双结对，听着我们选播的音乐，从课堂走向食堂。中午吃饭时听着这些歌曲，能促进消化，晚饭时段，我们常常播些轻音乐洋音乐，芳华正茂的帅哥靓妹，听了就会酝酿出荷尔蒙激素，以备不时之需。德彪西的无标题音乐，是在杭大广播站第一次听到，至今印象深刻。

广播站在顶楼，播音室以外，还有一间工作室，那里有一个我单独使用的办公桌，比课桌大多了，有了这张办公桌，晚自习不用去公共大教室了，感觉就是不一样，记得有同学来参观，他们羡慕的不得了，好像我当了领导，说了好些恭维话，我自己也开始膨胀

起来，开始偷偷学抽烟，抽的第一根烟，好像是经济系旅游专业女同学送的，不是送我一个人的，广播站每人一根。

[返回目录](#)

生物系里宿舍楼

——杭州大学生物系 86 级钟留群



杭大生物系在那个年代好像是一个地标，因为是文三街的尽头。再往西走，一派风光正如现今的西溪湿地——鱼塘接着鱼塘，桑树柿子树遍布。

学生宿舍那幢古色古香的破楼，承载了多少正当季的青春。所以纵然老旧得一脸沧桑，却从来不曾暮气沉沉。

回忆里它总是透着阳光的颜色。只找到楼北面的照片，青春映衬无数次回忆起从前门甬道走过，无数次想见阳光照在灰暗的墙头，也难忘它拆除之前的最后一见。青春撤离的时候，它破碎地静卧在荒芜的地头，岁月一去不返。

1. 结界的三楼

宿舍楼早已拆除，可是记忆依然鲜活。

宿舍楼当年是男女生合住的，一楼二楼住男生，三楼住女生，在中间和西头各有一个楼梯。楼内没有任何隔栏，杭州城里大概独此一家。只找到另一座楼内的楼梯，与宿舍的基本相同，但左右相反。一楼潮湿，黄梅雨季时候水在地上好像多到能流淌的模样。

印象里极少有男生上三楼，好像有无形而强大的结界分隔。女生们总是自在地在宽大的走廊里穿来走去。

公用的卫生间和很大的一个水房都在楼的西头。洗衣服的时候抬眼就是绿草疯狂的操场，还常常会听到丁虹姐姐的歌声，所以回忆里都带着清新的水的气味和清丽的歌的韵律。偶尔还传来楼下男生爆炸般的疯狂歌声，据说是在深冷的季节里洗冷水澡。

还记得传看过的 84 一位学长毕业纪念册上的一段留言，大致是：你是一粒种子，生根发芽在一楼，成长在二楼，开花结果在三楼。这位学长先是住一楼，后来搬到了二楼，他女朋友住的当然一直是三楼。不记得这位学长模样了，就记得他跑步超级快。这段留言精彩到从未忘记，可是也从来不知道是哪位才子妙笔生花，在 1988 的初夏。

2. 宿舍管理员

看门的大伯瘦高，长脸，似乎从来不笑，看不懂年纪。

到了晚间大伯会给宿舍楼落锁，如果贪玩晚归了，敲门时候大伯会披着军棉大衣慢吞吞来开门，虽然脸拉得更长了，眉头锁得更紧了，但是一句也不呵斥，还是好脾气的吧。军棉大衣的印象实在太深刻，恍惚间突然完全想不起大伯夏天穿什么衣裳。大伯虽然动作慢吞吞的，可是会的事儿不少，敲敲打打地修个锁啦、补个门啦什么的。

后来宿舍楼里高大上地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就摆在大伯的窗口，于是大伯就时尚地兼职了具有当年特色的公用电话传呼员，当然也拥有众多志愿者，所以传呼电话这件事，大伯并不太辛苦。

记忆里突然闪现了大伯有过一个笑容，那是我们寝室在毕业前把网球拍送给大伯，嘱他好好锻炼身体。

3. 楼层战争

大三时候换了寝室，楼下是同年级隔壁班的男生，其中一个是我中学同学阿庆，我们从12岁就在一个班里，曾经被他从生物系捡了死菜花蛇来吓。我的中学里男女生是不讲话的，所以到了大学依然习惯性不讲话，可是，这个，不妨碍我们打架。

他们会把我们晾的衣服捅下楼去，会把西瓜皮从窗口撺进我们房间。

最凶狠的是一个烟幕弹，从二楼窗口探出身去手臂一挥就甩进了我们的房间。

极呛极呛的白烟一下子就浓浓地充满了整个房间，我们涕泪横流地咳嗽，然后去打整盆的水浇下去，然后跺地板。

楼下寝室兴高采烈地尖叫，咚咚地捅他们的天花板、我们的地板。

二十多年后，我和阿庆见面终于能熟络地说话了。

我耿耿于怀地问那烟幕弹究竟是什么？

他笑成花儿似地说是把乒乓球剪碎，拿锡纸裹起来，留一个小孔出烟，然后把里边的乒乓球碎片点燃。

刚刚30年同学会上我俩又讲过话了，也并不是只打架的。

当年楼里到点就熄灯，但是房间里的插座是有电的，很奇怪的是经常会二楼有电、三楼没电。

断电时候还想用个台灯看会儿书，我们就向楼下寝室借电。我们会把接线板的插头长长地从窗口挂下去，拴包瓜子，再写个条子说电老虎给点电吧……然后我们的台灯就哗地一下会亮起来。

4. 洞穿地板

宿舍楼是年久难修的。

走廊的顶上安置了特别粗的铁丝，贯穿整个走廊，是方便我们挂晾衣服的，想起来楼层很高吧，挂着的衣服好像不怎么妨碍我们走来走去。不过，因为总是挂满衣服，我都不记得走廊里天花板的模样。

但是房间里的天花板一定是斑驳的。我们寝室拿白纸糊过顶棚，我一直想做一个布满星星的顶棚，可是到头来只是想想。房间里是实木地板，就是老旧得走起来吱吱嘎嘎的。那一年的 12 月 30 日夜，大家准备洗洗睡吧那会儿，室友端着一盆水回房间，刚走进门就一声惨叫，扑通摔倒，一整盆水都泼向我背上。我们扶她起身的时候，发现她脚卡在地板里一天啦！地板踩破了一个洞！帮室友把崴了的脚折腾出来的时候一天啦！天啦！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二楼天花板已洞穿！我们直接看到了二楼房间的内部。

我和另一个室友赶紧下楼道歉，一走到门口，天啦！天啦！天啦！整个房间白雾茫茫，赶得上扔烟幕弹的效果了。我们的楼板破了直径 10 公分的洞，而楼下的天花板破洞虽然不大可是掉的石灰直径有好几个 10 公分。

天花板黑洞洞的地板白花花的。

我们磕磕巴巴地解释，走进屋里观察情况，突然，天啦天啦天啦天啦！灰尘弥漫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的桌上放着好大一个生日蛋糕，他们身边坐着软妹子。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不知道我们坏了楼下哪位兄弟的好事，在 1988 的岁末。

地板的破洞恰好在门打开成直角时候的最先端位置，洞虽不很大，但无论如何的必经之路。

申请修理之后一直不见维修。我们盖上了一块硬纸板，可是走进走出时候常常一脚踢飞，一定的角度下就刚好看到二楼的寝室门开处。

那天年级的大课结束后，我们都回了寝室，硬纸板照例一脚踢飞，突然咚的一下，从洞洞里看到二楼寝室的门被一脚踢开，几个男生排成一队，雄赳赳气昂昂地正步走进门，齐声高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笑成一坨。

二十多年后，阿庆告诉我那时候我们天天有垃圾掉下去，差点又想打架，后来想想我们地板破裂走路都不容易，遂作罢。

我想想他是说好听的罢了，又不傻，他们肯定明白当时的状况下是铁定打不过我们了，我们可以让他们的房间直接变成水帘洞的！

这个洞维持了大约一周时间，最后宿管大伯拿着一块特别薄的三夹板，咚咚地敲上钉子了事，因为板子若是厚了，门就会卡住打不开。

我们进进出出依旧会踢到，不过板子踢不飞了——虫洞就此关闭。

二楼寝室的害虫从此又阻隔在结界以外的那个世界了。

5. 夜半火险

印象里是哪一年的毕业季，一天夜里突然楼里人声鼎沸，楼道里全是纷沓杂乱的脚步声和慌张的喊叫声。

被吵醒的我们看到窗外有红红的火光闪烁，走廊里浓烟滚滚。

嘈杂人声中，大约知道了是东头二楼一间宿舍着火了。探头看看，宿管大伯站在楼下望向东头，看他淡定的样子，我们觉得应该不必撤离了。

幸好是夏季，床品不复杂，又临近放假，很多东西都收拾掉了吧，所以火势没有很厉害，很快扑灭了。但是一整座宿舍楼里烟雾茫茫一片。

后来听说是老化的接线板短路引燃了蚊帐，倒是火苗从窗口燎出去，把三楼女生晾晒的衣服给烧了。

隔天，一楼楼道口的小黑板上出现了捐款倡议之类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失火的那间宿舍弄的。我们愤愤不平地围观了一下，都觉得该是那间宿舍给大家精神补偿才对！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记不清失火是在哪一年的夏天了。

6. 欢乐小黑板

被失火宿舍利用的小黑板悬在楼道口，上课啦吃饭啦打球啦，都会经过它，我们常常会慢一慢脚步，浏览一下。小黑板上会出现通知啦需求啦寻物启事啦什么的各種消息，也有同学干脆把纸条贴在那里。

有一天，室友一路笑回房间，说有留言笑死人了，问是啥，她笑说你自己去看。我兴冲冲跑下去看，顺手记录了一下：译文如下：

第一段：“哪位同学叫本部大妈洗被子没拿到，请带钱到 205 找阿拉法特叔叔。”

第二段：“本人前几日登出的寻找网球拍启事，现经有关人员合力寻找，于池塘发现其残骸，且其柄为一黄鼬紧紧抓住。据专家分析，是黄鼠狼叼住网球拍后不慎落入池中，不幸身亡。”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不知道被子和网球拍的主人分别是谁，也不知道那只黄鼠狼是不是含冤。

7. 三草留园

86~90 期间住在这座楼里的师姐妹们和 86(2)班的男生们，应该看到过我们寝室门的大玻璃上与众不同地贴着三草留园四个大字。

寝室姐妹 5 人一薇、蕾、蒙、留、园，所以有了这个寝室号。



房间墙上贴了一幅很大的画，是我们大一时候趴在草坪上拍的一张照片，我按着不同的发型做成了剪影剪贴画，画面太可爱，成了文明寝室的加分项。可惜那时候都没留照片，只找到了大四的同款纪念照。

薇是寝室长，起得早，交游广，信息灵通。有她在，我们可以睡懒觉也吃到早饭，可以换住到阳光明媚的朝南寝室，可以被督管着认真整理打扫从不让文明寝室称号旁落。

咱班的另两个女生寝室每逢此时总是撇着嘴攻击我们说太假、太假。我们讨论后一致觉得那根本就是无限的羡慕嫉妒恨！肯定是！

就算我自己，想起当年的宿舍楼当年的我们，心头顿时也无限的羡慕嫉妒恨呢！



[返回目录](#)

花开堪折直须折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德语专业宋宏亮

在杭州大学读书，那是十分幸运的事，不光是因为杭州是六朝古都，有文化底蕴，风景秀丽，有山有水有江有湖。更重要的是，大学时代时你精神放松，没有什么负担，那是精神世界最鲜活，感情世界最敏锐的阶段。那是生命的精华阶段。等到芳华流逝，花落空折枝，老了再谈什么诗和远方，那就完全不是一个味道了。

在杭州上大学，正好满足上述两点：在天堂里度过你生命中最鲜活的那一段。

从正门出杭大，跨过天目山路，第二个路口有公交车，乘车经过松木场，到少年宫站下。大学时代游西湖的经典路线，从这里开始了。一般是跨过断桥，上白堤，步向西湖深处。在春天，白堤两侧桃花盛开，人在桃花下走，脸都会被桃花染红。

如果是夏天，两侧的湖面漂满水莲，朵朵莲花开成一片，它们亭亭玉立，仪态万方向你招手，让你不忍离去。离开杭大以后，每次到杭州都是来去匆匆，看到密集的人群，游西湖的念头顿时索然。年纪一大，干啥都没有冲动了。

白堤再往里走，就到了孤山。孤山被西湖包围，一过下午四点，游人渐渐稀少，这时可以放肆一下，躺在树荫下的绿地上，伸开四肢，看看夕阳慢慢西下，心旷神怡，飘飘然不知所处，时光能够停在这里该有多好。

钱塘之胜在西湖，西湖之奇在孤山。孤山碧波环绕，山间花木繁茂，亭台楼阁错落别致，人文景观一个接一个，你要处处留意步步惊心。一晃之间，太阳下山了，孤山上孤身只影，暮色里，留下

的游人鬼鬼祟祟形色可疑，有的可能是演员，躲在树后练嗓子的，有的不知在干什么。

还在春寒料峭中，望着窗外的枯树，一颗心已经在惦记着孤山的梅花了。每年的孤山赏梅，那是万万不可错过的。说实在，梅花不是我的菜，它太娇艳，开的早，谢的快。

[返回目录](#)

第八章：荟萃

杭州大学：关于春天，一些难忘的瞬间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孙敏强

1978 年 3 月 6 日，对于我和我的同学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刻。那时我们正走在从家乡奔赴杭大中文系求学的路上。

（一）

我的记忆就像母亲珍藏的车票一样清晰。那一天我乘的是开往杭州的头班车，这个阳光灿烂，大地清新的早晨，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生命和记忆中。因为这一天，对我们的生命，我们未来的人生旅程有着特别的意义和深刻的影响。回忆中的大学时代，新鲜得一如



那个春天的清晨，那是在经过了浑浑噩噩的童年和有些灰色的少年以后，我生命中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青春的早晨！那也正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坚冰融化，万象更新，生气勃勃的春天的早晨！

高考制度的恢复给许多在毛泽东时代无缘进高等学校深造的青年以公平的机会和宝贵的希望。

（二）

那时的桐乡县是浙江省恢复高考的试点县，记得正式考试时语文卷的作文命题是就给出的一段材料写一篇作文，材料叙述毛主席晚年如何克服眼疾学习英语。我很自然地由这一材料引申到自己，

那时我高中毕业已近两年，没有工作，也没有书看，好不容易得到去乡下代课的机会。秋天的时节，我时常在旷野中仰望天空，目送南飞的大雁，放声歌吼，以一抒郁闷。渴望飞翔，向往远方，是那时心中朦胧的梦想。我还没有具体地梦想过走进哪个大学校园深造，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现在，这样的希望和可能，却仿佛就在面前。我非常珍惜这一次机会，并且把自己渴望继续求学的强烈愿望写出来了。记得写到激动处，如飞的笔在颤抖。

不久后，浙江全省开始统一高考，作文题目是《路》。这真是一个好题目，我曾为此艳羡同学们。许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感到试点卷和后来全省卷的作文题及其差异，都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味，包涵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那标示着我们的社会正在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过渡，那标示着社会变化和进步的速度。

（三）

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七七级的一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我和我的同学们共同经历了物质、精神极其匮乏的年代，十年动乱给我们带来的时间（生命）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那时我们不仅吃不饱饭，更读不到书。记得自己之所以知道和考入杭大中文系，就是因为看过的毛泽东诗词注释本是杭大中文系编的。除了毛主席诗词和鲁迅的作品外，还有偶然有幸读到的半册《红楼梦》和一二册《中华活页文选》，其中《高祖本纪》《项羽本纪》和《淮阴侯列传》是我看了许多遍的，这些就构成了我可怜的国学和文学底子。

我们的同学中，有已人近中年、拖儿带女的兄长和大姐，有扛过枪和锄头的，有抡过锤驾过车船的，来自天南地北，干过各行各业，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与各自生命旅程中的风雨春秋，走到一起。十几年的积累、多少年的饥渴，浓缩为四年的精彩。

（四）

我们能够有缘一起在大学校园里重新学习，是多么来之不易啊！在这短短四年中，我从书里书外，从同窗那里所学到的一切，超过了过去十几年所学到的总和。难忘临毕业时，ZX 学长在同学录上代表我们全体同学题写的一段文字：

我杭州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百四十一位同学，砥砺萤窗，顾学业之锐进；风雨中流，感岁月之峥嵘。歧别依依，特制此册，非惟志青山于永恒，亦冀扬沧海之云帆。

正是因为高中毕业后的蹉跎岁月，和大学时代的得来不易，我们真是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无论是外出还是排队买饭，我们的手上总是有纸片或者小本子，不是背英语单词，就是背古代诗文。

那时，杭大中文系在文三路和文二路之间的下宁桥，现在的省工会干校内。与校本部相比较，这里很大的好处是没有晚上按时熄灯的规定，这给我们的学习带来诸多方便。我们年级多夜猫子，许多同学都要用功到午夜十二时，有的同学甚至要到次日凌晨一两点，三四点钟，而这时喜欢早起的同学也已经开始来晨读了，所以我们的教室总是通宵达旦地亮着灯。

（五）

从系大门出来，对面是西溪河支流。河对岸有菜地，河边是青青的杨柳。西南面有小路可通学军中学和杭大生物系，附近不远处就是田野。

早春时节，可以看到油菜地和麦田，大片大片清新的麦绿与淡黄的油菜花，让人心醉。那里宜于吟咏春天的诗。再走几步路，就是现在的学院路一带。那时还是大片湿地，有河，有水塘，有水田，还有菜地。

仲夏时可以到此朗诵夏日的诗章。

再远就更荒野一些了，尤其是秋天。高岗上不规则地散布着旧冢新坟，偶尔还有一二零落的花圈，上面的字纸经日晒雨淋，风吹霜打，已消退了颜色，在秋风中瑟瑟地飘零着。乌鸦栖息在秋叶落尽的乌桕树上，寒风中的哀鸣划破周遭的宁静。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此地最适合讽咏“诗鬼”李贺的诗。

至于冬天，适宜吟诵白雪之诗的岂止是雪后的断桥？钱塘江边，西子湖畔，触处皆是诗景。

（六）

在苏堤之上，我们可以遥想诗人的风采，感受东坡先生的诗韵和德政。于六和塔下向南眺望，但见钱塘江流经此处，水面更加开阔，悠悠然拐了一个弯，划成一道美丽的弧线，以更舒展的姿式奔涌向前，让人领略到“江流婉转绕芳甸”的意境，我以为，那儿曾经是杭州最富于诗意的地方之一。我们就这样于钱塘江的潮起潮落，西子湖的春花秋叶，领略了诗意和词韵。



当年的杭大图书馆

我们亲历过一个匮乏动乱的年代，大多有过或多或少的忧患和坎坷的记忆。因此，我们关心政治，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那时同学们在寝室里对床夜语，有时为此辩论，甚而争吵，乃至于声闻邻室，

达旦不寐。一次选举西湖区人民代表，我们的同学中，既有作为校方推荐人选的学生会主席，也有勇敢地跳出来竞选的LW同学。几位

志同道合的同学还自发地为他组成竞选班子，这是需要深思熟虑和无畏的勇敢的。他们的竞选海报上写着：“昔日海上水手性格豪放不怕惊涛骇浪；今日文科学生风度翩翩敢为正义声张！”我也清晰地记得LW同学在竞选演说和答问中滔滔不绝而有条有理地阐述自己的竞选纲领和主张，从国家的政治改革一直谈到学校的教改。其中记忆犹新的一个内容是说，我们这里是文教区，但笕桥机场的航班客机起降经过，噪音很大，对居民生活和高校、科研单位的教学研究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如果我当选，就要提出搬迁民航机场的议案。LW同学后来没有被选上，他和他的竞选班子的同学们经历都比较曲折。我敬佩他和ZS、ZX等同学的思想 and 将其付诸实践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ZX君是最年长的老大哥之一，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有家小的他，那时常常囊中羞涩，却总是节衣缩食，拼命买书。

（七）

刚开始，新华书店里多的是领袖著作，没有什么文学名著，外国的更少。记得新华书店第一次开禁发行外国小说大约是1978年或者是79年五一节。那时文二街有一家不大的书店，我们前一天晚上就早早搬了凳子，到那里通宵排队。排队者大多是学生，我们自己管理，先到的编了号子依序分发给后至者。大家高谈快论，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内容已经完全忘记了，还有印象的是ZX、XJ的神情。这样一直等到天亮。

书的种类不多，而且没有大文豪的作品，记得是《一千零一夜》和《三个火枪手》等。（后来我才想明白，这是因为一流名著再版发行要过的恐怕是内容和译者两道关口。一是意识形态上要没有问题，二是译者没有问题。但大家名著多为名家所译，而越是名家，越是逃不过历次的政治运动。他们的译本得以再版发行，自然要在

平反之后。像傅雷先生翻译的诸种《人间喜剧》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就是又过了很久才重新面世的。）

虽然每人只能限购两本，但拿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还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在书店里琳琅满目的今天，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了。

(八)

如果有哪位喜欢回到文革时代的人士说，匮乏时代也有它的好处，那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假如真有人要我们回到文革时代，我不会沉默。假如我的学生们有难，我一定会站在他们前面。

（我总是觉得，作为当年的幸运儿，我们七七级每一个人，对自己，对我们的时代，对我们的同龄人和同代人都有一种责任，一份义务，包括作为高校教师尽自己微薄之力教好他们的子女的本分。）我曾经这样做，将来还会这样做。惟有如此，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才无疚憾于心，无愧悔于世。

二三十年眨眼间就过去了，但我依然记得那些春天的美丽瞬间，记得每一个春夏秋冬的流转：我记得初夏的午后与黄昏，酷爱音乐的YM兄打开收音机，德彪西的《牧神午后》、舒柏特的《小夜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那优美的

旋律便像金色的阳光和皎洁的月色一样洒满了房间；我记得同学们呼朋唤友，一起去文二街露天电影场或海洋所广场看电影，印象较深的影片有《阿波罗登月》和《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我也记得ZF、ZX、MX等老大哥和大姐们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作为杭州东



杭大校徽：红底白字（教师用），白底红字（学生用），天鹅图像（毕业纪念章）

道主，ZF 兄曾经领我们全小组同学整整一天在西湖山水间徜徉；记得同学们发起组成的《初阳》诗社和 ZF 兄初为人父时为新生儿写下的诗篇，此诗和诗社同学的一些佳作后来被《诗刊》发表；记得 YQ、YM 兄第一次在《中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释“平居”》等论文，和 HY、XD 兄第一次发表小说的情景；我还记得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门考试是外国文学，考完后我来到西湖边痛饮一气，我曾经一路狂歌，最后醉倒在苏堤之上；我更难忘毕业离别前的不眠之夜，我们唱着骊歌，告别同学和大学时代；记得 WY、YG、ZL、YM 等同学共同创作，XJ、YH 等同学配以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朗诵的大学时代最后的一首长诗，其中的一些诗句至今仍时时萦绕心头：

在远古的荒原和未来的铜像之间，
诞生了一群脚印。

.....

于是，我们从海滩起步，
地平线便有了新的意义。

.....

我们要让每一个人的心灵，
都变成鸽子的故乡，
把所有的秋天连成一片。

.....

在宇宙和更远的宇宙之间，
将留下我们这消逝者的微笑。

(九)

大约二十七年前，看过美院七七级的一个画展，其中的一幅画令我终生难忘。画中只画了向前摸索的手掌、一双探求的眼睛和一串脚印。我相信，那就是我们七七级的象征和宿命。愚钝如我，既已为七七级的一分子，就始终不敢放弃努力，始终不敢忘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心中依然拥有大学时代的激情，继续着发端于大学时代的思考，沿着先辈跋涉的路继续走下去，这是我生命中的莫大之福。

常常想起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许多可敬的先生，虽然，他们带着或浓或淡的乡音给我们授课的情景，已经遥远得如同古典时代，但是其影响力却及于今天。他们在传授学理和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将他们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对美的境界和韵味的敏感，以及生命的智慧传授给了我们，影响了一代代学子的求学与生活之路。我在《怀念敬爱的老师》曾经写到过许多已故的老师。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吴熊和先生的讲授宋词，与蔡仪江先生的解说唐诗。吴先生从容优游的语调，和深沉含蓄，饱涵哲理的阐发，与蔡先生神采飞扬的风度，和挥洒自如，引人入胜的讲解，堪称双璧。听他们授课真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啊。

每当我经过钱江南岸的西兴浦口，总是会想起苏东坡著名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的诗句，想起吴先生对这首词的讲解。“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千百年来，钱塘江潮就这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一日两回地汹涌而来，又悄然而去。这天下奇观是基于大地江河与日月星辰的运行伟力和相互作用，是神秘的宇宙之数的体现。而人世间的悲欢沉浮，生死聚散，有情无情，也自有其社会人生的因缘和命理。二十多年的人生，实在只是几个瞬间，我们的今天，有远远超出昨天的我们所预期的方面，也有事与愿违，令人扼腕叹息的方面。但

是，我们依然像昨天一样，在现实之上固执地高悬着自己的理想，并且愿意为此而继续努力。

(十)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当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十分想念我的同学们，也非常感谢我的老师。昔年同窗一百四十一位同学中，已有六位同学先后辞世。他们是：ZF 兄、JF 姐、LY 姐、SG 兄、JN 兄和 GX 兄。四年寒窗共读，我们之间有着同胞手足般的情谊。亡我同类，思之黯然。愿他们在天堂安宁！也祈愿我的师友们健康，平安！

[返回目录](#)

挥之不去的记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殷企平

我变为杭大人的那一刻，距今已有 40 年了。当年还是一名英语专业大学生的我，如今已经是快要退休的高校英语教师了。虽然是白驹过隙，但是某些记忆挥之不去。

作为一名杭大培养的外语学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席卷全国的外语学习热潮。

1977 年，我有幸考入了杭州大学外语系（1978 年 3 月入校）。进校的第一天，行李还没有安放好，就有人敲宿舍门，原来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同学。他叫刘小明（后来考上了联合国译员），一坐下就开始试探我和室友们的英语水平，简直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之前我自学完了许国璋编的 4 册《英语》教材，还学完了俞大綱编的《英语》第 5 册，自忖英语水平还不错，结果发现刘小明不仅在语法、词汇、口语和听力上远胜于我，而且已经阅读了不少英国文学原著，如莎士比亚的 *The Merchant of Venice*（《威尼斯商人》）和狄更斯的 *The 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外传》）。更让我佩服的是，他能用流利的英语讨论这些作品。后来我发现，他也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的。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学是温时幸（如今是美国鸱道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新生欢迎会上，他作为新生代表发言，从头至尾全用英语演说，其语言之流畅，词汇之高级，内容之丰富，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有些沾沾自喜的我顿时觉醒，从此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时时提醒自己戒骄戒躁。以上两个例子还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许多大学生进校前就已经有过不平凡的自学经历。

事实上，我们 77 级的同学多多少少都有过自学英语的经历，而且能跟刘小明、温时幸媲美或接近他们水平的还颇有几位。例如，有一位名叫潘大安的同学（后来获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加州州立理工大学英语系），入学前是杭州湖滨卫生院的伤骨科医生，也是靠自学考上了大学。入学初期，我发现他几乎已经把《现代高级英语双解词典》读烂了，至少是对其中的大部分词条烂熟于胸。同样在自学阶段就开始背词典的同学还有好几位，如后来获得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的甘恢挺同学。这些例子不啻是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学习外语热情的缩影！

高校外/入学前的情形尚且如此，高校内/入学后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在杭大的学习和生活中，前七年（本科和硕士阶段）是我最难以忘怀的：几乎每一个同学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而且多年如一日。记忆最深刻的是同学们跟老师“抢座位”听讲座的情形：只要有学术讲座，阶梯教室就会被挤得水泄不通；当时系领导规定前两排的座位为教师们预留，可是总有不知情的学生早早就去前两排占好了位置（当时没有设牌的习惯），因而有关人员每次都不得不（大约在 15 分钟之前）提醒大家给老师们让位。当时的讲座还真多，每次讲座的通知一出，人们就会奔走相告；不管是谁，传递信息者都会喜形于色，有外来名家的讲座时更是如此。记得我读一年级时，复旦大学的陆谷孙教授应邀来杭大做了整整六天的讲座，那情景简直就是盛会——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走道上都坐满了听众；台上人妙语连珠，台下人如痴如醉。那是我一生中最短的六天：兴头最高时，陆先生却要走了。临行时，陆先生透露自己的英语是“homemade”，这让我十分吃惊！一个（此前）从未出过国的人，英语说得那样地道，那样漂亮，就连当时的一对澳大利亚籍外教 Keath 和 Margaret 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一场不拉地听完了讲座，事后感叹地对我们说：六天中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陆先生的语病，

但是发现除了两个小毛病之外，他的英语堪称完美无瑕。除了陆先生的讲座以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王佐良、李赋宁、许国璋和陈嘉先生来我校做的讲座。说来奇怪，虽然这些讲座的内容都很精彩，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却是观众席上爆发出的热情，这种热情如今仍然感染着我，从未离我而去。

须顺带一提的是，如今许多大学生听讲座的热情已经大不如前。每念及此，总会让人伤感啊！正所谓：不履高山，焉知平地。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借此机会向所有教过我的杭大老师们表示感谢。我有幸听过课的老师包括鲍屡平教授、张君川教授、蒋炳贤教授、任绍曾教授、王丽云教授，还有胡新云、俞新元、张丽娟等老师，他们个个敬业，而且和蔼可亲。他们的学识和人品，永远是我的榜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老师：蒋炳贤教授和任绍曾教授。

蒋先生是我的硕士论文导师。我没有见过比他更和蔼的老师了！他知识渊博，且上课富有激情。更确切地说，他简直就是善的化身！可惜他走得太匆忙——脑溢血而死，我们几个弟子连送他的机会都没有，每念及此，都痛心不已。

另一位须特别一提的是任绍曾老师（原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在浙江省，就学术影响力而言，过去的40年中当首推任老师。他对英语语法理论的研究不囿于前人的结论，而是从语言事实出发，进行理论研究，探索语言规律，因此总有所创新。他关于英语双重谓语的系列论文就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颇受好评。1991年他在杭大发起召开全国第一届话语分析研讨会，此后坚持不懈，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动态，博采众长，对语境与语篇、语篇和语法、语篇分析的层次，话语的多维分析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始终处于国内前沿。学术界认为他对推动中国的话语分析研究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他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尤其是根据现代语言理论对 Jespersen

的研究，对叶氏的语言观、语法哲学观、语用观的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公认。有这样的老师，自然是做学生的福分。我有幸听过任老师的一门课，感觉他能用清晰的（英语）语言把高深的理论传递到位，这其实是如今许多头上戴着光环的“学术大咖”所没有的本领。

杭大远去了，却总是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心里。

[返回目录](#)

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谢为群

小学的路很近，过了圆明园路，到了第二个路口右拐进入虎丘路，就可以看见那幢红砖房了。

小学的路走得轻松、欢快、无忧无虑。但在最后临近毕业的那一年，却有了那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困惑。

中学的路有点远，有点曲折。得先走到外滩延安东路摆渡口坐渡轮过黄浦江，然后再走过现在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位置，踏入一条石卵铺就的小路，在一家工厂的斜对面有一幢普通四层楼房，那就是了。

那一段弯弯曲曲的路走得有点自己的思想了，走得对自己的未来有些思考了。

又过了几年，在以为再也不会走进学校的时候走进了大学。

大学更远了，得坐火车了，路上的时间更长了，也就更有时间想一些复杂的问题了。

在大学的四年，我走过许多路。我走过东门的东沟土路，在扬起的尘土中，我明白了未来有许多事情可能像处于飞扬的尘土中那样，不很容易看透看明白，需要时间等待尘埃落定。

我走过正门口的武林门路，在穿过车来车往的马路时，我明白了未来会有许多令自己眼花缭乱的事情发生，会有迷茫的时候。

我走过校园里许多说不上名讲不清楚的小路，在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小路上发生过许许多多会让自己琢磨一阵子的微小细节，那些细节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了自己。

现在依旧走在路上，但不再单一。有时在高速公路上，有时在飞驰的高铁和地铁上。思绪也因此飘得更远更高..... [返回目录](#)

4 年与 40 年的认知变化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沈加红

数学系的同学包含了“数学”和“同学”二个内容，俺就聊聊这。

1977 年 11 月 25 日，中断了 10 年的高考举行了唯一的一次冬季招生复试，因为数学答卷自我感觉好，所以改志愿时（当时笔试后可以改选报考志愿）就填了数学。这一为了提高入学概率的偶然举动，改变了我的一生。

《录取通知书》是通过中学革委会转给我的，说明政审通过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决定最后一次游西湖，然后“闭门造车”四年。当时龙井路正在建设中，从山上下来的路面都是碎石子，我的自行车哪里刹得住啊，连人带车飞进了路边悬崖下的茶地里。

1978 年 3 月 3-6 日报到时，我的右手臂绑着骨折绷带与 120 位同学相识了。

拿到的第一本课本叫《数学分析》，翻开一看不就是微积分么。无知的我心想为什么别人叫“高等数学”？阅览室里和其他专业的交流才知道：“高数”的很多定理是直接给出的，本质上属于“计算”范畴，“数学分析”的计算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证明各种定理，考察各种概念和它们的内在联系。这种培养良好的证明习惯让我有了烧脑的感觉。

专业的同路人也让我认识到：虽然同学是没有血缘的亲情关系，大学同学和中小学同学的区别就是：接地气的“通俗小说”进入了曲高和寡的“文学小说”了。有人说，学生在基础课考试中，最大的门槛就是数学和外语，一个需要智力去游刃，一个需要时间去记忆。这“文学”对我来说真是为难了！

4年中，我学到了什么？

16世纪是个分水岭，之前的数学基本属于初等数学，17世纪以后基本上是高等数学。所以，我和同学们一起离开了开始于公元前600年的初等数学，进入了始于17世纪中叶的变量数学、19世纪20年代的近代数学、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数学。仅仅吉米多维奇这4460题的“变量”就整得俺好苦啊。

进入数学世界后，从常量、匀变量来到了非匀变量，从三次代数方程求根、负数开平方、虚数进入了最丰饶的数学分支、抽象科学中最和谐的理论——复变函数。看到了有些函数是连续的但处处不可微，有的函数的有限导数并不黎曼可积。然而，回到现实，习惯的思维被颠覆了：三角形、正方形、圆是一样的（同胚，在“连续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球面/马鞍形三角形不仅三个角之和大于/小于两个直角，而且可以是任意的。空间的曲率是用它们偏离欧几里得法则的程度来衡量的。更为突出的是，经验归纳受到了数学归纳（完全归纳）的巨大冲击。

常人阐述一件事情，往往用3-5个例子就可以了，即便是统计规律，也是有限例证。在数学里，千千万万个例子，或者一个人一辈子，或者所有人实验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仍然只是个猜想，没有理论证明就不能下结论，而反例只需要一个。比如，说“鸟是会飞的”这样结论性的话，只能是文学语言，最多是自然科学语言，绝不是数学语言，因为鸵鸟就不会飞。

40年的观察，我看到了什么？

数学的重要性。数学虽然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但它有广泛的应用性，是形成人类文化的主要力量和人类文明的核心部分。科学的数学化已经成为近代科学的脊梁骨，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门科学的真正完善在于数学工具的广泛应用。”因此，

数学成为了科学的皇后、伙伴和仆人，其科学意义和教育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数学人的优秀品质。现实社会，还是要回归经验归纳：同学们各个言行中都体现了崇尚真理，勤于思考，坚韧不拔，诚实正直，因为数学的思维和推论是一种公开透明、无可辩驳的裁决，是用理性战胜本能。现在，大部分同学已经或者即将退休了，有限例证表明：数学是打开机会大门的钥匙，我们所获得的数学水平和能力决定了我们从事的职业和发展前景都是不输其他的。

品质的来源。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所有的学科教育中，数学教育是时间最长的？因为这种长期的浸泡会产生一种被认知科学家戴维·帕金斯（David Perkins）称其为思维程序（Mindware），心理学家 Kenneth Craik 称其为心智模式（Mental Model），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Charlie Thomas Munger）称其为思维模型（Thinking Model）的大脑印刻。

宇宙的认知。除了尺缩效应、钟慢效应、光的弯曲、有一种力（离心力）与非欧几里得几何性质之间存在着关系之外，还知道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事建立在参考系的加速度是与重力场等效的基础上的。在太阳表面附近， $g=270$ 米/秒²，一束光线从太阳表面附近经过时的偏转值等于 1.75 弧秒，这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地球表面和太阳表面的重力势差所产生的减慢因子是 0.9999995，因此，发出的光比地面光源稍红一些，这种“红移”现象也可以观察到。进而，在非匀速运动的参考系中所看到的几何图形与欧几里得几何学是不同的，且任何一个重力场都同参考系的某种加速度等效，所以，任何一个有重力场存在的空间都是弯曲空间。曲率半径同质量分布的关系由爱因斯坦的基本方程来描述。这个方程在数学上有几种不同的解，一些解相当于空间本身最后是封闭的，因而具有有限的体积，另一些解所代表的则是类似于鞍形面的无限空间。可以证

明，对于体积有限的封闭空间来说，膨胀和收缩是周期性地相互交替着的（脉动宇宙），但无限的“类鞍形”空间则始终不变地处在膨胀（或收缩）状态中。我们所在的宇宙目前正在膨胀中，但是，这种膨胀是否会转变成收缩？我们所在的空间大小究竟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两个问题现在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引力场的摄动作用和质量运动产生的狭义相对论性之外还有一个很小的剩余量，超出了万有引力理论，在广义相对论中却一目了然。

回到现实。在当下的信息社会，数学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素质，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以，数学对于一个人的终身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无论如何，在大数据（big data）、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引力波（Gravitational wave）等科技的最前沿，一切都仍在证实美国数学史家 Morris·Kline（M·克莱因）的一句话：“一个时代总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的数学活动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在我们这个时代尤为明显。”

我很庆幸能有数学同学，这是超越许多关系的。有些关系（比如领导、夫妻、邻居、同事……）变化了，是要加“前”字的。但是，同学关系终生不变，不可以加“前”字，如同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血缘，不能挑选，不可分割。这种是可遇不可求的上等缘。

数学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有的人在给当初的女神们送〔伪西溪子〕^①，有的人在用“84 小时”打一成语^②。更多的人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组专家、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办“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数学学科组成员、国务院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员、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秘书长、浙江大学证券与期货研究所所长、浙江省风险投资协会理事……有的人跑到美国专业排名 15 的大学里，30 年培养了 20 名 Ph.D.，还有的

在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Manufacturers Life Insurance Company）发挥了 20 年的骨干作用……总之，在众同窗面前，俺只是个被称作“勾撇”③的“小矮人”。除了但愿数学这位“白雪公主”能够在遇到白马王子之外，在这人生盛宴的同学聚会之时，我的绰号只有你们听得懂，同学间有些笑话只有一个宿舍的听得懂，一些动作只有某些同学明白背后的意思……有此，人生足矣！

注：

①【伪西溪子·给当初的女神们】

个个花容月貌
人人聪慧窈窕
下手早
是王道
待悟道
黄花菜都凉了
当年梦
可曾终？

②84 小时。（打一成语）

解释：因为一朝一暮为一天，而“ $84=3\times 12+4\times 12$ ”，所以谜底为“朝三暮四”。

③因为讲『许国璋英语』中《教堂的钟声》Soppy 故事而获得的绰号，如同“老头儿”。中学时因为讲苏联侦探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故事里的老爷子而获得的绰号一样。

[返回目录](#)

杭大诗缘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卫军英

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习阶段，都是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度过的。这所 1998 年并入浙江大学的江南名校，那时候虽然不是国内第一梯队的重点大学，但却继承了民国时期之江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衣钵，文史方面的功力不亚于国内任何名校。当时中文系更是名师荟萃，古典研究独擅风骚，据云早年即传“北有北大，南有杭大”之誉。记得和大学本科一年级的 1978 年春，我通宵排队在新华书店买的第一本书，是胡云翼编注的《宋词选》，那两年这本书每天捧读，及至后来甚至熟读能背。那时还曾工工整整地手抄过南宋周密所选的《绝妙好词》，学词和创作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吧。我硕士阶段专业方向是唐宋诗词，我的导师陆坚教授研究生师从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教授，夏先生既是学者也是词人，因开启现代词学而被誉为“一代词宗”。陆老师指导我们的时候，每每传授的都是当年夏先生的词学体悟，加之那时陆老师主要研究南宋词人，多少也影响了我硕士论文是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写一篇“稼轩词新论”。那篇论文后来拆为两部分，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1987 年第 6 期）和《杭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不成想此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专论宋词的论文，虽然也有小文探讨具体词作，但基本上都属于赏析类的千字文。主要原因是我硕士毕业之后留校执教，教研室分配我主讲先秦汉魏六朝文学，于是那几年把精力放在这一段，而且为了专业发展自我定位于魏晋南北朝段，围绕阮籍陶渊明展开整个研究。阮籍是竹林七贤的领袖，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 400 余年间首屈一指的大诗人，也是魏晋风度的最后终结者，所以在我年轻的习性中，自觉不自觉地就沾染到魏晋人物的风韵。

研习诗词的爱好在 1992 年戛然而止。那一年可以算是中国经济元年，我也在这股大潮中下海了，经济的浪潮冲刷掉年轻时飘荡的风雅，最为可悲的是有一年搬家时候，我竟然虚无的把书架上的很多书给当做废纸卖了，还烧掉了少年时代的十多本日记和读书笔记。那时候物质主义扭曲了人性，即便我重回大学讲授广告营销，也竟然以为未来将永远不会再沉浸于诗词。然而宿命有其无法违拗的轨迹，那种基因般烙印于你生命中的文化因子，不论怎样总会发散出不屈的光芒。所以在年近天命之际，又重回诗词创作并且一发不可收，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即是最近五年来所创作的。

中年之后我居住在杭州的城西，这里临近西溪湿地，水色天光风清气爽，碧草烟树花开四季。西溪湿地往西延伸，一直连接到了我少年欢快生活的军营，以及我当年就读的学校，现在的杭州西湖高级中学。人生中许多看似偶然的际遇，实际上都是某种宿命般的必然，当你在朦胧的轨迹中下意识的行进时，其实那是命运在向你呼唤。西溪原本就涵蕴了许多美丽传说，自然的造化和人文积淀，激发了性灵中的浪漫真纯，发为歌诗也就成了必然的回归。所以当我把目光投射到西溪湿地的时候，仿佛多年漂泊的心灵也找到了相应的寄寓，而西溪更深一层的隐喻，那就是我的母校。我读书时候的杭州大学中文系，就在西溪河下，而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大学后又被称作西溪校区。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水之乐皆为所爱，尝自谓若山水之间止得其一，吾其与山。看来在聪明和宅心仁厚之间，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总以为在自己的秉性中，仁的一面超乎智的一面，这似乎也是我对过往溪山一往情深的某种解释。2007 年我在西溪源头的小和山下，依山傍水置办了一套房子，用作晚年可以举步临水悠然看山，更加自由的呼吸清新的空气。于是西溪不但贯通了我生命中过往的记忆，而且为我舒展了一幅更加绚丽的画

卷，宛然掀开了一页新的生活，注入了生命和情感的活力。因此也自然成为我灵魂深处的文化象征，注定演绎出梦里千寻的记忆符号。

[返回目录](#)

那诗,那歌,仍在轻扬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任平

到杭大中文系读书,于我而言如是在梦中的事情。

以前写过一篇小说《车前草》，讲的是搬运工人一家的遭遇，就如车前草一般受尽碾压，却仍然顽强地活着。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名“拉儿工”：整天拉着大板车走在杭州的大街上，无论严冬酷暑，无论货重路长。我曾经经过西溪河下路边的工会干校门口，怅然无望地看着那块“杭州大学中文系”的牌子，然后隔着篱笆，摘下里面的一片草叶，默默地离去。

七七年高考，自认为考得还不错的我却因为当时政审的原因名落孙山，七八年再考才踏进这曾经在梦里描绘过多次的大门。那天，头发斑白的徐步奎教授似“不速之客”般冲进我家的门，高声说：“你被中文系录取了！”让我母亲和我都惊愕了一阵，旋即喜极而泣。

那年的金秋是那么美好，连空气也是甜甜的。我穿着熨得平整的卡其青年装，朗读了“新生致辞”，我和子帆、郑鸣等出了本年级第一期墙报《金秋》。我们在寝室里互相自我介绍，说说笑笑。很早就来的胡志毅就在我的下铺，至今他对人介绍总是说：“这是我上铺的兄弟！”略带腼腆书生气很重的李瑜，竟然是以前我经常走过的杭州西桥酱酒店的伙计！一说那巷弄里的事他感慨万分。皮肤白皙的帅小伙郑鸣有和我一样的知青经历，只不过他在临安我在余杭。倪建平用浓重的诸暨话向大家问好，之后他一直称我平哥，有一天他非常郑重其事地交给我一只带着青竹香味的篮子，说是自家编的，他父母给我的礼物。靠门口的上铺是陈叶葳，黑黝黝的脸充满活力与灵气，一个轻巧的动作就上了床。在床上看什么书、写

什么东西，他总是努力掩住，但往往第二第三天就会公布出来。宝康的姓，那个岑字以前不认识，还以为读“琴”，但名字倒很合其性情，乐观、亲和。徐小洪曾是军人又是党员，这在一开始是没有想到的，不就是一个常见的杭州小伙子嘛。但一旦谈吐，其经历、其见解，让人钦佩三分。马上知道我们小组还有两位女生：老是带着朴实微笑的王琳和有着甜美笑意的沈澜。开小组会，她们就会坐在宝康那张下铺，听我们男生吹牛一般绝不发言。

个把月之后，我们这个寝室的活力与不守常规就显现出来了。首先是每周一期的墙报必出。进了中文系，自以为与文学结缘的我们总认为不写点诗啥的，就不像中文系的人。于是定下规矩，每人每周必须写一首诗或一篇散文，自己书写了贴在寝室墙上。此举最积极者是胡志毅，他的作品也最像诗，据说是受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影响。李瑜以前读了不少古代诗词，所以作品也文绉绉一些，有一次在一首自由体的诗里面冒出一句：“想起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充满了惆怅和感慨，又不失潇洒。这成为后来我们经常引用的名句。我因为一首《保俶的倩影》受到叶葳的钦羡，也因为其中一句“清晨的保俶塔犹如披着乔其纱的少女”而受到志毅的调侃。还有一首《鼓浪屿之波》，因为写了高考录取后的兴奋与奇异的经历，连我自己也一直记忆犹新，在今年阮公墩的西湖诗会上，我略作修改朗读了一遍。其中的几句是：

不如一头扎进大海
胜过沉迷于画意诗情
让皮肤自己涂抹蓝色
让咸味渗透毛孔深层

.....

双臂划开的涟漪，是无限远去的笑纹。

你是谁
为何时时触碰我的腰肢
好似在探究是否还娉婷
呵呵
这是鲨鱼的吻
我一转身便见她凝视的眼神
大海中人与鲨的相遇
互相看到了善良和真诚

.....

我的每一个细胞活跃起来
借助海浪
和她的细胞交谈的很清纯

.....

大海深浩
鲨悠然游去
她有更美妙的远征

.....

一亿年前的地球
鱼儿就已经是大海的精灵
人
只是鱼的一部分
忘却的基因

.....

当时确实有一条小鲨鱼游过身边,一开始有点恐慌,但鲨鱼也似乎感觉到我兴奋的心情,伴我游了一阵,于是复归坦然。

我们这个寝室，可能是全年级小资情调最重的，用我们自己的话说是有艺术氛围，用比较官方的话来说是有自由化倾向。比如，我们会去文二路餐饮店买来大桶的啤酒，在食堂多拿几份肉圆菜底，大碗碰杯大声歌唱、喧哗。我们中有两三个是带工资上学的，比有些同学宽裕。其他寝室的同学往往应声而来。七七级的吴雪景是号称要当电影配音演员的，也喜欢在我们这里朗诵《简爱》里罗契斯特的道白，赵简则大谈在西泠印社的见闻，走读班的王小川、宋一洲是我和郑鸣的常客，加上陈白夜，畅谈书画篆刻兴味不减。甚至外系的朋友也常常光临，郑鸣的“插友”，地理系的阙维民，常常来忆苦思甜，现在调到北大，是我在北京的对门邻居。我的工人朋友、后来成了浙江日报“名记”的朱成方，也来我们寝室吹牛，浙江大学力学系高材生，学生会主席严峻、华东师大徐震堦教授的弟子吴各、美院周沧谷教授的妹妹周素子，也来高谈阔论。严峻与《伤痕》的作者是中学同学，自然话题颇多。周素子的先生是著名戏剧家，胡志毅后来和他家有了更多的来往。所以，此虽“陋室”，却有“裴多菲俱乐部”的嫌疑，当然属于改造之例。徐小洪和李瑜的移出，换来了樊诗序和郑广宣的进入。殊不知，这里已具有“染缸”的色彩与能量。老樊给我最初的印象是，第一，对日本文学很精通。这可以用他熟读夏目漱石《我的猫》并着手翻译日本短篇小说得以证明。第二，用左手写字，是我看到的写得最好的钢笔字之一。听人说左手写字的人往往有异才，现在算是见到了。于是有几次出黑板报，我也请老樊出手，使“蓬荜生辉”。广宣的刻板的军人表情一开始有点震慑力，但后来其浓浓的上虞口音里其实带有绍兴式的幽默，有时还带点穿越。特别是毕业后他“弃政从文”并多次提出要为我父亲出文集，令我刮目相看并心存感激。这次寝室人员的调整，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那就是调到 9 组的徐小洪与 9 组的女同学高琦华成了情侣，而调入本寝室的樊诗序抓住了我们 4

组女生王琳的心。估计当年煞费苦心调整人员的系领导和年级辅导员邬乐萍不会想到会有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成果。

很多出格的想法和行为，往往发源于这个寝室。首先写带色小说的陈叶葳也是第一位竞选成功的班长，已经有“俄罗斯大叔”美称的胡志毅领头演话剧并且发起小合唱《伏尔加河 qian 夫》，老樊的男低音一发而不可收，从那时起就有了明星范。我的手风琴则在后来的毕业篝火晚会上让一支兴奋无比的小分队高唱《喀秋莎》走了好几圈，以致宣传忠（现已改名为宣传中）仪式般的跳火堆，曹布拉宣布活动费用全由他的小说稿费支出，中夜，晚会才令人依依不舍地落幕。

骨子里的小资情调和“杭大中文系 78 级”的特质，似乎难以消弭，影响了我们后来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无论在校和在毕业后，原来的这几个老同学，时间一长还是“熬不牢”要呼唤一下：“喂，哪天喝茶去噢！”“有好酒，过来喝噢！”

于是，今年春天，我又将大一时寝室墙上曾经贴过的《保俶的情影》略作修改，在“纯真年代”书吧的聚会上读了一遍。

翻过初阳台
因为无心观太阳的升起
走进抱朴道院
寻当年道姑的古琴
琴不复存在
那匈牙利画家画的肖像
似流着潺潺的琴音
探头望一眼炼丹的古井
只见一张葛洪般
苍老的脸形

.....

海阔天空的闲话已经聊完

上好的龙井茶也被喝干

知道山的那边

女生们又在嘲笑

那几个一事无成的

书生

.....

往事如烟，人生如梦。能让人记住的，都是好梦吧。

(写于 2018 年 10 月，进杭大中文 40 周年)

[返回目录](#)

永远感恩我伟大的母校

——杭州大学外语系 83 级英语专业李共扬

初识母校杭州大学是因为我的恩师，缙云新建中学一代名师杨



(第一排右一为作者)

明昆就是母校的学子。1983 年 9 月中旬，我和朱文飞、陈育松、黄伟明、阮瑾、朱建英，6 个本是缙云新建中学杨明昆老师的学生也像他一样成为杭州大学外语系的学子，从此杭州大学就成为了我的母校，名师杨明昆也从我的恩师就变成了我的师兄，幸运的我从中学起就已经得到了母校的培养，由此也更增添了我对母校深深的怀念与感恩！

1. 迷茫的大一与大二短暂的文学梦

上世纪 80 年代是刚刚奏响改革开放序曲的时代，刚进母校就听到了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将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费翔的《在那冬天里的一把火》；阅读到了三毛、琼瑶的小说，弗洛伊德有关精神分析的作品，科普书籍《第三次浪潮》；观看了美国立体电影《星球大战》，国产电影《人生》、《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内部片《原野》；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陈真》；从金发美女美国外教那里学会了以美国乡村音乐为背景的集体舞；班级舞会上，美女同学们又教会了我三步、四步交谊舞；球场上，帅哥同学们又教会了我踢足球；目睹了母校大礼堂法律系和中文系同学们唇枪舌战的辩论会中，突然让坐在台下母校党委书记夏书记上台

回答为什么青年教师宿舍男女同厕所，逼迫他表态什么时候解决？记忆中的夏书记十分宽容地微笑着表示一定尽快改善青年教师们的住宿条件。



第一排右一为作者，参与母校南大门天目山路两旁迎接南疆自卫反击战中凯旋的英勇战士

我从一个山村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傻小子一下跳入母校这个熙熙攘攘、百花齐放、充满活力、思想多元、包容、活泼、开放自由的大海般的世界中，最初感受到的是新鲜稀奇、无比的兴奋，激情燃烧，而后渐渐地感到迷茫、无所适从。但我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青年了，心中已经不甘于只学英语专业了，我觉得

英语只是工具，我应该多学一个更加能为社会服务的专业。

记得 1984 年 10 月，作家李杭育师兄回母校大礼堂的一次文学报告会激起了我大二短暂的文学梦。我精读李杭育师兄以钱塘江流域古朴民间民俗为特色的系列作品，记得当时像发疯一样地在图书馆里，阅读贾平凹、张贤亮、路遥等当代作家的作品，深深地沉浸在文学作品所描写的意境中，以及感受到了文学作品能改良人心的力量！

2. 1985 年暑假劫难与大三大四的经济学家梦

1985 年 8 月我在老家缙云县新川乡夏群村过暑假，记得我母亲已经生病卧床多日，由于家里实在没有钱给她看病，我能做也只好一直陪伴着她。有一天的下午，突然有人踢开了我家的门，惊醒了正在午睡中的我和我病中的母亲。原来是乡政府的书记和乡长带着

一个收税的干部上门来收农业税，病中的我母亲说，现在看病都没有钱，农业税是不是可以年底再交？我母亲苦苦哀求，他们就是不同意，还威胁我母亲，要把她抓到乡政府去。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和他们理论起来。我说你们是父母官，我们整个村现在这么穷，你们当官的就没有责任吗？他们理论不过我，就暴跳如雷，要把我抓到乡政府去，我弟弟赶回家想阻止他们，他们又要把我弟弟抓走。我当时觉得不好了，就马上做了检讨，又泡茶给他们喝，请求他们原谅。没有想到他们一边说原谅我了，暗地里却已经打电话到县公安局派公安来抓我和我弟弟了。因好心的村民提醒，当天我和我弟弟逃脱。第二天他们又以只要我和弟弟到派出所检讨就了事做诱饵，诱骗我和我弟弟主动到派出所，捏造我阻碍公务和我弟弟殴打公务人员的事实，给予我 5 天，我弟弟 15 天的行政拘留处罚。他们说也明白就是要让我回老家当农民！我理解了“苛政猛于虎也”！

1985 年 9 月暑假结束后，诚惶诚恐地回到母校，没有过几天，年级辅导员王小璐老师收到来自我老家政府要求开除我的信后，不露声色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暑假里发生的事，我顿时泪流满面地哭诉发生的一切，她静静地听完后，不但没有说一句责备我的话，反而说了许多安慰我的话！外语系谢世娥老师也为保护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原以为可以安心下来好好学习了，但不久母校派出所也收到了缙云县公安局寄来的有关我曾被他们拘留的信件，出乎意料的是当时母校派出所所长周成富老师听完我的哭诉后，义愤填膺地说，他要为我讨回公道，并鼓励我放下心里包袱，继续好好学习。1985 年暑假的这场大劫难就在母校老师们父母般关爱和保护下平安渡过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当年母校老师们父母般的关爱和保护，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正常地走完我完整的人生！所以今天为

了向曾经保护过我的母校老师们表达深深的感恩之情，我必须把母校老师们为我保密了 30 多年的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公开！

经历了这次劫难后，我开始真正地思考我应该学什么了？我想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贫穷，贫穷的根源就是经济不发达，我要学习让国家富强的经济学。所以我找到了母校经济系的丁之江教授，拜他为师，到经济系听各门课程，如吴梦皎老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谢瑞淡老师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到图书馆借各种各样的经济学书籍自学，除了熟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以外，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如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制度经济学、创新学派、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多有学习和了解。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经济系当时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读研的师兄徐尧兴老师，时时给我来信鼓励并指导我学习世界经济理论。大三大四两年是我学习生涯中收获最丰的时期，虽然在大四报考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研究生未被录取，但在母校的努力学习以为我今后的人生道路，打下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功底！

3. 放弃经济学家梦想与创富理想的实现

1987 年 7 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西衢州的浙江工学院浙西分校（现衢州学院）当英语老师，最初坚持追逐经济学家梦想，参与了丁之江教授组织的《凯恩斯以前 100 名经济学家》翻译工作，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但里面涉及的经济学知识太为广泛，尤其是大多为现代人所不熟悉的各式各样古典经济学理论流派，我们为此书的翻译工作付



出了不少努力，但当时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出版经费无法出版。这件事又一次让我明白了贫穷的可怕与无奈！

于是，我放弃了我的经济学家梦想，于 1992 年 9 月南下深圳打工、创业，用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分别在工厂实业、国际贸易、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等领域有所收获，基本实现了财富自由的理想！2008 年移居温哥华后，每年往返于深圳温哥华两地，过着苟且偷生、闲云野鹤的候鸟生活！

回忆往事，没有母校的培养，没有母校老师们的关爱与保护，就不可能有我今天的美好生活！我永远感恩我的母校！

（2018 年 8 月 9 日写于温哥华）

[返回目录](#)

捐书记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胡波

十五、六年前我捐了一批书籍给母校的图书馆（详细数目由于时间久远已记忆不清），为此还收到了学校图书馆颁发“捐赠证书”呢。

本来捐给母校的图书既不是祖传古籍，也称不上什么珍稀版本，数量也不多，那为什么要记叙一笔呢，说来有段不寻常的来历。

八十年代中期，我到非洲援外，有段时间驻扎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Freetown）。一天当地报纸刊登新闻说全球最大的浮动书店（the world's largest floating bookstore）环球航行途中将在当地码头停靠，欢迎民众参观。这对于地处西非一隅的小国来说不啻是一项重大年度活动，民众蜂拥前往。泊位边、舷梯上，人头攒动，有当地人，也有许多外国侨民。好奇的我也是其中一员。

承载着全球最大的浮动书店的船的名字叫“忠仆号”（Doulos）。她由一艘历史悠久的老客轮改建而来并由一家欧洲的慈善机构负责运营。船上工作的百来号人，从船长到司炉员、从厨师到服务生全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愿者。听说我来自红色中国（那个年代外部世界多这样称呼大陆），船上员工露出了诧异的表情。或许我是他们接待的第一个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吧。他们后来对我说，他们船几乎航行到过地球每一个角落，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机会访问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啊，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门刚刚打开不久。

浮动书店内图书很多，有新的，也有旧的，内容包罗万象。我当时在热情的接待员的帮助下挑选了数十本，涉及文学经典、翻译理论、知识百科，还有些通俗小说类书籍。那个年代国内年青人对

外来文化普遍有一种饥渴感，面对这么多原版书籍任自己挑选，价格也算承受得起，怎么可能放过机会呢！

一年多以后，我的援外任务顺利结束，启程回国。与其他同程队友不同，我的行李因为多了两纸板箱书，外加十几盘录音磁带（记得有 Michael Jackson、Madonna、Diana Rose。当时他们的歌声正风靡海外），大大超重。为此，还在机场海关交涉许久。

九一年我来澳洲后，由于自己从事的工作与这批图书的关系渐行渐远，我一直想给闲置在杭州老家的图书找个永久的归宿，好让它们重新发挥用途。没想到通过在杭亲属跟母校图书馆沟通一拍即合。他们表示非常欢迎。我挑拣出价值不大的消遣性图书，将其余的扎成 4-5 捆全部捐赠给了母校。

至此，经历了漫长的旅程和岁月后这批图书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写于 2018 年 9 月）

[返回目录](#)

我向母校交作业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周晓康

今年，2018，真是个不平凡的一年。有几个别有意义的纪念。令我瞻前思后，感慨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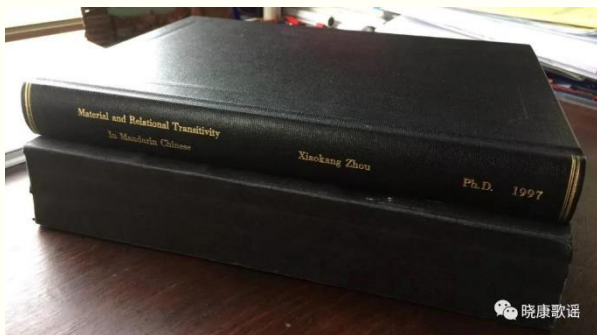
回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我们有幸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与文化断裂之后重入考场，以自学所得的优异成绩通过让全国上下、举世瞩目的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1978 年，77、78 级考入大学，我是其中一员，考入杭州大学外语系，至今整整 40 周年纪念；接着，1987 年中国首届博士研究生应考入学，我被录取到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学博士学位，至今 30 周年纪念；然后，1997 年我完成墨尔本大学语言学博士论文，1998 年获得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至今 20 周年纪念。

如今记忆犹新的是，1998 年夏，我回国参加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系统功能语法国际研讨会，宣读我的关于汉语及物性系统的博士论文节选。会后回浙江老家，特意去了一趟十年未见的杭大，因为我要给母校赠送一份厚礼。

进入杭大校门，迎面所见就是那焕发着书生意气、高耸入云的杭大图书馆（说实话，比墨尔本大学的图书馆更有气派，更夺人眼球），那工整、对称、错落有致的现代与古典风格相得益彰的建筑，堪称当年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学术圣殿。那时，除了上课，在校园里，我最爱的两个去处就是图书馆和 252 大教室，进去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像被钉子钉住了那样，丝纹不动。而且到了图书馆，最让人投入的是从书架的书和杂志里摘录经典句子，抄单词，记卡片，厚厚的一叠又一叠，实在来不及记了，就把书再借回宿舍接着看。因为图书馆有关门的时间限制，所以每次进去都特别珍惜那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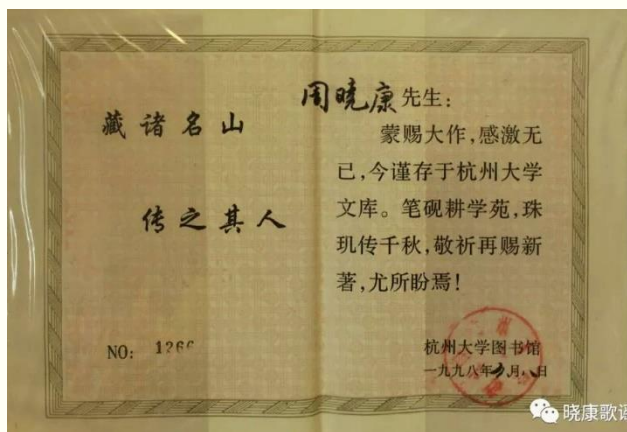
时间，分分秒秒都要用到刀口上。这就是我对图书馆情有独钟、挥之不去的记忆。

而十年后的今天，我来图书馆，身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要把我在墨尔本大学刚完成的博士论文的精装本献给母校的图书馆收藏，也为了有助于国内同一领域的学者和学生们查阅、参考。当时我的心情真像是一名远征回来的战士，带着自己“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成果凯旋而归，希望能得到母校的认可。那是因为我出国后的第二年，母亲不幸病故，临终前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句遗言就是要我坚持读完博士学位，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方可回国见“江东父老”。这就成了我当时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情况下能顽强坚持下来的唯一的动力和支撑。这次我就是来跟母亲和母校还这个愿的，我要让我的母亲在天之灵可以安息、欣慰。



周晓康博士论文精装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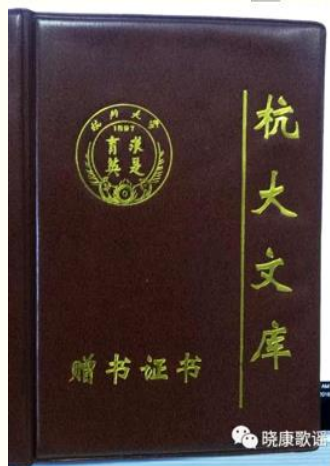
我情绪激动地走进了图书馆。当时一位图书馆的负责人接待了我（现在已记不得这位老师的名字了），只记得他很热情，彬彬有礼。我跟他汇报了一下我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情况，介绍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及意义。他听得很认真，还时不时提几个关于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前景问题，因为我研究的是以系统功能特征为选择项的汉语句式生成，他看到我的论文里有很多句法-语义系统结构图。也记不得当时是谁帮我跟他们联系的，他们那天早就准备妥当，在谈话快结束时，那位负责老师拿出了一本印有“杭大文库”几个大字的赠书证书让



我过目，里面已经用毛笔写上了我的名字和赠书日期，并盖有“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印章。

我接过这本证书，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那一刻的心情，酸甜苦辣，难以形容。

脑海里涌现的是从杭大起步，从本科、硕士、到北大英语系的博士专业，再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的语言学系的博士专业，这连着两个十年的寒窗苦读，一路拼搏，个中艰辛，非亲身经历难以言表。而追根溯源，我那洋洋洒洒十万字的博士论文离不开那些年在杭大外语系打下的最基础的英语写作、语法、词汇等基本功，以及后来在杭大中文系进修现代汉语语法的修炼。饮水思源，我在国外取得的任何一点成就，都要归功于杭大所给予我的听、说、读、写之启蒙教育。我的学术生涯从这里起步，也从这里腾飞。



从图书馆出来，我心里一阵轻松。这么多年来朝夕相伴的“亚历山大”，顿时销声匿迹，如释重负。那一刻，在校园里，见人就想大喊一声：我给母校交了最后一份作业！

（2018年12月2日于伊莉莎山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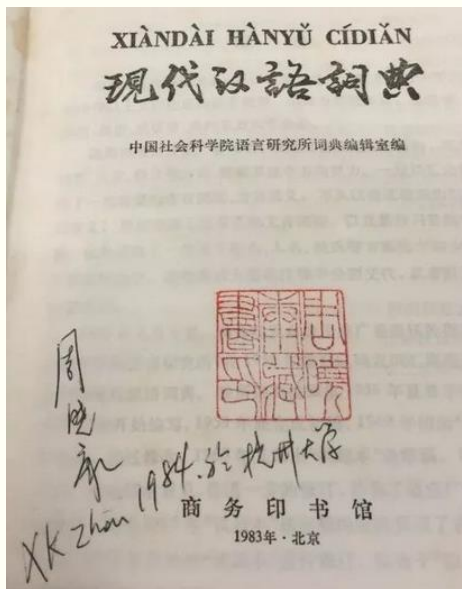
[返回目录](#)

“老掉牙”的词典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英语专业周晓康

今天南半球的维多利亚州中文高考笔试。上周最后一节课有个学生问我借汉语字典，因为考场里不能带电子设备，只允许带纸质字典。我把我奉为至宝的上个世纪 80 年代出的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借给了她。

打开一看，词典的扉页居然已经纸面上黄斑点点，明显是年代久远的标记，真没想到我也有了如此珍贵的老古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周晓康 1984 年于杭州大学”，让我想起原来是在杭大书店买的。



简直就像昨天！却不知它已经比我的学生的年龄都翻了一倍！陪着我走过了快 35 年！跟着我远涉重洋来到南半球的这个袋鼠国，形影不离，劳苦功高，也快 30 个年头了！它见证了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也记录着我们求学途中的步步艰辛和进取。

再看看封底，书价上标着 5.40 元，当时我带薪读书的月工资也就是 25 元，占了五分之一，也可以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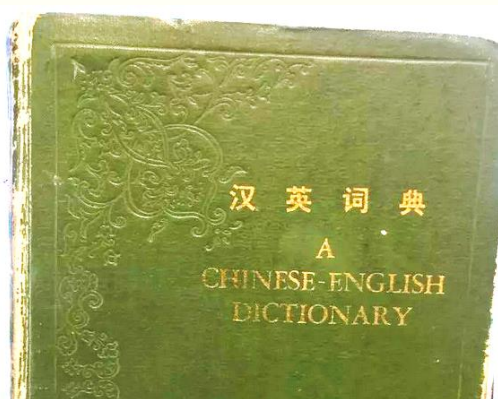
得上是个贵重物品了！当时肯定是咬咬牙买下来的：读书人再穷也不可以没有书，更不用说是一辈子受用的工具书了！即便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大家都在电脑上、手机里查阅单词，甚至电子翻译，可我还是钟情于这本“老掉牙”的字典（还有一本“老掉牙”的汉英字典和英汉字典，还是当年我在杭大教过的第一批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留学生中一位攻读汉语和国际政治学的博士生白桂嫻 Kristen Parris 回国前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依然喜欢用偏旁部首查阅生词，单词，感觉更可靠踏实。这也许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看家本领”吧！凡是这么一笔一划查阅的字，印象深刻，牢记不忘。至少我们的文章里不会有错别字！

而现在的学生，每天捧着手机、电脑、“笔记本”平板电脑，跟着互联网长大，生活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高三毕业考大学，很多人写作文还是错别字连篇，敢情就是不会或不用字典啊！所以不能不让我对着我的“老掉牙”的字典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看来这本字典还不能进历史博物馆，它还有它存在的理由呢！
填下面这首词，用以自勉：

【调笑令·词典】

词典，
词典，
录尽文辞千万。
书生学海何求，
怀揣百科探幽。
幽探，
幽探，
难忘校园书店。



(2018/11/19 写于伊莉莎山庄)

[返回目录](#)

关于杭州大学的客观评价

——杭州大学哲学系 78 级祝毅

1958 年 11 月 26 日以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为源头，秉承国立浙江大学和教会之江大学文理学科的浙江师范学院与新成立杭州大学合并。

- 1, 杭州大学在 1995 年教育部全国综合性大学（不含理工类大学）排名中列第 13 位（第 11 位厦门大学、第 12 位中国人民大学、分差分别为五分和二分）；
- 2, 全国首个大学评价体系 1996 年对全国所有大学评价杭州大学排名第 45 名：（第 42 名厦门大学、第 43 名北师大、第 44 名中国人民大学、第 46 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第 47 名南京农业大学、第 48 名中国石油大学第 49 名上海大学、第 50 名北京理工大学）
- 3, 杭州大学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首批自行审定增列博士生导师教师试点，与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待遇同。四校合并前，已经建有博士后流动站 1 个，博士点 30 个，硕士点 61 个。
- 4, 1996 年杭州大学通过国家教委组织的“211 工程”部门预审，成为二十一世纪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
- 5, 杭州大学是国家教委邀请开会单位：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部分部属大学（约占部属高校三分之一少）、个别地方大学（2~3 所）
- 6, 全国地方 8 高校协作会（后发展为 SC9）发起及会长单位。

全国地方 8 高校协作会成立于 1994 年，由杭州大学、辽宁大学、内蒙古大学、苏州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发起成立，山西大学

和郑州大学加入。现已称“全国九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协作会（SC9）”成员为：山西大学、云南大学、内蒙古大学、辽宁大学、西北大学、苏州大学、郑州大学、南昌大学、新疆大学等九所院校。

综合结论：杭州大学为地方高校中的领头羊、浙江省高校排名第二、全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十名左右，全国全部大学四十位左右。因地处浙江，生源很好。如果还在，以苏州大学现以跻身全国排名 25 位左右的现状为参照，加上浙江经济发展和杭州大学在浙江省的重要地位，发展成全国大学综合实力二十位以内应该没什么问题。设想浙江作为经济强省如果舍得投入和建设，实现省部紧密合作，将杭州大学发展成为 985 大学也不是没有可能。

[返回目录](#)

杭州大学“身世”概述（1952-1998）

—原杭州大学办公室主任张美凤

【编者按】

本文为校友史晋川教授推荐，原载微信公众号《浙大档案馆》：漫漫求是路⑦|西溪河滨吟弦歌（1952-1998）。据了解，本集撰稿人为校友张美凤女士，原杭州大学校办主任。经同意，转载时略有删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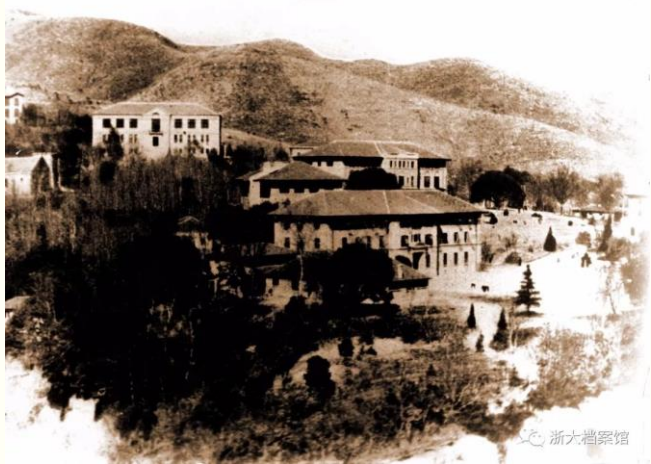
杭州大学是所有校友共同的精神家园。杭州大学的“消失”是我们心头永远的遗憾。可要说杭大是怎么样的一所大学，每位校友实际经历的其实各不相同。不仅因为校友们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系，更因为杭大本身也一直在变化和发展之中。从直接前身浙江师范学院算起，杭州大学从 1952 至 1998，共计四十六年。她曾经稳居国内同类综合性大学的前列。

本文即简要勾画了杭州大学四十六年青春年华的历史概况。各位校友可

以大体看出，自己所经历的杭大，是她的哪一段辉煌。



保俶山下，西溪河畔，坐落着一座端庄、典雅的美丽校园，这里就是原杭州大学办学所在地。作为一所文理为主，经、管、工科兼备的高等学府，杭州大学历经四十多年岁月洗礼，到1998年四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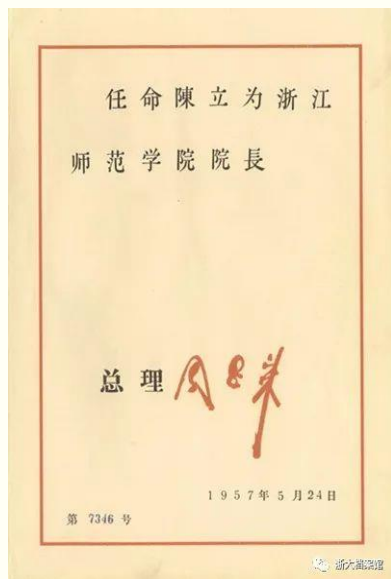
合并组建新浙大之前，已经稳居国内省属综合性大学的前列，成为同类高校中的翘楚。

杭州大学本来与浙江大学同源。前身最早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历

经历史演变后，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浙江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为主体，合并解放后创办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浙江俄文专科学校，成立浙江师范学院，设在秦望山上原之江大学校址。

1957年，浙江师范学院迁入杭州市松木场道古桥（现天目山路）新校址，将原之江大学校址改为分部。学院设有中文、俄语、历史、地理、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9个系和政治、体育2个专修科。

1957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陈立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



1958 年上半年，中共浙江省委决定筹办综合性的杭州大学。7 月，杭州大学成立，校址设在杭州市文三街，设中文、新闻、生物、化学、数学、物理 6 个系，学制 4 年。新创办的杭州大学于 1958 年暑假开始招生，9 月正式开学。同年 11 月，杭州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两校合并，定名“杭州大学”。两校合并后的杭州大学，定位为以人文社会学科为中心、文理并举的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原浙江师范学院所有的之江大学旧址校舍随后划归浙江省委党校。1960 年 7



图为 20 世纪 80 年代天目山路上的杭州大学校门

月，浙江省委又决定杭州大学与浙江省委党校合并，对外仍挂两块牌子。1961 年 11 月，杭州大学与浙江省委党校分开设立。

杭州大学对传统文理专业实行调整、保护和提高的方针，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史、中国古代文学、西方哲学史、比较教育学、教育史、历史地理、工业心理学、基础数学、算数数学、计算数学、有机化学等，都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部分学科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

【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1：杭大轶事】



中文系徐朔方教授（右四）、吴熊和教授（右三）与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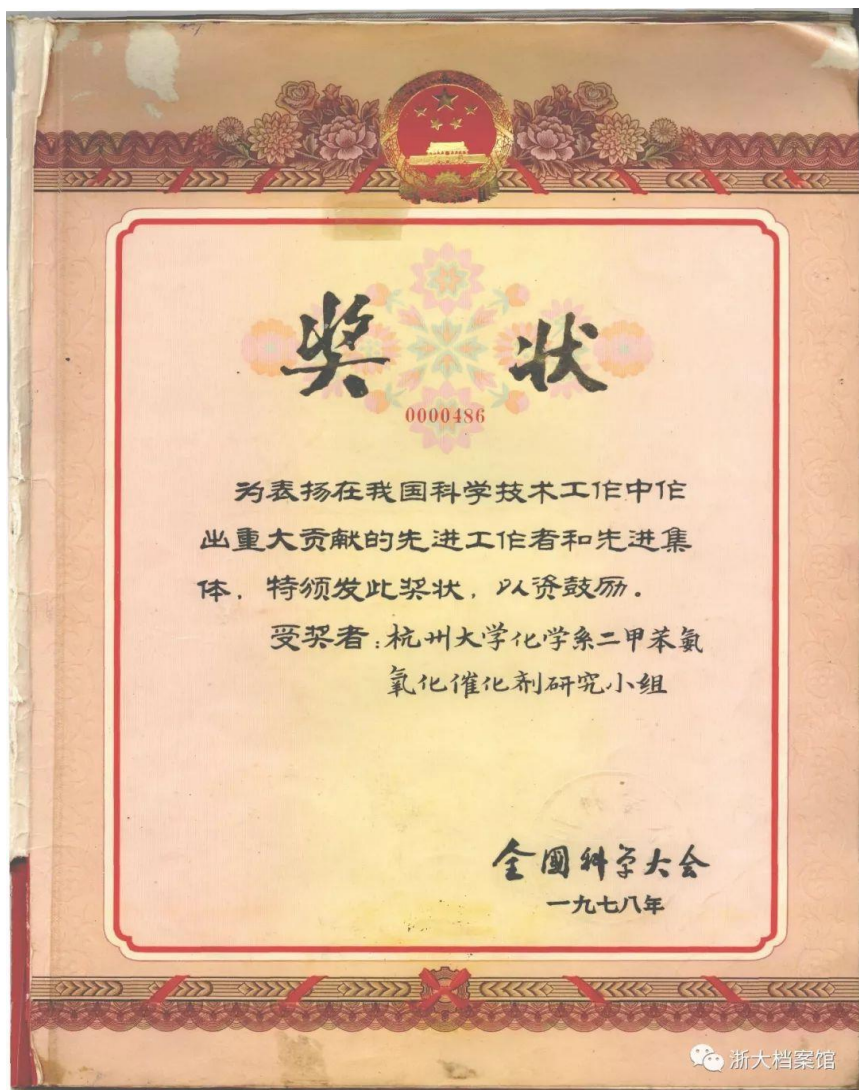
数学系召开学术研讨会。
左四至左七为王兴华教授、王斯雷教授、白正国教授、林正炎教授

对适应社会需要的前沿性、应用性专业，实行优先发展、拓宽面向的方针，旅游、财政、经济、外语、法律、新闻、经济地理学与城乡区域规划、图书情报与档案学、文物与博物馆、保险等一大批应用学科、专业得到了发展，获得了国内最早旅游管理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校还尝试实行新老专业的交叉与文理渗透，建设适应学科发展趋势的边缘、交叉学科和高新技术学科，新建了环境、生物工程、材料科学、信息科学、人口研究等学科、专业。



原图书馆楼改建后，成为行政楼与图书馆

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杭州大学8个项目获奖。



图为化学系获奖证书。

物理系王绍民教授的列阵光学理论，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等奖，实现浙江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零的突破。下图为王绍民教授（左一）在杭州大学科技文化节作成果介绍。



杭州大学以“求是、育英”为校训，坚持“打好基础、拓宽知识、加强实践、培养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因材施教教育原则，紧紧把握提高水平和服务地方两个方向，重视学术梯队建设，重视青年教师在学校各项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骨干作用，鼓励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不断夯实办学基础，综合实力和办学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效益显著，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1985—1995年的10年间，学校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数列地方高校之首，全国高校第13位，科研经费居国内同类大学前列，其综合实力列地方综合院校之首。



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学校组织了一系列专题学术报告会。
图为教育系第三次科学讨论会。



1986 年 4 月，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代表学校与德国基尔大学签订
校际合作协议



1996年，杭州大学通过“211工程”部门预评审，正式成为国家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高校之一。图为预审会闭幕式现场

1998年，杭州大学设有13个学院29个学系，建有博士后流动站1个、博士点30个、硕士点61个。学校共有教职工2700余人，其中教授210余人；全日制在校学生1万余人，其中研究生800余人。

1998年重点学科和实验室	
类别	名称
国家重点学科（1个）	心理学
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1个）	工业心理学
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5个）	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数学、化学、心理学
省级重点学科（6个）	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汉语史、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有机化学、计算机及应用
省级重点扶持学科（5个）	西方经济学、英语语言文学、经济地理、旅游经济学、生物工程学
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	应用化学、生物学、资源与环境信息学

上图为1998年杭州大学重点学科和实验室一览

1998年9月15日国务院通知四校合并之际，杭州大学已经是一所文、理、商、法、工、管、教育等学科齐全、基础较为雄厚、实力较强、总体水平较高、办学效益显著，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综合性大学。

历任校长（院长）一览

校名	姓名	任期
浙江师范学院	刘丹（兼）	1952.02—1952.12
	俞仲武（兼）	1952.12—1957.05
	陈立	1957.05—1958.11
杭州大学	林乎加（兼）	1959.05—1962.05
	吕志先（兼）	1962.05—1964.04
	王家扬（兼）	1978.07—1979.03
	陈立	1979.03—1983.09
	薛艳庄	1983.09—1986.01
	沈善洪	1986.01—1996.06
	郑小明	1996.06—1998.09

浙大档案馆

[返回目录](#)

求是育英，精神永存

杭州大学源流小考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郑良根

虽然再也找不到杭州大学的校门，凭记忆沿杭大路穿天目山路走进老杭大校园。回头一看，校门内侧四个金光闪闪的立体大字依然煜煜生辉：

求是育英！杭大人知道，这是母校杭州大学的校训。



温时幸摄于 2018 年 7 月 2 日

默默地，它似乎在继续诉说着杭州大学一段悠久而曲折的史话。

从字面上看，这个校训可以分为两段来理解：追求真理，培育英才。短短四字，把办学的宗旨和目标说得明明白白。而要继续追究它的来历，却又另有一层复杂而又深邃的意思，凝聚着血脉源流

的久远历史。它述说着，杭州大学正是从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发展而来，原来是两个校名，两支最重要的源流，两所同样诞生于 1897 年的新式学堂，也是浙江省乃至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发端之一。

先说求是书院。清朝末年，西学渐进。有浙江省巡抚廖寿丰上奏清廷兴办新学，光绪帝亲笔朱批，于 1897 年成立求是书院。学制 5 年，注重“新学”，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物理）、化学等课程。延聘外籍教师，也选派留学生。1901 年后数度易名，求是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和高等学校等。当时清朝廷风雨飘摇，办学也一步三摇。1914 年后停办。至 1927 年国民政府北伐攻克杭州，在旧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 年改名国立浙江大学，发展为文理工三大学院。1937 年日本侵华，上海沦陷，杭州沦陷，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到过贵州遵义、湄潭等地；也有过浙南龙泉分校，设有中文、外语、教育等系。如此颠沛流离的日子度过了九年，至 1946 年返回杭州。好像是“多难兴邦”，此时的国立浙江大学不但没有沉沦，却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名家。真实的原因，应该是 1936 年竺可桢担任校长时得蒋介石两大保证：一是财



源滚滚（不上限），二是人事取舍绝对权。有钱有人，做事就更容易成功。当然，更是校长治校有方，艰难困苦，也能玉之于成。竺可桢校长据传统的“求是”校名提炼为“求是精神”，并有独到的诠释：“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竺可桢时代是“国立浙江大学”最可圈可点的时期，好像“没有之一”！

到 1950 年中国新政府接管时，改名浙江大学，已经是个有七大学院 25 个系规模的大学校。

再表另外一支，一个同时期甚至是更加久远的源流。育英书院前身是宁波崇信义塾，始于 1845 年，于 1867 年搬到杭州，后于 1987 年定名育英书院。曾经在 1911 年改名之江学堂；后搬到杭州六和塔附近秦望山，1914 年改名之江大学，转制成为高等教育。这个学校是由美国基督教会南北长老会等资助运作的，是当时中国 13 所基督教会学校之一。之江大学那时的英文名称就是 Hangchow College.

虽然是外国人经营的学校，在中国饱受灾难的那个年代，也同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日子。1937 年为躲战乱炮火，西迁至安徽屯溪，随后仍然无奈将师生遣散；1938 年曾在上海租界数校合并复课；租界沦陷后，1942 年开始“流浪”，辗转于福建邵武，贵阳，重庆等多地，直至 1946 年逐渐返回上海，返回杭州。新中国建立后，美国人自知难以为继，退出学校管理。之江大学于 1950 年 1 月由新政府浙江省教育厅接管。

此时的之江大学，也已经是个文理工多科规模不小的大学。之江大学一脉相承了育英书院，在民国时期取得很好的办学成绩，培养过陈望道、朱生豪，郁达夫等许多优秀人才。

从求是书院而来的浙江大学和育英书院而来的之江大学，两大源流于 1952 年大汇合，即中国当代教育史上著名的高等院校大调整。两者的具体情况略有不同。浙江大学融合了厦门大学等多所院校的一些系科，也接纳了之江大学的工科部分；而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许多系科专业和教授师资分流到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十多所院校中去。在杭州，原浙江大学的农科，医科分离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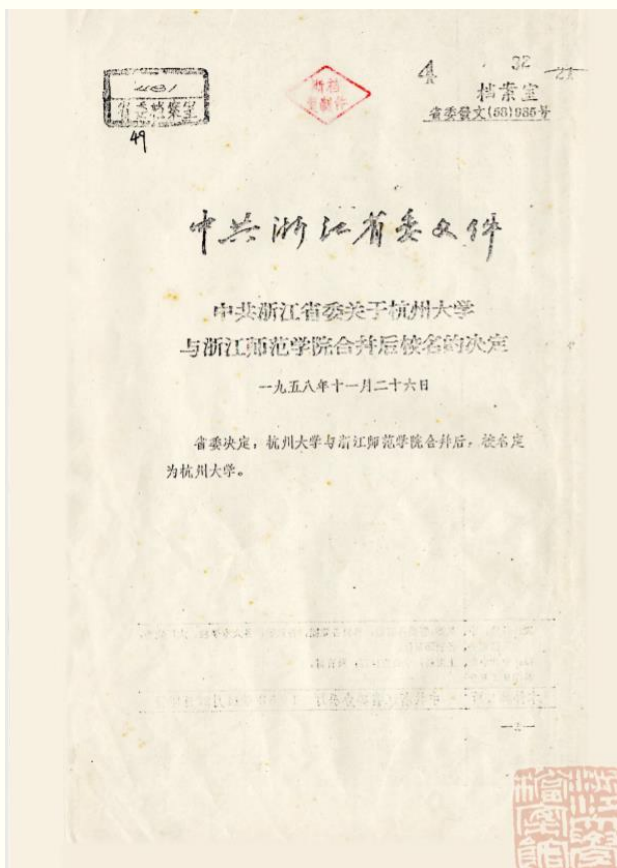
后来成了浙江农大，医大等；原浙江大学的文理学院都划到了浙江师范学院。开枝散叶，各立门户以后，浙江大学保留了工科的主要部分。

浙江师范学院是这个高校院系大调整留给浙江的一所新大学。“诞生”时校址就是沿用之江大学（秦望山）。其来源主要是接纳了原浙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和从育英书院发展而来的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等主要部分，换言之，浙江师范学院融合了求是源流的文理科和育英源流的文理科，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俄语专科学校。1957年，浙江师范学院搬到杭州市松木场一

带，已经有中文、历史，数学，物理，俄语，教育等9个系和两个专科。

时光到了1958年5月，一所新办的杭州大学横空出世！校址在杭州西溪路和文三街，原属于省委党校和省农工速成中学校址，成为杭州大学的主校园。当时设有中文、数学等6个系，新生于9月份入学。

1958年11月26日，浙江省委颁发



资料来源：浙大档案馆

文件，杭州大学和整个浙江师范学院合并，校名保留杭州大学。

至此，浙江师范学院继承的求是和育英两大源流，历史和血脉，全盘并入杭州大学。因此，说到杭州大学，有人以 1958 年 5 月“杭州大学”这个校名出世时算起；或者从 1958 年 11 月 26 日两校合并定名杭州大学算起；也有人从 1952 年高校院系大调整以来的浙江师范学院算起；而要溯其源头，因两支主干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则杭州大学的历史源头在 1897 年。

无论年份怎么算，传承着历史上的各个校名，一支是求是书院，国立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另一支是育英书院，之江学堂，之江大学……。两大源流，流经浙江师范学院，汇入杭州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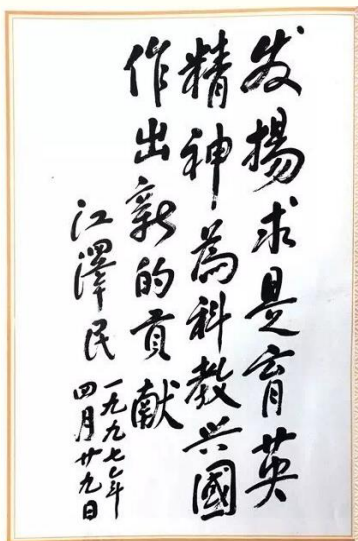
杭州大学，融合着求是和育英两大历史血脉；

“求是育英”，凝聚着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积淀。

（以上历史渊源，传承关系，见下页《杭州大学历史沿革示意图》）

1996 年，在杭州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在任十年之久的沈善洪老校长拍板，校委会决定将“求是育英”四字正式定为杭州大学的校训，既取用字面上求是与育英这个办学深意，又恰好延用了杭州大学两大源头书院的名字，可谓神来之笔，巧妙之至。

在杭州大学 100 周年校庆之前，“求是育英”这个校训制成四个金色的立体大字，立于杭州大学的校门内侧。从此，杭大人进进出出，抬头远方天际，低头求是育英。映入眼帘，记于心田；时时日日，三省吾身。



杭州大学百年校庆的众多贺词中，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贺词用到“求是育英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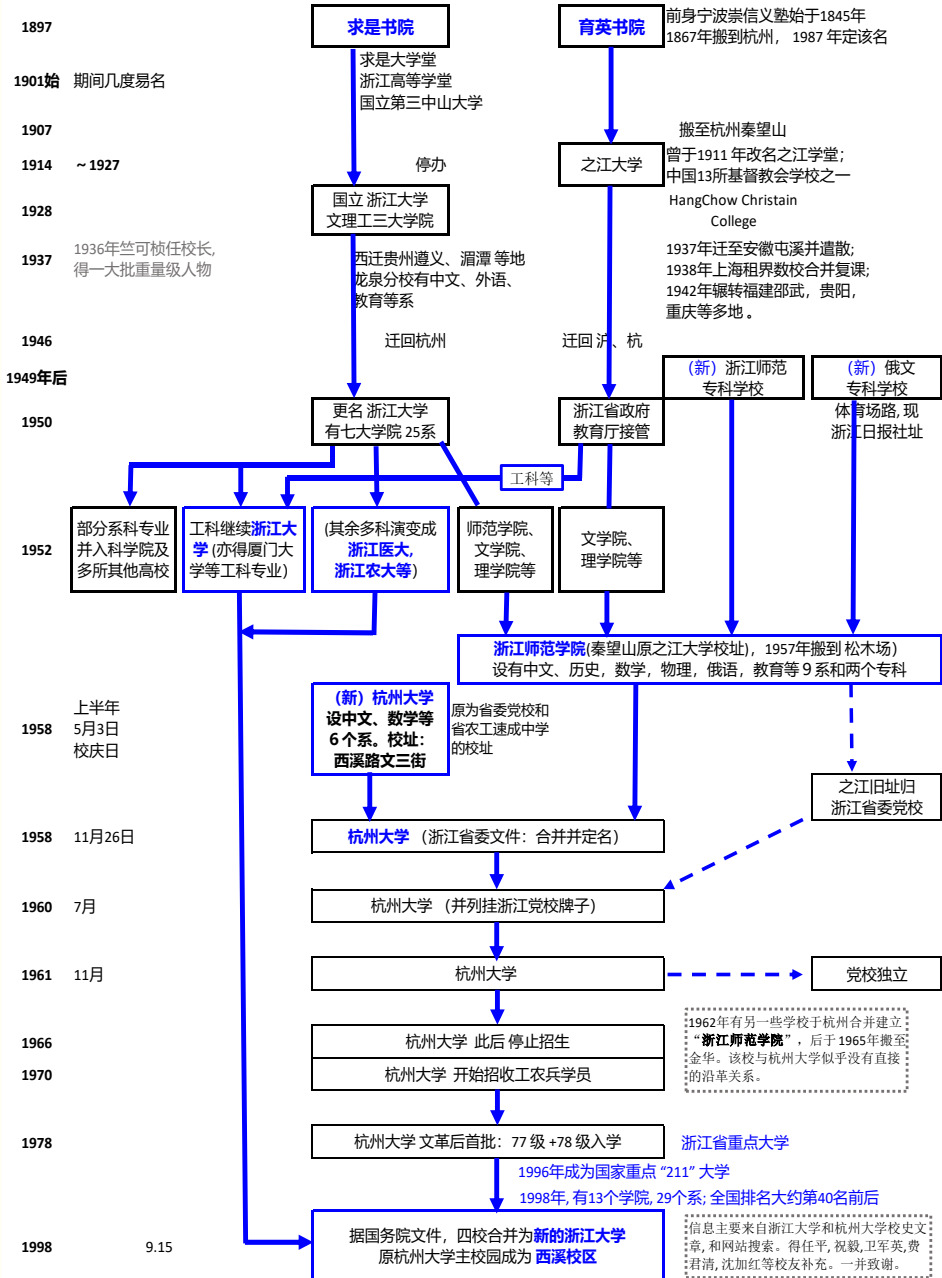
今天，“杭州大学”的校名没有了；
“杭州大学”的校门也没有了。
但是，“求是育英”四个庄严的大字依然闪闪发光；
求是育英校训的精神已经永远留存杭大人的心底。
求是育英，精神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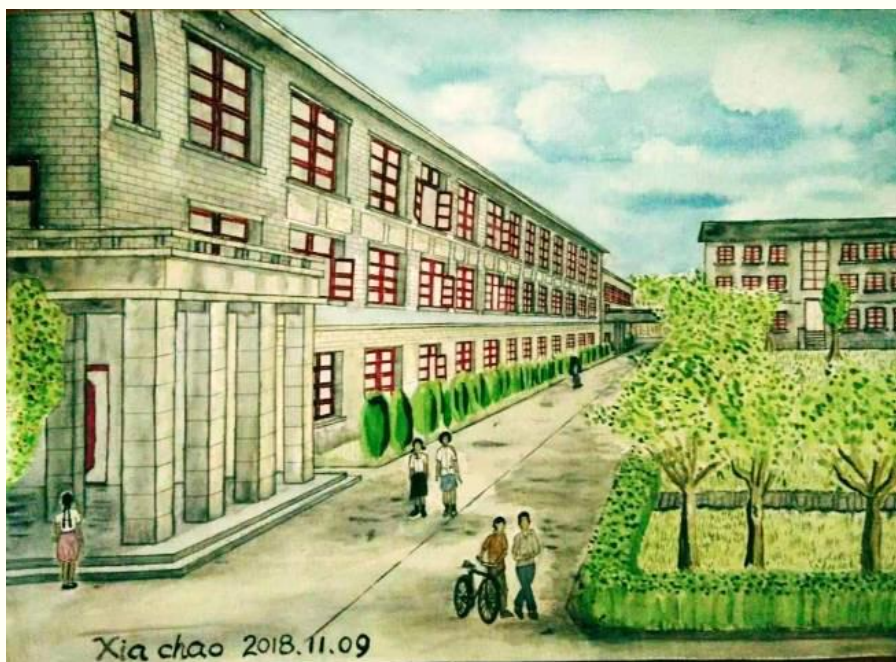
说明：本文信息主要源自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校史文章，和网站搜索，并得到任平、费君清、施建基、卫军英、祝毅、沈加红、史晋川等同学校友的“口述历史”补充和纠正；温时幸校友提供文首照片。在此一并致谢！

[返回目录](#)

杭州大学历史沿革示意图

郑良根整理、制图 (有些资料待核实) 2018年12月19日





“杭大”在哪里？

题《杭州大学回忆丛书》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施建基

-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路”里。宝石山下，黄龙一脉，白金之地。
-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新村”里。道古桥边，历史街区，年轮刻记。
-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民宿”里。古刹青山，蹊径另辟。
- “杭大”在哪里？在西溪校园里。求是育英，百年轨迹。
- “杭大”在哪里？在万人履历里。饱经岁月，遍走五洲，证书如一。
- “杭大”在哪里？在杭州人心里。在杭大人心里。
- “杭大”在哪里？在微信电波里。海内海外，永不消逝，昼夜接替。
- “杭大”在哪里？在旧书今作里。有史如河，诗词轶事泉涌不息……



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1-970152-00-5